

頭對著牆

大國的民主化

世界對中國大陸政治的兩大困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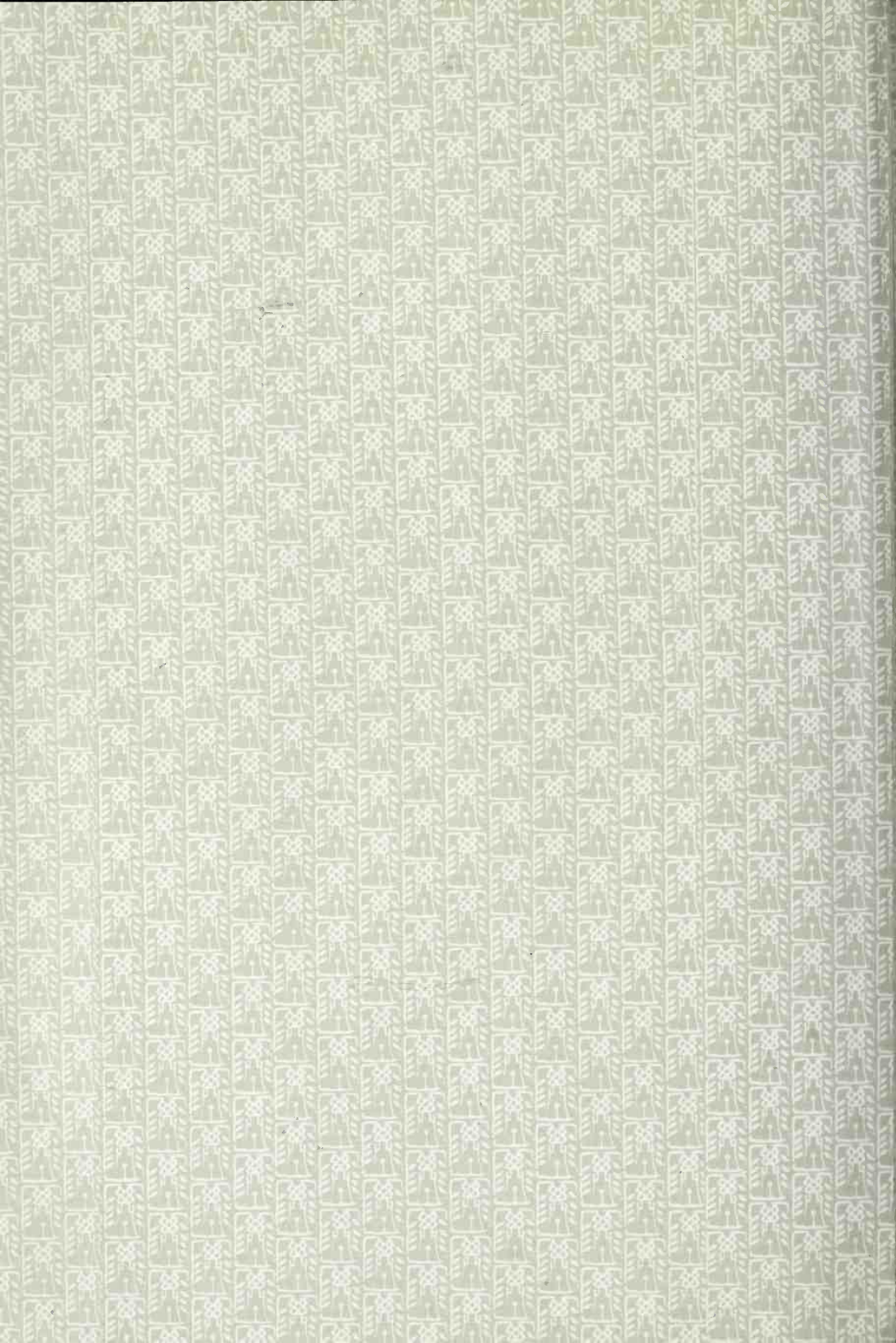
一是大陸現行政體到底是什麼政體？它是如何運作的？

二是中國大陸為何一百年來未能實現民主？

吳稼祥◎著

余英時撰序推薦

BOSTON PUBLIC LIBRARY
Copley Square
Boston MA 02116





CHINESE

文化叢刊

頭對著牆

大國的民主化

吳稼祥 著



序

這是一部「不拘一格」或「別具一格」的著作。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它的作者恰好生值一個最不尋常的時代，而又具有一番最不尋常的經歷。讀過吳稼祥先生《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原稿之後，我的第一個深刻的印象是：這是一部政治反思的自傳，全書自始至終無不有作者自己的經歷貫穿其間。

我和作者只有過一次晤談，內容主要環繞著本書的主題，未及其他。因此我對於他的經歷幾乎一無所知。讀完此稿之後，我才獲得下面這個大概的輪廓：他在八十年代中期參加了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的文件起草工作，先後追隨過胡耀邦和趙紫陽。胡耀邦主持中共十三

吳新祥 著

夏憐善齋

大園的吳主介

文
明
出
版
社

想不到的際遇。本書第一章有一段趙紫陽和鄧小平的對話值得引述：

趙說：「現在理論界有一種觀點，叫做新權威主義，意思是說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或混亂，還會出現反改革的干擾，爲了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我們必須排除障礙，保持穩定，建立秩序。爲此，在必要的時候，不惜採取鐵腕手段……」「我就是這個主張。」不等趙先生說完，老頭子就斬釘截鐵地說。

我特別摘錄這一段對話，是爲了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對話發生在胡耀邦死前不久，鄧小平以「鐵腕」鎮壓「六四」於此已見端倪。所以這段記錄具有史料的價值。第二，這是作者的政治和思想生命史上的一個最重要的轉折點，也是本書的緣起。「新權威主義」的觀點得到鄧小平「肯定」之後，作者在知識界的處境自然更爲尷尬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我自己的形象就變得有些可憐。我覺得被人罵得體無完膚，要比別人給我附加某種曖昧形象要舒服得多。」正是爲了要表明心跡，他才和朋友在五月中旬聯名給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寫了一封公開信，表示支持。這件事卻又成爲他後來入獄三年的導火線。

現在事過境遷，我們再回頭看看當時聚訟紛紜的「新權威主義」，好像「輕烟散入五侯

大報告起草時，他也是起草班子的成員之一。後來趙紫陽取代了胡的總書記職位，他自然而然地便成爲趙系統中的成員。這大概是他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身分，並爲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作者並不是傳統的「幕友」，只知一味揣測「府主」的心意，然後「操翰」成章，如清代汪中所謂「一從操翰，數更府主。俯仰無趣，哀樂由人，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相反地，作者擅於獨立思考，更富於研究精神。當時正值從經濟改革轉向政治改革的關鍵時刻。爲了配合業務，他也從研究經濟學轉向研究政治學。但是他的研究卻不是從學術專業的角度出發，而著眼於通識與效用。中國傳統知識界曾流行過「博士之學」與「士大夫之學」的劃分。前者指經生的專門絕業，其特色是「窄而深」；後者指一般從政者所具備的基本常識，其特色則是「博而通」。所以「士大夫之學」在過去一直是和「通經致用」的觀念分不開的。這一傳統劃分，無論就名詞與內涵而言，自然都已不適用於今天。然而「專家」和「通才」的分野在今天全世界都依然存在：學院中人屬於前者，公共領域中的知識人則屬於後者，不過知識分工越來越細，知識領域也越來越大而已。作者無疑走的是「通才」的道路，他研究經濟與政治也是爲了「致用」。通過他的獨立思考，作者在八十年代曾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建議，如「股份化」、「個人所有權」等，在當時顯然都是具有突破性的觀念。但是真正使作者陷入政治和思想的風暴中的，似乎是他在一九八九年一月所發表的那篇〈新權威主義述評〉。這篇文章一方面引起了當時知識界的強烈批評，另一方面竟有一番意

本書大致包涵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於中國現狀的分析；第二個層次則是在現狀分析的基礎上提出關於中國出路的構想。限於篇幅，這裡不能涉及構想的部分。但是我認為本書最大的貢獻是作者對於中國現狀的深入觀察。他所運用的一些感性描述詞，如「茶靡現象」、「一桶江山」、「穀倉結構」等確是既形象生動，又入木三分。這自然和他的不尋常經歷是分不開的。他不但出入過紅牆（中南海）和黑牆（秦城），而且出獄後爲了謀生，還一度開過小茶館，成爲他所說的「第四等級」的邊緣人。沒有這一「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生活背景，他便不可能把中國社會的上下下都看得一清二楚。這是他和一般書齋中的知識人最不相同的地方。

我已說過，本書不是學院式的著作，而是作者根據切身體驗，加上十年「面壁」，在苦思中得來的。這正是它的優點，而不是缺點。所以本書絕沒有藉「西方學術權威」的調子起舞。僅此一點，本書已給人耳目一新之感。無論我們同意或不同意他關於中國未來出路的展望，我們都不能不承認他說的是他自己真正相信的話。就現狀分析這一層次而言，他對於「極權僭主政權」的觀察不但根據確鑿而且探驪得珠之見隨處可遇。這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殺的。作者在〈自序〉中說，他「試圖把悟性思維、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三種思維形式都調動起來。」這句話並不誇張。我願意下一轉語：他的「理」是即事以立理而不是持理以限事；他的「悟」是觸處皆悟；他的「感」則是通感（Synesthesia）。作者遠道索序，情不可卻，

家」一樣，對於政局的推移並無左右之力。事實上，遠在六十年代末期，即杭廷頓關於權威主義的理論初面世時，臺灣學術界便已討論過這個問題，但也沒有發生任何顯著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爲此說僅僅是對於某些權威政府的國家所作的經驗總結，即使觀察可信，也不過是事後諸葛亮，而沒指導政治行動的功能。何況鄧小平已有「四個堅持」作爲意識形態的根據，他何取於理論效力較弱的新權威主義？當時真正欣賞它的恐怕反而是趙紫陽吧！無論如何，新權威主義終不過是曇花一現，僅足供讀史者憑弔而已。

但是對於作者而言，新權威主義的提出畢竟是一件大事。作者今天早已超越了這個觀點，然而「權威」的概念卻爲他提供了近十年來關於分析中國問題的契機。本書取名《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便是最明白的證據，而他在《自序》中也作了明確的交代。尤其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說，他最珍視的是從秦城監獄中偷帶出來的一張發黃的紙片。這張紙片上寫的便是本書的原始構想的幾條綱要，全是環繞著「權威」這一概念而形成的。大體上說，他以「權威」爲始點，在內涵方面越分析越細緻，在外延方面則越推擴越廣大。所以涓滴之水終匯成巨川，寫成了幾十萬字的一部大書。我可以說，他進秦城監獄時似乎還是一個新權威主義者，出來的時候已變成一個聯邦論者了。他爲什麼會有這一轉變？轉變的過程有些什麼曲折？這些問題都是十分複雜而有趣的，讀者必須細讀本書才能獲得答案，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

自序

如果將本書視作我的一個精神上的孩子，它的經歷頗為有趣：受孕於中南海，妊娠於秦城監獄，分娩於美國康橋，前後歷時十年，中間卻隔著生死之域。也就是說，這本書差一點胎死腹中，連同他的母體一起灰飛煙滅。他能夠面世，要感謝上蒼。因為它的這個經歷，讀者可以相信，它既是胡趙改革的難產兒，也是「六四」死難者的遺腹子。

也許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余英時先生在給本書寫的序言裡下的一個判斷：「這是一部政治反思的自傳」。他這個句子包含三層意思：首先，它是一部政治著作，分析的是中國政治，關心的是中國政治前途，提出的是某種政治解決方案的理論基礎，或者說是政治哲

姑略抒所見，以待讀者之印證。

余英時

序於普林斯頓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此處為極淡的印文，內容難以辨認，疑似為書籍的序言或正文內容。）

理論和「第二把手更換率」理論，都來源於這種感受。這些理論為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作了這樣的定位：它是一種從傳統神權政體向民權政體過渡時發生夭折而出現的臨時政體，它是一種失去權威本位的偽民主政體，它本身是動亂和不穩定的根源。

有一種流行的理論認為，中國之所以搞不成民主，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文化落後。這理論是成問題的。中國的經濟文化再落後，大概不會比半個世紀前的印度落後，也不會比今天的外蒙古落後，甚至比印尼還要先進些。怎麼解釋這些國家的民主化？

本書認為，中國民主化的真正困境是存在於大國的「民主——分裂陷阱」和「專制——統一循環」。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中央集權的大國搞民主，要麼把民主搞成文革似的「大民主」，要麼搞成今天這樣的「偽民主」，要麼搞成前蘇聯崩潰式的民主。這種現象，在政治上可以稱為「盧梭困境」和「薩托利障礙」。我通過一種全新的分析工具——「權威落差——權威距離」分析法，對此進行了論證，並提出了解決辦法。在中國，要民主，不要分裂；要統一，不要專制，除了聯邦化道路，我們別無選擇。

如果說「民主與統一」是大國民主政治實踐中的基本難題的話，那麼，「自由與權威」的關係，或者說「權威落差」問題，就是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為了從理論上探討解決中國民主實踐難題的道路，本書不得不觸及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

在我看來，人類所追求的政治價值主要有三種：權威（或者叫秩序）、自由和平

學基礎。

其次，它是一部反思之作，反思的是我於一九八九年提出來的新權威主義觀點。不少國內外政治評論家認為新權威主義是反民主的思想，這是誤解。實際上，新權威主義建議的是一條通向民主的道路，是漸進的、通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實現政治轉型的民主化道路。通過幾年來的探索和思考，我發現，在這條道路上潛伏著我當時還沒有看到的危險：法西斯化的可能。本書對這種可能進行了歷史考察和理論探討，從而促使我放棄了新權威主義的政治變革觀點，開始採取聯邦主義立場。

再次，它是一部思想自傳，它盡量還原本書每個重要思想產生的現場，甚至給你看思想分娩的痛苦。我的政治和人生經歷，也就是我的思想經歷。用海德格的存在者「對生存活動本身的領會」，而不是對領會的領會，不是對文本的領會。這種領會海德格稱為「生存上的領會」。如果這是哲學領會，它便是有血有肉的體溫的領會。

本書同時也是一部政治分析著作。它面對的是兩大政治難題：第一，我們生活其中的政治體制到底是一種什麼體制，它是如何運作的？第二，中國為什麼一百年都沒有要來民主，民主化的困境在哪裡，如何擺脫？

我對第一個問題的分析得益於我的政治生活經歷，得益於我對中國高層政治生活的近距離感受。我所下的「當代全權僭主政體」的定義，我所提出的權威本位理論、「茶廳現象」

本書是對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的基本分析和對基本理論的陳述。前四章可以看成一個單元，主要任務是準備分析工具。第一章相當於導論，敘述了本書的由來。第二章通過「茶廳現象」來分析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運行機制，並初步涉及「權威落差」概念。第三章深化第二章的分析，用木桶模型概括傳統中國的帝國統治，從中引導出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概念，給出了自由——權威曲線。第四章處理權威本位和權威分流概念。

從第五章到第八章是本書的第二個單元，運用第一單元提出的理論分析工具，用案例法和演繹法闡述了四個政治學假說，即權威化假說、自由化假說、侵略傾向假說和崩潰趨勢假說。這些假說充分論證了在一個東方大國，在單一政治體制下不可能達到自由與權威的均衡，也就是說，在中央集權條件下一個東方大國不可能有民主。換句話說，在給定的兩個條件（東方大國和單一制國家）下，求不到民主的解。

作為第三單元的第九章和第十章改變了第二項條件，在維持一個大國的國際權威條件下，把單一制國家改變成一個複合制的聯邦制國家，自由與權威便可以達到均衡，這意味著可以成功地民主化。

這種結構安排表明本書的結束並非本項研究的結束。本書只是試圖構造一個新的聯邦制理論基礎。也許需要第二本書對世界各國的聯邦制的制度安排進行研究；第三本書討論中國如何向聯邦制過渡。

等。西方早期的政治哲學著作大多分別探討或強調這些價值，比如霍布斯的《利維坦》把權威的價值置於其他價值之上；洛克的《政府論》則把自由的價值放在優先地位；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最珍視的則是平等的價值，他反對代議制，主要就是怕它會損害政治平等。

當代政治哲學開始關心三種政治價值之間的關係與平衡。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的《正義論》著重處理了自由與平等的關係，也就是正義問題。如果說自由與平等的關係問題是政治倫理學的首要問題，那麼，自由與權威的關係就是政治操作的基本問題，兩者都是哲學層面上的問題。本書的中心論題，便是自由與權威的關係。

本書提出了「政治人」概念，從中演繹出推動社會政治體制變革的「權威化動力」和「自由化動力」及其約束條件。還提出了政治體制的理想狀態是自由等於權威的均衡狀態，在這個均衡點附近建立起來的政體，是民主政體。社會波動是政治不均衡的表現。

在某種意義上，本書可以被看作是對盧梭《社會契約論》遺留問題的一項研究。《社會契約論》探討的是民主的小國模型，本書研究的是民主的大國模型。盧梭自己認定他的模型絕不能在大國實行，而國家過小又不安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本打算在完成《社會契約論》之後要開始邦聯制研究，他認為這「是唯一能結合大國和小國的一切優點的政府」。可惜他沒有時間從事這項工作。美國的聯邦黨人在實踐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但在理論上留下了需要進一步探索的空間。

致謝

校完全書之後，心裡一陣輕鬆，同時油然而生敬畏之心和感激之情。

能完成此書，首先要感謝暝暝中的神力。在我徘徊於生死門檻之際，處於萌芽狀態的本書思想彷彿是一根線，一根我捨不得扯斷的線，把我重新牽回生命的岸邊。雖然這樣的線還有幾根，但它無疑的是最柔韌的。無論如何要完成本書，似乎是一項指令，來自我靈魂簽下的契約。誰是甲方我至今還不明瞭，但對他的敬畏與感激將伴我終身。

可以不必接受，但我必須感激的是我的那些八〇年代的同事們。那些共同的焦灼與痛楚，觀察與思考，爭論與研討，激發了我最初的思想。沒有那段人生經驗和政治閱歷，就沒有這本書的起點。

在構思本書框架結構過程中，給我最大幫助的是單少傑博士。可以說，本書的思想結構

爲了把閱讀變成一件快樂的事情，本書採取了口語化的敘述風格，並盡量追求表達的快感。我沒有抽象地陳述思想，而是尋找恰當的形象結構來呈現思想。這樣，思想就不僅是可陳述的，而且是可感覺可觸摸的。我嘗試把中國傳統的悟性思維、西方的理性思維和藝術化的感性思維都調動起來，爲本書服務，讓悟性思維提供靈魂，理性思維構造骨架，感性思想敷設血肉。

這種風格的好處是增加閱讀的樂趣，壞處是可能損害表達的精確性和結構的嚴謹。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假如我過多地照顧了嗜魚者的口味，則要請熊掌愛好者原諒。畢竟熊掌是難得一見的稀有之物，可遇而不可求。

力；她的判斷力和鑑賞力，為本書的寫作引航。幾乎每一章在寫作前都和她討論過，寫好後她都披閱過。她的理性和客觀，使本書減少了許多因情緒而來的偏頗。

我的小女兒霏霏是我重生之後上天賜與我的禮物，是快樂的小天使。她的到來滋養了我的樂趣，激發了我的創造力。我的岳父黃義尚和岳母瞿福琴在我們出國之後，撫養霏霏，劬勤劬勞，我銘感於心。此書的出版如果能酬謝他們的辛苦之萬一，亦可略報我的感恩之心。

方式深受他的影響。在我遇到邏輯與敘述概念上的難題時，都要和他討論，他常常中斷自己的寫作，推敲我書中的概念和提法。我得益於他的地方，難以枚舉。

張煒博士、吳國光博士、嚴家祺先生、黃萬盛先生、陳奎德博士、楊建利博士和盧躍剛先生都耐心傾聽過我對本書結構和主要觀點的敘述，他們所給予的鼓勵增強了我將本書寫下去的勇氣；他們所給予的指點和辯駁，大大完善了本書的概念體系和結構。特別是張煒博士關於要尋找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兩者之間均衡，和把微觀動力與宏觀均衡聯繫起來的觀點，開拓了我的思路。

對余英時先生，我尤為感激，比感激更多的是尊敬。他與我素昧平生，我冒然求序，他慨然應允。沒有俠肝義膽士風仁德，何有此舉？

我還要感謝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是它讓我成爲它的訪問學者。沒有這個安排，我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完成這項研究和寫作。在促成這項安排方面，南希女士和陳小平先生提供了幫助，我要在此一併感謝。

此書能夠出版，張偉國先生出力之巨，非當事人無法想像。

感謝我的前妻李曼英，她將本書的最初提綱偷帶出秦城監獄，她還承擔起撫養和教育女兒未來的責任。

用感激來表達對我妻子黃雷的感情是不夠的，只能用愛。她的愛是我生活與寫作的動

目次

第一章 用腹腔鳴唱 1

一 出土的歌聲 1

二 權威分裂 4

三 從經濟到政治的探索 7

「為趙紫陽搖旗吶喊」？／權力三明治／發現西方也曾「隨地大小便」

四 圍剿 15

五 獄中沈思 19

一次玩笑／植根自己的土壤

- 四 儒、道、法三家權威落差理論 90
禮、分、名：儒家權威落差理論／法、術、勢：法家權威落差理論／慈、儉、謙：
道家權威落差理論
- 五 權威落差：權威與自由的比例 100
- 六 高峽平湖：當代僭主全權政體模型 103
- 七 自由——權威曲線 106
- 八 四大假說和木桶帝國的極限狀態 110
- 第四章 權威本位：瀑布的聯想 113
- 一 黃河斷流 113
秋風吹渭水／四個神話
- 二 三種本位的權威 121
父權本位權威／神權本位權威
- 三 人權本位及其變種 130
霍布斯和洛克的人權本位思想／主權公有制：盧梭「集權本位」思想
- 四 盧梭版的民主偽鈔 139

- 六 人類歷史上的第三個五十年 25
七 月暈 30

第二章

茶靡現象

35

第一把手 VS 屌絲

- 一 開到茶靡花事了 35
二 權威落差 42

- 三 陪襯人／安全感／更換傾向和神化傾向／嬰兒化
退化與動亂 55

- 四 第二把手更換率／反淘汰機制／周期性動亂
應是緣肥紅瘦 66

不治之症／短命的政體／百年尷尬

第三章

一桶江山

73

- 一 裁縫「德先生」 73
二 木桶帝國 79
三 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 86

第六章 解凍原理：自由化假說 199

- 一 趣文共欣賞 199
- 二 小臺、大臺與冰山 207
- 三 自由化動力（上）：資源產出壓力 212
- 四 自由化動力（下）：被奴役極小化 216
- 分裂動因：絕對主權論／政治參與／自由距離：天高皇帝遠
- 五 自由空間：危險的三部曲 225
- 六 一個案例分析：英國教會獨立 228

第七章 穀倉結構：侵略傾向假說 235

- 一 新加坡之夜 235
- 二 要是張伯倫知道有個侵略傾向假說 240
- 全面「綏靖」／脫韁野馬／納粹的「血統」
- 三 作為擴張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及其變種 248
- 變種之一：宗教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拿破崙主義／變種之二：財閥民族主義——法

五 權威分流 144

六 現代僭主政治的多重僭越 148

茶藤成爲PH試紙／「假冒偽劣」政治產品

第五章 山高水長：權威化假說 157

一 權威化動力 157

劉軍寧與胡鞍鋼／資源動員偏好／權威化的國家動力／權威極大化假設

二 秦國：被擴張推向專制頂峰 168

第一次推動／第二次推動／一元化／資源耗竭而亡

三 羅馬帝國：被軀體逼大的腦袋 180

好戰的「民主」／半截子帝國體制／腦袋改造不了身體／共和國死於龐大／震盪與

偏離

四 民主的權威化：美國聯邦黨人的創制 192

刺蝟聯盟／必要的反動：獅虎聯邦

出庸君，小國有明主／大國容易分裂，小國易於結盟／大國是平衡木上的大象，小國是小荷尖上的蜻蜓

二 大國的國際權威 315

護照的價值／國威的衡量／國威的「匯率」或指數／國際拳臺上的重量級選手

第十章 分級落差：大型共同體的內外均衡 335

一 大國和小國的不穩定狀態 335

手壓葫蘆：大國的內部不穩定／牆頭草：小國的外部不穩定

二 聯邦制：兼得小國自由與大國力量 341

分級加壓的灌溉系統／水向高處流：公民代理人管理政府／聯邦制是防止大國民主政體僭主化的更重要武器／主權約束

三 張力條件下的動態平衡 353

政治平衡與三大約束條件／均衡點與政治發展趨勢／「自由—權威曲線」下沉：政治上的「滯脹現象」／多黨三權：必要的張力

四 國威指數變動引起國家重組 362

安全—穩定假說／國威指數相對下降推動西歐聯盟／國威指數上升會激發後起專制

西斯主義／變種之三：工農民族主義—共產主義

四 侵略的預警信號：對民主反動 258

侵略性評估／德國和義大利／日本／兩伊戰爭和海灣戰爭

五 俄羅斯：專制與擴張的循環推進及終止 269

第八章 雪崩反應：崩潰趨勢假說 277

一 世界一片斷裂聲 277

二 木桶散架與「改革彈性」 283

三 案例分析之一：大英帝國的慢性解體 287

因父之名／公民權隔離和螃蟹策略／本土聯邦化

四 案例分析之二：大清帝國突然崩潰之後 295

中國的鏡子碎了／「聯省自治」／破鏡難圓

第九章 護照的價值：國際權威及其衡量 303

一 大國之短與小國之長 303

大國專制、停滯、腐敗，小國自由、創新、清明／大國多起義，小國多起訴／大國

第一章 用腹腔鳴唱

一、出土的歌聲

蟬是昆蟲界的名流。

中國最家喻戶曉的詩集是《唐詩選》，前十首詩裡，就有兩首寫蟬，一首是虞世南的〈蟬〉，另一首是駱賓王的〈在獄詠蟬〉。西方婦孺皆知的文學作品是《伊索寓言》和《拉·封丹寓言》，書中都有〈螞蟻與蟬〉的名篇。而昆蟲界的立憲者法布爾更是寫下了蟬的讚美詩，他的作品至今仍在最暢銷的書架上。

中國人歌唱蟬的清高，什麼「居高聲自遠」，什麼「無人信高潔」；寓言家諷刺蟬的不

大國的擴張野心／主權開放：後國家時代來臨

附錄：參考書籍中英文對照表 377

一九七九年國際法委員會關於國家主權的宣言

五 大國對小國的主權開放：自由——對自由主義的挑戰

第八章 大國對小國的主權開放

一 全球性國際關係的演進

二 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演進

三 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演進

四 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演進

五 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演進

第九章

一 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演進

二 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演進

三 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演進

四 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演進

五 國際法與國際關係的演進

教授就有兩種描述。一種是前提式描述，他認為對於不少中國學者來說，學說的大前提在國外，小前提在國內，從大前提推到小前提，結論才是自己的。另一種是除法式描述，被除數是國外的理論，除數是國內的情況，除商是研究者的成果。國內一度有爭奪某種主張首倡權的風氣，比如誰首先提出了什麼主張，誰就成了大家。主張不是理論，更不是學說，爭它何用？我比較早地提出了股份化主張，但我沒有必要被稱為「吳股份」。提主張是在比膽量，不是在比學問。作為年輕人，我膽量可能大一點，沒什麼可炫耀的。

我讚賞單少傑博士的倡議：在學術研究中恢復常識，注重案例研究。這本書是對他的倡議的一個回應。這是一支出土的歌，非常古老，又很新鮮。我的主題是古老的，權威和自由；我的理論是新鮮的，我從中國的樣本出發，從一個不同於西方民主思想家的角度論證了民主。即使是亞里斯多德，即使是盧梭這樣的民主愛好者，也未必弄清楚了自己為什麼偏愛小國；即使是杭廷頓也未必論證了他自己的一個著名論斷：兩個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發生戰爭。讀完這本書，讀者將會了解我的解釋。

本章著重敘述新權威主義主張產生的背景，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向理論框架拓進。這項研究前後花去了我十年的時間，雖然是斷斷續續的，其中三年在獄中。有悲有喜，有血有淚，有狂呼，也有嘆息。假如我的腹腔音色不佳，假如我的鳴唱過於尖銳，驚擾了什麼人的午睡，我會很抱歉。

切實用，像個流浪歌手，唱歌唱忘了還要吃飯；法布爾則為蟬平反冤案，恢復了蟬的受難者形象：蟬卵就受到飛蠅的戕害，吸食樹汁時又受到螞蟻之流的搶劫，為歌聲殉難後，螞蟻又肢解它的遺體……

其實，蟬的苦難來自它自己的命運和它自己的經歷。據說，蟬卵在土洞裡要掩埋四個冬夏，才能蛻化，才能脫去蟬衣，踉踉跄跄地爬上樹幹，開始試聲。如果它有耳朵，它肯定被自己的第一聲鳴叫嚇了一跳，不僅因為這聲音極其沙啞難聽，更因為這聲音並非來自喉部，而是來自腹腔。也許漫長的地下生活毀壞了它的嗓子和聽覺，但掩埋了許久的歌不能不唱，只好用腹腔鳴唱。

我很喜歡這個唱完了歌就去死的小東西。我在秦城監獄獨坐長夏的時候，它的歌給了我不少慰藉。我也像一粒蟬卵，被監獄厚厚的牆壁掩埋了三年，我也醞釀了一些歌，想要鳴唱，用腹腔鳴唱。我的兩肋有很多小鉞。

我在本書裡要唱的歌，和蟬一樣，都來自泥土。我在一九八八年底寫〈新權威主義述評〉的時候，還只有這支歌的幾個音符。在政治上指責我的人，說我是鱷魚，是在白手套裡藏著鐵爪的傢伙，是民主的叛徒，是專制主義的走狗；在學術上貶斥我的人，說我鸚鵡學舌，是杭廷頓在中國的跟屁蟲。

跟屁蟲是有的，可能不是我。描述中國目前的學術狀況，有很多方式。我的朋友單少傑

一直行跡可疑）產生的權威。最高名義權威有名義上的最高決策權，但他的決策不是最終決策，後面有個「無為無不為」的最高實際權威，有秋後算帳的能力。

趙紫陽有前車之鑑。一九八五年下半年，以胡耀邦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鄧力群為總協調人的元老派之間的不愉快發展成不調和，作為當時的最高名義權威，胡耀邦鼓足勇氣行使了一次決策權：免去鄧力群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職務，怕夜長夢多，立即電傳各省各部各委和各大軍區。第二天，各省各部各委和各大軍區收到了另一份由胡耀邦親自簽署的電文，免去鄧力群職務的前電作廢。

不是胡耀邦先生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是另一個和鄧小平分享最高實際決策權的元老陳雲先生打了他的耳光：指令胡先生收回成命。

在中國，只要老皇帝還在，兒皇帝就切不可須臾忘記自己兒皇帝的身分，所有關係到一二品大員的職務安排和權力中心轉移問題，必須奏報。兒皇帝光緒忘了這一點，丟了皇冠；胡耀邦先生有時也記不起這一點，也就坐失天下。

最高實際權威雖然有最高實際決策能力，但是他不能頻繁地決策，他的決策「名不正言不順」，他只能在幕後，不能上前臺。什麼時候他才出面決策呢？危機時刻，也就是除了他，任何人說話都無濟於事的時刻。這時候，要麼他的階下跪滿一片王公大臣，頂戴放在身側，乾燥的哭聲起伏彼起，請求他挽救王朝或國家；要麼最高名義權威的政敵分期分批登門

但既然我出了土，不唱是不可能的。你要知道，蟬這東西，是四載苦修，一月歌唱。

二、權威分裂

一九八九年是一個蝙蝠聚集的洞窟，記憶的蝙蝠晝伏夜出。暮色蒼茫中，打開電腦，一隻蝙蝠飛到我的眼前。

八九年五月初，我應邀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召開的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嚴家其所長主持會議。當時，與會者感到困惑，學生請願這樣一個本來不大的事件，為什麼如此難以解決，以致事態不斷擴大，社會肌體終於從低燒發展到高燒，甚至出現癡變。

作為後學，我不揣冒昧，談了我的一點淺見。我認為，這是我國當時的政治體制和權威現實必然導致的結果。現實就是，最高名義權威和最高實際權威分裂。趙紫陽雖然是中共十三大選出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是中國的最高決策人，是最高權威，但他的權威在當時只是名義上的，實際上的最高權威是鄧小平。

這是中國改革的「雙軌模式」在政治權威上的表現。一軌是老的，是歷史上形成的權威，是人格的權威；另一軌是新的，是改革中出現的權威，是經過某種程序（儘管這種程序

世時造成危險的權力真空和宮廷鬥爭。鄧先生本人就身受其害。

他的解決辦法是通過權威雙軌制，在生前就逐步完成最高權力移交。這是一個有點高尚的政治設計：主動放棄了既在名義上，又在實際上觸摸並把玩最高權力的心理享受。遺憾的是，他沒有想到，和他同輩的老臣們，沒有幾個人願意和他一起退出權力前沿。他們在舊的軌道上不斷向新軌上的一線決策者暗施冷箭，並且有意識地加劇權威分裂。權威分裂越嚴重，他們就享有越多的權力。權威的雙軌忽寬忽窄，在上面行駛的國家列車不可能平穩，不出軌翻車就算幸運。

嚴家其先生對我的發言給予鼓勵，說最高名義權威和最高實際權威分裂的分析是一個發明。但是，他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他所稱讚的正是他所反對的。他稱讚權威分裂的分析，他反對新權威主義，而權威分裂的分析正是我提出新權威主義的一個重要論據：權威分裂導致國家最高決策權虛置，統一決策權，要求兩軌權威併軌，向新權威合併。這就是說，讓最高名義權威實際化，從制度上徹底廢止與最高名義權威分立的最高實際權威。

這就是說，讓鄧小平光榮地但是徹底地退出政治舞臺。

三、從經濟到政治的探索

叩見，拜請他力挽狂瀾。

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的局勢得到控制以後，連中共中央委員都不是的鄧小平先生接見軍方首腦，表現出一代雄主的威嚴和雍容，他以顫抖之手再一次握住一座江山，當時沒有人覺得不自然或不適當。

這說明，權威分裂的政治體制，無法進行常規決策，特別是常規的重大決策，而只能進行危機決策。這種權威體制，是培養政敵的溫床。所有覬覦最高權力的賭徒，都可以扮演最高名義權威的對立面，然後等待問題或製造問題，並力圖拖延問題的解決，把小問題拖成大事件，把小感冒拖成胸肺炎，把名義第一把手拖下水，把實際第一把手拖到爐子上烤，然後重新瓜分權力。

不要以為只有最高名義權威才是受害者，最高實際權威也是受害者，更大的受害者是王朝、執政黨，最大的受害者是國家和人民。暫時受益的是那些從中分到更大份額權力蛋糕的權臣。清王朝末年是这样，鄧小平的最後年代也是这样。

不能認為是慈禧或鄧小平有意導演了這齣悲劇。特別是鄧先生，他設計的權威雙軌制原本是想解決共產黨執政以來一直不能解決的一個難題：最高權力繼承。毛澤東生前確定接班人的作法是失敗的，對接班人資格的爭奪引發了一次又一次高層權力鬥爭，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鬥爭危機還不斷轉嫁給人民，導致全國性災難。接班人地位的不能確定，還會在他去

九八五年八月三日的《經濟日報》上。它被吳敬璉先生稱爲「最早系統地提出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公司制改造的思路」①。正如吳敬璉先生所指出的，文章發表後，贊同者有之，但更多的是反對和不理解。王小強等人發表了《企業非股份化模式的思考》，他的意中人是日本模式，用銀行籌資解決企業的資金問題。如今，大量不良債務給日本信用體系帶來危機，不知道王先生是否對非股份化模式進行了再思考。

比更多還要多的反對意見沒有公開發表。一次我們理論局開會，局長盧之超先生在會上微笑著問我：「聽說你發表了篇文章，主張股份化？」他是鄧力群的得意門生，對理論界出現的新觀點保持與衆不同的敏感，是可以理解的，更何況他眼皮底下有了動靜。

「是的。」我說。

「你是在爲趙紫陽的改革搖旗吶喊呀！」

「之超同志抬舉我了，我哪有資格爲總理吶喊。如果真起了這種效果，我感到榮幸之至。」「搞股份化，恐怕不好吧？你是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呀！」看來，我調侃式的回答有點激怒了局長大人，他只好使出了看家本事：一劍奪命。

① 吳敬璉，《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頁二一八—二二〇。

1. 「爲趙紫陽搖旗吶喊」？

我一生前進的動力之一是羞耻感。

記得我上初一時好賭。一天下午，我在防空洞裡輸掉了六毛一分錢，那是我哀求了三個 month 才從父親那裡要來買鉛筆盒的錢。在我父親看來，每分錢都比車輪還大。當時很看不起自己。回到課堂，老師正在發作文本，打開一看，真是羞愧，我的上一篇作文只得了六十五分，批示是：請參閱某某作文。自從升到小學二年級後，這是很少見的得分。我感到羞耻。爲了洗刷它，我在小油燈下熏黑了無數次鼻孔。

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工作，幾年的彷徨又迎來一次羞耻。我的一個同學在山西省原平縣當縣委副書記，那兒的改革當時很紅火，他每次來京都很亢奮地和我大談他改革的業績。有一次，他邀請我到原平去考察，同行的還有另外兩個同學，一個在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一個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別的記憶已經淡忘，只有兩個印象深刻：一是原平的冷豬蹄很好吃，二是在談考察結果時我表現得很無知。幾年對經濟學研究的荒廢，讓我不知所云，我的同學的表現卻都很出色。那是一九八四年。

回來後，我開始下功夫。年底前我完成的經濟學論文是〈股份化：進一步改革的思路〉。這篇文章最早發表在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所的內部刊物《發展與改革》上，後發表於一

2. 權力三明治

第三個機緣是中國改革事業發展的邏輯和我對產權研究進展的邏輯的耦合。當時以放權為中心的改革走入岔路，用鄧小平先生的話說，你放權，他在那裡收權。權力放不到該放的地方，被中間權力結構截留了。結果，中央的權威資源減少了，自由並沒有增加，增加的是各級地方的割據勢力。

這就是我提出的「權力三明治」現象（在我發表於《中國青年》雜誌一九八九年六月號上的文章〈我的觀點〉中，我用的術語是「權力四合板」，為便於理解，現改為「權力三明治」）：我國的舊體制，用政治術語來說，是「全權政體」，政治、經濟、社會三種權力合而為一，都在國家手裡。放權並沒有使這三種權力分離，只是使它碎裂，使一塊大三明治碎裂成若干中小三明治，在「督撫」的餐桌上，在「府臺」的餐桌上，甚至，在「縣太爺」的餐桌上。這些權力三明治，用於幹事，可能不足；用於享樂，綽綽有餘。

當時我能想到的辦法，就是讓權力三明治分離。分離的結果，必然是經濟自由、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的發展。三權不分離，權力下放不一定意味著自由的增加，甚至可能導致自由的減少。我在本書中將闡述的一個假說表明，個人的自由與他離權威的距離成正比。權力下放，權威離個人還遠一點；權力放下了，只要沒有放到個人手裡，權威離個人反而近了，

這回論到我微笑了：「之超同志是否高估了我的能量？黨章上說的很清楚，在中國，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我哪有本事在中國把資本主義道路走通？」

局長猛然起身，大概是上洗手間去了。不知何故，沒有再回來，會議不歡而散。我從此和他所代表的體系結下了樑子。

正當我準備對股份化進行深入研究時，我被調到對胡耀邦總書記直接負責的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當時有個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是鄧力群，胡耀邦根本用不上。設立書記處辦公室，就是要代替研究室的職能，並且培養一批幹部。我在政法組工作，不久任副組長。有三個機緣促使我當時從經濟研究轉向政治探索。第一個機緣就是工作性質，我當時被告知，我們工作的性質就是做無名英雄，不要公開發表文章，我又被安排做政法工作，只好暫時中斷經濟理論研究，集中精力學習政治實務操作；第二個機緣是鄧小平先生於一九八六年初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讓胡耀邦總書記來抓這件事，胡讓書記處辦公室先開始研討，具體組織工作由政法組來做，組長陳福今負責，我協助。當時有八個年輕人和我一起工作，半年內，我們宵衣旰食，座談討論，精文簡章，輸肝寫膽，編成了七輯政治體制改革參閱資料。後因胡耀邦先生被免去總書記職務，這項工作交由趙紫陽先生統攬，他成立了專門班子研討，中共中央辦公廳這邊無意讓我去，我才轉向別的工作。

障。這個結論，不僅來自我對我國現實情況的研究，也來自我對西方個人所有權成長史的研究所，我從古希臘一直研究到日本明治維新。我把研究成果寫成了兩篇論文，一篇是〈萌芽與移栽：個人所有權成長的歷史道路〉^②，另一篇是〈傳統社會與個人所有權的未完全化〉^③，都發表在當時很有影響的學術雜誌《走向未來》第二卷和第三卷上。但是這兩篇文章並沒有造成什麼影響，雖然我認為，它們可以列入我寫過的最好的文章的前幾名。

這似乎是所有學者的共同命運：讓你浪得虛名的是你的膚淺，讓你垂名後世的是你的深邃。遺憾的是，這兩篇所有權文章既不膚淺，也不深邃，結果自然是湮沒無聞。不過，因為這項研究，我有一個發現，倒讓我進入了一場熱鬧的中心。這個發現就是：西方在個人所有權成長之初，權威和自由共渡過一個「蜜月時期」。

資本主義的萌芽時期，同時也是西方現代君主專制主義時期。四卷本的《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伯恩斯和拉爾夫稱這段時期為「專制主義時代」（一四八五—一七八九）^④；《全球

② 吳稼祥，〈萌芽與移栽：個人所有權成長的歷史道路〉，載《走向未來》雜誌，第二卷第三期。

③ 吳稼祥，〈傳統社會與個人所有權的未完全化〉，載《走向未來》雜誌，第三卷第一期。

④ 參見「美」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和菲利浦·李·拉爾夫著《世界文明史》中文版第二卷（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七年版），頁二五八。

自由也減少了。中央部屬企業變成地方企業後，它的職工，對此應當有切身感受。

恰好在一九八七年，我經歷了一次內心危機。胡耀邦總書記下臺後，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的地位下降了，我對當「無名英雄」的興趣也下降了。在趙紫陽智囊班子裡工作的朋友們請我過去，但我考慮到中央辦公廳的領導待我很好，而且趙紫陽也在主持黨中央的工作，我決定留在中央辦公廳。鮑彤邀請我重新參加中共十三大報告的起草工作，胡耀邦主持報告起草時，我是班子成員。

一九八七年，我和起草組成員是在中共中央別墅區玉泉山渡過的。那是一段難忘的歲月。我和黨內起草文件的大師和兩個總書記的大秘書鮑彤、鄭必堅一起工作，當然，還有龔育之先生，我像是他們帶的研究生一樣，把主要精力用於學習。我感到榮幸，這是精神上的；但是，當我在完成了當日工作的仲春的午後，懶洋洋地躺在花樹下，美景橫陳，草地上的小花隨風搖曳，這時，我看到了空洞，在我生命的某個部位。於是，我重新開始了研究。

3. 發現西方也會「隨地大小便」

我的研究仍然沿著產權改革的思路。提出某種主張不難，難的是如何理論化。我發現，股份化的前提是個人所有權的成長，解決「權力三民主治」問題，也必須從發展個人所有權開始，經濟權力分離出來了，其他權力才有獨立的基礎；有了經濟自由，其他的自由才有保

和日本；沒有這個時期的社會，現代化過程就磨難重重，比如中國和俄國。自由先行，權威隨後趕上的社會，現代化過程可能更順利，比如美國，但這種情況只適合移民社會。

這不是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的地方，對它的討論，是有待我去完成的現代化理論一書的內容。我在這兒想說的是，新權威主義主張，不僅僅是對東亞新興國家發展道路的概括，也不僅僅是把杭廷頓的政治秩序理論照搬到中國（他的理論來自對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的一般總結），而是來自我的獨立研究，首先來自我對西歐所有權現代化過程的研究。

如果說，不負責任的專制統治就像三歲小孩的隨地大小便那樣，那麼，西方人別忘了，在你們嘲笑未完成現代化國家滿地斑斑「尿跡」或累累「糞堆」時，你們國家的君主也曾經穿過開檔褲，也曾經把王座當糞坑，把國旗當尿布。

四、圍剿

張宗厚先生大大地喝了一口啤酒，輕輕地啞了一下嘴巴，把一塊魚肉放了進去，歪過頭，用有點含糊的聲音越過李澤厚先生對我說：「稼祥，你考慮好了嗎？說真的，你趕快發表一項聲明，放棄新權威主義觀點，我替你去辦，好嗎？來，乾這一杯！」

聽語氣，有點像勸降，但他完全是好意，是想救我，這時，觀點的分歧讓位給了油然而

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稱之為「民族君主國的興起」^⑤；《日本政治史》的作者信夫清三郎稱爲「神政絕對主義」^⑥。

說法不同，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君主權威的加強。乍一看，這似乎是胡說。個人產權的發展，意味著經濟自由化，在經濟自由化的同時，怎麼可能加寬了權威的河流？細一想，這就是歷史，是幾乎所有文獻典籍都異口同聲的歷史，只是我們自己視而不見。

如果是馬克思，他會得意而狡黠地對你說：「這就是羅陀斯島，在這兒跳吧！」他得意是對的，他發現了貨幣的「蛹」，如何變成了資本的「蛾」，贏得了世界的一片喝彩。我沒什麼可得意的，我只不過發現了自由女神也會和權威那老頭子上過床，結果，招來了一片唾罵。是自由不愛惜自己的貞操嗎？不是的。在自由出海的時候，必須有權威護航。它們是一對「俏冤家」，處不得，又離不得。在人類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變革的過程中，必定有一個權威和自由同時增加的時期。有這個時期的社會，現代化過程就很順利，比如英國

⑤ 參見「美」斯塔夫里阿諾斯著《全球通史——一五〇〇年以後的世界》中文版（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版），頁二八—三〇。

⑥ 參見「日」信夫清三郎著《日本政治史》中文版第二卷（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頁一八五及以後各頁。

「我是她最好的朋友。還不是因爲你，搞什麼主義，挨許多人批！我命令你趕快來看她！」蘋兒是女詩人，是我在大學讀書時就認識的好朋友。等她們看到我若無其事的样子才放了心。就在這前後，我還收到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個研究生給我寫來的信，對我表示同情，他在信中說，「我認爲，對你和新權威主義的批判，是建國以來非官方發動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批判運動。」是否真是如此，有待比較研究，但他有這種感覺，足以反應出當時的批判聲勢。

這場批判運動的聲勢本來可以更浩大，因爲全國最權威的大報《人民日報》開始介入此事，它在理論版編發了一整版有關新權威主義的文章，有我的文章，有別的主張者的文章，但更多的是批評文章。編者在按語中表示，要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但這股洶湧的聲討新權威主義的洪流，被一隻長滿老年斑的微微顫抖的手關掉了，像關掉一只小小的水龍頭。大約在胡耀邦先生去世前不久，趙紫陽先生向鄧小平先生匯報工作，在結束了所有重大事項的討論後，趙先生一邊收拾桌子上的文件，一邊說：

「現在理論界有一種觀點，叫著新權威主義，意思是說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或混亂，還會出現反改革的干擾，爲了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我們必須排除障礙，保持穩定，建立秩序，爲此，在需要的時候，不惜採取鐵腕手段……」
「我就是這個主張。」不等趙先生說完，老頭子就斬釘截鐵地說。

生的情誼，畢竟我們坐到一起出席民盟中央召開的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學術座談會；畢竟那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七日，學生們正固執地走向街頭，生死未卜，大家突然發現，我們還是在一個戰壕裡；畢竟我們正在午餐，已經幾杯啤酒下肚，心裡有了幾分暖意。

但是李澤厚先生和在場的嚴家其先生對張先生的話沒有反應，李先生在當時最新一期《未定稿》（中國社會科學院機關刊物《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的內部刊物）上發表文章批評新權威主義，我記得劉再復先生的文章也在上面，當然也是批評。除了刊登批判新權威主義的文章，那期刊物沒有刊登別的文章。這樣集中刊登此類對新權威主義實行大批判的內部刊物不少，我記得的還有《求是》（前身是《紅旗》，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雜誌的內刊《內部文稿》。

要具體描繪我那篇〈新權威主義述評〉發表後在社會上，特別是在學術界所激起的憤慨和圍攻，不是易事，但從兩件小事可窺一斑。

一九八九年四月的一天下午，我辦公室的電話鈴響了，拿起話筒，是一個怒氣沖沖的姑娘的聲音：「你是吳稼祥嗎？」

「是的。」我說。

「你這個家伙真是的，瞧你惹的事！蘋兒在哭呢。」

「蘋兒爲什麼哭？你是誰？」

這享受的不是幸福，而是力量。

五、獄中沉思

1. 一次玩笑

知了在窗外的白楊樹上拼命嘶叫，電動理髮剪在我耳邊嗚嗚響著，頭髮屑一撮撮地落下來，有的掉到地上，有的落在圍在胸前的白布上，有的滑進脖子裡，一陣陣刺癢。這是我一個月才有一次的與人相處的時刻，監獄管理人員在給我理髮。「如果是個女孩子就好了，」我當時想。女人和自由當時離我同樣遙遠。

「你的頭髮不多呀。」監管員說。

「是的。」我說。這不是明知故問嗎，前幾天，你到我的監室抽查，翻檢我的書頁，看見書頁裡夾著的一大撮頭髮，問我：「這是什麼？」

「這是我的落葉。」你奇怪地看看我，把我的「落葉」掃走了，現在怎麼又驚訝於我的「樹葉」稀疏呢？

嗚嗚聲停了下來。「理好了。不過對不起，理得不太好，前邊的頭髮留得太短。」

這個精神一傳達，很多人的文章寫到一半都流產了，而我自己的形象就變得有些可憐。我覺得被人罵得體無完膚，要比別人給我附加某種曖昧形象要舒服得多。當時，只有我的大學同學張煒最理解我的尷尬，並最終為這種理解付出了代價。他是天津開發區的第一任主任，當時是中共十三大代表、天津市副市長候選人、天津外貿委主任。他是我們同學中當時官做得最大的一個。大約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他突然從天津開車到家裡來找我，對我說：「你因為新權威主義的觀點被人誤解了，現在是個表明你態度的好時機，咱倆給天安門廣場上的北京大學的學生寫封公開信吧，支持他們。」

信是我們靠在他轎車上寫的，並由我送到天安門廣場。底稿被已關閉的《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記者張偉國拿走了，說要給什麼報紙發表。後來才知道他給了《經濟學周報》，並在此後的清查中被當局查獲，結果是張煒被監視居住，我被隔離審查，雖然我倆分別在五月二十日和六月三日中午向官方遞交了辭職書，但那只是被調查的起因，不能構成進一步被處罰的事實。

我至今不敢肯定，要不是因為鄧小平先生對新權威主義的肯定，和社會上對新權威主義的圍剿，我是否會寫那封信，或辭那個職。我在獄中自量，我畢竟是個小人物，經受不住別人的不理解，我沒有那樣的定力，也沒有那樣的自信。因為這個緣故，我很佩服鄧小平先生，他能頂住任何壓力，也不害怕任何不理解，即使不理解他的是他的家人。

生非的文章〈新權威主義述評〉，在文章中，我引用了榮劍的觀點：「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變在客觀上需要政治上的相對集權」；有趣的是，就在我的文章下方，赫然刊登著榮劍反對集權的短文。多年以後，聽說正在做房地產生意的榮劍又開始談權威。一次見面，我向他請教，爲何出爾反爾。他笑了：「那時反對新權威主義的人太多嘛！」現在又談權威，大概是反對民主的人太多吧？當然，我沒有問。

秦曉鷹和榮劍現象讓我從獄中一直思考到現在，使我深切感到，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學術思想上，中國都缺乏孤膽英雄。隨大流和起哄，是我國的一個社會特徵。無論什麼人，都想把自己的思想變成狂熱的群眾性思潮，並以吶喊來取勝。像英國思想家柏克那樣的思想硬漢，在我國，只有一個魯迅，獨自挑戰一群。

做孤膽英雄是需要實力的。我深知，在我提出所謂新權威主義時，我還是個政治學的門外漢。所謂「主義」，不過是個招貼，我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形成中心概念和系統思想，對這個思潮本身的來龍去脈也不甚了了。既然我被迫上了「秦城研究院」，就要好好思考。

於是，除了片斷地寫些詩篇和學術隨筆外，我在獄中開始對權威問題深入探究。

2. 植根自己的土壤

門「呀」的一聲從外邊打開了。有人對屋裡喊道：「八九一八，你這條衣領已經搓了兩

「沒什麼，只要你滿意就行，反正我的頭除了你們看也沒有別人看。」我滿意的是過程，不是結果。

他沒有笑。這是我記憶所及在秦城監獄被關押期間唯一的一次幽默，儘管我以前是頗有幽默感的。經過這次我才明白，幽默感來自人對局面的控制。局面在你的控制之下，你才有幽默感；局面超出你的控制，你有的只有荒誕感了。卡繆成了局外人，只能荒誕。

當時，命運跟我和整個國家的人都開了個大大的玩笑，而我並沒有感到幽默，真是可惜。當時控制我的是痛。以前憤怒批判我的新權威主義，強烈要求馬上民主的某些人，比如說秦曉鷹，連血腥鎮壓的權威都不批評了，反而在為它論證，「六·四」之後，很快就寫了一部電視政論片「社會主義世紀行」，仿照《河殤》的樣式；而我這個被看成是在當局的馬廐裡當「弼馬溫」，專為御馬的屁股撓癢的人，反而進了「老君爐」⑦。

還有一個小小的玩笑。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的《世界經濟導報》發表了我的那篇惹事

⑦ 秦曉鷹，〈跳出歷史的惡性循環〉：「新權威主義的出現，如果不是首倡者耐不住平淡，搞什麼轟動效應，至少也是對歷史的無知。這套主張在中國、在世界已到了白了鬚髮、添了壽眉、脫了牙齒的歲數。說它是為當權者牽馬隨蹬，似乎過損；但要說它是一種身著西裝，卻蓄著一條辮子，恐怕不能算過分。」

我們就是那條狗，民主就是那塊肉，拿竹竿的是盧梭。按照盧梭的方式在中國搞民主很難搞到手，他的民主理論只有在自由之樹上才能開花結果，在沒有個人自由的落後國家只能長出毒瘤。他的「公意論」否定思想自由，他的「人民主權論」第一否定個人利益從而否定市場，第二否定集團利益從而否定多個政黨。離開個人自由和政黨政治的任何「人民主權」都是虛幻的，都很容易蛻變為絕對的個人專制。後面我們將會看到，他的偽民主理論是現代僭主制最銳利的思想武器。

新權威主義是想在中國進行英國道路和英國政治思想的啓蒙，它的教條是自由，如果它有教條的話。我已經欣慰地看到，從一九八九年以來，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有了一點市場，柏克的著作被大量譯介。劉軍寧先生為培養這兩種思想的種子當了好多年辛苦的園丁，他的《保守主義》和《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兩本著作就是他培育出的兩棵幼苗。

但是，它們扎根的土壤並不深厚，一百多年來越來越狂熱的激進主義似乎已經進入中國人的遺傳基因，一遇機會就急性發作。塞爾維亞人是世界上最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之一，但與駐南使館被炸後的中國學生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一夜之間，美國成了中國最凶惡的敵人，昨天還被朱鎔基總理在美國閃射的光彩照亮了眼睛的人，今天就罵他是賣國賊。電視屏幕上，美國的文藝節目和體育節目像落葉一樣，被狂風吹盡，法國電影和巴爾扎克突然時

個多小時了！」八九一八指的是我，是我在秦城監獄的代號；向我喊話的人是武警部隊的哨兵，他站在門外監視我，通過門上的一個向裡放射的圓洞。在這裡，你過著絕對沒有秘密的生活，除了你的思想。我當時正在潛意識和顯意識之間掙扎，試圖搞清楚關於新權威主義論戰的來由。我猜想，這場爭論，基本上不是所謂社會主義思想框架裡的爭論，不是在選擇社會主義的救治方案，而是在為它料理後事，在設計後社會主義的政治道路。

在政治現代化方面，有兩條基本道路，一條是英美道路，一條是法俄道路。英美道路是自由之路，是通過培植個人自由實現社會民主；法俄道路是解放之路，是突然實現整個社會的解放，在暴政的廢墟上建設民主大廈。前一條路是漸進之路，是保守之路；後一條路是突變之路，是激進之路。

這兩條路都有自己的代言人，英美之路的代言人是洛克和柏克，法俄之路的代言人是盧梭。誰不想一步登天？所以大多數落後國家都熱衷於盧梭的學說，瘋狂於革命和解放的道路。可以說，盧梭的人民主權論和法國大革命讓中國人狂熱了近一個世紀，可是結果呢？結果是今天仍然在狂熱。

這使我想起一個寓言似的景象：一條狗拼命往前追一塊吊在它眼前的肉，可是怎麼也構不上，它的嘴張瘦了，牙齒被風吹乾了，因為那塊肉吊在一根竹竿上，竹竿在一個人的手上，那個人坐在一輛行進的車上，車行進的速度和狗跑的速度一樣：狗快車快，狗慢車慢。

個人動力。

從提出新權威主義到現在，十年過去了。我花了十年時間磨了這把劍（當然，也磨了些別的），物是人非，我心中早也沒有了戰鬥豪情，有的只是一絲柔韌的表達欲望。我想把這把劍當尺子來用，看看十年來，經過狂熱和冷卻，經過波峰和浪谷，經過滄海和巫山，經過老君爐和煉獄，我哪些地方萎縮了，哪些地方成長了，希望我成長了的不仅是鬍子或者年齡。

六、人類歷史上的第三個五十年

有人說，人生是漫長的，但關鍵的地方只有幾步。我們也可以說，人類歷史是漫長的，關鍵的地方也只有幾步。這關鍵的幾步在哪裡？在歷史發展的斷裂處。

美國政治哲學家喬治·H·薩拜因（他的名著是《政治學說史》）在回答「什麼叫政治理論」的問題時說過一段非常精彩的話：

「當人們瀏覽一下傳統上屬於政治哲學的歷史文獻時，馬上就會碰到這一事實，即這種文獻不是道道地地出自書齋或實驗室的作品。即使它是出於學者之手，它的作者也是把一隻眼睛盯在講壇上的。政治哲學的大量問世，是社會本身正在經歷艱難困苦時期的確實徵兆。

興，前蘇聯的保爾的中國版也在炮製之中。法國和俄國挺好的，我很喜歡，我不喜歡的是她們所患的歷史傳染病，來自法國大革命和俄國革命。

我雖然贊成洛克的議會民主理論，但我不準備把這本書變成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版本。這方面的文本太多了，多一本少一本沒有多大關係。洛克的議會主權模式和盧梭的人民主權模式雖然不同，但其論證的基礎都是一樣的：自然狀態、人權和契約理論。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民主理論，我稱之為微觀民主理論，它的起點是個人。它植根於西方商業社會土壤，採取的是比較小型的社會樣本。

中國是一個超大型社會，經歷了從傳統君主制到當代僭主制^⑧的演變，有獨特的樣本價值。我希望以大國為樣本，從宏觀權威模式出發，研究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的互動關係，從中推導出自由與權威的均衡模式，也就是民主模型。我想冒昧地將我將要闡述的這個理論稱為宏觀民主理論，當然，它也有微觀基礎，我提出了政治人假設，研究了自由化和權威化的

⑧ 僭主制是指個人獨裁統治，其權力既不來自神授，也不來自民授，最早被亞里斯多德系統研究，他提到了僭主制的三種形式（參見《亞里斯多德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一篇《政治學》，第一〇五頁以及後各頁，第一三五頁，及一三九頁），但他的三種形式都不能概括盛行於二十世紀的全權政體或極權政體，這種政體，我稱之為當代僭主政體。以後要專門討論。

思想的影響，這些人具有覺察危機的敏感和理智上的洞察力。」^⑨

薩拜因的話有兩點特別值得關注：第一，重要的政治哲學不是道地的書齋產品，不是從概念到概念的推導，它來自原始的生活經驗，來自對苦難政治生活的哲學反應；第二，同樣本的政治實體和政治制度的崩潰，會推動不同文本的政治哲學的誕生。在第一個五十年，民族內部的城邦制度坍塌，產生了兩個文本：《理想國》和《政治學》；在第二個五十年，以民族為界限的現代君主制崩潰，從廢墟上出現了另外兩個重要文本：《利維坦》和《政府論》。但是在二十世紀興起和崩潰的是不同於歷史上任何時期的政治樣本：當代僭主制。它的規模巨大，有時超出了一個民族的界限；集權程度極高，多數情況下是全權政治。傳統政治哲學的被子已經蓋不住這個龐然大物的身軀。政治哲學家不是寓言作家，不能把人鋸短以適應短的床或短的被子。我們需要為現代僭主制訂做一床被子。這個工作我們不能指望別人替我們來完成，就像古希臘人不能指望波斯人替他們發展出一套政治理論，當年的英格蘭人不能指望俄羅斯人解決他們的政治體制問題。

談論政治問題，要有切膚之痛。別人不知道我們的鞋的哪一部分在夾腳，雖然誰都知道

⑨ 引自喬治·H·薩拜因，《什麼叫政治理論？》，載《現代政治思想》，〔美〕詹姆斯·A·古爾德和文森特·V·瑟斯比編，楊淮生等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五年版），頁十一—十二。

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在幾乎長達兩千五百年的一段歷史中，相當一部分最重要的哲學著作是在兩個時期內完成的，每一個時期只有五十年左右，而且出自兩個範圍十分有限的地區。這兩個地區之一是雅典，時間是公元前三七五—三二五年，這個時期出了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另一個地區是英格蘭，時間是從一六四〇—一六九〇年的那半個世紀，這時出了霍布斯和洛克的著作，同時還出了一大批不那麼知名的人物的著作。

「應當看到，在歐洲的社會理性的發展進程中，意義最重大的變化都出現在這兩個歷史時期。在第一個時期，希臘城邦從文化上的領導地位跌下來，這肯定是古代世界重要的精神大動盪。……在第二個時期裡，形成了第一個以民族為界限的立憲國家，為知識上的和科學上的變化作了準備；這些變化支配著西方世界，至少直到一九一四年。

「這兩個事實都是說明政治哲學的特性的主要例子。對這種特性可以作無止境的說明，而且的確很典型。政治理論隱藏在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的裂縫中，這本來是給實體法和程序法所打的一個著名的比方。政治理論的確不是由這種危機產生的，而是由於危機對一些人的

我像一面旗幟被包圍在遼闊的空間。

我覺得風從四方吹來，我必須忍耐，

下面一切還沒有動靜：

門依然輕輕關閉，烟囪裡還沒有聲音；

窗子都還沒顫動，塵土還很重。

我認出了風暴而激動如大海。

我舒展開又跌回我自己，

又把自己拋出去，並且獨個兒

置身在偉大的風暴裡^①。

① 里爾克，〈預感〉，載於中文版《里爾克詩選》（臧棣編，中國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頁十一。

一雙小鞋會給所有比它大的腳帶來痛苦。上中學時我們接受軍事訓練，其中一個項目叫「拉鍊」，就是作長途行軍。五個小時後，我的腳開始痛，後果是右腳的第三個趾頭的指甲蓋脫落，這件事只有身受者知道。我做過我們國家的腳趾頭，也在國家的神經部位接受過從全身其他地方傳導來的痛感。被夾過，被痛苦淹沒過，我有條件寫一本哲學化的政治痛苦報告書。

政治樣本從小城邦（比如雅典），到中等民族國家（比如英國），再到超大型多民族國家（比如中國和俄羅斯），從原始民主制，到現代君主制，再到當代僭主制，這勾勒出了政治哲學最粗線條的發展線索。根據這個線索，我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應當是政治哲學發展的第三個五十年。從第一個五十年到第二個五十年，經歷了兩千年的漫長歲月；從第二個五十年到第三個五十年，只有不到三百年。當然，並不是說有了母雞就一定有蛋吃，有了政治危機就一定有偉大的政治哲學。只有具有敏銳的理智洞察力的民族才能像深海巨蚌那樣，從軟體上的傷痕裡長出璀璨的哲學明珠。

我就生活在這第三個五十年裡，而且國家的傷痕日夜環繞著我。我有里爾克感受過的那種預感：

這種效果，正是我追求的。我在寫《智慧算術》一書時，追求的是另一種效果，類似於古典音樂中的對位變奏，結構和語言都盡可能對稱，你可以說那是中國古代駢體文的現代翻版。這種結構的好處是穩定而且平衡，有節奏感，有形式美。不足之處是缺乏變化，不飄逸。弄不好，會露出斧鑿和雕琢過度的痕跡，像京劇人物的臉。

我在這本書裡採取虛實相間的敘述結構，實的是月，虛的是暈。月無雲遮不暈，谷無鳥鳴不幽。薄雲中的月亮，猶如輕紗裏著的美人，韻味無窮。這就是中國詩人或好的文章家所追求的意境。能否在政治理論性的著作中做到這一點，這對我是一個挑戰。

與文章結構有關的，是思想結構，這二者決定了敘述結構。思想結構方式有許多種，其中兩種方式比較典型：一種是東方特別是中國式的「兩點—漣漪」結構，二是西方式的高樓大廈結構。幾乎所有的中國古代哲學著作都是一場雨，每個作者有每個作者的雨，有的雨大，有的雨小，有的雨狂暴，有的雨細柔，有的是巴山夜雨，有的是渭城朝雨……有統一的風格，沒有統一的邏輯結構，你也可以稱這種思想結構為「無結構模式」。不過，這些雨基本上都下在水面上，每個雨滴都激起一圈小小的漣漪，這個漣漪，就是它不確定的解釋空間，很美，但不好把握。

這種結構追求的不是把思想表達得清楚，而是表達得美妙；不是表達得確定，而是表達得富有啓發性。對於經過現代科學訓練的人來說，這種無結構思想的美感不受歡迎。有一

我當然不會「獨個兒置身在偉大的風暴裡」，而且，我對風暴已經感到厭倦，我希望在風暴來臨之前把房子修好。我感到的是這種責任，我不敢推卸。

七、月暈

一天下午，我去看我的朋友單少傑博士。每當我在思考或寫作的小徑上開始蹣跚的時候，就去拜訪他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頂層的寫作室。彷彿那是一方活水，我是一條魚，離開那兒不能太久。

「哈哈，我正要告訴你，我發現了寫文章的一種美的結構！」我剛進門，他就大叫起來。凡有思維上的快樂，我們都急於相互分享。

我在落滿灰塵的長椅上坐下，喝下第一口清香的六安瓜片，問道：「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結構？」

「月暈，」他說，「好的文章都有月暈效果。文章越好，暈就越大。沒有暈的文章，讀者讀不出暈來。有暈的文章，也要有暈的讀者來讀，暈大的讀者可以讀出大暈，暈小的讀者只能讀出小暈。」

我和少傑可算是心有靈犀。他說這番話時，我這本書已經寫到序章的第五節，他所說的

的，你第一步踏進的可能是一座蘇州式園林，很具體，一切都在面前，看看到了頭，轉個彎又別有洞天，精巧而散漫，不經意中有經意，隨處可以終止，隨處可以伸展，這兒有殘荷聽雨，那兒有西樓望月……

請跟我來。

笠 茶蔭現象

次，我和一位剛從北京大學獲得哲學碩士學位的先生閒聊，我問他研究什麼，他說他研究海德格。我問他是否對中國哲學感興趣，他說以前很感興趣，現在有點討厭，中國哲學的不確定性和模稜兩可使他難以忍受。

中國思想結構不足的地方，可能恰好是西方思想的優點。西方思想稜角分明，像一棟高樓，結構嚴謹，從基礎到框架，毫不含糊。

思想結構的差別背後，是思想表達方式的差別。中國的典型表達方式是從具體上升到抽象，表達過程和思想產生過程保持一致，它的上升方式不是整體結構的呈現，像地平線上升起一棟大廈，而是分散式呈現，像濟南的珍珠泉，泉水如一粒粒珍珠，從水底漂向水面。西方式的典型表達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思想的終點，是表達的起點。這種表達方式優點很多，但有一個缺點，很難被還原為人類的原始生活經驗，思想家會掉進自己創造的語言和概念的迷宮裡，找不到通向現實生活的路線。德國哲學家胡塞爾的現象學、海德格的存在論和迦達瑪的解釋學，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爲了把思想還原爲生活，把人類引出思想迷宮。

我在本書裡想探索另一種思想結構方式，既想保持中國式的表達優點，從思想的起點開始敘述，也想向西方學習，讓思想最終有一個整體邏輯結構，有基本概念，有模式框架，有假說和推導。

這就意味著你走進這本書，不僅可能走進一場雨，還可能在某處碰到一棟樓，但最重要

第二章 茶蘼現象

一、開到茶蘼花事了

這個標題的關鍵詞是「茶蘼」。

關於「茶蘼」，《辭海》寫道：「薔薇科。落葉亞喬木，莖高四五尺，自根叢生，新枝及葉柄有刺，葉爲羽狀複葉。夏日開花，花冠爲重瓣，帶黃白色，甚美麗。」

這不是我要的解釋，我要的是文化解釋。不記得何時讀過一首詩，其中有一個句子「甚美麗」：「開到茶蘼花事了」。這詩句一直縈繞於我的心頭，可以說，它是我這本書的最初起點。本書最基本的分析工具之一「權威落差」，就起源於這裡。我很早就觀察到我國政治

一，「花事」終了，第二，「花」越開越小。毛澤東的「花事」是華國鋒終了了的，他是開在毛澤東花季裡最後一叢最小的花。

華國鋒這叢茶藤開花的時候，我還在農村當小幹部，做著各種不確定的人生之夢，但沒有玫瑰色的，都是革命的紅色。那時候，我有每天寫點東西的習慣。現在，我隨手翻開當時《每日雜記》中的一頁，就看到寫於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的兩首所謂的小詩，看內容，大概是歡呼中共中央十屆三中全會的：

其一

北斗燦爛群星亮，

舵手正確千帆發。

旗手英勇旗如海，

華主席英明黨偉大。

其二

三中全會喜訊傳，

全國人民遂心願！

領袖華主席知道咱，

生活中的「茶蘼現象」，後來又在類似的其他當代僭主制政體中多次觀察到，引起我極大的研究興趣。

茶蘼是春天的句號。花開到了茶蘼，春天的花季就結束了。這就是「開到茶蘼花事了」這句詩要說的意思。寫這本書時，我想查明這句詩的出處，可是手頭又沒有合用的工具書。於是打電話給好友王兆軍，請他幫忙，他學養深厚，文學功底非常人所及。他查過有關資料後告訴我，那句詩還不知來自何方，但有蘇東坡有關茶蘼的兩句詩看是否能交差：「茶蘼不爭春，寂寞開最晚」^①。我很高興。

這是在稱讚茶蘼自甘寂寞的品格，沒有無可奈何之意，沒有每況愈下的感嘆，也不是萬物無常也有常的達觀。就詩意而論，東坡恐怕要讓三分，他的「不爭春」有點勉強，畢竟，茶蘼是不能與牡丹和海棠爭春的。

茶蘼是一個花季最後開的花，無疑地，也是很不起眼的花。在什麼地方發現茶蘼，什麼地方的盛事便已終了，在人類事務中，也有這種「茶蘼現象」。這種現象有兩層含義：第

① 我後來購書，在書店翻閱《中國古代名言雋語大辭典》，終於找到了這句詩的出處。它出自南宋詩人王琪寫的一首名為《春暮游小園》的七絕，其中兩句是：「開到茶蘼花事了，絲絲天棘出莓牆。」該詩選在《宋代絕句六百首》中，載於第二六三頁。

有華國鋒願意先親身試試這種新醫療方法。我喜歡華國鋒。他的正直和誠懇，在腐敗的黨領導階層中十分罕見^②。

華國鋒可能是個相當好的和尚，只是被錯誤地當作菩薩，供奉在不適合他的大廟裡的不適合的高位上。在這個位置上就要要求繁盛的香火，儘管他會被過濃的香烟噙得透不氣來。他原本是個小人物，在他於一九六九年進入歷史聚光燈的邊緣，當上中共「九大」的中央委員和公安部長以前，人們對他所知甚少。人們後來知道，他此前最光輝的業績，就是在毛澤東的家鄉向毛獻對了殷勤：他作為湘潭地區的地方官，誠惶城恐地接待過毛，修建了從韶山到長沙的鐵路，在韶山建造了毛澤東故居陳列館，以便招徠並接納來自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朝聖者。他除了忠心耿耿，別無所長。

當毛澤東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去世後選定他來接替周時，連毛澤東的夫人江青都不能容忍，她指責華國鋒「蠢」，是「鄉巴佬」。從來就不了解自己丈夫的「紅都女皇」不知道，這個「蠢」和江青沒有提到的「忠」，正是自知死期不遠的毛澤東最珍視的品質，雖然他口頭上不承認。他說華國鋒「無私，不蠢，厚重少文」，所謂「厚重」，當然是「忠心」

②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文版，臺北時報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版），頁〇〇四。

早就盼著這一天！

盼著這一天幹嘛？開除「四人幫」的黨籍，恢復鄧小平的職務。你可以說這不是詩，而是狗屁。但當時的中國就到處充斥著這種狗屁。如果我沒有記錯，它們好像還在我家鄉的《銅陵日報》上發表過。當時在全國的媒體上，華國鋒根本不是什麼茶糜，而是最紅最紅的牡丹。「英明領袖華主席」是當時重複率最高的詞組，遠遠高於現在的「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這個用語。我高考的作文題就是〈跟著華主席，永唱東方紅〉。

其實，我們知道華主席的什麼呢？只是聽說他粉碎了「四人幫」，知道他當了「英明領袖」以後，把土裡土氣的小寸頭，變成了毛澤東式的「偉大領袖髮型」；知道他仿照〈東方紅〉裡「東方紅，太陽升……」模式，搞了個「交城的山來交城的水……」好像交城真要交上好運了，要繼韶山之後，做中國第二個太陽升起的地方；記得在一個場合，人們高唱完〈交城的山〉之後，歌中的主人翁華主席在現場帶頭熱烈鼓掌……

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越是茶糜，越要把自己描繪成牡丹。實際上，華國鋒本人是一個不錯的人。《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作者李志綏先生對他有很好的印象：

負責拯救主席生命的華國鋒對毛忠心耿耿；他誠摯地關心毛的健康和舒適，試著了解醫生的解釋，並相信醫療組已竭盡所能。我們建議從毛的鼻孔插胃管入胃餵食時，只

是第五個，雖然他不是毛澤東本人選中的，他是周恩來選來代替自己的，周於一九七四年六月用自己退入醫院的辦法，把鄧推到實際第二把手的位置上，總攬黨政軍大權；華國鋒是最後一個。

應當承認，除了小丑式的王洪文外，華國鋒是剩下五個可能的接班人中最無能、最不知名、威望最低的一個。論資歷，論對中共奪取天下的貢獻，論治黨治國治軍的才幹，他都比不上其他四個人中的任何一個。即使談到到處題詞的書法，他那幾筆柳不柳、顏不顏的筆畫，也只適合出現在小學生的描紅簿上。我們可以很不喜歡林彪的長相、習慣和為人，但他的軍事才能，他透悟事物的能力，他控制局面的力量，都不是華國鋒可以望其項背的。

人們確實困惑，在雄才大略的毛澤東坐過的龍椅上，怎麼可能坐著華國鋒。他那一點英氣和靈性都沒有的臉上，也沒有讓人看到多少福分。他的濃眉大眼，和厚厚的嘴唇根本掩飾不住讓人同情的蠢相。他對當時國家未來的所有信心，都來自於他智慧上的一片混沌。

就當時情勢看，人們可以說，華國鋒之所以能上臺，是他無意中當了一回「漁翁」，以江青為首領的「文革派」和以周恩來為首的穩健派已成鷸蚌相爭之勢。但只要稍稍研究一下當時的材料就可以發現，這種形勢是毛澤東本人精心加以培養的。他今天鼓勵江青一伙「批林批孔」，明天縱容他們抨擊「宋江周公」，後天號召要學習「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大後天又要回擊「右傾翻案風」。一九七五年一月，他不出席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全

的別名^③。忠心，可以保證毛澤東風燭殘年的人身安全；而愚蠢，可以保證毛澤東身後威望的安全；終華國鋒一生，也不可能追趕上毛澤東的生前聲望。

鄧小平先換胡耀邦，後換趙紫陽，不一定是鄧先生感到了他們二位對自己生前地位或生命的威脅，而是感到了他們對自己身後威望的威脅。他們沒有無能或謙卑到永遠不超越鄧的名望的程度，實際上，在胡先生和趙先生被廢黜之前，他們的威望已經接近甚至超過鄧了。這也正是毛澤東對他可能的接班人的擔心，他擔心的是死後出現一個赫魯雪夫。

毛澤東曾經有不少於六個可能的接班人。第一個是衆所周知的劉少奇，他從一九四三年開始，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在長達二十三年的時間裡，都是毛澤東的第一助手，在蘇共「二十大」後，他被毛澤東視為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雪夫或定時炸彈；第二個是把接班人的合法地位寫進黨章的林彪，他從一九六九年十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是毛澤東的第一「親密戰友」；周恩來是第三個可能登上權力頂峰的人，他在林彪死於一九七一年後，一直是中共統治集團的第二號人物，直到他於一九七六年去世；第四個當然是王洪文，他是在林彪事件後，被毛澤東以火箭速度從上海拔上來的人，作為他隨時用來代替周恩來的接班人；鄧小平

③ 參閱〔美〕R·特里爾，《毛澤東傳》（中文版，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頁四九九—五〇〇。

起來，有特別的感染力，好幾次，我潸然淚下。

他們還朗誦過左拉的一篇小說：〈陪襯人〉。這篇小說我以前沒看過，我不太喜歡左拉的風格。但這篇小說我難以忘懷，它爲我提供了一個對某種政治現象的一種解釋性結構。故事情節很簡單：一個有獨特創意的商人發現，在巴黎，不僅美的東西可以出售，醜的東西也可以出售。一些人老珠黃的太太，某些相貌平庸的小姐有某種潛在的需求：讓一些醜陋的女人陪伴在自己身邊，去出席晚宴或其他聚會，這樣可以把自己反襯得美若天仙。這個商人滿足了她們的需求，他招募了不少醜女人出租給她們，收取租金。這些醜女就是陪襯人，她們白天強顏歡笑，回來以淚洗面。

我當時發現，我們也有這樣的太太小姐，也有這樣的陪襯人。所不同的是，巴黎的陪襯人是憂傷的，北京的陪襯人是歡樂的；在巴黎，醜陋是被迫出售的，在北京，人們主動出售醜陋。一個政治家老了，芳顏就會減褪，就不希望身邊有潘安或者阿波羅，如果身邊碰巧有這樣的人，就會被換掉，請那些敢於醜陋的人來陪他，做他的助手。這些陪襯人的醜陋，可以反襯出他猶存的豐韻。南巡講話之所以聞起來像巴黎的C D香水一樣香，那是因爲他的陪襯人身上灑的是蔬菜湯。

否則，你就不能理解，爲什麼有些醜陋得很罕見的人總是能坐穩他的位子，而且是二號位子。這種醜陋，受到了幾乎是全中國人持久的嘲諷。但令人佩服的是，他不在乎，他堅持

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卻讓報刊發表他與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合影，當時他正在湖南老家悠哉游哉，看戲吟詩，以損害人大會議組閣的權威性和合法性。

華國鋒這叢茶糜花可能不是毛澤東有心栽的，但也不是毛澤東無意插的。要知道爲什麼毛澤東要廢黜開國元勳、滿朝文武，起用華國鋒，爲什麼狗尾續了貂，龍種變跳蚤，大山分娩出了耗子，請看官且聽下回分解。

二、權威落差

1. 陪襯人

在秦城監獄時，我唯一的娛樂是獄牆上的小喇叭每日三次的廣播，早晨、中午短些，晚上長些，它轉播的是北京廣播電臺的節目。大多數節目是大批判文章，批判並揭露一些「六·四」運動中的知名人士的「醜行」和「犯罪活動」，偶爾也播些輕音樂。

最有趣的是該臺文藝部編播的文藝節目。不知有意還是無意，他們在詩歌朗誦節目裡，播過普希金的〈囚徒〉，雨果的〈屠殺〉（控訴拿破崙三世鎮壓民衆示威），艾呂雅的〈自由〉（在納粹監獄裡寫出的法國人對自由的渴望）等等。這些詩，在那種情況下和環境中聽

上損害了毛澤東的安全感。

2. 安全感：第二把手是第一敵人

人類有許多政治體制，氏族社會之後，最常見的有兩種：君主政體和民主政體，其他政體都是這兩者之間的過渡政體。在過渡政體中，主要形式是僭主政體。從古代民主制向君主制過渡時，要經過僭主制，比如古希臘的馬其頓政體；從君主制向現代民主制過渡時，也往往要經過僭主制，比如稱帝前的拿破崙政權，破壞了民主後的德國納粹政權，義大利法西斯政權，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開放黨禁前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俄國和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拉丁美洲的許多軍人政權等等，都是當代僭主政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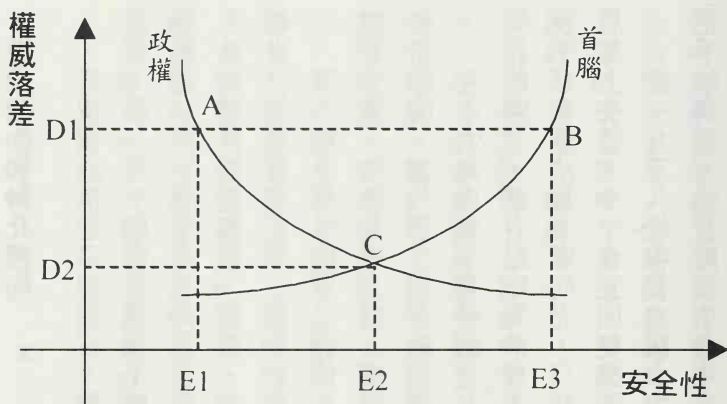
由於君主的權力來自神授，民主的權力來自民授，這兩種政體的首腦都有較強的安全感，他的臣下或閣員很難通過提高自己的聲望或派系鬥爭奪取最高權力。君主是世襲制，只有他的兒子在他死後才能繼承權位；民主首腦是任期制，只有在任期終了時，通過重新選舉來產生下屆首腦。首腦權力的爭奪不會在行政權力機構內部，而是在執政黨和在野黨之間。最沒有安全感的是當代僭主制的首腦。這種首腦的權力既不自神授，也不來自選票，而是來自以下幾種形式：擁戴、密謀或移交。對第一把手權力的爭奪，就是對威望的爭奪；對繼承權的爭奪，就是對忠誠形象的爭奪。一般說來，僅次於首腦威望的是第二號人物，所

自己的醜陋，醜陋得很自在，很開心，甚至很驕傲。他知道，他的醜陋不是為中國人民準備的，而是為他的雇主特製的。他的幾任雇主都不算漂亮，有的因為衰老，有的因為劣質。

當然不能用這種美學結構，來解釋毛澤東清掃六合、虎視天下時選擇副手的行為。那時他很美。當梁漱溟在農業政策上對他指手劃腳時，毛澤東認為梁是在和他比賽選美。這是不能容忍的，他諷刺梁先生說，「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④雖然毛澤東說這番話時不是燕語呢喃，倒像是潑婦罵街，不過當時他確實比梁先生美，尤其是他那雙著名的光滑細嫩的手。

美人是不需要陪襯人的，所以他當時的副手劉少奇也還漂亮。既然如此，毛澤東為什麼還是要搞掉劉少奇呢？是他資歷淺嗎？非也。他於一九四三年上調中央時，資歷才淺呢，他當時是一個籍籍無名的白區工作者；是他不稱職嗎？非也。劉少奇當時在一線牽頭工作，成績斐然，尤其是替毛澤東擦大躍進的屁股，擦得乾淨漂亮；是他不忠於毛澤東嗎？這話要兩方面講，忠於毛澤東正確的東西，糾正毛澤東錯誤的東西。正是由於這一點，劉少奇在實際

④ 毛澤東，〈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頁一一五。



圖二之一 首腦權威落差與安全性

圖的縱軸表示第一把手與第二把手之間的權威落差，橫軸表示安全性，右斜的曲線是首腦曲綫，左斜的曲線是政權曲綫。如果權威落差在 D_1 點，政權的安全性在 E_1 點，首腦的安全性在 E_3 點，首腦可以得到很大的安全，但政權的安全性過低。如果權威落差降低到 D_2 點，首腦的安全性和政權的安全性相等，落在 E_2 點。

這就表明，在正常情況下，當代僭主政體的個人權威落差 G 在 D_2 點上下震盪。但遺憾的是， Q_1 和 Q_2 的值都是可變的。一般來說，它們的變化方向相反： Q_1 的值隨著第一把手年齡的增長和管理事務的減少會下降， Q_2 的值隨著第二把手就職時間的增加會上升。這決定著首腦曲綫會不斷左移，要保持首腦原有的安全性，需要越來越大的權威落差，這就損害了政權本身的安全。首腦曲綫的左移表明，首腦任職時間越長，政權的安全性越低。

以，對首腦地位威脅最大的也是第二號人物。表面上，第二把手是首腦的助手或戰友，實際上，他們是對手或敵人，甚至是最凶惡的敵人。

這就是為什麼僭主生前的副手很少能順利繼承他的權力，終身不放棄權力的僭主總是要到生命的最後一刻，才把權力交給他認為最忠心於他的人。在周鄧集團和「四人幫」爭奪社會威望的時候，只有華國鋒在默默地表達忠心，當然是他拿到繼承權；在胡耀邦去世後，幾乎所有人都在有意無意損害鄧小平聲望時，只有江澤民在上海維護他，他關閉了當時著名的《世界經濟導報》，原因是這份報紙刊登了一份首都名人的座談紀要，這份紀要藉紀念胡耀邦為名，對鄧小平口出不遜。這一舉動所傳達的信息別人可能忽略，至少兩個人印象深刻：一個是鄧小平，一個是趙紫陽。這是一次豪賭，寶押在鄧小平一邊。結果大家都知道。

這就是當代僭主政治的困境：沒有第二把手，政治體制無法運轉；有了第二把手，第一把手就寢食難安。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在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之間造成巨大的權威落差。個人權威落差 G 等於第一把手的威望和權力 Q_1 減去第二把手的威望與權力 Q_2 ，用式子來表達： $G = Q_1 - Q_2$ 。落差 G 越大，第一把手就越感到安全。但是，如果權威落差過大，第二把手過於醜陋或無能，政權本身就會不安全。這種個人權威落差與安全的關係可以用圖二之一來表示：

任中央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主任。這段時間，是中共黨史上槍指揮黨的時期。軍委副主席，自然地位很高。這期間發給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指示文電有許多都是毛澤東和王稼祥或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簽發的。這期間的風光，難與外人道^⑤。不過，風光無限好，只是在險峰。

其中的險情，王稼祥肯定感覺到了。一九四二年三月劉少奇調到中央，一九四三年三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當了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劉少奇成了黨內的第二把手。中共在毛澤東的謀劃下，從黨指揮槍，變成槍指揮黨，現在黨又開始指揮槍了。所不同的是，以前黨是別人的，是博古、王明等人的，現在在槍的指揮下，黨回到了自己手裡。這一變不打緊，軍委副主席王稼祥先生就從實際上第二把手的位置上跌下來了，將跌到何處，要看毛澤東手裡的那根線。

於是，爭奪第二把手的一場忠誠和神化的競賽開始了，在王稼祥和劉少奇之間，競賽的總決賽在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上。

幾天前，一個名字非常好聽的新朋友喬雨到我的茶舍品茗。他是詩人，也是個企業領導

⑤ 《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三十三卷（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版），頁三〇—三一。

3. 更換傾向和神化傾向

要使權威落差Q值穩定不變，以滿足首腦的安全感，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面臨著不同的選擇：第一把手傾向於選擇不斷更換第二把手，每更換一次，Q值都要下降，其下降速度要和第一把手威望衰退的速度保持一致，這就使我們看到，首腦年齡越大，他選擇的第二把手就會越無能越醜陋，當然，並不排除第一把手採取一步到位的更換，即把永遠也不可能超越自己的蠢貨放在第二把手的位子上。我們把這一選擇稱為更換傾向。

第二把手要保住自己的位子，一般會選擇裝傻、吹捧和自我貶抑。裝傻是給首腦以虛假的安全感，吹捧是向上擴大權威落差，自我貶損是向下擴大權威落差。我們把這個選擇稱為神化傾向。當代僭主制下的造神運動，就來自這種傾向。

在中共黨內最早造神的是我的老鄉王稼祥先生。託他老人家在天之靈的福，許多人一看到我的賤名，就有點吃驚的樣子：「這名字好熟，在什麼地方見過。」彷彿我就是個名人。我不好意思沾我老鄉的光，只好坦白：「您熟悉的是王稼祥吧？我是吳稼祥。」對方不好意思馬上失望，多半會立即變換話題。

從一九三八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到一九四三年，王稼祥在毛澤東身邊扮演的是接近第二把手的角色，他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並兼

是不是從王稼祥和他共事時得的。我想，毛澤東難以驅除的一個念頭可能是：午夜旋律傳來那首歌，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

此後的事態發展，顯示出毛澤東在權力鬥爭和更換第二把手方面的不朽才華。在七大上，據說由於王稼祥生病住院，會議代表對他缺乏了解，沒有選上中央委員，還是毛澤東做工作，才選上了候補中央委員^⑦。代表們對剛剛從白區上來的無名之輩劉少奇不缺乏了解，倒對長期以來擔任中央軍事領導、和毛澤東聯名簽署文件的赫赫有名的王稼祥缺乏了解。王稼祥受重傷躺在擔架上沒有缺席長征和遵義會議，以病弱之軀，為毛澤東驅除強敵，扶他上臺；在安全歡樂的延安七大召開時，王稼祥倒缺席了，躺在醫院裡。這是誰的安排，不問可知。暗打明拉，是毛澤東黨內鬥爭的一貫策略。依我看，當時主要不是王稼祥的腸胃病犯了，而是毛澤東的心病犯了。

4. 嬰兒化

劉少奇當上毛澤東的助手以後，毛澤東就離我們越來越遠。不過，別的東西離我們遠了

⑦ 同上，頁三五。

人。談到中共黨史時，他認為是劉少奇第一個創造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可見劉少奇在神化毛澤東、推廣這個名牌產品上所下的功夫。據歷史記載，第一個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的是王稼祥。他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在延安的《解放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在中共歷史上最發明了「毛澤東思想」這個符咒^⑥。按理說，王稼祥在神化毛澤東的棋局上占了先手，應該能鞏固自己的位置。遺憾的是，他抬高毛澤東，並沒有給後者帶來安全感。他的不安全並不是他的威望太高，而是他的謀算太深。毛澤東兩次被擁戴上臺，都得把首功記在王稼祥名下。一次是在長征途中，王與毛澤東、張聞天、聶榮臻等人密謀，在遵義會議上讓毛澤東奪下軍隊的指揮權。

另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王稼祥從蘇聯治病回國，囊中裝著所謂共產國際的尚方寶劍，又一次與毛澤東密謀，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王稼祥用共產國際的「指示」，幹掉了王明，使毛澤東奪取了黨的領導權。

王稼祥這樣的人睡在自己的卧榻之側，誰能不假裝打鼾呢。毛澤東頑固的失眠症不知道

^⑥ 同上，頁三一。

王爺、竈王爺和龍王爺。

塑造毛澤東金身的第一塊泥巴是王稼祥捏的，後來的工程是劉少奇完成的。劉一生所做的最有成效的事情，就是把毛澤東變成了一個半神。當他發現這個半神幹的蠢事越來越多且不思悔改時，他造神的速度慢了下來，甚至還試圖在八千人大會上讓這尊神走下聖壇。這就給另一個造神專家林彪留下了創作空間。

如果說周恩來感受到了當代僭主的更換傾向的話，那林彪肯定觀察到了第二把手的神化傾向。周恩來看到了當第二把手的危險性，終其一生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留在第二把手的位臚上，即使在林彪的肉體被消滅之後，他也要格外謹慎地推出鄧小平，在他前面擋風抵浪；林彪看到了當第二把手的吸引力，以為通過神化競賽，就可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並把這個地位寫在黨章裡，就能繼承毛澤東的神位。這表明，周恩來在政治上要比林彪成熟多了。

林彪對毛澤東的極端神化雖然把自己送上了第二把手的寶座，但對中國人的精神所造成的損害是無法挽回的。這個損害就是全社會的「嬰兒化」。一個人的偉大不是別人創造出來的。要創造一個人的偉大，只有一個途徑，那就是讓所有人都渺小。當我們都跪著的時候，有權力站著的人就會高大。說毛澤東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就等於說，老百姓說的話狗屁都不算。

「嬰兒化」有許多表現，比較典型的特徵是「兩根萎縮」：男根和慧根。嬰兒沒有男

會逐漸變小，毛澤東離我們越遠就越高大，最後變成了遙遠的巨人，成了一個神。

一九九二年，我從秦城監獄出來，發現世風大變。有一次我去山東，濟南的一個朋友派車去接我，是賓士車，很豪華。車內的立體音響箱裡是一個女歌手在唱著軟綿綿的通俗歌曲，旋律我有點熟悉，細一聽，原來唱的是「文革」中的毛澤東頌歌：「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陽，多麼溫暖，多麼慈祥，把我們奴隸的心坎照亮……」按照唱法，把後面的歌詞改成這樣要貼切些：「多麼溫暖，多麼輕柔，把我們女郎的心尖兒吻遍……」不要以為毛澤東只是做了個大眾情人，在司機額後的後視鏡上掛著一個護身符似的東西，上面鑲著一幅毛澤東像。

「你很懷念毛主席，是嗎？」我問。

「懷念他幹嘛？」

「可你掛著他的像呀！」

「哦，那是吉祥物。有一回發生大車禍，只有一輛車沒事，那車上就掛著毛主席像。」

「毛主席成神了？」

「他本來就是神嘛！」

別誤會，司機的話毫無挖苦之意，毛澤東在許多中國老百姓眼裡，就是神。這個神到底是幹什麼的，人們並不深究。只有一點可以肯定，在中國，香火最盛的神都是凶神，比如閻

三、退化與動亂

1. 第二把手更換律

雖然第二把手做了神化的努力，但並不能讓第一把手高枕無憂。就我所了解的材料而言，在相當多的當代僭主制政體中，不被更換的第二把手幾乎沒有，除非是僭主的兒子（如金正日）、妻子（西奧塞斯古的老婆）、兄弟（如卡斯的弟弟）或不可救藥的傻瓜做了第二把手。這個結論有點血腥味，我倒真希望它不能成立，遺憾的是，要改變它，我無能為力。

當代著名的僭主薩達姆·海珊說過一段話：

從遠古至現代，從我們民族誕生那個時期以來，從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情：兩位領導者在同一個領導機構裡共掌十一年朝政，既沒有給領導層帶來思想危機或政治失衡，也

根，只有小便的出口。在毛澤東生活的年代，似乎全中國只有他一個男人，他對所有的女人都存在可能性。除他以外，其他人都必須中性化或不男不女化：女人要「不愛紅裝愛武裝」，和他上床時除外；男人要天天想著階級鬥爭，不能天天想著女人。情歌是非法的，除了獻給毛澤東的情歌。由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那種「階級鬥爭」等於集體起哄，所謂「階級敵人」像貓窩裡的耗子一樣罕見，這種鬥爭也就變成了小孩子扮家家酒的玩藝兒，是集體犯罪的懦夫表現，比如造反的中學生集體屠殺他們的老師。

男根萎縮，導致整個民族英雄氣概的萎縮，陽剛之氣的萎縮。當李志綏先生筆下的毛澤東駕幸過的女人讚嘆說「毛主席什麼都偉大」時，她是有所特指的。不是說別的男人在她特指的方面都不偉大，而是不被允許偉大。在毛澤東面前，其他男人只能陽痿。

在那個時代，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堅挺，只有他一個人妙語連珠，只有他才華橫溢、思如泉湧、格言不斷、胡說八道。其他人的智慧發育最好不要超過兒童，識的字夠看《毛主席語錄》就行。有些字不認識，沒關係，偉大領袖的字哪能都認識，翻翻《新華字典》好了。那本字典可能是唯一免於「火刑」的字典，字條不超過一萬。孩子們讀了中學就上山下鄉，不幸早年多讀了幾年書的教授們快下牛棚，知識被證明已退化到兒童時代的可以返城。

慧根的萎縮，導致整個民族創造力的萎縮。現在的盜版現象，不過是創造力萎縮的一個例證。

把手的人進行了掃地式的清洗^⑩。同時，他也抓緊對貝克爾進行神化，以造成一個虛幻的權威落差。《薩達姆·海珊》的作者馬塔爾寫道：

某一天，伊拉克的新聞媒介在提到貝克爾總統時開始稱他為「總統和統帥」，這令他吃驚，因為早先他是被稱為「地區領導機構總書記同志」、「同志」或「共和國總統先生」的。這顯然是得到薩達姆·海珊指示的結果。他還要求新聞界稱貝克爾總統為「革命之父」，這一稱呼到他辭職時已成為他正式頭銜的一部分了^⑪。

這表明，作為名義第二把手，他遵循「神化傾向」，在貝克爾和他之間造成一個假的權威落差；作為實際上的第一把手，他遵循「更換傾向」，不斷清除接近他權力地位的人，在他和其他所有人之間，造成一個實際的、不可逾越的權威落差。到了這一步，貝克爾對於他，不是什麼首腦，而只是他臀部的一個瘡疤，用不著自己去揭，揭早了會流血；只要假以時日，瘡疤會自行脫落。貝克爾果然於一九七九年脫落了。

就世界範圍而言，更換第二把手規模最大、最殘酷也最徹底的要算史達林，更換第二把

⑩ 「美」薩米爾·哈利勒，《海珊的伊拉克》（中文版，西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頁四九以下。

⑪ 《黎巴嫩》福阿德·馬塔爾，《薩達姆·海珊》，頁四五。

沒有以一個領導者最終排擠另一個來結束他們之間的關係……^⑧

海珊所說的兩位領導人，一個是他，另一個是本不該和他相提並論的他的「父親」兼第一把手艾·哈·貝克爾。他這段話，說出了兩個意思：第一，僭主制在他們國家歷史悠久，而且從沒有十一年以上的安穩日子，不是第一把手換掉了第二把手，就是第二把手政變幹掉了第一把手；第二，他和貝克爾是個例外，他們和平地交接了權力。

這個例外其實是表面的。貝克爾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革命紀念日前夕宣布退位之前，早就成了一個傀儡首腦，在他們二人合作的十一年中，貝克爾基本上是在病榻上、花園裡和對已故親人的哀悼中度過的。他患有嚴重的糖尿病，不能勝任任何繁重的工作；他的兒子死於一場車禍，妻子也去世了，不久女婿也撒手而去，只剩下女兒和外孫。他沉湎於回憶和憂傷，失去了對權力的任何興趣^⑨。

而海珊在此期間通過此起彼伏的「間諜案」或「陰謀集團案」，對可能代替他成爲第二

⑧ 「黎巴嫩」福阿德·馬塔爾，《薩達姆·海珊》（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頁

三一。

⑨ 同上。

年），他可能認為以劉少奇那點道行，想跟我毛澤東比魅力，永遠沒門。等到他在農業合作化等問題上與劉少奇意見相悖時，他猛然發現，站在他這一邊的人並不像他想像的那樣多。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會議上，據說在選舉中共中央主席一職時，劉少奇所得的票和毛澤東的票幾乎相等。

「受颱風影響，今天晚上到夜裡，江淮之間有暴雨，最大風力十一級……」少年時代，家鄉沒有電燈，天黑就睡覺，躺在床上聽廣播，上面那段話是夏天傍晚經常聽到的。在一九五六年，莫斯科颳起了代號為「蘇共二十大」的強颱風，史達林的偶像被吹翻了，受其影響，中共八大上也有風吹草動，毛澤東搖搖欲墜，不僅選票減少，中共七大時被劉少奇寫進黨章的「毛澤東思想」，在八大時被人用橡皮擦掉了。

劉少奇在七大造神時，在自己的報告中一〇五次提到毛的名字，在八大上，僅提到四次^⑬。當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把國家主席讓給劉少奇時，他的情緒一定惡劣到極點，劉和他之間的權威落差接近於零。劉少奇當了國家主席兩個多月後，毛登上了廬山，為排解內心苦悶，寫了一首詩，最後兩句寫道：

⑬（美）石·特里爾，《毛澤東傳》頁三〇八。

手震動最大、拖延時間最長的是毛澤東。

史達林的更換是從肉體上消滅，而且是大規模的，他更換的不是個別第二把手，而是第二把手集團，是所有可能威脅他的權威的人。一九三四年，史達林策劃了一次在創造性上決不遜於納粹國會縱火案的「基洛夫謀殺案」。基洛夫當時是「受到全黨熱愛的人」，其威望很高，他被蘇共高層用來準備代替史達林。史達林一箭雙雕，先暗殺了他，然後嫁禍給所有對他的權威構成威脅的人。一場大清洗開始了。

根據蘇聯官方統計，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所選出的一三九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九十八人即占百分之七十的人被處決；在一九五六名代表中，有一一〇八人被捕。五位蘇聯元帥中，三人被處決；所有的軍團司令、幾乎全部師長、旅長、約半數的團長都被撤職^⑫。這裡的每個字，都滴著血。這裡的教訓是，威望過低、手段過辣的第二代僭主上臺，血雨腥風就會到來。

毛澤東是第一代僭主，他犯不著用如此大規模的清洗來更換第二把手。他的問題是起初對自己太自信，把劉少奇放在第二把手的位子上達二十年之久（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六

^⑫ 「蘇」阿·阿夫托爾漢諾夫，《蘇共野史》（原書名《黨治制的由來》）中文版（湖北人民出版社，內部發行，一九八二年版），下卷，頁八五八以下，頁八六九。

人，只能從剩下的人才中選拔，其質量很難上乘。可見，第二把手的每次更換，都是對政治和社會精英的一次淘汰，更換的震盪面越大，精英就淘汰得越徹底。

這是周期性淘汰。周期性淘汰是衰退性的。隨著僭主的年事漸高，被換上來的第二把手越來越無能，花開到荼蘼的時候，就肯定會出現「平庸在高位，俊傑沉下僚」的局面。這就是僭主的末代景象。

還有另一種常規性淘汰，可以稱爲「武大郎式」淘汰。由於當代僭主要保持和第二把手的權威落差，第二把手也要保持與第三把手的權威落差，中央要保持與地方的權威落差，各級領導都要保持對其下屬的權威落差，這樣一路落下去，真可謂是「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落到最後，人渣飛濺。

你可能以爲這種落法挺不錯，至少上級領導比下級本事大，威望高。你要這麼想，可就錯了。人才不是從上面下放的，而是從下面逐級往上提拔的，先提拔而後才有下放。誰能被提拔？相對無能的人才能被提拔。上面提副科長，科長肯定推薦科員中比較無能的人，這樣，既聽自己的話，又不對自己構成威脅，還可以用來壓住下面那些能幹的科員，保持強制的權威落差。上面考察幹部的時候，有無能的副科長當陪襯人，自己被提拔的機會要多些。在幹部升遷的第一級，精英就被淘汰掉了。每一級幹部的提拔，遵循的都是這一模式。

結果，幹部要想升遷，要謹守兩條規則：第一，要裝糊塗。讓領導覺得比你聰明，對你

陶令不知何處去，

桃花源裡可耕田？

給人的印象他似乎想歸隱，不過，誰要真這麼想，那他就要上當了。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已經退到了牆根，他知道，再不發動反擊，他就完了。他痛苦地看到，小苗已經長成大樹，不是說一兩句話就可以扳倒劉少奇的。終於，他有了主意，並且等到了機會：他親手發動了一場戰爭，一場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大教主之間的宗教戰爭，他們兩個人中，只有一個人成爲「東方不敗」。金庸的武俠小說，有妙不可言的象徵價值。這場內戰持續到毛澤東的生命終點，他仍然沒有獲得完全的勝利。毛澤東獲得了政治上的勝利，劉少奇獲得了教義上的勝利，雖然後者爲他的教義殉了教。

2. 反淘汰機制

我被關在秦城的時候，聽說香港的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說，「中共真奢侈，把像吳稼祥這樣的人關在監獄裡。」也可能這是別人的誤傳，我的才幹和名氣還沒有大到驚動科斯（R. H. Coase）高足的程度，比我傑出得多的許多人，當時也都在監獄裡，或逃往海外。

這就是更換第二把手的代價。每個第二把手爲了工作，都要起用大批人才。第二把手一倒，從中央到地方的這些人都得倒楣，其人數是無法統計的。新上臺的第二把手所要用的

士兵命令他們看著不順眼的人打開包裹檢查，我居然沒有想到我可能面臨的危險。

感謝上蒼，歷經驚險，這部稿子保存下來了，雖然它現在只可作為一種紀念，沒有單獨出版的價值。不過其中有一節「全權政體進入動盪之秋」，可以在這裡引用一部分。這不僅是行文的需要，也是情感的需要。文中「全權政體」在本書裡屬於當代僭主制的一種，是全權僭主制政體。

我當時寫道：

如果塞繆爾·杭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不是寫於一九六八年，而是寫於一九八八年，他的一些重要結論可能要修改。該書開篇第一段寫道：

「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區別，並不在於政府統治形式的不同，而在於政府統治程度的高低。有些國家的政治擁有一致性、一體性、合法性、組織性、高效和穩定的特點，而另外一些國家的政治則缺少這些特點。這兩種政治之間的差異，要比民主制和獨裁制之間的差異更為顯著。共產極權國家和西方自由國家一般都屬於有效能的政治體系，而非軟弱無能的政治體系。美國、英國和蘇聯的政府統治形式各不相同，但它們政府的統治卻是行之有效的。它們都是政治共同體，其人民對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都具有普遍的一致性認識。其公民和領袖對社會公益和政治共同體所賴以建立的傳統和原則都持有共同的認識。這三個國家都具有適應性強和凝聚力高的強有力的政

有權威落差，他才有安全感；第二，要做女人。對上級要溫柔體貼，如果他同性戀癖好則更好；不能有陽剛之氣，不能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更不能頂撞領導，否則，你是第一個被淘汰的。每升一級，你的陽氣就可能少一分。這正是：幹部向上進，那話兒短一寸。短到高級幹部時，你可以相信，就剩不下什麼了。在中共高層，連一個野心家你都找不到。

我一個在一個雜誌裡寫過這麼一段話，適合引在這裡：「有人問我，中國小男人為什麼這麼多？我想可能的答案應當是，中國從古以來，尤其是這幾十年來，凡有男根的人，都活不下來。陽萎是生存的秘訣。經過選擇性淘汰，男人就小下來了。」

這個選擇性淘汰，就是僭主制下的反淘汰，或者叫精英淘汰制，劣勝優汰制。這是反生物進化論的，是人類社會的一種退化。當代僭主制的集權程度越高，退化就越嚴重。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與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相比，國家公務人員素質更低，精神文化更沒落。這種社會裡的人，不說別的，你不準備坐牢，或逃往海外，要想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不可能的。

3. 周期性動亂

一九八九年六月，我膽大包天。我於六月五日逃往山東的途中，手提包裡還放著我正在寫作的一部書稿，稿中有許多對當時當局的不恭之辭。我回到北京時，看見火車站上有許多

現沒有一項能夠被他自己驗收。這四項標準是組織或程序的適應性、組織的複雜化程度、政治組織的自立性、政治制度的凝聚性。

之後，我專門討論了共產主義極權社會的動亂，引用了現在已查不到出處的青年專家李忠傑的材料：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八八年的七十一年間，蘇聯、東歐國家共發生了二十七次大規模社會動亂，其中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六七年的五十年間發生了十三次，平均每四年一次；從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八年的十六年間發生了十四次，接近於每年一次，動亂頻率加快了。進入一九八九年，社會主義各國各種形式的動亂一齊到來，大有火山爆發之勢，比如遊行集會；罷工罷課、靜坐絕食；流血衝突、戒嚴宵禁；政變與高層權力鬥爭；暗殺和破壞；非正式政治組織活動等等。

在我入獄的當年和第二年，蘇聯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治體制全面徹底崩潰，同時也就宣布了杭廷頓想當然的政治理論禁不住檢驗。

一九九七年，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個酒吧裡，我的一個加入法國籍的北大校友請我和一個法國籍的歐盟一秘喝酒聊天，那個一秘是個很文雅的中年女士。她問我對六·四的看法，我說，從壞的方面說，那是兩個專制組織之間的一次衝突，雖然聽說廣場上的學生要的是民主；從好的方面說，中國的這場運動可以媲美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宣告了君主專制的死刑，中國六·四民主運動宣告的是全權僭主制的死刑。不同的是，法國先砍了自己君主的

治制度：有效能的科層制；組織良好的政黨；人民對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文職官員控制軍人的有效機制；政府對經濟的廣泛干預，以及調節權力繼承和控制政治衝突的合理有效程序。」^⑭

在稍後的幾頁，他還指出共產黨人爲現代化中國家提供了一種經過檢驗並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逾越政治差距的方法，面對困擾著現代化中國家的社會衝突和暴力，共產黨人能夠爲保證政治秩序的穩定提供某種措施^⑮。

使我感到吃驚的是，杭廷頓在作出上述勇敢論斷時，爲什麼不先費心看一看當時正處在混亂、狂熱和內戰中的中國，爲什麼不顧及當時正在夭折的「布拉格之春」，爲什麼輕鬆地忘記了匈牙利一九五六年的悲劇，爲什麼不提從列寧到史達林，從史達林到赫魯雪夫，從赫魯雪夫到布里茲涅夫最高權力繼承過程中的宮廷傾軋、政治清洗和社會動盪？

接下來，我用杭廷頓自己檢驗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四項標準來衡量共產主義極權政體，發

⑭ 「美」塞繆爾·杭廷頓，《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文版，華夏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頁

一、八。

⑮ 同上。

式。我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母親懷我的時候已經生病，生下我就一病不起，在我五歲時仙逝。我是靠米湯餵大的，身體一直瘦弱。大學二年級時，大概是讀書太玩命，病倒了，高燒不退，查不出病因。一般燒八天，退七天；燒起來住院，退下來出院，八天進，七天出。這樣持續了一年多，我的同學們都很犯愁。

大學三年級要做學年論文，先分頭到各省做社會調查。杜創業同學大概是爲了照顧我，和我分在一組，去安徽，調查農村承包單幹。大約是在冬季，我當時對迎面吹來的每一陣冷風都感到膽戰心驚，生怕寒戰半夜到來，拖累了創業。記得我們在合肥住在四牌樓的一個小旅館裡，躺在床上可以看見從房頂裂縫中漏進來的星光，寒徹心骨。我承認一夜沒有睡著，不斷摸自己的額頭，看是否燙手。雖然我堅持到了家鄉才病倒，但這一路的擔憂和恐懼損害了我們的調查。

後來有個醫生診斷說，我沒什麼病，就是身體過度衰弱，免疫功能低下。他決定給我注射胎盤素，增強免疫功能，我一天天好起來了，但還時有發燒，一直到我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後，才徹底痊愈。

沒有任何一個醫生能夠用胎盤素治好全權僭主政體的「衰弱—發燒」綜合症。不保持權威落差，僭主無法生存；保持權威落差，國家就必然「生病」：退化，動亂頻仍。這是它的先天性疾病，來自它的遺傳基因。我相信現在中國的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人每夜都在摸國家

頭，然後幫助別國去砍；中國的順序是倒過來的。

全權僭主制的動亂有很多根源，政治上的根源始終是僭主權威的來源不清。它的內部動亂來自對繼承權的爭奪，和對第二把手的周期性更換，隨著意識形態越來越淡化，更換第二把手就越來越困難，從而越來越依靠赤裸裸的權力鬥爭。

外部動亂來自精英淘汰和政治退化。除非能從肉體上消滅被淘汰的精英，像史達林做過的那樣，還能保持平庸、僵死的穩定，否則，精英流失到社會上，就成為潛在的反對派。一方面，體制內的官員在退化；另一方面，體制外的潛在反對派精銳化，社會自然失衡，當局就解不了對穩定的無限饑渴。

不過，外部動亂往往是內部動亂引發的。

四、應是綠肥紅瘦

1. 不治之症

退化是身體的持續衰弱，動亂是難以預期的發燒。這兩者，對全權僭主制政體來說，是與生俱來的不治之症。我體驗過對這種病的恐懼。不過我的病最終治好了，我改變了生活方

在一起，是秦王朝的不幸。據《史記》，殷商的始祖是大黑鳥（玄鳥），周的始祖是巨人，秦的始祖也是大黑鳥。這些都沒有神聖感。只有劉邦的爸爸是「赤龍」。有人不明白劉邦的人間老爸為何老和他搞不好關係，他對劉邦的王霸之業沒有絲毫興趣，對別的兒子的農藝倒讚不絕口。劉邦對他也沒多少好感，甚至霸王要用他老爸做「爸爸湯」時，他還要求「分一杯羹」。他們兩人都知道，他們沒有血緣關係。劉邦的母親與龍做愛時，她的丈夫就在旁邊。當時雷電大作，很有音響效果，像美國電影。

所有沒有完成神授化的僭主政體都是短命的，因為它必患「衰弱—發燒—綜合症」。秦王朝也不例外，它活得不比它的締造者長多少。

當代僭主政體同樣短命，它從來就是一個非常規的過渡政體。它有兩個選擇方向：一是向世襲制的君主政體演變，二是向任期制的民主政體演變，沒有第三條道路。

袁世凱是第一個嘗試向皇權過渡的，蔣介石是第二個，但他躲躲藏藏、羞羞答答，不敢大張旗鼓，不敢宣稱神聖，只是把權力交給兒子了事。他搞了世襲，但無法使之神聖化。毛澤東是不是可能的第三個，林彪是不是可能的第四個，我還不敢妄下結論。如果被毛精心培養的兒子毛岸青不死在朝鮮，如果林彪沒有死於非命，如果……中國人近代以來碰到了無數楣運，但有一個好運：當了僭主的毛澤東沒有了兒子，有兒子的林彪沒當上僭主。否則，我寫這篇文章時，一定有別樣的心情。

的額頭，看它體溫是否上升，它的每個噴嚏，都讓他們心驚肉跳。法輪功信徒請願，就是一個這樣的噴嚏，嚇得他們一身冷汗。還有每年六月，有個日子容易發病。每到這天，他們都要捂頭蓋臉，關門閉窗，怕感染風寒，坐在家裡猛喝薑湯。

夜裡可能有風雨，窗外是西府海棠。一夜無話，醒來精神很好，想起李清照的〈如夢令〉，這任僭主有此雅興。詞曰：

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卷簾人的回答是可信的，每個僭主的卷簾人都只會說「海棠依舊」。但願問話的僭主能有李易安的觀察力，看到在茶靡開花之後，是「綠肥紅瘦」，春天已經完了，知否？知否？

2. 短命的政體

秦始皇封泰山，臨東海，都只是想解決一個問題：壽命。封泰山，拜上天，是想延長他的王朝的壽命；臨東海，求仙藥，是要延長他自己的壽命。

秦王朝還是個僭主政體。它不是周王朝的嫡系子孫，也沒有完成從氏族政治向神授政治的過渡。完成這個過渡的是漢劉邦，標誌是把他的統治和龍結合在一起。沒有把自己和龍搞

稱自己在搞民主。

這當然是在說謊。在中國式的當代僭主制下，並不是在實行民主，只是在表演民主。朝廷成了舞臺，官員成了演員，按照當代民主的規範模式表演：你說民主不是一黨政治，他就養了一批「民主黨派」；你說民主主要表決選舉，他過幾年也要人民投上「神聖的一票」；你說當代民主都是代議制的，他也搞了個「人民代表大會」，還搞了個「政治協商會議」。

其實，所謂「民主黨派」，是共產黨參養的「宮廷戲班子」；所謂人民「投票」，那不是權利，而是義務，你只有投票的義務，沒有不投票的權利，你只有投他指定的唯一候選人是義務，沒有投其他人的權利，與其說這是民主，不如說這是納稅，納政治人頭稅，你納，人頭就沒了；所謂「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也不過是「文藝調演」，讓事先挑選好的演員上演事先準備好的節目。

真假民主有一個試金石：競選。我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正趕上海淀區人民代表選舉，不少同學本著推進民主的目的，不聽勸告參加了人民代表競選。當選的是現在美國的中國海外民運領袖之一胡平。到畢業時，幾乎所有參加競選的學生都受到報復，被發配到邊遠地區。中國一直以天朝之邦自居，到了當代，經濟上不如人家發達，政治上不如人家民主，頗讓國人尷尬。更尷尬的是，一直被中國人稱為爪哇國的印度尼西亞都在民主化了，一百年來被無數中國先烈用鮮血訂購的民主還沒有到貨。有記憶力的中共黨員可能還有深一層尷尬：

另一個世襲了權力的是金日成的兒子金正日，由於他們規避了對第二把手的更換，所以規避了動亂，但沒有規避掉的是人民的苦難。據說，朝鮮現在有了年號，但願他們還能有個神，否則，年號有什麼用？

僭主們應當清楚，通向金鑾殿的道路進入了死胡同。法國大革命宣布了全世界君主的死刑，沒有死的都在緩期執行。民主就像急性傳染病，傳遍全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海關能守住國門。感染了這種病的君主政體，紛紛斃命，中國還是比較晚的一個。想在二十世紀甚至二十一世紀復活君主政體，真是做夢。

留下來的只有一條路：民主政治。

3. 百年尷尬

從辛亥革命開始，中國人白天做的夢都是民主。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打著民主的旗號爭取人民的擁戴，他二人也都以對方獨裁為藉口，在自己統治的地方實行獨裁。雖然如此，他們誰也不敢放棄對民主的承諾。在中共歷次代表大會的文件中，民主總是一個裝點門面的字眼，似乎像小姐塗的胭脂，不抹上它，不敢出門。

好像是恩格斯說過，馬克思主義已經強大到這種地步，逼得它的敵人也只好裝扮成馬克思主義。這句話用在民主思潮上更為合適。民主思潮已經逼著幾乎所有當代的獨裁僭主都宣

第三章 一桶江山

一、裁縫「德先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旬，我應美國華人學者楊建利主持的「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的邀請，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參加「中國政黨政治研討會」，我提交的論文是〈超越民主——分裂陷阱〉。文章是這樣開頭的：

當深藍色旗幟上十五顆金星和別的旗幟一起閃耀在北約總部大樓頂部時，無數精確制導導彈正在國破山河也破的南斯拉夫土地上開花。這具有某種象徵意義：一個重新整合的西歐，在美國領導下，正在修理四分五裂的東歐。

重慶談判時，共產黨對國民黨提出的要求，如今變成了國民黨對共產黨提出的要求：廢除一黨專政，把黨軍變成國軍。一直被共產黨指控為獨裁的國民黨，在臺灣實現了民主；而民主這個詞，在如今的大陸，還像是非法貨幣，不能流通。

是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反動嗎？不一定，這是個意識形態問題。是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害怕民主嗎？有道理，這是個實際問題。害怕民主，從人性的角度說是害怕失去權力。權力是毒品，是海洛英，不能沾，一沾就上癮。統治的區域越廣，集權程度越高，毒癮就越大。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大陸的國民黨比在臺灣的國民黨毒癮大，上臺後的共產黨比被趕到海島上的國民黨毒癮大，所以更害怕民主。

不過，從國家統治者的角度看，或者從主權人格化的角度看，共產黨害怕民主，也有超越一黨私利的理由：害怕掉進「民主——分裂陷阱」。在臺灣搞民主和在大陸搞民主，不是一回事。不是中國人不配享有民主，臺灣人也是中國人，而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僭主制大國，一個超民族的國家，在民主化過程中，很容易陷入分裂。

要知道什麼是「民主——分裂陷阱」，要知道如何才能跨越這陷阱，後面再說。

不落帝國曾經用它自己發明的紡紗機和織布機，把自己織成了一匹世界帝國的巨大面料，民族主義以及英國本土和殖民地民主化的發展，把它剪得七零八落。最近澳大利亞的全民公決，估計讓英國皇室嚇出一身冷汗，雖然最後多數公民選擇了立憲君主制，澳大利亞還是英聯邦套裝上的一只衣兜，但過遠的距離使這只衣兜只有象徵意義，不能為英國皇室裝什麼東西。

不滿足於小鳳仙柔情蜜意的蔡鏗將軍，是在中國被德先生最早選中的剪刀。他的「討袁通電」一下就把雲南剪了出去。接著你一剪我一剪，閻錫山剪得山西，張作霖剪得東北，至於西藏和蒙古，則被當作邊角料給剪掉了。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從清王朝覆滅到共產黨的軍隊占領前後空缺了近半個世紀，人家不斷吵著要獨立，不能說沒有來由。在美國，如果父母讓十二歲以下的孩子單獨在家待幾個小時，就是違法行爲，倘若有人控告，父母將被起訴。你說西藏是你的孩子，你又把孩子一個人扔在家裡，至少要受點懲罰，現在的懲罰就是西藏政府的流亡，或者說孩子離家出走。在多次國內戰爭中獲勝的蔣介石先生雖然把支離破碎的中國又攏在了一起，但外蒙古那片布料卻被俄國人檢走了，成了蘇聯的附屬國。

從裁縫德先生那裡獲益最多的是美國。獨立戰爭把自己從英國的那匹布上裁下來，裁成了許多塊碎片，這是第一次民主運動，使美國脫離了英國的中央集權和殖民地地位；第二次民主運動像一次時裝表演，表演的時間是一七八七年，地點在費城，那次制憲會議決定了美

世界進入九〇年代以來，東西歐就開始了反方向運動：西歐在作權威化的向心運動，東歐在作自由化的離心運動。東歐分裂和西歐聯盟幾乎同時到來，是本世紀末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

有趣的是，東西歐的運動方向相反，動力卻是一個，都是民主化。說蘇聯東歐體系的瓦解是民主化的一個過程，人們可能會同意；但說西歐十五國聯盟化也是民主化的表現，也許有人搖頭。其實，歐洲聯盟化，不過是現代民主的進一步發展，是代議制的擴展和聯邦制的外化，是經過協商後，十五國大多數公民都同意對自己權利的進一步轉讓，人權更加被肯定，主權相對化了，人人享有的政治平等權利從一個民族國家內部，初步平推到十五個國家內部。人權成了西歐的國際「貨幣」，德國人權和法國的人權之間沒有「匯率」。

這就更加有趣了。被中國早期民主思想進口商們稱為「德先生」的民主，彷彿是個脾氣乖戾的裁縫，左手拿著一把大剪刀，右手捻著一根針，把要搞民主的大國像布料一樣剪成碎片，卻把已經搞了些民主的相鄰小國或相鄰小政治實體縫在一起，縫成長袍，或縫成百衲衣。他的職業習慣似乎是：逢整便裁，遇零即縫。既有「民主——分裂陷阱」，也有「民主——聚合功能」。

被德先生剪過的「布料國」還真不少，有上世紀初的中國，有印度，有上世紀末的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還有最近的印度尼西亞。其實，被剪過的還有英國，這個日

德國是唯一一個在東歐變局中不僅沒有分裂，還完成了統一的國家，這不奇怪，德國的民族統一性很高，不多的猶太人已經被二戰期間的血雨腥風洗乾淨了，而聯邦德國更是一块磁鐵，在東德碎裂以前就把它吸了過來，這是民主體制發揮其巨大聚合功能的例子。

蘇聯的崩潰是預料中的事，它民族統一性低，專制和集權程度又高。值得玩味的是，在獨聯體各國中，最早和俄國結成聯邦的是白俄羅斯，因為它和俄羅斯的血緣最親；和俄聯邦打得最凶的是車臣，它在民族和宗教上和俄羅斯都離得很遠。如果太遠了，裁縫德先生恐怕很難把他們再縫合在一起。印度和巴基斯坦雖然都來自一個母體，現在還看不出有任何聯盟的跡象。它們之間的傷口太深，喀什米爾好像永遠不能彌合：今天流膿，明天淌血，今天結痂，明天揭掉。即使好了瘡疤，也忘不了疼。

如果用這個格式來理解中國大陸和臺灣之間的關係，就可以明白，妨礙二者聚合的肯定不是民族問題，中華民族的統一性和融合性從來都是極高的；也不是臺灣的政治體制，作為亞洲少見的總統直選民主體制，它的親和力和聚合力都高；而且臺灣被中共逼得像個無家可歸的孩子，和全世界幾乎全部國家都沒有外交關係，突然聽說有個家在召喚他，他不願回，那就是「家」的問題了。家有什麼問題？家長太粗魯，太專制，動不動就打孩子，還不聽勸，誰勸就說誰干涉他的內政。很明顯，妨礙大陸和臺灣統一的唯一障礙，是大陸的獨裁政治。統一臺灣的武器不是刀劍，而是民主。自己不民主，還要用武力強迫別人和你過，就因

國今後數百年政治服裝的基本樣式。三個著名的「聯邦主義」流派的「服裝設計師」亞力山大·漢密爾頓、約翰·傑伊、詹姆斯·麥迪遜，把十幾塊「布料」縫成了星條旗，此後，它就成了美國人永不過時的外套或內衣。這一裁一縫，裁縫出了一個美利堅合眾國。

不是一個超民族的大國搞民主，一定有一個先裁後縫或者裁而不縫的過程？不一定。據我觀察，有兩個因素是至關重要的：一是民族統一性和融合性的程度，二是前民主大國集權和專制的程度（這裡的集權是指政治社會權力的縱向集中，專制是指政治權力的橫向壟斷）。一般來說，開始民主化時，民族統一性和融合性越高越不容易分裂，即使暫時分裂，也會重新聚合；相反，專制和集權程度越高的國家，越容易破碎。

美國在獨立前，英國對其實行中央集權管理（總督制，類似於英國管理下的香港），但有充分的經濟自由和個人自由，在民主化過程中先散開為散亂的邦聯聯合體；但它又是個民族統一性極低，而民族融合性極高的國家，因此又很快聚合成聯邦制國家。

愛爾蘭徹底獨立，北愛也在朝這個目標奮鬥，除了民族和宗教統一性較低外，是因為英國對其實行徹底的總督制集權；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還在大英國協裡，除了它們和英國的民族統一性比較高外（加拿大的魁北克除外），還因為它們在實行可以稱之為「總督立憲制」的民主體制，總督和英國皇室一樣，他們的統治權都只是個象徵，而在北愛爾蘭，曾經連議會都沒有。

訴我們的，你要想了解什麼是文化傳統，你只要拿起一根繩子，就可以明白，什麼是傳遞和連續，什麼是創新和守成。所謂「焚書坑儒」，所謂「文化大革命」，不過是想砍斷繩子，最後掉下去的是自己，陪葬品是自己的王朝。這種事是文盲或半文盲幹的。

二、木桶帝國

最易於讓讀者把握的表達思想的方式，是尋找到合適的象徵性結構來描述，但最難的也是這種方式。由於找不到讓我特滿意的結構和有解釋空間的表達，第三章的好幾個開頭，都被我廢掉了，有時刀落下去的時候，眼裡含著淚：有些文字很難割捨，我自認為有奇思，有雋語。這幾天的寫作，總是始於驚喜，終於嘆息。

妻子見我悶悶不樂，用詢問的目光看著我。我向她描述了我的苦惱。

「這一章想說什麼意思？」她問。

「要提出我這本書的主要概念。」我提出了「民主——分裂陷阱」，這一章我要以中國為案例，對它作出解釋，作一個過渡性的理論概括。我想說明像中國這樣一個古老的大國，在統治強度上沒有一點彈性，這主要和它統治的廣大疆域有關。中國的歷史，就像《三國演義》開篇說的：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不過，分不出新花樣，也合不出新制度。

爲他們是中國人。怪不得臺灣人寧願自稱日本人，也不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做中國人就有挨中國人打的義務，真是不幸。如果誰有這樣一個可怕的父親，兒子的最好選擇，大概就是斷絕父子關係。也許父親死了，兒子還會回家的，假如他有一個流乾了眼淚的母親。哦，扯遠了，這是題外話。

我們似乎已經從經驗層面觸及到了在民主化的壓力下，一個超民族大國的可分裂性與其民族統一性和融合性之間存在著負相關關係，與其專制和集權程度存在著正相關關係。我們在上一章提到，中共當局遲遲不敢射出民主化的在弦之箭，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害怕掉進「民主—分裂陷阱」。這表明，他們模糊地知道所謂「民族大團結」是一個童話；對自己統治的獨裁性質也心知肚明；而他們自己由於學識和思想的局限，且又在同一條鐵達尼號上，明知它要沉，又想在船沉前找到他們各自的「海洋之心」藍寶石，或謀求個船長或大副職位幹幹，無暇顧及其他，不可能從理論上和政策上解決像中國這樣的超民族大國如何既不分裂又能民主化的問題。

本書不打算討論民族問題，想先找到某種類似電腦上的快捷方式，你用滑鼠一點它，馬上就能進入特定程序，並給你一個理論化描述，使你對前民主大國在其專制、集權程度和其易碎性之間存在著的正相關關係，有一種直觀性了解。

我想告訴你，親愛的讀者，語言是無力的，象徵性結構才是巨大的力。就像維根什坦告

（江）山嘛！」乾隆大喜，說他善禱善祝，祝他的江山不僅一統，而且像鐵桶那樣穩固。如果這桶不是鐵桶，而是木桶，不就像你說的那東西，一捆就死，一就散嗎？……」

「一桶江山……妙呀！真是太妙了！」我猛拍了一下大腿。

關於中國，有各種著名的比喻。臺灣的柏楊說中國是個大「醬缸」，所有活的東西在裡面都會被醬死，醬軟，醬黑，統統變成醬菜。好比喻。但柏楊是個文學家、雜文家，他的比喻可以裝很多想像，未必裝得了思想。

更有思想的金觀濤、劉青峰伉儷從馬克思那兒借來一個概念：「一袋馬鈴薯」；從控制論創始人維納（Wiener）那兒借來一個概念：「混凝土」。在他們看來，中國是馬鈴薯和混凝土的複合體。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小農經濟是「一袋馬鈴薯」，缺乏組織，互不聯繫，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由中國儒生階層實現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的一體化，是「混凝土」，把大一統的中國澆鑄在一起。但這種結構是脆性的，因為缺乏彈性。分散又一體，穩定又脆弱，這就是金觀濤夫婦對中國社會結構的概括。他們還提到：「這種結構像一個脆而大的容器，其關係是僵硬的，一旦子系統偏離適應態，容器就要脆裂，而不是

數千年了，山還是那座山，樑還是那道樑，碾子是碾子，缸還是缸，小民是小民，帝王是帝王。捫起來，是個大國；一破碎了，就是人家砧板上的肉，被一塊一塊地割著吃，或蒸，或煮，或烹，看人家的口味。幾百萬口的滿洲人，就能把你數億人的大國給滅了。受日本人的氣就更不用說了。合起來是整體，找不到個人；散開來是散沙，聚不成個兒。我想從統治疆域和統治強度之間的關係上引出我的寶貝疙瘩「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的概念，並讓這「兩口子」發生關係，生幾個小寶貝「假說」，第一個就是「崩潰假說」，它可以說明「民主——分裂陷阱」是怎麼回事。我想過「瀑布」，想過「穀倉」，想過人體的「血壓系統」，想過「灌溉系統」……

「慢著，我倒是想到一個。」妻子說

我眼睛一亮：「你就趕緊說吧。」

「木桶。」

「木……桶……？」

「是呀。」妻子猶豫猶豫地說，「宰相劉羅鍋的電視劇你看過嗎？八月中秋，百官朝賀，紛紛向乾隆皇帝獻禮，群臣都送厚禮，金銀財寶，翡翠瑪瑙。只有劉羅鍋拎著一鐵桶生薑來了，受到和珅嗤笑。唯有乾隆很感興趣，問他這禮有什麼講。劉羅鍋說，「皇上您瞧這薑堆得高不高？」皇帝說：「高呀！」「像什麼？」「像座小山。」「對呀，一桶（統）薑

想來說，「木桶」結構，比以上任何一種比喻，都更適合我的需要。這木桶一出來，就把江澤民的所幹的活兒給搞清楚了。原來他不是什麼「繼往開來的領路人」，只是個和秦二世、光緒一樣的「箍桶匠」而已。

中國自古以來的社會結構就是「木桶結構」。由於第一，中國是個農業社會，對水的依賴性極高，它不像游牧民族，可以去找水；它只能利用現成的雨水和河流。而華夏族人生活的區域地跨寒帶、溫帶和亞熱帶，降雨量極不平均，每年非旱即澇，或既旱又澇。對水的依賴，就變成了對河流，特別是對黃河和後來的長江的依賴。水利工程的興廢，關係中華民族的盛衰。中華文明，似乎是從大禹治水才真正開始的。中國可考的第一個帝王大禹，不過是個水利工程師。那時，不是學而優則仕，而是治水優則王，不優則殺，比如大禹的父親。這就決定了一個完整的中國社會，必須是一個極大的桶，大到足以裝得下整個黃河流域，以及後來的整個長江流域。由於黃河和長江在枯水季節和洪水季節的水位差別很大，如果在它們的上游和下游有不同的國家，乾旱時，上游國家牛氣，不對下游放水，下游國家就渴死了；洪澇時，下游國家得意，不讓上游國家洩洪，你將成爲一片澤國。而水量比較穩定的歐洲多瑙河，沿岸國家的國際衝突就小得多。

第二，在華夏族的西北邊疆，生活著世世不絕的游牧民族，他們強壯慍悍，驍勇善戰。在冷兵器時代，未開化民族戰勝文明民族幾乎是一種世界性規律。那時的戰鬥力差不多等於

像橡皮袋子那樣伸縮。」^①解釋結構都很好，只是多了些，不集中。最好的是最後的歸結：「一個脆而大的容器」，已經接近木桶的感覺了。

自稱與費正清研究方法不同，擅長綜合研究的黃仁宇，在其綜合性史學著作《中國大歷史》中，並沒有對中國總體歷史形態作出什麼集中概括，只是順便提到，秦朝創立了「流線型」政治體制。這「流線型」是什麼意思，黃氏語焉不詳，按上下文推想，大略是指中央集權體制^②。「流線型」的說法解釋性有限。

倒是《黃禍》的作者王力雄有個有趣的提法。一日，著名報告文學家和社會觀察家盧躍剛到我開的茶館來談天說地。談到中國的進步，他引用王力雄的話說，要說中國有什麼進步，大概就是從「一盤散沙」進步到了「一瓶散沙」。「瓶」比「盤」緊湊些了，但中國社會的組織化程度依然甚低，瓶子打碎了，沙還是散的。

所有的比喻都是跛腳的。選取什麼比喻結構，要看你想表達什麼思想。就我要表達的思

① 金觀濤、劉青峰著，《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頁二〇頁—五〇。

② 黃仁宇，《中國大歷史》（三聯書店，一九九七年版），頁三三—三四（聯經版，頁四〇—四二）。

的寬度是指設置同樣大小的地方行政單位，比如郡縣或道府；同樣的厚度，可以理解為貧富差別要小，要搞平均主義，當然不是共同富裕，那做不到，至多是一樣貧窮。這樣可以消除因嫉妒而產生的不平。

第二個辦法是最大限度地收緊桶箍，加大箍的力度，不能給桶板（地方或個人）留下一點活動餘地，或自由空間。否則，桶會散架。

這就是中國的木桶帝國，就是歷朝歷代君主維護的一桶江山。這木桶，箍死才緊，一鬆就碎，沒有一點結構彈性。在這點上，我和金觀濤夫婦倆的意見是一致的。這只木桶，在歷史上，打散了又箍起來，箍起來又打散。只要王朝的統治能力一下降，桶箍就老化，就鬆弛，然後就一塊板一塊板往下掉，不是農民起義，就是藩鎮造反，要麼就是外敵入侵，或者兼而有之，或丟城失地，或割地賠款，或喪權辱國。在大分裂大動亂中，又出一個好箍桶匠，把這只散架的桶再箍起來。

每個王朝的後代皇帝，主要工作就是維護這只木桶。維護的辦法各種各樣，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過一段時間就製造或創造一些自己容易控制的水患或邊禍，進行社會動員，以提高全社會的向心力，讓各塊桶板自動靠在一起，膽敢不靠的，就可以說它威脅整個木桶的穩定和安全，並很容易加以制裁。遠的不說，就說毛澤東的現代僭主王朝。作為第一代僭主，毛澤東的治黃工程屬於前者，在朝鮮戰場對美國、在中印邊境對印度、在中俄邊境對俄

體力，智力含量很低。據說，馬其頓軍隊占領雅典時，有個士兵正要放火燒雅典圖書館，被長官攔住了，他詭秘地笑著對士兵說：「別燒。讓他們去讀書吧，讀得渾身無力，就不會造反打仗。」看來中國的皇帝秦始皇和毛澤東還不如馬其頓軍官更懂統治術。只要提到匈奴、突厥、契丹、蒙古、女真這樣一些部族的名字，就知道長期活動在中國邊疆的游牧民族有多麼強大。被漢武帝趕跑的一支匈奴，跑到歐洲，所向無敵，一直打到羅馬，其首領是阿提拉，意思是「上帝之鞭」。至於蒙古人，就更不用說了，他們曾經讓俄國人大敗虧輸，沒有讓強大的拿破崙和凶狠的希特勒餵過馬的莫斯科，卻被蒙古人的馬蹄踐踏過。至於日本人，更是聞風喪膽。在這樣強大的部族面前，所有的華夏族人都要被裝進一只大桶裡，接受保護，任何不在桶裡的小國或人群，都會像失散的羔羊，被狼群撕爛。春秋時期，稱霸的諸侯都要把保護所有小國不受外族入侵，作為自己的政策和義務。齊桓公的國策就是「尊周親鄰，治亂攘夷」。秦始皇統一六國，馬上修築長城，防範邊禍。

水患和邊禍，是驅使中國建立大一統帝國的永恆動力，所有能統一天下的開國君主，都是天才的箍桶匠，要把碎裂的桶板箍成一只大桶。桶越大越難箍。桶大離心力大，必須用同樣大的向心力來抵消。提高向心力有兩個辦法：一是讓所有的桶板都一樣，同樣的木材，同樣的寬度，同樣的厚度，這樣桶才能箍得嚴絲合縫。如果木料不同，熱脹冷縮係數不一樣，即使箍好了，也會裂開。同樣的木材，就是都從事農業，重農抑商是歷代王朝的國策；同樣

權威距離好說清楚。我國道家學派鼻祖老子是最早注意權威距離的人。他在《道德經》裡，提到了道家理想國模式：「小國寡民」。在他看來，國家要想治理得好，就不能過大，權威距離要小一些，人口不能太多。以此推想，老子可能贊成搞計畫生育。遺憾的是，他的理想符合統治規律，不符合中國的自然條件，小國不僅不安全也沒水吃。

西方政治哲學的創始人之一亞里斯多德也注意到了權威距離，在他看來，小的權威距離比大的好，他是城邦理想主義者。他說，大城邦永遠是治理不好的，因為人數過多就不能有秩序。一個國家應該是大得足夠多少可以自給，但是又不應該過大而不能實行憲政。一個國家應該小得足以使公民們能認識彼此的性格，否則選舉與訴訟就不能做得公正。領土應該小得從一個山頂上就足以把它的全貌一覽無遺^③。他說的似乎正是雅典。

對權威距離思考最多的要算孟德斯鳩了。他注意到了權威距離與民主共和政體之間的關係，他認為，民主共和國是小國具有的特點，「在一個小的共和國裡，公共的福利較為明顯，比較而言為人們所了解，同每一個公民的關係都比較密切；在那裡，濫用權力的現象不普遍，因此也不易受到庇護」；在一個大的共和國內，「因為有龐大的財富，因而就缺少

③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一三二六b，轉引自〔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中文版，紅旗出版社電子版圖書：《家庭藏書集錦之五：哲學》），頁二八一。

國的戰事，屬於後者；第二代僭主鄧小平的葛洲壩工程和更大的長江三峽工程屬於前者，所謂「對越自衛反擊戰」屬於後者；自稱第三代僭主的江澤民，更善於虛張聲勢，他大張旗鼓、喪事喜辦的長江抗洪屬於前者，利用中國駐南使館被炸事件和豆箕相煎的對臺灣耀武揚威屬於後者。這些作法，就像讓一隻披著狼皮的羊在羊群前張牙舞爪一番，自己在旁邊大叫：「狼來啦，狼來啦！」只要嚇得羊尿流成河，便可見好就收。

三、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

說了一通笑話，現在要講點嚴肅的東西了。讀者讀這一節和以下各節，如果感到頭大，可以先準備一塊冰鎮毛巾，在適當的時候，對頭冷處理一下。

木桶帝國其實講的是中國迄今為止的統治結構。爲了說話方便，我們不得不對上文引入的某些概念進行整理。我們把木桶的大小稱爲統治幅員，把木桶的箍力，也就是箍的鬆緊程度稱爲統治強度。如果我們引入更流行的權威概念，統治強度就可以稱爲權威落差，統治幅員就是權威距離。我在本書裡使用的權威概念，除了特別申明的外，其含義都是在近代以來歐洲各國逐步獲得共識的，是指主權者掌握的最高權威。它是一個政治哲學概念，而非一個社會學概念。

有待確定。」遺憾的是，他沒能完成這項工作。不過，他的主張在他的《波蘭政府論》裡得到體現，他建議波蘭採用邦聯制政府，認為這「是唯一能結合大國和小國的一切優點的政府」^⑥。美國後來的實踐證明他的這個想法是想當然的。

真正在實踐上遇到權威距離挑戰的，是美國聯邦黨人。在《聯邦黨人文集》中，至少有兩篇文章（第九篇和第十四篇）是專門辯駁論敵的一個鮮明觀點：孟德斯鳩說，實行共和政體版圖必須狹小，版圖大了，就會產生專制主義，主張在美國這樣大的版圖上搞聯邦，容易導致專制。漢密爾頓執筆寫的第第九篇文章和麥迪遜寫的第十四篇文章，對此進行了駁斥^⑦。怎麼駁斥的，這裡就不說了，以後我們會更詳盡地回到這個主題。順便提到的是，論戰雙方在論點上各失敗一半，在實踐上聯邦黨人完全成功。

⑥ 以上引文，均出自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文電子版，紅旗出版社電子版圖書《家庭藏書集錦之五：哲學》，頁一四三—一四四，正文及注。

⑦ 參閱《聯邦黨人文集》（中文版，程逢如、在漢、舒遜譯，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年版）。

節制的精神」④。他還談到了權威距離與國家安全的關係：「一個共和國，如果疆域狹小的話，會毀於外力；如果版圖廣大的話，則會亡於內部的邪惡」⑤。依他之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國家的真正敵人，不在外部，而在內部；不是美國，不是臺灣，而是竊取國家權力並將其用於邪惡目的的人。

以《社會契約論》聞名於世的法國政治思想家盧梭也提到了權威距離，他也是一個小國理想主義者。他說：「仔細考察了一切之後，我認為除非是城邦非常之小，否則，主權者今後便不可能在我們中間繼續行使他自己的權利。」由於他崇尚公民直接參與的民主，擔心代議制傷害政治平等，他對權威距離過大的大國存有戒心：「大國的最大不便之一——這種不便會使自由極其難於保持——就是立法權自己無法直接表現出來，而唯有通過代議制才能行動。」盧梭也感到國家過小會不安全：「但是，如果城邦是非常小的話，它不會被人征服嗎？不會的！下面我就要說明，人們怎樣能夠把一個大民族的對外力量與一個小國的簡便的制度和良好的秩序結合在一起。」他本人就這段話作了一個注解：「這就是我準備本書之後所要做的工作，在探討對外關係時，我將要討論邦聯制。這是一個嶄新的題材，它的原則還

④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第八章第一六節。

⑤ 同上，第九章第一節。

1. 禮、分、名：儒家權威落差理論

司馬光的歷史巨著《資治通鑑》是以儒家思想為經線，以史料為緯線編織起來的。他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給後代君王提供一套教材，讓他們學習如何按照儒家思想來治理國家。他一開頭就寫道：「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果然是大師手筆，一下就點中了儒家權威落差思想的核心，核心就是三個字：禮、名、分。什麼是禮？司馬光說是「紀綱」，這已經把它翻譯成中央集權國家體制的用語了，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或更早些時候，按照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裡的理解：「禮本為祭儀。」祭什麼？當然是祭祖先。所以，禮主要是用來強調和重申血緣原則的神聖不可侵犯，在祭祀時序列並顯示參加祭禮者的上下尊卑關係。而祭祀時的上下尊卑，只能是輩分、嫡庶和長幼的排序。因此，禮，從根本上說，是記載並憲法化的一套血緣權威落差的規範體系，而以血緣關係維繫的權威系統，正是周朝統治的根本基礎。

所以，在孔子及其門徒看來，禮的喪失，是犯上作亂、社會失範的根源。對策是，第一，強調禮的重要性，第二，克己復禮。

禮的重要性是怎麼強調也不會過分的。《左傳》稱：「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

四、儒、道、法三家的權威落差理論

說到權威落差，讀者應該記得我們在第二章第二節有初步討論。在那裡，我爲了說明在現代僭主政治生活中觀察到的僭主的一種模式化行爲，使用了這個概念。那只是摸到了這個概念的邊緣部分，涉及的只是個人權威落差問題，其側重點，有點類似於馬克斯·韋伯的奇里斯馬權威類型，強調的是權威者個人在能力和魅力上的差距。在我將要闡述的權威落差理論中，它只是一個組成部分。

我國春秋後期和戰國時代，是權威落差理論特別繁榮的時期。其社會歷史原因是當時周朝的中央權威和周王權威的衰落，使社會陷入無窮的動亂和兵災；其理論原因我們下一章再說。可以這麼說，春秋戰國思想家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權威問題，他們所有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方案都是圍繞重建權威而展開的。他們的一般哲學，起源於他們對方案的論證。

這裡不是全面考察諸子百家權威理論的地方，我只想簡單介紹和討論一下儒、道、法三家的權威落差理論。

威落差，即君臣父子，後世的「三綱五常」是發展了的原則。分，是君臣之間的權威關係，即最高統治者和整個統治集團的關係。「分」的要求是，國家元首必須在制度上擁有統治集團其他成員不可僭越的權威，君與臣之間的權威落差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名，是權威落差的分級制，或叫作等級制。在朝廷內，是君以下的廷臣等級劃分；在朝廷外，則是中央和地方的權力等級劃分。簡言之，分強調的是首腦對統治集團的權威落差，名強調的是中央與地方的權威落差。這些落差，不僅用文字加以表述，而且在衣食住行樂的各個方面加以限制和規定，其森嚴讓人敬畏，其繁瑣也讓人頭痛。

不難看出，儒家看重的是名義權威落差，而非實際的權威落差；是權威的形式，而非權威的實質。這是儒家權威落差理論的缺陷。晚清時，光緒皇帝有名義上的權威，慈禧有實際上的權威。光緒有志無威，成大事不足；慈禧有威無德，禍國家有餘。在鄧小平時代，胡耀邦、趙紫陽有名義上的權威，鄧小平有實際上的權威。胡趙心有餘，鄧公德不足。這種政治弊病，是儒家權威落差理論無法克服的。鄧小平和慈禧太后都利用了法家的權威理論蛀空了儒家的權威學說。

2. 法、術、勢：法家權威落差理論

最早看到血緣權威落差形式衰落的是法家，最早看到儒家忽視實際權威落差的也是法

利後嗣者也。」孔子說：「爲政先禮，禮者政之本也。」《禮記》載：「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重禮動口，復禮就要動手了，光靠克己是不夠的，還要克人。孔子一當上魯國的大司寇（司法部長），就在魯國展開復禮活動。他主持撤毀了三個實力派大夫季孫、叔孫、孟孫（都是魯君的同宗晚輩）的都城。大夫都城過大，侵犯了諸侯的權威，縮小了彼此之間的權威落差。但是，孔子的復禮活動在魯國沒有進行到底，在別的國家也不受歡迎，有時甚至混不到一口飯吃。

孔子失敗的原因在於，他沒有看到血緣權威落差形式已經過時，不能容納社會進步。奉行這個原則，勢必任親黜賢，重戚輕功，也就是說任人唯親，在政治上喪失治理國家的能力，在軍事上削弱軍隊的戰鬥力。輩分高的未必會打仗。結果是國家的滅亡。春秋滅國無數，在同等國力條件下，大體是最重禮的最先滅亡，比如他的母邦魯國；最不講禮的秦國，反而越來越強大。

但是，孔子爲重建當時社會權威落差所創立的以禮、分、名爲構架的權威落差理論體系，具有不朽的價值。只要更換了權威本位（什麼是權威本位，下一章討論），其理論就有了生命力，這爲後來的君權神授的君主政治實踐所證明。

禮，是建立權威落差的原則，在孔子那裡，就是按照血緣原則或後來的宗法原則建立權

侯目爲非我族類的異族，而魏國和韓國則是魏大夫和韓大夫從姬姓的晉君手裡奪來的。特別是秦國，把自己建設成我國歷史上最早的軍國主義國家，暴政於內，黷武於外，秦君很快就威服邦內，秦國不久就威震國外。到戰國末期，各國君王，一提到秦國都心寒齒冷。最後滅六國，一天下，弭戰亂，建立起了空前（但不能說絕後）的暴力權威落差的大帝國。

這是法家理論的成功。猶如禮是儒家權威落差理論的核心概念，法，是法家暴力權威落差理論的核心概念。法是暴力權威的集中表述。所謂立法，就是樹立暴力權威。韓非說：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可見法定的權威是成文的。法仍然是名義上的權威落差。不過，法家遠比儒家更注重實踐和理論的可操作性。他們從不空談理想狀態。他們極爲重視循名責實，重視實際權威落差甚於重視名義權威落差。「勢」，指的就是實際權威落差。而「術」，則是擴大和保持權威落差的方法和手段。

韓非主張人主的名義權威落差和實際權威落差要保持統一。爲此，他提出了「四美」理論，就是「身之至貴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勢之隆也。」身貴位尊是名義權威落差，威重勢隆是實際權威落差。君主要時時刻刻防備臣子暗中削弱自己的權威。他警告說：「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是以奸臣蕃息，主道消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這簡直是把他家祖傳的盜國秘方抖落出來了，他的韓國就是祖宗韓襄

家。法家觀察到，舊的氏族權威偶像已經破碎、坍塌，沒入歷史的黃昏夕照之中。

法家是暴力權威落差的鼓吹者。這個主張在亂世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可行性。在儒門弟子四處碰壁之時，法家諸君卻到處受到歡迎和重用。李克在魏，吳起在楚，申不害在韓，商鞅、范雎、李斯在秦，都是如此。韓非遭到既是同學又是同行李斯的暗算，否則，他大有希望幫助秦國滅掉自己想愛愛不成的祖國——韓國。

法家的暴力有內外之分。對內的暴力，就是嚴刑峻法；對外的暴力，就是戰勝攻取。西周的戒條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這是血緣權威落落下的戒條。大夫是以君主為首的一個大家庭的成員，對家庭成員當然不能用刑；而庶人則是異姓之人、族外之人、被征服之人或遠房、偏房親戚，對他們當然不適用家庭禮教。正是這個「刑不上大夫」，在法家看來，是君主和諸侯失去權威落差的根本原因。大夫們利用這一點違法犯禁、擴張勢力而不受懲罰。要保持君主對臣子的權威落差，就一定要刑上大夫。

西周不成文的規定是，諸侯之間是嚴禁動武的。因為諸侯們大多是同一個祖先的後裔，不是兄弟，就是叔侄，不應同室操戈。要相親相愛，「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確實，終春秋之世，很少有像後來的秦伐中原那樣，動不動就斬首數萬至數十萬。中原諸侯之間也經常征伐，但大多數是耀耀武揚揚威，擺擺樣子，讓你服從。

法家大行其道的秦國、楚國、魏國和韓國，可以完全不理這一套。秦、楚一直被中原諸

起穩如泰山的權威落差，他的江山就成了鐵打的，可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於千世萬世地傳下去了。他錯了。他不懂，在所有的權威落差形式中，暴力權威落差生存能力最差，最不穩定，也最難讓人忍受，因而，壽命最短。暴力不是西施，不是世界小姐，越赤裸越好。應當給它穿上一件外衣，要有神聖的符號，僅僅封泰山，表功德，求鬼神，「賴宗廟」是不夠的。

秦帝國的內部動亂不旋踵而亡，暴露了法家暴力權威落差理論的局限性。赤裸裸的暴力只能改變動亂的形式，不能消除動亂本身。

3. 慈、儉、謙：道家權威落差理論

道家探索的是另外一條路線。

他們反對儒家以禮為核心恢復權威落差的理論。老子頗有針對性地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可見，禮不僅是等而下之的東西，而且是搞動亂的「幕後黑手」。用禮來治亂，不是抱薪救火，讓病人當醫生嗎？他們也反對暴力權威。暴力的最大權威是殺人，當然也包括跟踪和竊聽。老子有點蔑視地指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就算能使老百姓怕死，你能通過殺人治亂立威，但你能親手殺每個人嗎？只要你讓殺人的人來殺，弄不好會傷了自己的手，比如趙高。

子用這種辦法從「萬乘之君」晉君那兒「傾」來的。由神偷世家子弟談防偷之法，應當是可信的。防偷之法，主要是「術」：「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結果是「有主名而無實」。

那麼，用什麼「術」來防止大權旁落呢？第一要學會「虛靜」，讓臣子無法揣摩你的意圖，那就沒有辦法打著你的旗號為他們自己謀權謀利。你反而可以觀察他們。你在暗處，他們在明處，很容易露出馬腳。第二要學會槓桿操作，用刑與德這兩個槓桿（韓非稱為「二柄」）來操縱臣下。刑德是最重要的權柄，抓在誰的手裡，誰就是實際上的權威。第三要搞平衡，不要專信一個人。專信一個人，他就會組織黨羽，使腳比腰壯，尾巴比頭大，樹枝比樹幹粗，一陣風就能把你颳倒。第四要讓臣下失去重量，要讓他輕飄飄地像根鵝毛，你往哪兒吹，他就往哪兒跑。不能讓臣下握重權。要擴大與臣下的權威落差，讓他們的頭頂構不到你的腳根。

李斯和秦始皇對第四術活學活用。平定六國之後，丞相提出，燕、齊、楚三國又大又遠，為了便於統治，建議始皇帝封諸子為王去鎮守。廷尉李斯反對，認為周文王封了許多同姓子弟為侯，結果相攻為仇，戰亂不已。不如皆為郡縣。始皇帝大為讚許，說：「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注意，感謝的是祖宗，重的仍然是血緣——引者注），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始皇帝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建立

關於建立一個無爲的「守夜人」國家的道德綱領。老子在道德上絕不是無爲論者。他明確反對「以智治國」。他說：「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應當以什麼治國？當然是以德治國。老子在骨子裡是主張以德德治天下的。

以我看，三大法寶裡最重要的法寶是儉。聖人要帶頭過儉樸的生活，這樣才能不與民爭利，才能在利益面前退讓，不爲天下先，才能慈愛起來。現在的中共官僚凶狠無比，主要是儉不起來。又貪又嘔又痴，所以看起來像著了魔。魔鬼爲王，當然是一國瘋魔。

用好這三大法寶，聖人就能樹立起絕對的道德權威，受到人民的愛戴。江海爲百谷之王，是因爲它善於處在下面；聖人爲萬民之王，是因爲他不爲天下先，出門躲著利益走。如同百川樂於歸海一樣，衆人也樂於歸附聖人。

老子的道德理想國沒能建立起來，道德上的人格權威在戰國時代也很難找到。不是說老子的人格權威落差理論沒有價值，而是說他的理論不合時宜。道德可以使治世更治，但很難使亂世變治。如同補藥可以強壯身體，但不能解熱退燒。一個國家元首的人格權威突然喪失，可能導致社會動蕩，但出現一個道德上的完人來治理國家，國家就能從大亂達到大治，那倒未必。由亂變治還需要許多條件。

儒、法、道三家的權威落差學說的命運耐人尋味。法家學說隨著秦王朝的成功而失敗，儒、道兩家學說則隨著秦帝國的失敗而成功。原因或許是，法家學說是打天下的學問，儒、

道家從根本上來說是反對任何政治權威的。在他們看來，政治和社會動亂的最終原因是人和社會的發展。人的智慧發展了，就會鬥智；人的體力發展了，就會鬥狠。社會財富增加了，就會誘導大家去搶去偷。前東德領導人可能修煉過道家學說。當東德的居民紛紛逃往西德時，他們譴責西德人在引誘東德人。東德人逃亡的根本原因，不是東德沒有搞好，而是西德搞得太好。這等於說，強姦罪的真正誘因，不是獸性，而是美色。如果讓道家的法官來執法，他極有可能這樣來審理強姦案：強姦者無罪釋放，被強姦的美女當即毀容。

因此，社會和人倒退，是消除動亂的治本之法。人本質到看不出什麼東西好，他就不會去爭奪；社會純樸到沒有悅耳的聲音，沒有眩目的顏色，沒有餽口的美味……人們就會不爭不取，和睦相處，社會自然就安定團結。

道家思想家也知道要讓所有人都廢棄他們已獲得的東西談何容易。但至少治國者應當能夠做到。能夠清心寡欲、與世無爭、大智若愚的只有道家所謂的聖人。所以，太平祥和的理想國應是以聖人爲元首的國家。這有點像柏拉圖的哲學家國王。柏拉圖生活在戰亂頻仍的希臘城邦時代晚期，老子生活在內亂外患的春秋末期。動亂強化了人們對人格權威的需求。不同的是，哲學家國王是理性的化身，聖人君主是道德的典範。

老子對聖人君主的期望有三條：第一是「慈」，第二是「儉」，第三是「不敢爲天下先」，也就是「謙」。他在《道德經》第六十七章裡把這三條稱爲他的「三寶」。這是道家

方面在人類歷史的發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前者保障社會安定，後者提供社會生機。如果個人創造性勃發，而社會控制力不足，就會像古希臘那樣，處於一種無政府狀態，最後受別人統治；如果社會控制力過大，個人積極性就會窒息，社會僵化和停滯就會到來^⑧。所以，完整的權威落差理論包括三個方面：

- (一)「君臣」權威關係或者首腦和下屬的權威關係，我稱爲第一項落差；
- (二)中央和地方的權威關係，我稱爲第二項落差；
- (三)政府和個人之間的權威關係，我稱爲第三項落差。

這三種關係，都是對一個國家主權的縱向分割，或者說，都是縱向的權威關係。爲了方便，我們可以把以上三種權威關係歸結爲權威與自由的關係，也就是權威與個人自由、決策參與和地方自治的關係。我認爲，權威與自由的關係問題，也就是權威落差問題，是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雖然傳統上，人們更傾向於把正義問題放在政治哲學的首要問題上。正義關心的是政治體制的倫理價值，而權威落差關心的是政治體制的構造和運作。把權威和自由的關係優先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我認爲在人類政治價值的順序表

^⑧ 伯蘭特·羅素，《權威和個人》（中文版，蕭魏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頁二二—三一。

道學說是治天下的學問。叔孫通對漢高祖劉邦就說過：「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五、權威落差：權威與自由的比例

儒、法、道三家的權威落差理論，是對世界政治哲學的一個偉大貢獻。他們既研究了名義權威落差，又研究了實際權威落差；探討了制度權威落差，比如儒家的「禮」和法家的「法」，還探討了人格權威落差，特別是君臣關係。但由於時代條件的限制，他們基本沒有涉及個人問題。在他們的理論中，只有君臣關係、上下級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看不到政府或權威和個人的關係。在他們的概念中，有時會提到「民」，但這個「民」，是個集合概念，不是個人。只見森林不見樹木，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徵。個人是不能與「君」相對的，與「君」相對的只有「民」。民與君比，重於泰山（「民爲重，君爲輕」）；個人與君比，便輕於鴻毛了。所以中國人必須聚衆才能鬧事，個人總是求告無門。

重視個人，是西方的文化傳統。天上的彩虹，是上帝與諾亞和他的兒子之間的契約。基督教の拯救，是個人的拯救。受語言限制，專門討論權威與個人關係的西方著作我讀過的不多，印象比較深的，是我寄宿在秦城監獄期間給過我很大快樂的英國哲學家羅素的一本小書《權威與個人》。那本書主要談論社會控制力與個人創造性這一對基本矛盾，他認爲這兩個

表明，當 x 趨於無窮大時， y 趨近於 0 ，這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全權模式。

$A = KE$ (式三之三)

表明，當 x 趨近於 0 時， y 趨近於 0 。這時，沒有任何權威存在，人人平等。這是西方契約政治論作家所設想的個人權力轉讓前的原始狀態，或者是羅爾斯在《正義論》裡所構造的掩蓋在無知之幕後面的原子狀態，同時，也是無政府狀態。

六、高峽平湖：當代僭主全權政體模型

毛澤東不僅是個天才的權術大師，還是個天才的詩人。他的詩詞和他的書法一樣，才華橫溢，不守規矩。他的直覺幾乎和女人的一樣好。除了唐詩宋詞，沒有任何其他朝代的中國詩人的作品，像他的作品那樣琅琅上口，意境闊大，被人廣為傳頌。我在少年時代，幾乎能背誦他公開發表的全部詩詞。

他於一九五六年六月寫過一首詞《水調歌頭·游泳》：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上，應當是權威優先於自由，自由優先於平等。正如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所說的，人類在沒有自由的條件下生活了數千年，但如果沒有權威，一天也不能生存，當然要看權威是以什麼為本位的。而平等，如果沒有自由制約，就會導致以集體名義實施的暴政，像我們生活其中的政體那樣；就會是人類的墮落，因為沒有自由的平等，只能是向下的平等。猶如一個家庭，其生活水平，由薪水最高的人決定；其精神水平，由文化最低的一方決定，即使你是大學教授，如果你娶了一個村姑，你在家裡也只能談論土豆。我特別針對的是被盧梭廣泛推銷的平等優先於自由的原則。在他的名著《社會契約論》裡，政治哲學的基本問題似乎變成了權威也就是主權與平等的關係。他的理論成了當代僭主政體的合法性來源。我在下一章還要更詳盡地回到這個主題。現在先來討論權威落差。

如果用 K 表示權威落差，A 表示權威，F 表示自由，則自由和權威的關係可以表示如下：

$$K (\text{權威落差}) = A (\text{權威}) / F (\text{自由}) \quad (\text{式三之一})$$

這個式子說明，權威落差就是權威與自由的比例。這是我給權威落差的定義。這個式子還說明，權威落差與權威成正比，與自由成反比。權威與自由的比例不同，人類的政治體制就不一樣。我們先來考察兩種極端類型。

$$F = A/K \quad (\text{式三之二})$$

是個朱門幫凶。

第二，中央集中了地方的所有權力，地方政府要打二兩油買三斤醋，建個廁所修條路，都要向中央政府打報告。

第三，政府剝奪了個人的一切權力，從政治權力到經濟權力，從社會權力到文化權力，從笑的權力到哭的權力，從說話的權力到不說話的權力，到了極端的時候，人的嘴巴的三種功能（吃飯、說話、接吻）只留下了半種功能：吃半飽的功能。對你實行從頭髮到腳趾頭的領導和從神經到陰莖的控制。你的一切都必須被批准，從搖籃到墳墓，從自身到子孫。這種體制，是一個人對一個黨的全面而絕對地壟斷，是一黨對國家的全面而絕對地壟斷，是國家對全社會資源的全面而絕對地壟斷，從政治資源到經濟資源，從物質資源到思想資源。但所有這些資源，特別是權威資源，既非神授，又非民授，都像「高峽平湖」一樣，落差雖然達到最大，但沒有源源不絕的來源，不是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沒有資源再生能力，資源耗盡之後，黃河斷流之後，體制就會瓦解。

研究全權僭主政體的衰變是極其有意思的。這種衰變，一般都是從放權開始，從第一項落差降低開始。第一代僭主比如毛澤東死後，第一項落差開始降低，僭主政體開始衰變為寡頭政體；同時，中央的權力開始下放到地方，第二項落差開始降低，中央集權體制開始衰變為諸侯體制；但是，第三項落差最難改變，也就是說，個人的自由他們最不願給予。「他

風搖動，龜蛇靜，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這首詞的最後六句似乎是一個打算，他要搞一項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工程：三峽水庫。但詞中的一個意象：高峽出平湖，卻極具象徵意義，它不僅是他一生政治和人生謀略思想的寫照^⑨，也是他親手締造的政治社會體制的形象結構。這個體制，被西方某些學者稱爲全權政體，或稱爲極權政體。但全權政體這個概念，只涉及統治形式，沒有涉及統治性質；或者說，只是權威結構概念，沒有包含授權概念。毛澤東的政體，其權威，既不是神授，也不是民授，而是槍桿子裡面打出來的，但他又像中國傳統君主那樣行使權力，因而又是僭主政體。兩者疊加，所以稱爲當代全權僭主政體。

這個政體的模式，就是「式三之二」所表達的狀態。如果從權威落差的三個方面來考察，可以描述如下：

第一，最高統治者也就是僭主握有幾乎所有權力，特別是生殺予奪大權，統治集團的其他成員，都不過是聾子的耳朵和瞎子的瞳孔，是個陪襯；對主子，是個華服奴僕；幹壞事，

⑨ 參閱吳稼祥，《智慧算術——加減謀略論》（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六年版）。

病痛，不好意思說出來。如果寫作也是演出，那麼我的舞臺已經從北京轉換到了波士頓。當我第一次站在查爾斯河上的鐵橋邊，看黛色河水上漂浮著白色野鵝，聽天空裡的海鷗啾啾鳴喚，心裡浮現一絲陌生的哀愁，類似於秋風中飄到河對岸的落葉，似乎沒有牽動任何目光。除非，在十分遙遠的地方，存在著一縷永恆的視線。

但我很快回到自己的內心。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這兩個角色又一次登場。我們已經介紹了它們各自的身分和來歷，現在，它們要演它們的故事。我們已經知道，木桶越大，它的離心力也越大；必須加大桶箍的力度，提高向心力，才能使桶不散架。這就是說，木桶的半徑越大，桶箍的箍力就越大；換句話說，權威距離越大，要求權威落差越大，前者與後者成正比。這種正比關係，是權威距離和權威落差之間的基本關係。

權威落差增大的含義，我們已經敘述過了。它意味著一個社會權威增大，自由減少。它們之間的關係，見圖三之一：

們」是誰？「他們」是前南斯拉夫領導人吉拉斯所說的「新階級」，是踏上權力階梯的所有人，是「新奴隸社會」所有大大小小的「奴隸主」。保持住特權是這個階級的共同意識。他們最不願簽署的就是奴隸釋放令。只要第三項落差不變，全權政體的基本性質就不會改變，就不會變成自由政體。但由於前兩項落差的變化，當代僭主全權政體，就變成了當代「寡頭——諸侯全權政體」。

在所有的政體中，最沒有權威的政體是古希臘式的直接民主政體，最沒有自由的政體是當代僭主全權政體，既沒有權威又沒有自由的政體大概就是我們的「寡頭——諸侯全權政體」了。但是，由於資源的枯竭，第三項落差不改變是不可能的，因為「新奴隸」的生產能力，已不足以養活他們自己了，更不能向奴隸主提供剩餘產品，這部分奴隸自然先被趕出去「待業」。這些獲得了部分自由（主要是經濟活動的自由）的被釋放奴隸一多，經濟自由化就持續擴展，全權政體就開始衰變為以自由經濟為基礎的所謂「威權政體」。這時候，離自由政體就不遠了，因此，危機也就更加深化。

七、自由——權威曲綫

寫完這一節標題後，我鬆了一口氣。這一章的思想傷口終於可以癒合了。我為它忍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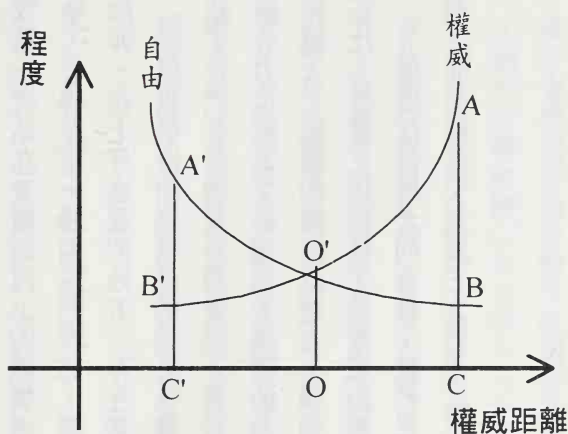
權威可能過剩；中等國家的權威落差 $\approx \parallel$ 表明，它的權威等於自由，或者說，權威與自由處於均衡狀態，這是政治體制的理想狀態；小國的權威落差 $\approx \wedge$ 表明，它的權威不足，自由可能過剩。

這三種狀態，是對國家政治體制的極端抽象，但它基本上符合西方古典政治哲學家對古典政體的描述。在他們筆下，古希臘城邦處於 $\approx \wedge$ 狀態；亞力山大帝國、古羅馬帝國和東方專制主義國家處於 $\approx \parallel$ 狀態；而伊麗莎白時期的英國本土大概最接近 $\approx \wedge$ 狀態了。

但是，一個國家不能總是通過擴大或縮小國家版圖來調節它的政治體制。這三種形態描述的是政治體制的原生狀態，在既定的權威距離下，人們可以通過改革，選擇其他政治體制。聯邦制和代議制的發明，使這種可能性大大增強。同樣是小國或小邦，臺灣和新加坡的選擇就不一樣。臺灣吵吵鬧鬧，對陌生的政治自由還不太習慣；新加坡安寧得象個童話，幾乎接近柏拉圖哲學家國王和老子小國寡民的境界，它連續多年被世界競爭力委員會推上競爭力最強國的前幾名，就是因為它既有活力，又有穩定。至於你是否喜歡它，那是你的美感問題。

隨著我們的研究更接近現代和現實，我們將對「自由—權威曲線」作出修正。

圖三之一 權威落差曲線



這個圖可以稱作「權威落差曲線」，或者稱作「自由—權威曲線」，它說明了三種情況下的權威落差：

當權威距離在 C 點時，權威落差 $K = AC/BC$ ，這時的 $K > 1$ 。

當權威距離在 O 點時， $K = OO'/OO'$ ，很明顯，這時的 $K = 1$ 。

當權威距離在 C' 點時， $K = B'C'/A'C'$ ，這時的 $K < 1$ 。

相對而言，權威距離在 O 點上的國家，是個大國；在 O 點上的國家，是中等國家；在 C' 點上的國家，是個小國，或者是類似於雅典的城邦。大國的權威落差 $K > 1$ 表明，這個國家的自由不足，

叫做「崩潰趨勢假說」。

在四個假說中，崩潰假說是我要著重闡述的，它是「民主——分裂陷阱」的理論基礎。它描述的是一個原生性超民族大國的民主化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她在民主化和領土完整之間作出選擇。一百年前，中國和俄國都進行了第一次民主化嘗試，都失敗了，中國還丟了外蒙。一百年後，中俄兩國這對難兄難弟，開始了第二次民主化嘗試。俄國驚險地一跳，跳過去了，身後是一堆國家版圖的碎片，連撫慰過普希金的基輔月光，都被切割在俄羅斯國境之外了。而中國，還在民主的對岸躍躍欲試又躊躇不前。

爲了保持懸念，我將從第五章開始先討論其他三個假說，崩潰假說最後討論。這並不是說其他三個假說是假貨，要先向你推銷，也不表明它們沒有吸引力，或不會給你快感。其實，它們可以讓你看到歷史的另一番景象，我敢向你擔保，這景象你在別的理论背景中是肯定看不到的。最後回到崩潰假說和本國的現實政治問題，不僅是邏輯張力的需要，也是全書氣勢和敘述結構的需要。

四個假說似乎對中國幾千年特別是後幾百年的歷史沒有多少解釋力，從長程的歷史眼光來看，中國的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雖然都有變動，但都是短期的。只要回到統一狀態，就會回到原來的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上來。這表明，中國的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在傳統統治手段下，都已達到極限：它的侵略動力和權威化動力都已經枯竭。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中華帝國

八、四大假說和木桶帝國的極限狀態

從權威距離和權威落差的正比關係中，我們可以推導出四個最讓我激動的假說。你可以說權威落差理論產生於歸納，而四個假說產生於演繹，對權威落差理論的演繹。演繹法在當代學術界可憐得很，美元那個亮妞，根本看不上這個糟老頭。當我把這些假說的大綱說給我的朋友劉軍寧博士聽時，他很關心地問我：「你是不是很喜欢斯賓諾莎，怎麼聽起來有點幾何學的味道？現在美國做的學問，大多是顯微鏡下的學問，我怕美國主流社會對此不感興趣。」幸虧我主要不是為美國人寫的。

閒話少說。我的第一個假說是，在既定的權威落差下，權威距離突然擴大，權威落差也有擴大的傾向。這是「權威化假說」。

第二，在既定的權威落差下，權威距離突然縮小，權威落差也有縮小的傾向。這是「自由化假說」。

第三，在既定的權威距離下，權威落差突然擴大，權威距離也有擴大的傾向。這是「侵略傾向假說」。

第四，在既定的權威距離下，權威落差突然縮小，權威距離也有縮小的傾向。我把這個

第四章 權威本位：瀑布的聯想

一、黃河斷流

1. 秋風吹渭水

我躺在床上，半夢半醒之間。對於我，這是思想分娩的重要時刻。許多交給潛意識去處理的概念、意象和它們的相互對位問題，現在都浮出水面，前來交活。有的完工了，有的還是半成品，還有的沉沒了，成了冰海沉船。

是的，第四章等我開頭，該起床了。「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

的權威落差已經達到農民生存狀態的極限，再擴大，再生產便不能持續。權威落差不能擴大，資源動員能力受限制，就不可能對外發動侵略戰爭。即使像明成祖那樣發動了侵略越南的戰爭，也沒有足夠的資源在那種條件下維持對它的統治，最後還是放棄。所以，中國人愛好和平，並不喜好戰爭。

中華帝國木桶由於治水與抵禦侵略的需要，不能箍小，箍小了，裡面的「水」不夠全體社會成員吃；也不能箍得更大，箍大了，沒有足夠大的箍力，木桶會破裂。桶的直徑和箍力都已經達到極限狀態。由於桶箍疲乏、王朝老化、統治能力下降，桶箍和木桶同時崩潰，但新上任的箍桶匠重新箍起來的桶，還是那個桶。

所以，月落烏啼總是千年的風霜，濤聲依舊又見當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只能重複昨天的故事，這一張舊船票（別碎了），總能登上新的客船……

如果這本書有幸辱及金觀濤夫婦的法眼，我想請教的是，這是不是也可算作對中國政治與社會頑固的穩定結構的另一種解釋？

秋》的出版問題，最後，我讓他感到了我的「陣痛」。我告訴他，爲了找到一種既有美感又貼切自然的形象結構來象徵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之間的關係，我幾乎用盡了我作爲一個詩人的資源。我當時最傾向於用灌溉系統，水位落差大，水就流得遠，灌溉的面積就大。

單教授略略沉思，然後說：「略有不妥。灌溉面積的大小不僅與落差有關，還和水流量有關……」我腦子裡像蒙太奇似的閃過黃河斷流的景象。是呵，黃河的落差是恆定的，如果流量不足，或河床淤塞，它也流不到海裡。在構思這本書的大結構時，我設定過權威資源的概念，並想過用黃河斷流來使權威資源枯竭的思想結構化、形象化。當時沒有討論這個問題，他基本同意我用人體的血液循環系統來排除流量問題，讓血液灌溉的面積只和血壓和血管有關。血壓相當於落差，血壓過低，血液灌不到大腦，就會眩暈。

雖然我最後以別的方法敘述了第三章的思想，但那次討論進入了我的潛意識，讓我不安。我慢慢意識到，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這兩個概念還不夠用，還要有些補充概念，來表達權威資源的豐歉也就是「權威流量」等問題。就像廬山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三千尺」是落差，「銀河」是水流量。山高水長，水資源充足才行。

權威資源說的是權威來源問題，也就是權威的合法性和權威在人們心中的信仰程度問題。在作進一步討論之前，我們先認定，毛澤東政權的合法性和人們對它的信仰，主要來源於他和他的宣傳機器創造的現代神話。毛澤東不是人，是神，這個觀念過去在絕大多數中國

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我身雖在美國的玉門關，但思想已經接近壺口瀑布。由於長江三峡工程，李白「千里江陵一日還」的豪情將會乾涸；而由於黃河斷流，王之渙「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的壯景也將枯黃。

上網，下載一篇呼籲書，是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一六三位院士聯名寫的，呼籲社會各界關心黃河，拯救黃河。黃河從一九七三年以來，幾乎年年斷流，一年比一年嚴重。他們擔心，這條流過千萬年的偉大河流，流不過冬季；一條不朽的河流，成了季節河；一條「千萬里，千萬里我追尋著你——大海」的河流，將成爲內陸河。一九八八年，一批才子們寫了一部鬧出是非的電視片《河觴》。那是一部河流文明的影音悼詞。也許是爲了讓位給藍色海洋文明，黃河要自動退休了。

無論如何，黃河斷流不好，呼籲總是好的。但遺憾的是，另一條「黃河」比這條黃河斷流得還要早些，它第一次斷流大約在一九七一年秋季，現在，它的河床一片龜裂，卻沒有聽見什麼人，特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部委員們，或中共中央什麼研究室的研究員們發出什麼呼籲。

千禧年之後的第一個春節我幾乎是在「產床」上度過的。難產的第三章有時手先出來，有時腳先出來，就是看不見它的頭。恰好我的朋友單少傑教授也在合肥過年，有一天我們從酒海肉山中逃出來，躲在他父母家清談。我們先討論他寫了六年的那部巨著《毛澤東執政春

了今天的定時炸彈？是今是而昨非，還是昨是而今非？本以為他們是神仙的聚會，卻怎麼還有魔鬼的血腥？我認識的不少人，我看過的不少回憶材料，都承認，他們對毛澤東信仰的動搖，就是從林彪事件開始的。

正是從那時開始，毛澤東政權權威資源的「黃河」開始斷流。這次斷流的後果，在五年後的一九七六年四月得到檢驗：天安門廣場上第一次出現了不要毛澤東檢閱不要事先彩排的群眾聚集，這次聚集的目的不是歡呼，而是抗議。其鋒芒直指毛澤東本人，雖然他的替身是他的助手們，即所謂「四人幫」。

2. 四個神話

毛政權，也就是當代全權僭主政體的權威資源有四個「泉眼」，四個來源，或者乾脆叫做「四大神話」：第一，個人全能神話；第二，民權神話；第三，真理與科學神話；第四，經濟增長神話。隨著這些神話一個一個破產，這個政權的權威流量越來越少，權威資源的黃河斷流的時間越來越長，政治危機也越來越深化。

毛澤東本人打破了他自己的個人全能神話，而所謂「三代領導人」，即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爲了保持個人權威落差，其接班人的日益荼蘼化，使個人全能變成了「個人無能」。鄧小平靠一次改變，結束了華國鋒的「後荼蘼時代」，使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但江

人的心目中不可動搖。關於他的神話可以收集很多。比如，說胡宗南進攻延安時，子彈像暴雨一樣傾瀉，但毛澤東走過的地方，「彈雨」就停了，他一過，彈雨又颳過來了。還說有一次毛澤東突然從屋子裡走出來，一改平日這個時候睡覺的習慣。他剛走到路口，身後一聲巨響，他的房子飛上了天，剛投下炸彈的飛機還在頭上盤旋。

這是老百姓眼中的神。在他的黨員心目中，他是真理的化身。他說的話不會錯；他幹的事永遠對；他走的路暢通無阻。他自己都被這個感覺騙了。據說一九五九年開廬山會議時，毛澤東帶著他最喜愛的女服務員飯後散步。也許他喜歡披荊斬棘的感覺，他專門挑灌木叢生的小徑走。越走路越窄，最後終於沒有路了。後邊的女服務員小聲小氣地提醒道：「主席，這條路走不通，咱們往回走吧？」我毛澤東還有走不通的路？毛一言不發，用更大的步伐穿過矮樹叢，走上一條大路，頭也不回地進了自己的房間。第二天，那個服務員被遣送回原籍去了。

但是，毛澤東的神威在一九七一年秋季隨落葉一齊開始飄零。「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那一年的九月，林彪和他的隨行人員突然神秘地在據說是溫都爾汗的郊外變成了灰燼。那個身體「永遠健康」的林彪，那個「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林彪，那個毛澤東接班人地位被寫進了憲法的林彪，那個為《毛主席語錄》做序、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總是站在毛澤東身邊接見紅衛兵的林彪，可是毛澤東自己欽定的，怎麼昨日的親密伙伴，成

地獄裡。這就是整個權力金字塔的陷落：它的頂部在地平面，底部在陰曹地府。當然，我們更不敢想像，再由華國鋒來挑選他的接班人，他的茶蘼。但是這種不敢設想的事，今天發生了。茶蘼江澤民保持住了他的權威落差：「兩個凡是」變成了「三個正統」；「英明領袖」變成了「江核心」；「批鄧」變成了「三講」；「交城的山水」變成了「走進新時代」；「抓綱治國八條」變成了「三個代表」……

有首美麗的唐詩真有點捨不得用在這裡：「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雖然江澤民號稱他的春天開始了，但入的依然是舊年。儘管茶蘼本人的感覺良好，但他的政權的無能化卻是天下盡人皆知。個人全能的神話是徹底破產了。

一九八九年破產的是這個政權的「民權神話」。六月二日晚上，軍隊正從萬壽路口開過去，向天安門廣場進發。我手握石頭和大批市民一起，被守衛該路口的士兵一陣陣地逼退回來，不時有血淋淋的年輕人被人摻扶著默默地從我身邊走過。在路邊，在一棵大樹下，有兩個老太太聊天。

「唉，北京是塊寶地呀！」一個老太太說。

「誰說不是呢！」另一個老太太同意。

「沒有人敢把軍隊開進北京城呵，連日本人進北京都沒有打槍呢。」

「可不是。我聽說傳作義不想壞了北京的文物，才向共產黨投的降。」

澤民的「後茶廳時代」，卻沒有改變來結束，因為偷小偷的東西越來越難。

當年，華國鋒曾經有過一段「短暫春秋」。他上臺後，不可避免地要擴大和穩固他對其他高層領導人的權威落差。他三管齊下。首先，把自己擺在毛澤東的神器旁邊，他即使是個耗子，也會有安全感。具體做法是製造和鞏固「兩個凡是」的觀念：「凡是毛澤東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言下之意，讓我華國鋒當接班人是毛澤東的決策，說我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是毛主席的指示，你們誰敢反對？其次，是自我神化，出標準像，唱交城歌，加修飾詞，讓「英明領袖」和「華主席」成爲一句牢不可破的成語。最後，盡可能打壓具有很高威望的鄧小平和其他開國元勳。

如果華國鋒成功了，中國就會失敗：地圖上就找不到深圳這個市，辭典裡就沒有「改革開放」這個詞，沙頭角的中英街上也許還飄著英國的旗，我們的「爺爺」是毛澤東，「親爹」是華主席……可以這麼說，今天中國社會生活中殘留下來的任何一點趣味和精彩，都要歸功於華國鋒沒有保住他的權威落差。你想想，如果是喜馬拉雅山要保持它的權威落差，在它下邊，泰山可以生存；如果泰山要保持權威落差，能生存的可能只有丘陵了；在丘陵之下，只有小土疙瘩得到重用。

假如一個人本來沒有什麼威望，他的權威在地平面上，卻非要往下挖出落差不可，他的助手們就到地下了；如果每級官員都向下挖自己的權威落差，挖到最後，老百姓只能生活在

泳，在美國彈琴，拋幾個媚眼，吐幾句洋文，追悼會上作哭狀，天安門頭裝穩重。於是就成了大國領袖，於是就是一代巨人。他真夠前衛。他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貢獻，就是對政治的解構，就是把政治由嚴肅到恐怖的東西，變成了兒戲到逗樂的玩藝兒。

由此看來，看不見的權威資源的黃河斷流，絕不亞於看得見的水資源的黃河斷流。前者可能引發的政治社會危機，也不見得不比後者引發的生態危機更可怕。通過植樹種草，搞好水土保持，可能會增加黃河的流量；但有什麼辦法增加權威的流量呢？

二、三種本位的權威

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施米特和卡爾在他們合寫的一篇討論民主的論文裡說：「曾幾何時，民主這一詞語作為一種貶值的通貨在政治市場上流通。」^①

劉軍寧博士在收錄這篇文章的那本書的前言裡使用了兩位教授對民主的形容，說「民主又像是沒有本位的『貨幣』，在世界的政治市場上到處流通，而每個國家都有對『民主』這

① 劉軍寧編，《民主與民主化》（中文版，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版），頁二〇頁。

我承認，我當時眼睛有點不自在，看東西有點模糊。老人沒有憤怒，只有惋惜。但她們心裡知道，她們親眼看到的東西，比日本人、比國民黨人帶來的東西還要可怕。

她們看到了什麼？美杜莎的頭，那個一直藏在頭巾之下的無數條毒蛇狂舞的頭。美麗的光環消失了，赤裸裸的暴力嚇了世界一跳。雖然自此以後共產黨官方還偶爾以人民的名義說話，還說什麼「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他們自己都不相信這話是真的。從此以後，中國就進入了公開軍警統治的年代，便衣或不便衣的特務跟踪、竊聽，隨便抓人，成了家常便飯。這個政權是什麼衣都不想穿了，一幅破罐子摔破的樣子。

從某種意義上說，科學的神話是科學自己打破的，而真理的神話是共產黨自己扯爛的。務實的鄧小平對其他神話不感興趣，唯一感興趣的是經濟增長神話。他雖然也不怎麼相信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能使社會生產力無限增長的神話，但他知道，他的政權要想生存，沒有經濟高速增长是不行的。他發動、胡耀邦領導的思想解放運動，打破了共產黨對真理的壟斷，把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從真理的龍椅挪到了經濟增長的寶座上來了。

全能變成無能，科學其實是教條，民權還原成暴政，手裡只抓著一根經濟增長的稻草。這是對當前共產黨統治資源狀況的盤點。鄧小平憑他的直覺，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他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硬在何處？經濟不發展，這個政權必然軟下來。江澤民的腦子就沒有這麼清楚了。在他看來，他統治的最後權威資源不是發展，而是做秀。到東海游

主義國家干涉我們的內政，做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情……」似乎千百萬在街頭上怒吼的人不是中國人民，那些幾天前還不知道躲在何處的人倒是人民。在這荒唐邏輯的背後，是當權者潛意識中的「父權意識」。

在他們看來，自己國家的事情，就是他們的家事；他們在家裡可以為所欲為，因為他們是「家長」，是「父親」。父親打孩子，鄰居管不著。要管就是干涉別人家的內政。這對於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是完全聽不懂的。在他們國家，如果未成年的孩子控告父母毆打他，父母是要坐牢的。在那裡，人權高於任何其他權力，沒有什麼父權，更沒有什麼「父母官」。

父權意識並不來自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它起源於相當原始的父亲社會。在父系氏族社會裡，它是政治權威的來源。從傳說中的堯、舜、禹，到有史可考的夏、商、周，其權威本位都是父權。父權權威是一種最自然的權威而非超自然的權威，就像父親生兒子，兒子生孫子那麼自然。它的權威落差，差不多等於血緣落差，也就是輩份落差和嫡庶落差。就長幼而論，爸爸比兒子有權威，爺爺比爸爸有權威，而兒子又比孫子有權威。孫子服從兒子，兒子服從老子，老子服從老子的老子，這叫「孝」，如果恰巧老子是王，老子的老子是太上王，這種服從也就是「忠」。弟弟服從哥哥，這叫「悌」，如果恰巧哥哥是君，弟弟是臣，這種服從也叫做「忠」。所以，父權本位權威的一大特徵是「忠孝」、「忠悌」一體，政治權威

種政治貨幣的發行權，且不受「幣值」、「額度」和「版型」的限制，這樣，民主的「花樣之多」就可想而知了。」^②

對照原文，軍寧對施米特教授的原話可能有誤讀：「貶值的通貨」不等於「沒有本位的『貨幣』」。沒有本位的貨幣可能貶值，有本位的通貨也可能貶值，只要貨幣發行量超過黃金或白銀儲備；就是硬通貨黃金也會貶值，因為它在流通中會發生磨損。

我並不是想在這裡普及貨幣常識。我只是想說，從我要在本書闡述的理論而言，民主，作為權威的一種現代形態，它是有本位的。一種權威的本位，就是它的權威來源；如同一種通貨的本位，就是該通貨的價值來源一樣。迄今為止，人類已經「發行」過三種常規形態的「金本位」權威。它們是：「父權」本位權威、「神權」本位權威和「人權」本位權威。

1. 父權本位權威

六·四後，許多西方國家抗議中國當局對平民的武力鎮壓，這種道義立場，被中國政府認為是干涉中國內政。那時的媒體上出現頻率最高的句子是：「……我們絕不允許西方資本

② 同上，頁四。

親代賢。但是，鬍子多的不一定才能多，血緣親的不一定本事大。於是，貴族政體就面臨這樣一個尷尬：要任用賢者抵禦侵略，治理國家，則親者不親，禮崩樂壞，禍起蕭牆，血濺宗廟；任用親者維持法統，則賢者去國，遠走他邦，壯大敵人，削弱自己，為叢驅雀，為淵驅魚，比如秦之客卿，楚之門客。一般情況是，誰先拋棄父權本位和血緣權威，誰就先強大起來。誰拋棄得最徹底，誰就可能是最後的勝利者。用砍頭多少來論爵位高低的秦國最後滅絕六國，就毫不奇怪了。

儒家企圖阻止這種趨勢，其學說四處碰壁；法家積極順應這種潮流，其學術到處受到歡迎。但是法家並沒有完成中國權威本位的轉換，它毀滅了「血緣權威本位」，建立的是一「血腥權威」體制。就像任何貨幣不能以斧頭為本位一樣，任何常規權威也不能用槍桿子為本位。槍桿子裡面可以出暴力政權，但刀尖上站不住盛世王朝。

2. 神權本位權威

秦帝國不旋踵而亡，許多人總結過許多教訓。比較著名的是賈誼的〈過秦論〉。「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是千古不刊之論。

和血緣權威一體，家庭倫理和政治倫理一體，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一體。

父權本位權威的另一個特徵是圖騰崇拜，圖騰是迷信而非宗教。所以，父權本位權威依靠迷信來加強其權威。迷信只具有地方性，而且一個氏族一個圖騰，相互之間具有很大的排他性，不可能成爲一個非氏族大國的統治權象徵。據《史記》，殷商的圖騰應當是「玄鳥」（其始祖契的母親吞了一個玄鳥蛋後懷了契），周的圖騰好像是巨人（其始祖棄的母親不小心踩了巨人的腳印回來後就懷孕生了他），而秦的圖騰也是某種「玄鳥」（秦的始祖大業的母親也吞了個玄鳥蛋，結果生了大業。如果我們對秦不滿，完全可以在歌中唱道：「都是黑鳥惹的禍……」）。當然，我們不能說秦帝國的圖騰是三陪女郎，儘管傳說始皇帝嬴政是邯鄲歌女趙姬所生。

很明顯，以父權爲本位的政治體制，還是「貴族政體」，最高統治者也就是本氏族中地位最尊的長老或嫡系長子。周王和秦王都不過是通過征服擴大了統治範圍的大酋長。當貴族政體只用來統治本氏族時，它能維持本氏族生活秩序，一旦它被擴展到許多氏族共同生活的廣大區域，它就會像一個成年人身上穿著一件童裝，衣不蔽體，而且撐破了許多地方。

這就是中國春秋後期周朝統治面臨的情況。周朝同姓諸侯已經無力阻止外姓氏族楚和秦的擴張，要阻止他們，就必須粉碎自己的父權本位和貴族體制。這就是任人唯親與任人唯賢的衝突。在貴族政體下，上面要求下面「忠孝」一體，下面必然要求上面「親賢」不分，以

隋朝的死因是政權危機。政權危機指的是權威落差不當，不是過大（表現為暴虐），就是過小（表現為無能和混亂），或者忽大忽小（時而暴虐時而無能）。

就人類政治發展史的一般情況而論，接替「父權本位」的是「神權本位」。在中國，「神權本位」的建立以龍與皇權的統一為標誌，皇帝即所謂「真龍天子」。前面提到，此前夏商周的崇拜物都不是龍。真正處心積慮把自己和龍拉扯在一起的是漢高祖劉邦，他不再是什麼怪鳥巨人的後裔，他本人直接就是龍種。《史記》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其次，龍種又進一步得到印證。劉邦帶一幫亡命之徒夜行澤中，親手斬一大蛇。有老婦夜哭，說是她的兒子乃白帝之子，被赤帝之子赤龍殺了云云。而秦始皇也常說「東南有天子之氣」。劉邦逃亡在山澤岩石之間，其妻帶人找他，一找一個準。問原因，說是劉邦所居之地的上空常有雲氣。雲從龍，風從虎。劉邦不是龍是什麼？最後，把這一神話廣為傳播，並樹為旗號。劉邦被推為沛公時，祠黃帝，旗幟皆赤，以表示是赤龍之子的軍隊^③。

從此以後，龍就成了皇家的專利。妄言自己與龍有關的，不是當上皇帝，就是掉了腦

③ 《史記·高祖本紀》。

賈誼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命題：以暴力奪取的政權，不能以暴力守。這比古希臘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同類命題要妥貼些。亞氏說，暴力產生的政權是速朽的。支持他的論據是他的學生亞力山大大帝的實踐，不支持他的論據更多。中國從商朝開始，幾乎所有王朝都產生於暴力，但速朽的主要是秦朝和隋朝。

速朽的不一定是用暴力取得的政權，而是以暴力治理的政權。不是不能用暴力，恰恰相反，暴力只能用暴力來清除；而是不能用持續的暴力。這就是攻守異勢：攻用暴力，守用仁義。以仁義守天下是仁政，以暴力守天下是暴政。

但是，秦、隋滅亡的原因並不完全相同。秦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是沒有解決權威本位問題，它廢除了傳統以血緣為紐帶的「父權本位」，但沒有找到新的權威本位，氏族統治的基礎崩潰了，社會統治的基礎沒有建立起來。靠黑鳥、靠宗廟已經不能在廣大的六國廢墟上建立統一的權威基礎。圖騰崇拜結束，全社會成員都崇拜的宗教性象徵物還沒有出現。從秦始皇登基後東奔西跑，不安於位就可以知道，他不神聖的身世（從他祖宗的出身到他自己的出身）使他很難神化自己的政權。他最感興趣的是到處勒碑刻石，炫耀自己的武功，以及求神拜仙尋找長生不死藥。他不再關心他王朝的壽命，只關心他自己的壽命。這種權威本位缺位，我稱之為「政本危機」，即權威本位危機，或者用現代術語說，是合法性危機。秦王朝死於政本危機和政權危機綜合症。

確定。對龍種的認定有兩個原則：一是從「父權」時代保留下來的「龍生龍，鳳生鳳」原則，也就是血緣繼承原則：只要認定是老皇帝的嫡系長子（長子和嫡系原則在清代雍正皇帝時有了重大修正，改儲君制為皇子選賢制，使繼位皇帝的愚蠢系數大為降低）具有優先繼位權；二是勝敗原則，或稱「勝王敗寇」和「勝龍敗蟲」原則：如果你不是皇帝的兒子，你又認為自己是個「真龍」，那你可以選擇造反，進行改朝換代的戰爭，如果你勝了，你就自動被認定為「真龍天子」，而那個失敗的君王，就成了一個任由你處置的爬蟲，像李後主那樣變成詩人的就算是幸運了。

這兩個原則對中國傳統君主體制的持續和更迭都是至關重要的。「龍種」繼承制原則，可以維持統治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使在位的好皇帝對待天下像對待自己的家產一樣負責，他不會把貪官污吏看成是「同夥」，只會把他看成是「家賊」，在盜竊他的家產，敗壞他的家風，要想盡一切辦法嚴懲。今天中共統治下全體官員集體腐敗，就是因為公有制把社會財富變成了無主資產，沒有任何人對沒有到手的公共財產負責，也沒有任何人對統治的最後後果負責。這就滋長了全社會的攔路打劫、趁火打劫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統治方式不如帝制。

「勝王敗寇」原則，是防止王朝統治狀況過度下滑的「煞車裝置」。假如有一個壞皇帝在位，這個原則給他一個壞的底線：不要逼得人民造反。幹得好，天下就是你的家；幹得不

袋。曾國藩的家人也只敢說他是蟒蛇精投胎，想陷害他的人故意誣告他妄稱自己是龍種。

劉邦基本上完成了神權本位的建設工作，解除了政本危機；並廢除了暴秦苛政，緩解了政權危機，使漢代成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平民王朝和非氏族王朝，也是繁榮時間最長的王朝之一。他實現了從「貴族政體」向「君主政體」的過渡，開始了中華文明的新階段，其功勞絕不在秦皇統一中國之下。從漢朝以後，兩千年裡沒有發生過政本危機，原因是沒有人對「神權本位」提過異議。其間所發生的動亂和分裂，都是外族入侵和政權危機導致的。

不過，中國的「神權本位」是不完全的，所以從「父權本位」向「神權本位」的過渡也就不徹底。羅馬教皇治下的歐洲各民族國家君主主權是比較典型的「神權本位」權威，西藏的政治權威也是比較典型的神權本位權威。不同的是，歐洲的宗教權威和世俗權威是分離的，由不同的主權者和組織來行使；西藏的宗教權威和世俗權威是合一的，同一個人比如達賴喇嘛，既是最高宗教權威，也是最高世俗權威，班禪喇嘛是在達賴缺席情況下的代理人。歐洲的神權本位，被論證為「亞當的主權」，它來自上帝的原始授權。後世君主的統治權來自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教會的授權。

沒有任何人間組織代表上天給中國皇帝授權，也沒有任何獨立組織像西藏那樣在一個皇帝死後尋找「轉世龍童」。對中國皇帝授權的不是宗教，而是神話。所以，中國君主體制，至多可以算「半神權本位」，它的權威還要借助別的東西加強。中國神權的基礎是對龍種的

1. 霍布斯和洛克的人權本位思想

如果說我國父權本位權威是得了慢性病，在漫長的歷史歲月裡慢慢死亡的話，那麼，神權本位則是得了從西方進口的政治傳染病，突然暴死的。它的訃告由辛亥革命起義者撰寫並張榜公布。

有過一次借屍還魂的嘗試，那就是袁世凱領銜主演的一齣恢復帝制的鬧劇，沒幾天就收了場。「真龍天子」的神話，在人們心目中成了想當皇帝的鬼話。

據我所知，比較早讓神授權威感染致命病毒的是英國著名哲學家霍布斯，他的名著《利維坦》是推動國家主權由神權本位向人權本位轉變的最有力的思想槓桿。霍布斯寫作這本書的動機與其說是爲了「人權」和「民主」，不如說是爲了君主。君主雖然從上帝和教會那兒獲得了統治本國臣民的無上世俗權威，但自己卻是羅馬教廷的可憐奴僕。霍布斯也許出於他的愛國心，對這種狀況十分反感。他下面的這段話，即使今天讀起來，也很痛快：

羅馬教會要人相信：國王如果不由主教加冕，他的權力就不是來自基督；國王如果是

好，你的家就可能變成別人的天下。幹得好你是龍，幹得不好你是蟲。

曾經不受君主們歡迎的儒家學說如今找到了用武之地。它稍作修改，對維護經過改良的「父權」原則提供了幫助。它的「禮、名、分」，在新的皇朝帝國體制下，變成了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宗法制度。所謂宗法制度，除了皇位本身的繼承外，其實就是把「父權本位」權威下的「親父權」變成了「養父權」。在「親父權」下，與君主分享權力的人都必須是與君主真正有血緣關係的子侄和子孫；在「養父權」下，朝廷大臣和封疆大吏可以不是皇帝的親兒子，但必須像兒子那樣對待皇帝。這樣的兒子當然是「養子」，而皇帝也就是「養父」。被皇帝授權管理地方的大官，其實被授予的是「養父權」，是收養地方百姓為「養子」的權力。不論小民活到多大年紀，都要像對待父親一樣對待地方官，即使那官員比自己的孫子還要年輕。所以，地方官一般都被稱為「父母官」。對好官的評價是「愛民如子」。

這樣既把家庭倫理擴展到了整個社會，也給皇帝及其受委託行使權力的官員在神權權威之外，又添加了血緣權威；既有上天的神聖權威，也有血緣的親密自然，還有任用賢才的空間，所以中國傳統權威體系生命力久長。

三、人權本位及其變種

我承認，在我沒有完全讀懂霍布斯，也沒有稍微讀懂人生和社會時，我是很不喜歡甚至可以說有點討厭老霍的。他從來不是一個人權擁護者，而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君主專制主義者。他給扮演主權者的君主開了一個應享有權力的完整清單，從立法權到司法權，從宣戰媾和權到行政權，應有盡有，不應有也有。而且，君主的權力不可轉讓，不可分割；臣民對君主不能有異議，不能控告，不能廢黜，不能處死。

如果把權威、自由和平等這些政治原則排成一個序列，霍布斯無疑把權威原則置於優先地位。這或許是霍布斯生活的年代十分混亂，缺乏安全感，他才要人們在戰爭狀態和接受不受挑戰的權威之間作出選擇。他不僅反對羅馬教會式的超民族權威，也反對克倫威爾革命時出現的極度社會動亂。

但是，必須承認，他是現代民主制度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他從政治思想上完成了權威本位的轉換。因為這個貢獻，他永遠是政治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只要你承認君主的權力來源於臣民，臣民就有權把權力轉讓給你，或轉讓給別人。既然我們因為一個契約而「結婚」，我們還可以因為契約而「離婚」，雖然霍布斯對此是不贊成的，那也由不得他了^⑥。

⑥ 同上，霍布斯在第十七章裡說：「一個君主的臣民，未得到君主的允許，便不能拋棄君主政體，返回烏合之眾的混亂狀態，也不能將他們自己的人格從承擔者身上轉移到另一個人或另一個集體身上。」

一個教士就不能結婚；王子是否合法婚姻所生要由羅馬教廷裁斷；國王如果被羅馬教廷判定為異教徒，臣民就可以解除效忠的義務；國王可以無緣無故地由教皇廢黜，並將其王國交給一個臣民，就像教皇扎加科對法蘭西王喜爾普列克所做的那樣④。

霍布斯表面上說的法國國王，其實是想為英國國王亨利八世鳴不平。亨利就是因為王后不能為他生一個兒子，想和她離婚而不被羅馬教皇批准，逼得亨利脫離羅馬教會。

霍布斯所做的就是剪斷國王與羅馬教會之間的臍帶，把國王的權威資源供給線從教皇那裡轉移到本國臣民那裡。他躲躲閃閃想說出來的話是：國王的權力不是來源於上帝的委託，更不是來自自稱上帝的代理人——教會的授權，而是來自本國臣民的授權，或者叫做轉讓權利的「契約」。他對主權者（如果他是一個人就是君主）的定義是：「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訂立信約，每個人都對他的行為授權，以便使他能按其認為有利於大家的和平與共同防衛的方式運用全體的力量和手段的一個人格。」⑤

④〔英〕霍布斯，《利維坦》（中文本，黎思復、黎廷弼譯，楊昌裕校，商務印書館），第一部分，第十二章。

⑤同上，第二部分，第十七章。

生而自由平等^⑦），也表現在他規定的政府目的上（「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置身於政府之下，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⑧），還表現在他對政府形式的設計上，在他看來，最好的政府形式是議會具有最高主權，是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分立，是公民只轉讓部分權力。

在洛克看來，個人為了進入政治社會，他要放棄的是兩種權力：一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其餘人類而做他認為合適的任何事情的權力；二是對侵犯自己的人處刑的權力^⑨。他絕不放棄的是他生命和財產的權力。公民部分轉讓自己的權力，國家也只有有限主權，這是洛克主權思想的精髓，他是當代守夜人政府理論的思想源頭之一。洛克痛恨任何形式的專制政府，他喜歡的政府是「裁判者」政府^⑩，是吹哨子政府。

最能體現洛克自由優先原則的，還是他的絕對自由思想。人們有平等地享受自由的權力，但沒有平等地受制於權力的義務。他的人權宣言是：「人類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獨立

⑦（英）洛克，《政府論下篇》（中文本，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第二章，第四段。

⑧ 同上，第九章，第一二四段。

⑨ 同上，第九章，第一二九—一三〇段。

⑩ 同上，第七章，第八九段。

霍布斯把君主從教會的權威下解放出來，君主很快就用他們的行動證明，除了上帝以外，任何人都不配享有絕對的權力，也不配享有別人對他的完全信任：他們很快腐敗起來並墮落下去，濫用權威，侵犯公民人身和財產權利。一六八五年，英王詹姆士二世上臺後，加深了對臣民的奴役和迫害，激起臣民的反抗。在西方政治發展史上，宗教權威和世俗權威之間的衝突，讓位給了世俗權威與公民之間的衝突。

也許英國的君主懷疑霍布斯是黃鼠狼給雞拜年，居心可疑，所以不給他禮遇。君主心中不安，有一種祖墳被挖的感覺。某個名叫羅伯特菲爾麥的爵士先君主之憂而憂，知道他既要擺脫羅馬教會的控制，又要不喪失其王位的神聖來源，不願把他的統治權和民衆的授權搞在一起。於是寫了一本《先祖論》的書，說君主的權力起源於亞當的「父權」，而亞當的「父權」來自上帝的指定。這不但繞過了教會，還借用血緣時代的「父權」本位權威來加強君主的神權。約翰·洛克用《政府論上篇》摧毀了菲爾麥爵士的論點和君主的權力來自「父權」的神話，在《政府論下篇》裡，他乾脆從根本上確立了自由優先原則，自由不僅優先於權威，也優先於平等。這種優先不僅表現在他對自然狀態的定義上（他認為自然狀態不是霍布斯所說的戰爭狀態，而是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也是一種平等狀態，這等於宣布每個人

國制度為藍本，一個以美國制度為模型，都寫出了不朽名著。

2. 主權公有制：盧梭的「集權本位」思想

第三個有才情的法國人是盧梭。他倒沒有什麼制度藍本，反倒是他的思想成了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的思想藍本。所以，一九八九年，中國自由主義思想者開始了對盧梭的思想批判。比較系統批判的是朱學勤^⑫，他的博士論文《道德理想國的覆滅》，批判的是盧梭的「至善論」政治哲學。

我在一九八九年和張炳九的一篇談話中，把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稱為偽民主理論。我這樣說的主要根據是四點：第一，他的所謂「主權在民」理論反對個人自由^⑬；第二，他反

⑫ 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原上海三聯書店出版，參閱紅旗出版社電子版《家庭藏書集錦之五》），該書序言頁十一。

⑬ 「法」盧梭：「每個結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權利全部都轉讓給整個的集體。……轉讓既是毫無保留的，所以聯合體也就會盡可能地完美，而每個結合者也就不會再有什麼要求了。」《社會契約論》，（中文本，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電子版《家庭藏書集錦之五》），第一卷，第一章，頁八。

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於這種狀態之外，使受制於另一個人的政治權力。」^①這個宣言等於允許世外桃源的存在，允許你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但毛澤東先生無論如何不能同意，他曾經問道：「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裡可耕田？」幸虧他老人家不知道，不然，還不把老陶抓回來放到牛棚裡去學語錄？他老人家喜歡的政府正是洛克最反對的政府：人人都接受他的奴役，只有他一個人快樂地待在「自然狀態」，為所欲為。

對人權本位有貢獻的還有天才詩人密爾頓，他有一篇偉大的演說辭〈論出版自由〉，是人類最輝煌的篇章之一。如果說洛克要保護的財產權力是脖子以下的人權，那麼，密爾頓要保護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就是脖子以上的人權。專制統治結束的最終標誌之一，就是言論自由的實現。

還有一個必須提到的人是孟德斯鳩，他在民主思想史上的名聲大於他的獨創性。他的三權分立和權力制衡思想，有三個直接來源，一是英國議會制度的實踐，二是洛克的著作，三是中國五行相生相剋思想，那個時期的歐洲人對東方文化有一種神秘的嚮往。法國人的才情真是讓人傾倒，在民主問題上，他們一直說的比做的好，從孟德斯鳩到托克維爾，一個以英

① 同上，第八章，第九五段。

不了解盧梭政治上的絕對平等至上原則^①，肯定看不懂他為什麼主張這種形式的「主權公有制」；就像不了解馬克思經濟上的絕對平等至上原則，也很難明白他為什麼主張財產公有制。在盧梭看來，對主權的任何分割，個人自由的存在，利益集團的活動，都會損害政治權力在所有社會成員之間絕對平等地分享，權力只要在質上不同（把主權分割成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等），權力占有的不平等就開始了。

這是一個人類至高善意孽生無窮罪惡的例子。書生盧梭永遠也不會搞懂政治過程和思維過程的天差地別。

四、盧梭版的民主偽鈔

如果我說盧梭在《社會契約論》裡表達的民主設想，是一個被善良和邪惡兩種力量弄瘋了的人，用瘋話、囁語、自相矛盾的卓越才智和嫵媚到蠱惑人心的警句構成的一個美麗的

^① 盧梭：「基本公約並沒有摧毀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與法律的平等來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與人之間的身體上的不平等；從而，人們盡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於約定並根據權利，他們都是人人平等的。」《社會契約論》，第一卷第九章，頁三六一—三七。

對對所謂「人民主權」進行分割^⑭；第三，他反對任何意義上的利益集團^⑮；第四，他反對統計意義上的公眾意見（他叫做「衆意」），推崇所謂高於「衆意」的「公意」^⑯。所以，盧梭的「人民主權」可以很恰當地稱爲「主權公有制」，他的「人民主權」，實際上是「人民集權」。他強調的是「人民的自由」，而不是個人的自由；是人民主權，而不是個人權利。而以人權爲本位的主權，我可以不甚恰當地稱爲「主權股份制」。

⑭ 盧梭：「由於主權是不可轉讓的，同樣理由，主權也是不可分割的，因爲意志要麼是公意，要麼不是；它要麼是人民共同體的意志，要麼就是一部分人的。」下面幾行，他反對某些政論家把主權分割成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爲稅收權、司法權和戰爭年代權，分爲內政權和外交權。同上，第二卷第二章，頁四〇。

⑮ 盧梭：「當形成派別的時候，形成了以犧牲大集體爲代價的小集團的時候，每一個這種集團的意志對它的成員來說就成爲公意，而對國家來說則成爲個別意志；這時候我們可以說，投票者的數目已經不再與人數相等，而只與集團的數目相等了。分歧在總數上是減少了，而所得的結果卻更缺乏公意。」同上，第二卷第三章，頁四三—四四。

⑯ 盧梭：「衆意與公意之間經常總有很大的差別：公意只著眼於公共利益，而衆意則著眼於私人的利益，衆意只是個別意志的總和。但是，除掉這些個別意志間正負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則剩下的總和仍然是公意。」同上，第二卷第三章，頁四三。

樂意採取的辦法，就是「任何人拒不服從公意的，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這恰好就是說，人們要迫使他自由。」^⑫我不明白迫使一個人自由是什麼感覺，我想那感覺和一個雄辯的強盜迫使一個人喪失財富、一個巧言的強姦犯迫使一個姑娘喪失貞操、斷頭臺上的一個文雅的雅各賓黨人迫使一個科學家喪失頭顱的感覺有某種類似。我曾經被迫使了一回，在秦城監獄裡享受「自由」。更妙的是，「主權者」在這樣做時，是以全體人民的名義幹的。

特別讓人格化的「主權者」想親吻盧梭的是，後者宣布「主權者不受約束」，「主權權力毋須向臣民提供保證」。我們不管他用什麼論證使之合理化，其後果自然是「主權者」愛幹什麼幹什麼，愛怎麼幹就怎麼幹。由於主權不能分割成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主權者完全可以像中國共產黨總書記江澤民那樣，既是黨的總書記，又是國家主席，還是黨和國家軍事委員會主席，還是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還是對外關係領導小組組長，還是對臺灣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讓盧梭有點失望的是，這裡有國務院，有政治協商會議，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好像主權要分割；但讓他放心的是，這些分割都是假的，「公意」牢牢地掌握在「公意集團」共產黨手裡。

⑫ 《社會契約論》，第一卷第七章，頁三一。

民主夢幻，我想，我的這個判斷不僅出於某種情感，那情感可以稱之為「憎惡和尙恨及嫉羨」。沒有在我們這個年代和地方生活過的人們，根本無法體會我的這種情緒。不錯，老虎和雪景都是美的，但老虎要放在籠子裡看，像里爾克那樣；雪景要隔著窗戶欣賞，像某些唐代詩人那樣，窗戶裡還要有紅紅的碳火和香香的翠袖。倘若像我們這樣和老虎待在一起，瑟縮地走在冰天雪地裡，我想，就很難有美感了。

在我看來，沿著盧梭指引的道路去求民主，比把手伸進蛇洞裡求魚還要危險。法蘭西民族這樣求過，俄國人這樣求過，中國人也這樣求過。

盧梭提供了一個專制僭主盜用民主名義，把所有權力集於一身的全部理論基礎。共產黨極權統治幾乎完全符合盧梭關於人民主權所下的定義，只有一個東西除外，那就是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如果不把資產階級當人看，那就和盧梭絲絲入扣了。

最喜歡盧梭學說的應當是有暴政傾向的革命家。盧梭為任何一個革命上臺的領袖實現絕對主義統治提供了所謂民主合法性。盧梭關心的是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的「自由」，在某些革命家的詞典裡這種「自由」被讀作「解放」。「解放」以後，就要按「公意」的要求實行統治。而「公意」不是任何個人或團體表達的意志，那只能是自命為「主權者」的領袖向全體人民公布的意志了。

對這種「公意」有看法怎麼辦？不服從「公意」怎麼辦？按盧梭的辦法，也是所有暴君

地表態，交「政治人頭稅」。

關於這個問題，法國政論家貢斯當有過一段精彩的論述：「簡而言之，專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統治，並且它留給了人們沉默的權利；僭主政治則強迫人們講話，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隱秘的棲身之處，迫使他對自己的良心撒謊，從而剝奪了被壓迫者最後這一點安慰。」^②在這裡，我完全同意貢斯當的觀點，僭主政治是遠比專制統治暴虐得多的政治。

讓我們再回到盧梭。當然不能說盧梭不允許通過選舉改變不好的現任「主權者」，但是，怎麼選舉呢？沒有利益集團，就沒有代表它們的各個政黨；不允許有違背唯一意志——「公意」的言論，就不會有言論自由。沒有政黨就沒有對職位的競爭；沒有言論自由，就無法知道人民的選擇。現代民主政治中的兩個最核心的命根子，就被閹割掉了。在這種條件下的選舉，就是我在第二章中寫過的：選舉「表演」，最後當選的只能是「導演」。

以上我簡略敘述的，就是至少在前蘇聯和今日中國發行的盧梭版民主「偽鈔」。如果把這種東西也叫做一種民主，那就不僅是對民主的一種褻瀆，而且是贊成偽鈔流通了。可以說，以洛克為代表的人權本位思想奠定了當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礎，而以盧梭為代表的「人

^②（法）邦雅曼·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中譯本，閻克文、劉滿貴譯，馮克利校，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九年版），頁二九四。

「主權者」有時候也徵求一點意見，但如果你害怕自己的意見與「公意」相左，從而被迫使自由的話，你可以保持緘默。按照盧梭的理解，「普遍的緘默就可以認為是人民的同意。」¹⁹「主權者」要都有盧梭這種難得的寬容就好了，遺憾的是我所體驗的主權者往往傾向於把沉默理解為危險的不滿。所以他喜歡迫使人民放棄沉默，對主權者發布的「公意」都要公開表示贊同，否則，在過去你沒有糧票，在現在你沒有工作，或你經營的企業肯定會有經濟問題，或你有一天突然發現有一個女人向你奔來，一邊向你投懷送抱，一邊脫衣服，於是你就成了流氓。中國發展聯盟的發起人彭明就是這麼進的監獄，而他的一個助手則是因許多年前的一個莫須有的債務問題入了牢房。

一九九二年，我剛從監獄裡出來，《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克里斯多夫夫婦請我喝咖啡，我們是老朋友了。他們問我，中國當局為什麼老要人們表態？當時，他們正在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書名好像是《中國覺醒》（按：中譯本為《驚蟄·中國》）。他們感到困惑的是「六·四」後，一個省一個省一個部一個部一個人一個人都要表態支持「平暴」。我當時說，這是中國所特有的「政治人頭稅」。你不交納，要受制裁。喪失了沉默權，你就要不斷

19 《社會契約論》，第二卷第一章，頁四〇。

只有當這條河流流到一個分界點，父權部分地成了一條支流，從政治權威系統的主流裡分流出去，流入家庭，在中國還流入祠堂，這時候，權威本位就開始發生轉換，血緣關係部分退出政治系統，政治權威和宗教權威合作承擔起社會整合功能，成為權威本位，這就是神權本位權威。

在西方，流行著一種「軸心代理論」，它來源於馬克斯·韋伯對新教倫理的研究，也來源於雅斯培（Jaspers）關於軸心時代及其超越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文明的軸心時代，是文化實現了超越的時代。超越前，宗教與政治經濟同構，並為後者提供合法性基礎；超越後，文化與社會組織有相對獨立性，出現了對思想本身的思考，在宗教信仰上，追求拯救與解脫^②。現在是後軸心化時代，宗教退出世俗生活。

這與權威本位理論和權威分流觀點有某種一致性。所謂「軸心時代」大致相當於神權本位時代，「後軸心時代」可以粗略地對應於人權本位時代。從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邁進的過程，或者說一種權威本位向另一種權威本位轉換的過程，都是權威分流的過程，或者用軸心理論用語來說，都是對一種權威的超越或某種權威退出世俗生活的過程。

② 參閱金觀濤文章，〈展望第三個千年〉，香港《二十一世紀》，二〇〇〇年，二月號。

民主權」也就是「人民集權」理論，是當代僭主政治的思想來源。

總結以上的論述，我們知道，以父權為本位的權威是「貴族政治」，以神權為本位的權威是「君主政治」，以人權為本位的權威是「民主政治」。所謂「僭主政治」，是一種沒有本位但可能盜用了某種權威本位的專制統治。本章第六節對僭主政治還有討論。

五、權威分流

從父權本位到神權本位，再到人權本位，從人類權威本位的這些更替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就我所處理的主題而論，我現在願意看到的是「權威分流」現象^②。

越古老的權威，越混沌一片，越一體化，所有的權威資源都混合在一起使用，像一條沒有分叉的河流，流域很窄，灌溉的面積有限。在父權本位時代，父系的權威被當作政治權威使用，或者說，政治權威被當作父系的權威使用，而前宗教的迷信權威——圖騰崇拜的權威也被合併在一起。

② 這個概念是單少傑教授第一次提出來的，在他的著作《毛澤東執政春秋》裡有更帶分析性的描述。

的人材——「門客」和在秦國參政的客卿，來自各國各個氏族，到了這個階段，血緣關係對權力的壟斷只退守到對最高權力的繼承了。在秦始皇治下，連第二號人物丞相都既不是皇親，也不是前任丞相的子嗣。李斯雖然祖上曾經是蔡國的貴族，但到秦國前的正式職業是楚國的一個倉庫保管員，到了秦國後，起初連訪問學者的身分都沒有弄到，做了流民，或者叫盲流，後來憑才學當上了丞相。這比美國的人才制度還要開放，我相信，不在美國出身的人，要混個國務卿都難，更不要說副總統了。

自由的發展還要求突破地域性障礙和宗教障礙，使權威本位具有普適性和廣泛的認同感，這樣，它才有容納所有人的巨大空間。每一次權威分流，首先退出的都是普適性低的權威形式，比如家族權威，和與之相適應的圖騰權威。秦國人可能崇拜黑鳥，齊國人就不會。漢高祖把他的政權和龍掛上鉤，還和黃帝扯上關係，普適性提高了，排他性降低了。

西方宗教權威從世俗權威系統中退出，教派衝突可能起了很大作用。一個國家，比如像英國，國王如果是天主教徒，其他教派，特別是清教徒就可能被迫害，而異教徒們也不會承認他的權威，只要他的權威來自他們不認可的羅馬教廷。宗教權威這時如果不退出政治，國家就面臨分裂和衝突，英國的清教徒革命，就是內戰。只有以最具有人類普適性的人權作為權威本位，美國才有可能在如此廣大的地域裡建立起一個國家，並容納千差萬別的多樣性。權威分流，是社會多元化過程；人權本位的確立，開始的是全球化過程。建立在人權本

當神權本位河流流到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分界點時，宗教權威開始分叉，流出了政治權威系統。政治權威開始自己支撐自己，腦袋終於落到了自己的肩膀上，牢固地站在人權本位的雙腳上。

權威爲什麼會發生分流，或者問權威本位爲什麼會從一種形態轉換爲另一種形態？

對這個問題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種回答方式。消極的回答方式是軸心理論提供的。軸心理論指出了一種我稱之爲多種權威價值「同歸於盡」的危險：如果宗教權威不能適時地從世俗生活中退出，社會政治生活不可避免的衰敗會拖著宗教權威一道死亡。所有權威價值同歸於盡，社會失去了整合手段，這種文明就面臨滅絕。這種理論在中國已經部分得到驗證：中國的皇朝政治在死亡時已經拉著儒教當了陪葬品，打倒孔家店運動，以及儒學在中國大陸的式微都是它給王朝統治陪榜的結果。避免了這種危險的文明，都在適當的時候發生了權威分流或權威退出。

從另一個角度看，自由的發展是推動權威分流和權威本位更迭的動力。權威是對資源的壟斷，自由是要求資源開放。在父權本位時期，是一個直系家族或一個中心氏族壟斷全部政治權力，旁系家族、氏族和被征服的家族和氏族被排斥在權力系統之外。在西周早期，只有姬姓部分地還有姜姓子孫才能封爵，才能拜上中下大夫，參與朝政。等到非姬姓的秦和楚也被封爵後，周朝的權威壟斷就開始被突破了。戰國「四公子」建立起來的戰略人材儲備庫裡

治」；而權威資源枯竭，權威本位喪失的政治，就是聞一多先生說的那一塘「死水」了，只有破銅爛鐵在裡面發綠，只有腐枝敗葉在裡面發臭。這是「死水政治」。

有本位的權威，就像有黃金為本位的貨幣，周流天下，信譽卓著。不膨脹，不貶值，這是「貴金屬貨幣政治」。而沒有本位的權威，就像濫印濫發的紙幣，權威濫用，職位膨脹，官多民少，權力貶值。這是「膨脹的紙幣政治」。

一種政治有沒有權威本位有一個最簡單的檢驗標準，就是看它是否存在「荼蘼現象」。無論是貴族政治、君主政治，還是民主政治，其最高首腦（貴族首腦、國王或皇帝、總統或總理）的職位更迭都有固定程序，一般不存在第二把手的篡位問題，首腦有安全感。

在貴族政治下，貴族的接班人一般是他的長子，威望和才能不是爭奪王位或爵位職位的依據，其他親屬也不可能通過煽動造反或謀殺現任國王或公爵篡奪其職位。所以國王或公爵沒有必要嫉妒兒子的威望和才能，也沒有必要害怕做執行官的其他親屬的才幹。不僅不害怕，還要廣招天下賢人，像燕昭王做的那樣。等到齊國被田單從燕國軍隊的鐵蹄下撿回來時，齊王開始削減田單的威望，表明當時父權本位的根基已經動搖了。因此，貴族政治雖然因血緣關係拒絕了許多人才，但不用擔心生前的權力和身後的廟號而不斷地更換第二把手。

在君主政治下，成問題的是開國初的那段時間。雖然改朝換代在中國是合法的，但第一代一起打江山的人誰都可能自稱為龍種。那個被大家擁戴為「皇上」的人在駕崩之前，是不

位上的國家，像通用電腦一樣，和任何國家和政治實體都有接口，國家之間的聯盟和聯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更和平。歐洲聯盟的產生即是一例。退出的傳統權威，成了各民族、各宗教的語言；而新任「帝王」人權權威，是世界語。冷戰結束，整個東正教和東歐共產主義世界確立了人權本位權威，迫使僭主政治意識形態退位，加強了全球化趨勢，從這意識上說，福山是對的，歷史終結了；但經濟的衝突依然存在，傳統宗教和文化，而不是現代意識形態，仍將在經濟衝突集團的組合中發生一定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杭廷頓有他的道理，文明的衝突依然存在。

六、現代僭主政治的多重僭越

1. 荼靡成爲 PH 試紙

有本位的權威，就像有源頭的活水，清明而源源不絕。朱熹有一首寫活水好處的詩：「半畝方塘一鑿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這似乎說的是治學，但也可以用來說政治。權威本位穩固，權威資源豐富，人才源源不斷湧現的政治局面，就像那半畝方塘一樣，照天鑑日，清如明鏡，飲如瓊漿，沐如甘露，這叫「活水政

官各有各的產生程序，就像一支軍隊裡元帥、將校和士兵有不同的產生程序一樣。在貴族政治中，首腦世襲，執行官有的世襲，有的嫡系接替庶系、近親接替遠親，這是聽天由命的政體，最大限度地排斥了人爲因素，首腦繼承規則非常清楚，宮廷政變的可能性小，所以周朝和以前的朝代都綿延了很長時間。

在中國君主政治中，君主世襲，執行官（指朝廷命官）考試並任命，幕僚聘請。執行官永遠當不上君主，幕僚也基本上當不上執行官。執行官篡不了位，君主也就不需要他無能。在中國歷史上，無能的君主有的是，無能的朝官還真少見。

民主制度下的總統產生於選舉，內閣成員來自總統的任命，文官或職員來自考試錄用。前兩者是任期制，後者可以是終身制。很明顯，這就根本上杜絕了非程序更迭國家首腦的可能性，總統任期內的安全感由選民來保證，超過規定任期的安全感連上帝都不能保證。如果總統更換部長或副手，那可能不是因爲他過於能幹，威脅他的職位，更可能是他有醜聞或力不勝任。葉爾欽的情況另當別論，他頻繁更換總理，是想保持他的權威落差，他不讓任何俄國政治家成熟，是想消除任何挑戰者，不僅爲了他在任的安全，也爲了卸任後不受法律追究。他最終的企圖是把總統民選制搞成接班人制，他成功了，俄國民主有點失敗。與其說葉爾欽是個民選領袖，不如說他是個玩弄選民的現代僭主。俄國的民主畢竟還年輕。

而不論古代還是現代的僭主政治，基本上就是「武大郎政治」，所有的僭主都患有一樣

能留下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元勳的，他怕其中有人被其他人擁戴，讓他的兒子坐不穩天下。所以，漢高祖要平藩國之亂，宋太祖要「杯酒釋兵權」，朱元璋要「火燒獨腳樓」。明太祖的兒子對老子的心狠手辣頗有微詞，老子扔給兒子一根刺棒，喝道：「拿起來！」當然拿不起來，扎手。老子開導說：「朕正是在給你打掉上面的刺呵！」過去的戰友，成了今日的「刺」了。

但是，從第二代君王開始，權威本位就鞏固下來，權威落差得到穩定，皇位的世襲繼承制，排除了任何丞相謀求皇位的可能。在歷史上，王莽偷過一次皇權，還沒有偷成。曹操終其一生也沒有敢徹底熄滅東漢香火而稱帝。丞相更有可能因為無能或不稱職而被罷免，不大可能因為太能幹而被撤換。覬覦皇位的人，只有一條路可走，進行改朝換代的戰爭。這就像民主制下的「大選」一樣。除此而外，皇權是偷不來的。武則天和慈禧以皇后和皇太后之尊，也只是在一段時間裡改變了帝位的使用權，而不是所有權。

在民主政治下，更不可能發生「茶藨現象」。所有的國家元首都必須通過選舉產生，而且不需要任何國家的總統費心考慮自己的接班人，因為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總統任期比他的壽命更長。一個總統的副手無論怎樣能幹，都不可能威脅總統的任期，所以副手的才幹和威望不僅不會使總統不安全，反而使他感到安全，一個能幹的副手能提高他內閣的效能。

以上三種政體不產生「茶藨現象」，有一個共同原因，那就是首腦、執行官和（或）文

觀點，他在《希臘僭主》一書裡說：「僭主的出現標誌著兩種政體之間的一個轉折點。」^② 無論是從貴族政體向君主政體轉變，還是由君主政體向民主政體轉變；作為一個特例，在希臘，部分地在後來的義大利城邦，無論是貴族政體向民主政體轉變，還是民主政體向君主政體轉變，都會出現一個僭主時代。

A·安德魯斯教授《希臘僭主》一書主要研究的是希臘政制由貴族政體向立憲民主政體轉變過程中出現的僭主，到了希臘民主制度衰敗時，又出現了更多更大的僭主，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和他同樣有名的凱撒大帝，則是羅馬民主共和政體（這個政體，也可以廣義地被稱為貴族政體）向君主政體過渡時的僭主。

越來越著名的是世界各國由君主政體向民主政體過渡過程中出現的僭主，數一數他們的名字都讓人不寒而慄。他們是英國的克倫威爾，法國的羅伯斯比和拿破崙，德國的希特勒，義大利的墨索尼里，西班牙的佛朗哥；在俄國，有以列寧、史達林領銜直到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結束的一長串僭主，在中國，有以袁世凱往下直到臺灣的蔣氏父子、大陸的毛澤東、鄧小平和其繼任者……這個名單可以寫得很長，鑑於他們缺乏美感，少寫無妨。

② [英] A·安德魯斯，《希臘僭主》（中文版，鐘嵩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版），頁十一。

的「安全饑渴症」。對僭主最有安慰的，是他和第二把手之間的權威落差。這個落差最好大到這種程度，在他生前，第二把手根本不可能向他的權威和地位挑戰；在他死後，他的接班人永遠也達不到他的政績和思想水平。這樣，不僅能保住自己的「教主地位」，還能保證後代子孫的安全。今天的中國，毛澤東的教主地位不如鄧小平穩固，毛的子孫之生活狀況也就不如鄧的好。這倒不是因為毛不如鄧偉大，而是毛的接班人失敗了，鄧的接班人成功了。凡是接班人失敗的僭主政治下，就會有新的教主誕生，比如列寧之後的史達林，毛澤東之後的鄧小平。就現在情況看，鄧之後，不會有新的教主了，雖然有人這樣努力，那只能是瞎子點燈。在這一小節結束的時候，我最想說的話是：凡是有僭主政治的地方，就會「荼蘼」叢生。

2. 「假冒偽劣」政治產品

如果問：僭主們為什麼不小心都患上了「安全饑渴症？」

這話說來有點長，這病和僭主的「母親」有點關係，僭主基本上都是權威本位轉換時期的產兒。英國古希臘史專家安東尼·安德魯斯（Antony Andrewes）教授可能也會同意這個

在當代僭主那裡，暴力不僅是一種美學，更是一種宗教。共產黨就是以暴力為其上帝的宗教組織，這是對神權的僭越，雖然他們口口聲聲稱宗教為鴉片，他們把中國人從未釋放過的對上帝的狂熱變成了對暴力的狂熱。當文化大革命中，無數中學生把自己的老師打死並用死者的遺體向自己的「教主」毛澤東獻祭的時候，這種暴力宗教狂熱達到了中國人人性的極限。無限制地搜刮民衆財富，也是所有僭主樂意幹的，但是，沒有任何朝代的僭主像當代全能僭主那樣，不僅剝奪了所有民衆的財富，還剝奪了他們對自身的所有權，甚至剝奪了他們的靈魂。他們這樣做時，還說這是爲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爲了人民當家作主，這是盧梭和馬克思式的詭辯，是對人權和民主的僭越。

無限制地禁錮人們思想，更是每個歷史轉折時期的僭主加強控制的慣用伎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是一個典範。但是，沒有任何僭主敢於像當代全能僭主那樣，不僅禁錮思想，還要壟斷思想；不僅把自己說成是人類的救世主，還把自己打扮成真理的化身和科學的終結者，這是對上帝、真理和科學的僭越。

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要「歸功於」人類在所謂理性時代殺死上帝之後，發明了一種上帝代用品——所謂革命救世主；毀滅了人類對天國的夢想之後，發明了一種天國代用品——所謂「共產主義」理想。他們把所有這些虛假的權威變成神話，全部疊加起來，還嫌不足，還復活了「父權權威」，搞「成分論」和「血統論」。歷史的進步是權威分流，當代僭

那些在自己國家歷史上沒有僭主的人民有福了，比如美國人民，他們的國父華盛頓偉大到與他的人民匹配，有機會當僭主，他拒絕了；那些在自己國家歷史上只有一個僭主的人民也是有福的，比如英國人民，他們只有一個克倫威爾，這主要歸功於英國人對僭主氣味有比英國獵犬還要靈敏的嗅覺，二戰結束後，沾沾自喜的丘吉爾正等著人民歡呼的時候，他被請下了臺，去寫他論繪畫的散文。英國從此少了一個政治隱患，多了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不幸的民族都有一個長長的僭主名單，最不幸的民族有一大批趕上了共產主義時髦的僭主，比如中國和俄國。由貴族政體向君主政體過渡時的僭主秦始皇是殘暴的，但他的殘暴止於殺人。

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當代全能僭主殺死的是積累了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和整個中華民族的靈魂。這個時期的中國，以令人痛心的速度退回到了人類最野蠻、蒙昧和黑暗的時期。並不是毛澤東比秦始皇更殘暴或更有才幹，從而更有殺傷力，而是迄今人類所發明的各種統治手段疊加所產生的核裂變似的能量，使整個社會進入了政治和暴力統治的「核冬天」。

無限制使用暴力，是所有僭主政治的特徵，但幾乎所有的僭主都像小偷知道偷竊是一樁惡行一樣，知道自己的暴力並不光彩，所以暴力像暴雨一樣短暫；唯有當代全能僭主，把暴力頌揚為美德，從沒有一個人類統治者給暴力穿上過如此多的美麗衣裳，他們眼裡的暴力，簡直就是李白眼裡的楊貴妃：「雲想衣裳花想容……」

第五章 山高水長：權威化假說

一、權威化的動力

1. 劉軍寧與胡鞍鋼

那天我們去吃飯，軍寧當司機。車上的乘客，除了我們幾個人外，還有幾摞書。那些書是軍寧從政治學研究所他的辦公室裡拿回來的，他從那天起，不再是那個所的研究人員了。我一直以為這是軍寧自己的選擇。去年（一九九九年），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邀請他做訪問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不批准。我已經說過，中國社會是個「批准社會」，你

主是讓全部權威合流，當然，都是假的權威，是權威贗品，是權威的假冒偽劣產品。現在，中國出了不少打假英雄，他們其實不知道，當代中國最大的假貨就是政治上的假貨，是假民主，假人權，假科學，假真理，假救世主。

假貨當然沒有安全感，賣假貨的頭子——僭主更沒有安全感。任何一個接近他權力的人都有可能取他而代之，所以必須讓他無能，必須要有巨大的權威落差。只有弄假成真，真正建立起人權本位，實行民主政治，才有可能從根本上克服中國當前的政本危機，結束「荼靡現象」，讓斷流的黃河重新奔流起來，重現偉大的詩人李白所見過的那種酣暢風采：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

奔流到海不復回……

說那是個「研究生」寫的文章，說劉軍寧在散布腐朽思想，違反改革開放，違反「四項基本原則」。也許，在這位「研究生」看來，「自由」是腐朽的，「不自由」才生機勃勃；活水是死的，死水是活的；自由是保守封閉的，封閉才是改革開放。這個研究生對中共的邏輯確有研究，不然也上不了《光明日報》。

於是，我想起另一個人，另一個學者，在中國名聲也大，他叫胡鞍鋼。他被認為是所謂「新左派」在國內的一個代表，其實他長期從事中國國情與國力研究。在以下三個方面中共官方給他與劉軍寧的待遇形成對照：

一是出國：劉軍寧是別人邀請，別人給錢，讓他做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官方不許他去；胡鞍鋼於一九九一年被官方派去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做博士後研究，錢是中國科學院資助的。

二是發表作品：劉軍寧的文章不僅中共中央一級報刊不予採用，就是被稱為「天高皇帝遠」的沿海省份發行的周末性報紙《南方周末》，也不敢發表他的作品，該報原主編本打算給他開個專欄，專欄沒開成，主編下臺了，當然不能說這兩件事之間有什麼聯繫；而胡鞍鋼的文章就像是中國道路上的警車，所到之處，只會遇到綠燈。他於一九九四年發表於《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驚呼：「我國的中央財政陷入了『弱中央』的境地」，呼籲「今後必須通過逐步提高國家汲取財政能力的辦法來發揮中央政府在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的主導作用。」

要想逃避「批准」，只有一個選擇：放棄體制內的職位。這在一九七八年前，意味著死路一條；在今天，對有獨立生存能力的人來說，則意味著獲得自由。所以，那天我們還向軍寧表示祝賀，他主張自由主義，現在獲得自由，真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樣，他就可以到哈佛做訪問研究了。他還開玩笑說，到美國後要和我合租一套公寓。

今天我上多維新聞網，看到一則報導，說大陸在開展「新反右運動」，有四位自由派知識分子受到官方處理，有的被撤職，有的被開除，全都被禁止在官方控制的出版社出書或報刊上發表文章。他們是李慎之、茅於軾、樊綱、劉軍寧，是當前中國大陸老中青三代才子。在中國，你只要是才子，特別是有德行，有責任感，有終極關懷的才子，你不用擔心，你遲早會成爲新一茬葱綠的韭菜，被割掉，給人家炒雞蛋下酒。

所謂新舊「反右運動」、「反自由化運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都不過是一茬接一茬的「割韭菜運動」，把中華民族的精英通通割乾淨，讓中國的思想界成爲沒有生殖能力的太監。有個法國人說，如果法蘭西學院在開會的時候，突然被炸，院士都死於非命，則法國就不成其爲法國了。按這個標準，中國早就不是中國了，而且還要不斷地讓她不成其爲中國。

這時我才知道，軍寧是被開除出官方政治學研究所的，當然，這個消息還要核實。已經核實的是，官方的《光明日報》已經展開對劉軍寧不指名的批判，這是中共的慣用伎倆。據

市不用說了，把所有的財產都拿在自己手裡，想怎麼「汲取」就怎麼「汲取」；對農村，則發明了工農產品「剪刀差」，用低價統購統銷政策，把農民的剩餘產品、有時是必要產品統統剪走；除此之外還有一把剪刀，一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剪刀，把統購統銷之外「自留地」裡的「資本主義尾巴」剪乾淨。

並非只有執政的共產黨才喜歡「汲取」財政。不久前在中國中央電視臺播放了一部收視率很高的電視連續劇《雍正皇帝》，吸引人的是層出不窮的宮廷陰謀，還有雍正皇帝「汲取」財政的能力。電視劇大書特書的是，在雍正上臺時，庫銀只有幾百萬兩，到他駕崩之時，庫銀猛增到數千萬兩，這其中，還有曹雪芹家的家底。真得感謝偉大的雍正，抄沒了榮國府和寧國府，否則，曹公子迷戀風月，我們哪有《紅樓夢》看？

也並非只有中國的統治者才喜歡「汲取」財政，才要增強國家實力，美國政府一樣喜歡「汲取」財政，我在美國一美分收入都沒有，但一踏上美國的國土，就成了納稅人：我買一本博爾赫斯的詩選，就給美國政府繳了一點五美元的消費稅。

不僅是中美兩個政府有「汲取」財政的偏好，世界各國政府都有此偏好。你要尋找一個沒有「汲取」財政偏好的政府，就像尋找一隻沒有魚腥味偏好的貓一樣難。所不同的是，國家越大，「汲取」財政的偏好越強。道理很簡單，大國的統治費用高，公共工程巨大而且衆多。像美國，要做世界霸主，美金、美軍、美物、美女到處送，沒有「汲取」財政的能力成

三是「中央的主導作用」：劉軍寧，我們已經知道，被中央發揮主導作用開除了研究所；而胡鞍鋼請和他一起寫作《中國國家能力報告》的合作者王紹光博士回國在京作報告時，中央的主導作用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財政部以及中央有關部門領導接見了他們，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新聞社、《中國青年報》、《China Daily》、《文匯報》、《中華工商時報》都報導了報告的內容，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調閱了報告全文^①，聽起來，風光無限。

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中共給人的待遇上的差別，那就略有不妥了，中共只是給不同的主張以不同的待遇，它從來都是「只認觀點不認人」，它對劉軍寧的不悅和對胡鞍鋼的喜愛，反映出中共對他們倆各自研究、堅持和傳播的不同觀點以及觀點背後的理念，有不同的偏好。

2. 資源動員偏好

中共執政後，就不喜歡自由這個詞。即使在比較開明的鄧小平治下，也多次進行「反自由化運動」；中共上臺後，就喜歡以各種手段「汲取」（胡鞍鋼和王紹光用語）財政，對城

① 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頁二八三—二八五。

離擴大了，它的資源動員偏好就會增強，隨後，它就會通過提高集權程度或者說擴大權威落差來增強它的資源動員能力，這就是我所謂的第一假說：權威化假說。資源動員偏好不僅是推動一個準備擴張的國家，也是推動一個擴張後的國家權威化的動力。

擴張前的國家通過提高資源動員能力來增強擴張力，擴張後的國家通過增強資源動員能力來加強社會的向心力。一個財政撥不出軍費，或一個沒有公共福利資金的政府是沒有向心力的。資源就像磁鐵一樣，掌握在誰的手裡，人民就像鐵屑似地向他集中。

我們在第三章還說過，國家越大，離心力也越大。消除離心力有兩個辦法：一是把資源集中到國家手裡，這就是資源動員偏好；二是消除，至少減少社會的多元化，這就是一元化偏好。一個一元化的社會容易擴大和保持權威落差，把所有社會組織形式都轉變為行政關係，最高權威就可以「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皇帝或僭主是九天之上的瀑布，人民是九天之下的沙石，權威順流而下，其勢不可擋，當之者潰。

現在我們清楚中共不喜歡劉軍寧的原因了。他鼓吹自由主義，鼓吹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增加的是離心力傾向，把社會導向多元化。和劉軍寧一起受到批評和處罰的據說還有經濟學家茅於軾和樊綱，他們的「罪名」是一直主張經濟自由主義。中共當局不知道的是，自由市場機制是一種完全不同於行政組織形式的社會黏合劑，美國當年如果不是得益於比較發達的國內統一市場，就很難建立統一的聯邦國家，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裡，把它的版圖從

嗎？

一個國家「汲取」財政的能力，我們稱之為「資源動員能力」；「汲取」財政的偏好，可以稱之為「資源動員偏好」。一般說來，一個專制政府比非專制政府的資源動員偏好強，其資源動員能力也強。一個政府越專制，其動員資源的速度就越快，動員的程度也越深。比較一下美國政府和蘇聯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資源動員能力，就足以說明問題。美國直到珍珠港被偷襲後，才建立起戰爭動員體制，而蘇聯，只要史達林一聲令下就行了。民主體制下，任何對資源的動員都要經過人民的同意，要經過一整套複雜的批准程序；而且對資源的動員有一個限度，就是不能損害私有財產，而專制程度深到當代僭主全權政體的程度時，這個限制就不存在了。德國納粹走了一條中間路線，它沒有取消所有人的私有財產，它只是取消了德國境內最富有的那部分人——猶太人的生命和財產，將它變成戰爭資源：取消猶太人生命，變成德國人的精神武器；取消猶太人財產，變成德國人的物質武器。

3. 權威化的國家動力

歸納上述，我們有一個小結：一個國家越大，資源動員偏好越強；一個國家越專制，資源動員能力越強。一個專制的大國，既有強烈的資源動員偏好，也有強大的資源動員能力。一個國家如果版圖變大了，或者說統治的區域擴大了，還可以用本書推薦的術語說，權威距

4. 權威極大化假設

現在我們簡要說明一下權威化的個人動力。

經濟學上有個「經濟人」假設。簡單地說，經濟活動中的個人，都是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使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是經濟增長的內在驅動力。沒有這個假設，經濟學的其他原理都成了無皮之毛。

在政治學上，也有假設，我們不妨稱作「政治人」假設。在亞里斯多德時代，經濟活動不是獨立活動，他因此認為「人類在本性上是一個政治動物」^②，這意思是說，人本性上是政治人。經濟人追求個人經濟利益，亞里斯多德的政治人追求「善」。由於城邦或國家的「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③，所以政治人追求善，就是要參與城邦政治。如果說經濟人的目的是利益極大化，則政治人的目的就是「政治參與」極大化。

這是城邦公民時代的政治人。而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則是一個君主或僭主的時代，馬

② 「古希臘」亞里斯多德，《政治論》（中文版，紅旗出版社電子版《家庭藏書集錦》第五盤，哲學部分），第一卷(A)，第一章，頁七。

③ 同上，正文，頁一。

東海岸延伸到西海岸。

不錯，自由是一種離心力，但它離開的是傳統的一個政治權威中心，但對於多元的發達經濟中心來說，它是一種向心力：資源和人才向效率最高的地方流動。美國是世界各國自由程度最高的國家，它的人民不僅沒有離開它，世界各國移民反而像潮水般地向美國湧來。我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期間，於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到廣東調查，省委宣傳部匯報「精神污染」的一個典型材料，就是廣東某地有五個農村姑娘，想逃到香港，沒有能如願，一起站在珠江大橋上跳江自殺。她們的遺言是：「活著到不了香港，死了也要讓屍體漂過去。」大有伍子胥死後讓人把自己的「遺頭」掛在城上，看著楚國軍隊開進姑蘇城的悲壯和淒美。這就是自由的吸引力，和舊政治權威的離散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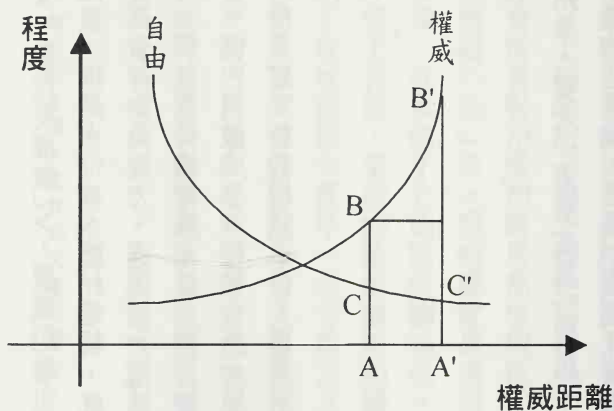
這是當代話題，我們現在討論的是市場經濟機制和現代民主制發明以前的前現代化大國的偏好，或者是沒有現代意識的大國領導人的偏好。對於一個突然擴大了版圖的大國來說，它的資源動員偏好和一元化偏好都會增強，從而把它推向專制。推向專制是一種傾向，這種傾向意味著這個社會或者將發生權威化的向心運動，或者是一元化的整合運動，或者是一種更有力的權威本位替代一種分崩離析的舊權威本位（這通常都是神權替代父權），或者是權力與威望向中央和個人集中。總之，權威化傾向，偏好的是權威的效率，而不是公平。

驅動，加強社會向心力，提高權威落差；作爲政治人，受權威極大化驅動，要扮演人間上帝，扮演救世主，想擁有無限權威。

在圖三之一的「自由—權威」曲線基礎上，可以將「權威化假說」描繪如圖五之一：

這就是說，當權威距離從 A 點擴大到 A' 點時，權威落差就有從 B 點上升到 B' 點的傾向，而自由有從 C 點下滑到 C' 點的危險。

這就有點像長江大河，要想奔流到遙遠的海洋，只有發源於海拔極高的唐古拉山和可可西里山；如果你只發源於韶山或交城的山或別的什麼小山，恐怕連湖泊都



圖五之一 權威極大化假說

基維利《君主論》裡有一個隱含的假設，即在政治生活中的每個人，都是追求權力的。使權力最大化，被奴役最小化，是政治人的目的。我認爲這個假設，使政治學更接近價值中立的科學體系，而不是倫理學。

從這個假設出發，有權的君主或僭主，受權威極大化驅動；無權的人民或平民，受自由極大化驅動；有選舉權的公民，受政治參與極大化驅動。本節只涉及權威極大化問題。

有一個哲人說過，人與人是可以合作的，但那是上帝和他的僕人之間的合作，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是上帝，別人是僕人。

只要有可能，人人都想做上帝而不是僕人。這也說明，任何人都可能無限擴張權力，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群人，無論是君主、貴族，還是人民；無論是多數，還是少數。有君主和僭主的暴政，也有貴族和人民的暴政。

對權威極大化願望有來自兩個方面的基本約束：一是有同樣欲望的別人的權利約束，二是資源約束。這兩個約束限制了權威落差的無限擴大和權威距離的無窮擴張。但權威落差擴大，能使資源約束軟化，因爲動員資源的能力大大增強；權威距離的擴張，能使權利約束鬆弛，因爲擴張不僅使君主或僭主威望膨脹，而且，他踐踏外國主權和人權的暴力，很容易用在本國人民身上；他從國外獲得的資源，也可以用來加強國內統治。

一個國家的君主或僭主在擴張之後，作爲國家的人格化，受資源動員偏好和一元化偏好

雖然秦人自稱有一個神聖的起源（玄鳥蛋和舜、禹二帝的助手），但到了曾長非子的時代，雖然被周王封為「秦嬴」，但一不是貴族，二沒有大塊封地，三地處蠻荒偏遠之甘肅天水一帶。更值得一提的是，秦人幹的活和孫大聖在天上幹的活一樣，都是弼馬溫：受封之前在野外牧馬，受封之後在周王的馬廄裡養馬。也許養馬者對拍馬和騎馬都很內行，擅長於溜鬚和打戰，到了秦莊公時，秦的統治者就有實力自稱起「公」來。開始應當是自封的，但到了秦襄公派兵抗戎，援救周平王時，周王爲了報答秦，就承認了它的諸侯國地位。

或許和征服西戎廣大地區及晉國黃河以西大片領土有關，秦國的統治疆域和權威距離突然擴大，有了最初的資源動員渴望和偏好，使它成了春秋諸國中最早（公元前六八八年）設立縣級行政單位的國家^④，而且在公元前四〇八年就首次開徵穀物稅^⑤。這兩樣東西加在一起就非同小可，這就是中國土地上不是最早也是很早的「汲取」財政的體制，也就是中央集權的資源動員體制：社會剩餘產品從領主手裡到了政府手裡。縣，應該是徵收穀物稅的接近

④ 參見《劍橋中國史》第一冊《秦漢篇》（中文版，韓復智主譯，臺北南天書局發行，一九九六年版），頁三〇正文及注⑩。

⑤ 與西戎諸部落相鄰，這正是秦國迅速崛起的原因：使它既能擴張領土，又能享有周王「衛士」的榮譽，因爲它打的是蠻族；而中原諸侯要擴張，只能「兄弟相殘」，受到「禮」的約束。

到不了，遑論海洋？山高才能水長，權重才能治遠，這是傳統大國逃避不了的邏輯。

這也有點像灌溉系統，你原來灌溉的面積是A，現在要灌溉B，灌溉距離也更遠了。那麼你既要提升水位，或加大水壓，還要增加水流量。提高水位或水壓好理解，就是擴大權威落差；增加水流量，在既定的權威本位下，是提高資源動員能力，通過擴大權威落差來實現；如果在既定的權威本位下，權威落差難以擴大，那就要轉換權威本位，擴大權威資源，增加權威流量。中國秦帝國就是想同時做這兩件事，但它只做成了一件半：極大地擴大了權威落差，這是一件；摧毀了舊的權威本位，但沒來得及建立新的權威本位，這是半件。

二、秦國：被擴張推向專制頂峰

1. 第一次推動

從秦族到秦侯，從秦侯到秦王，從秦王到秦始皇，秦人一直處在第一假說（權威化假說）和第三假說（擴張假說）的循環推進中，用中性的語言說，這是「專制—擴張」的循環推進；用道德判斷性語言說，這是「暴政侵略」的惡性循環。

倍以上的賦稅。他這樣做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要把全國成年男子不是變成戰士，就是變成農民，前者去征服，後者提供給養。

商鞅的改革，從根本上拔掉了父權本位權威，建立了以暴力為過渡本位的專制僭主政體。但是，這種僭主政體是以擴張為取向的，和秦統一全國時的取向不同。我們可以把戰爭取向的僭主政體稱為軍國主義體制，這種體制的特點就是把整個國家變成一部戰爭機器。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是中國歷史上最的軍國主義國家。

從此以後，秦國的戰車就駛上了征服列國、統一天下的快速通道。經過一百多年的積蓄內力，苦練內功，秦國已經強大到天下皆輕我獨重的程度；經過十年東伐西討南征北戰，魏、趙、韓、齊、楚、燕六國像氣泡一樣一個接一個地破滅了。從公元前二三〇年滅韓，到前二二一年滅齊，前後十年，秦國的版圖擴大了三倍以上（見圖五之二）^⑥，接著它又把原來楚國的實際控制線向南延伸了五百多公里，一直到達南海邊，使其統治的幅員又擴大了近一百萬平方公里；蒙恬的大軍還從匈奴那裡攻下了黃河北部河套的鄂爾多斯地區、更北的今內蒙古地區以及西北即今甘肅省蘭州等地（見圖五之三）。

⑥ 本圖和圖五之三均採自《劍橋中國史》第一冊《秦漢篇》（中文版），頁四七、四八。

基層的政權單位。這是秦國開始強大的基礎，也是征服對秦國權威化的第一次推動。這次推動的最大成果是商鞅變法。商鞅改革的核心是進一步擴大權威落差，加強中央集權，通過「農戰」政策，把秦國的整個制度轉變為戰爭體制，把幾乎所有的剩餘產品都動員為戰爭資源。

具體的措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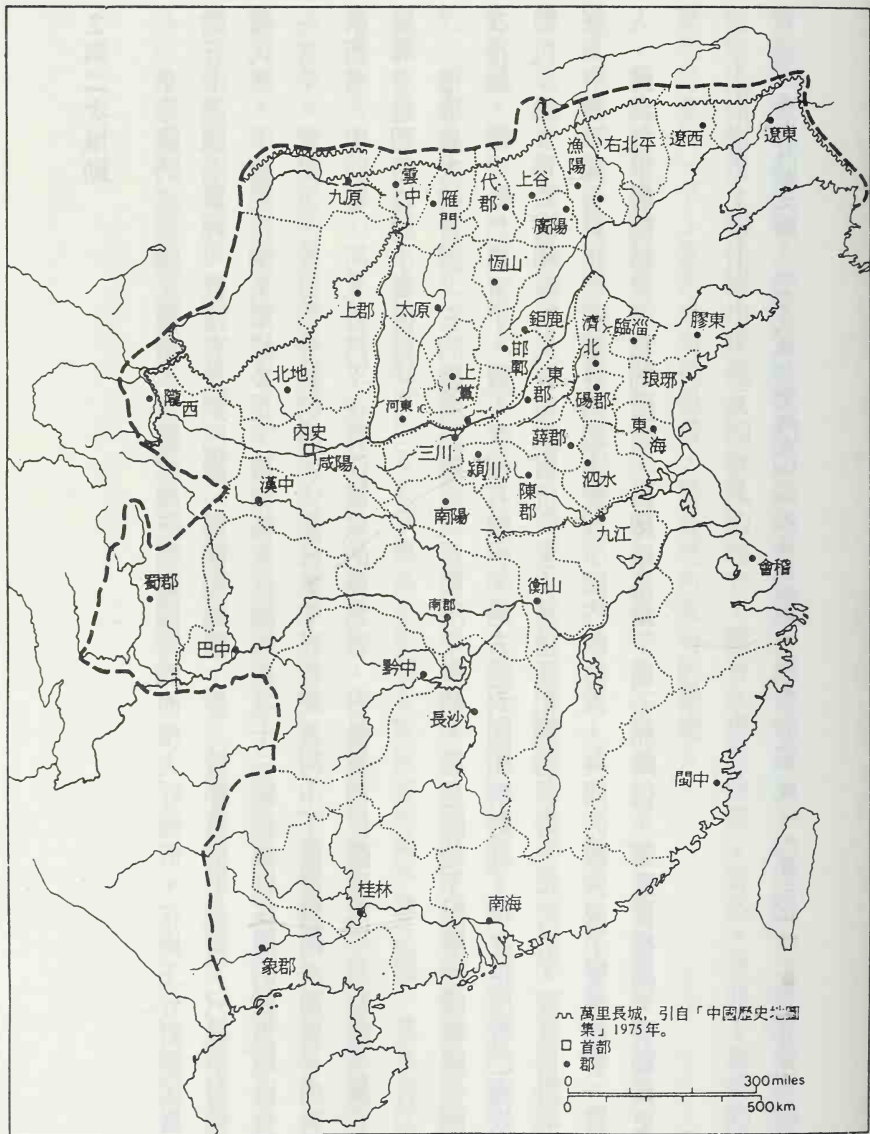
1. 在政治上，把大部分領土分成三十一個縣，縣令應當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加強中央集權，削弱世襲貴族權力，便於徵收稅賦；

2. 在經濟上，基本廢除井田制，改用阡陌制，全面用國家稅收代替向世襲貴族繳交的勞役，同時降低了農民對領主的依附程度，又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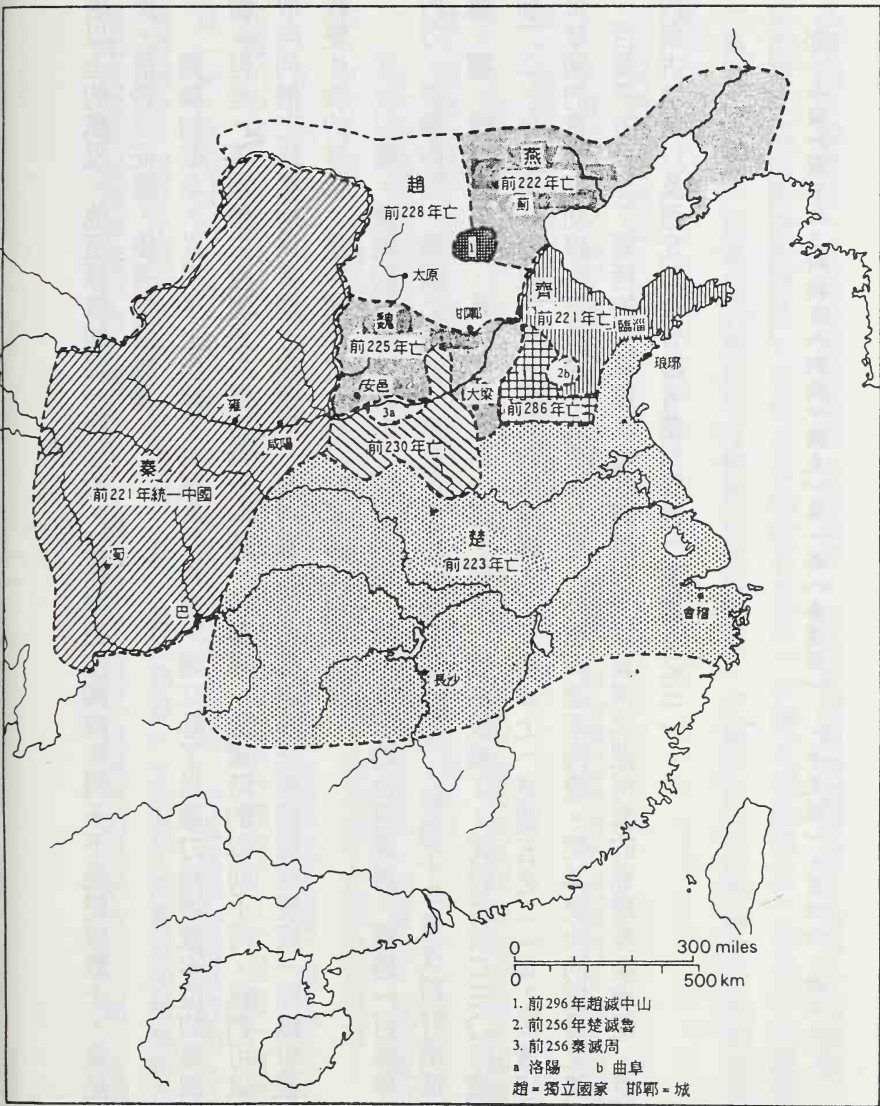
3. 在對國民的控制上，發明了「連坐法」，以五家或十家為一個單位，每個單位成員犯法，如不告發，全體治罪，這不僅是要鼓勵全民做奸細，也是為了瓦解家族紐帶；

4. 在爵位授予上，基本廢除了世襲爵位制，最優先獲取爵位的人是「殺人狂」，當然是

在戰鬥中屠殺別國的戰士，一天提一顆頭回來就進爵一級（韓非子：「日斬一首級者爵一級」），這可以叫「首一級，爵一級」制度。後來，繳納一定數量穀物給政府的人，也可以獲得爵位，這就出現了不少「大兵爵爺」和「農民爵爺」。商鞅可能嫌這項措施對血緣和父權本位權威摧毀得還不夠，他還禁止父親和成年的兒子或成年的兄弟住在一起，否則要課兩



圖五之三 秦帝國統一後的中國版圖



圖五之二 秦帝國統一前的中國版圖

資源來監視和控制人民，去打擊和防衛匈奴侵擾，還要修建天下的道路，以保證秦軍暢通無阻地迅速到達全國任何出現造反和叛亂的地方；還有水患要治理；當然，並非不重要的是，要充分享受一下，亘古未有的皇帝，要嘗亘古未有的歡樂。

首先被推動的是秦始皇帝的個人權威，又是「皇」又是「帝」，而且還要「始」，這些過去只能加於三皇五帝的至高無上的稱呼都加在他一個人頭上，以顯示他功兼三皇，德超五帝。這些好辭被秦皇用絕了後，到了毛澤東，就只剩下辭藻的疊加了，什麼「最紅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什麼「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到了這時，中國人的文字和生活都貧困化了。由於這個推動，第一項權威落差，即君臣之間的權威落差就擴大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秦始皇對群臣及其家屬甚至整個家族握有生殺予奪之權，並且有任意選擇處死方法的權力。也就是說，他的權力是無限的，凡是他能想像出來的權力他都擁有。

其次被推動的是自商鞅變法以來的秦國制度的權威，除了「提頭請爵」的制度外，商鞅制定的大部分專制制度被保存下來甚至得到加強和擴大：郡縣制的中央集權體制、「連坐法」和酷刑制度被放大到全帝國。第二項權威落差（中央和地方的權威落差）和第三項權威落差（政府和人民的權威落差）也都達到了極限程度。

2. 第二次推動

秦帝國的這個國土面積，應當比周王朝建國時的面積大好幾倍。在周王分封諸侯最詳盡的五十五國名單裡，就沒有見到巴國、蜀國和越國，秦、楚都還稱不上國，只是小封地，附庸氏族。不論把這個名單拉多長，被秦後來征服的西戎十二國和蒙恬征服的北方地區肯定不在其中。實際上，被周王分封的諸侯大部分集中在今天黃河中下游流域的河南省、山東省、陝西省、山西省、河北省內；在長江流域的湖北省、安徽省和江蘇省內，只有隨、厲、向和吳等姜姓和姬姓的小支後裔^⑦。

這樣龐大的帝國，它的權威距離之大是前所未有的，於是開始了對秦帝國權威化的第二次推動。戰爭雖然結束了，敵人並沒有減少。過去是六國和秦對抗，現在是所有亡國奴跟秦對抗；過去是六國和游牧民族匈奴對抗，至少是趙國和燕國與秦一起對抗，或各自對抗，現在只有秦軍獨自對抗了。國外的敵人變成了國內的敵人，共同的敵人成了秦統治者一家的敵人。雖然戰爭體制結束了它的使命，但權威落差不僅不能降低，還應當提高：要動員更多的

^⑦ 參見日知主編，《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頁三二四—三二五。

河、霓裳成雲的阿房宮。這場戰爭他不幸沒有打贏，他後半生篤信「採戰之術」，可惜大敗虧虛。不能搞三宮六院，也可能是一代雄主毛澤東的一個遺憾。後來關於他風流韻事的種種傳聞，不過是他想彌補這個缺憾的一些努力。對於他，玩弄女性，可能只是對他無限征服慾的一個滿足。如果他的私人醫生李志綏的回憶可靠，一個從毛澤東臥室裡頭髮散亂地奔出來的女人關於「毛主席什麼都偉大」的嘆息，應當使他滿足。

再說秦始皇。全國統一後，秦始皇在政治一元化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先是搞有點現代意味的「公民」身分一致，消滅任何舊貴族，把原六國的官員、貴族和富人共十二萬戶，統統遷到首都咸陽，加以「監視居住」，沒有聽說把他們定為「壞分子」，在這點上，毛澤東比秦始皇更有創造性。

接著是全國「手無寸鐵」化，銷毀全國人民手裡的武器；接著是全國「不設防」化，拆毀各國城牆和可能用於軍事目的的建築工事。這一點，毛澤東做得一樣好，甚至更好，他不僅銷毀了人民手裡的所有「武器」，還幾乎完全銷毀了中國境內的「文物」，包括他自己首都的城牆。

接著是文字改革，統一並大大簡化了文字的書寫形式。毛澤東在這方面又做了秦始皇的學生，他在北京登基不久，就推出了第一個簡化字總表。我沒有弄清楚的是，簡化字和專制統治之間的相關性到底有多大。

3. 一元化

整齊劃一、一元化，是任何專制制度的精髓，一個社會越整齊劃一，人民越容易處於無組織的原子狀態，一盤散沙，就越不容易形成有組織的反對力量。國家越大，權威距離越遠，越要整齊劃一，這樣統治一個大國就和統治一個小國同樣簡單，此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之一解。就像箍一只木桶，要想箍好，箍結實，要滿足三個條件：桶板要同質，一塊松木，一塊檀木，不行，膨脹係數不一樣，容易裂開；桶板要一樣寬，有的寬有的窄，箍出來的桶就不圓，容易破損；桶板要一樣厚，厚的厚，薄的薄，薄的地方容易壞。

一元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給僭主一個不被任何人超越的「全能第一」的最高權威感。一元化，就是用一把尺子來衡量整個社會，所有的人都按政治標準來排隊，他在這個方面排在最前面，也就是在一切方面排在最前面了。不像現代社會，衡量社會的尺子是很多的。柯林頓是總統，在一段時間裡，在行政權力上排在美國第一，但網球排名比不過山普拉斯和阿格西；資產排在另一個比爾蓋茲之後；論全球崇拜者的擁有量，他肯定輸給喬丹；雖然魯文斯基對他有「性」趣，但李奧納多（電影「鐵達尼號」男主角）身邊的溫香軟玉會更多。

所有這些，都是傳統皇帝和僭主不能忍受的。他不僅政治上要一元化，美色上也要「一元化」。秦始皇征服六國之後，下一個戰役就是征服六國嬪妃。他的另一個戰場是胭脂成

里。比這個還要著名的工程是萬里長城，動用了三十萬人，費時十年；和長城同樣有名的是阿房宮，花的人工少些，花的錢更多；比長城工程更浩大的是驪山陵寢，動用了六十多萬民工。

考慮到這些工程是同時進行的，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從戰火中劫後餘生的中國成年男人，大概如果不是在長城工地上，就是在道路工地上或者宮殿或者陵寢工地上，要麼就在塞外的戰場上，或者在長城的邊防線上，或者像陳勝吳廣那樣，長途跋涉在奔赴戰場、工地和邊防線的旅途上，還有些拖家帶口跋涉在被逼遷徙的路上，在田間的可能只有老人、孩子和婦女了。還有些婦女，像傳說中的孟姜女，送寒衣，做了這些工程的自願後勤人員。更多的死於非命。進行這些戰役和工程，有統治一個大國必須做的，有秦始皇好大喜功想要做的，有純粹是爲了勞民，折騰老百姓的。爲什麼要折騰？讓老百姓沒有一刻休閒，他們就沒有時間想亡國之恨、奴役之辱，疲於奔命，沒有精力反抗。需要提到的是，秦始皇的折騰和毛澤東的折騰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建設性的折騰，至今還留著引爲中華民族象徵的萬里長城，還有造福後人的三大名渠；毛澤東的折騰則完全是破壞性折騰，打東砸西，戰天鬥地，毀滅了文化，也破壞了自然環境。他的折騰，是貽禍子孫。

但秦始皇沒有想到的是，統治殘酷到一定程度，就會起反效果：大大降低人民的反抗成本 and 死亡成本，使造反和戰死反而有利可圖。如果犯罪必須腰斬、車裂、挖鼻、割丸、凌

再接著是統一貨幣，統一車輛的寬度，更重要的是，統一了人民的思想。爲此，把法律農醫等技術以外的書都燒了，把著名的學者和讀書人都「坑」了。從此以後，秦國的法律就是全國人民的課本，秦國的官僚就是全國人民的老師。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國人民的課本是《毛主席語錄》，毛主席本人是全國人民的總教師，其他的老師不被打死，就進了「牛棚」。

4. 資源耗竭而亡

有了這樣的制度設計之後，就可以毫無障礙地最大限度動員全國資源了。秦始皇在他一生中開始和完成的巨大工程及戰役是駭人聽聞的。就戰役來說，有六國之戰，有統一中國南方之戰，還有對匈奴的戰役。秦帝國初建時的軍事力量應當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強悍的匈奴被蒙恬一戰打得逃逸千里之外，而後來逃到歐洲的一支匈奴，居然所向披靡，攻占羅馬，成爲奧匈帝國的創始人之一。

秦皇一共修建了至今仍然是中國最著名的三條水渠，其中鄭國渠和都江堰是統一前修的，南方的靈渠是統一後修的。道路建設是一個更大的工程，據估算，秦修築的道路總長度爲六千八百公里，據《劍橋中國史》的作者說，這個長度，比吉朋估算羅馬時代，從蘇格蘭境內的安東尼斯牆通到羅馬，然後止於耶路撒冷總長爲五九八四公里的道路還要長近一千公

案例的檢驗。除非，第一，你不承認羅馬共和國是民主國家^⑧；第二，「兩個民主國家不能發生戰爭」這句話的含義不是指「民主國家沒有侵略傾向」，而只是指民主國家不侵略或不想統治另一個民主國家。如果是後者，對英美之間的獨立與反獨立戰爭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羅馬共和國可以說是有史以來侵略傾向最強的國家之一，孟德斯鳩肯定是贊成這一看法的，在他看來，羅馬是一個以戰爭為業的城邦。他寫道：

然而共和國的領袖是年年更換的，他們總是在他們的任職期間功業顯赫以便重新當選，因此他們每時每刻都不放鬆表現自己的雄心；他們勸說元老院建議人民發動戰爭，他們每天都向人民指出新的敵人。

元老院本身也是很願意進行戰爭的。因為它經常不斷地被人民的申訴和請求所苦，因此為了使自己擺脫人民的困擾，它就設法把人民的精力放到對外事務上去。

⑧ 我相信四卷本《世界文明史》的兩個美國作者是不能同意把羅馬共和國稱為民主國家的。他們在敘述平民對貴族的鬥爭取得勝利後指出：「國家的專制性質依然如故」，人民大會的立法權是一紙空文。他們的主要根據是羅馬從未放棄「人民治於人而非治人」的觀念。見〔美〕伯恩斯和拉爾夫，《世界文明史》（中文版，羅經國等譯，商務印書館）第一冊，頁二八九。

遲，那戰死在疆場就是一種福氣；如果去戰場、工地也是死，不去也是死，像陳勝等人面臨的情境，那就不如揭竿而起，不會有更壞的結果了，但卻有更好的可能，比如稱王封侯。

秦國就是死於自己的暴政，死於它對資源的過度動員，耗盡了自己的精力。等到叛亂發生時，偉大的秦國軍隊，只能靠驢山工地上的犯人去打仗了。在這個意義上說，殘酷暴政等於自殺。

三、羅馬帝國：被軀體逼大的腦袋

1. 好戰的「民主」

「權威化假說」最讓我激動的，還是它可能具有的對羅馬從共和國轉變為帝國這一過程的解釋力。因為它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案例：一個民主共和國怎樣由於擴張而走上了專制僭主制度的危險道路。有人說，兩個民主國家之間不可能發生戰爭，這個結論可能禁受不住這個

的勇武精神，羅馬取得了大片土地，後來的羅馬皇帝絕大部分都只不過是坐享其成而已。^①

2. 半截子帝國體制

那麼，羅馬取得的「大片土地」有多大呢？「西至大西洋邊；北至萊茵河和多瑙河；東至幼發拉底河；南邊則直到阿拉伯和非洲的沙漠地帶。」^②

在這片土地上，至少曾經存活過六個龐大的國家：迦太基、希臘、馬其頓、埃及、敘利亞和安息。在凱撒時期，還征服了阿爾卑斯山南北的高盧，後來又征服了不列顛。除此之外，整個義大利境內的各民族，都在羅馬的統治之下。這時候的羅馬共和國，用孟德斯鳩的話說（他的話總是富有魅力），「既不是一個王國，也不是一個共和國，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組成的軀體的腦袋。」^③即使這樣，這個腦袋也是過小了，和它統治的龐大軀體相比，有點

① [英]愛德華·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文版，黃宜思、黃雨石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版），上冊，頁十九。

② 同上，頁二〇。

③ 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頁四一。

原來對人民來說，戰爭幾乎永遠是一件快意的事，因為戰利品的合理分配是使人們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

羅馬這個城市沒有商業，又幾乎沒有工業。每個人要是想發財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沒有其他辦法^⑨。

孟德斯鳩作為高盧人的後裔，對羅馬人的評價可能有過分之處，但他指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一個好戰的民族如果實行民主制度，可能有助於提高它的侵略性。支持這一論點的證據是：羅馬在王政時期不如共和時期擴張性強。孟德斯鳩的解釋是：「羅馬把國王趕跑之後，就建立了每年選舉執政官的制度。這一點也是使它變得極其強大的原因。每個國王在他的一生裡都有野心勃勃的時間，但在這之後就會是縱情於其他享樂，甚至是懶散的時間了。」^⑩經過執政官、元老院和人民的共同努力，羅馬共和國漸漸完成了它征服世界的冒險大業。《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英國人愛德華·吉朋也說：「羅馬疆域的擴張在共和國政府的統治時期，便已基本完成；那時主要依賴元老院的政策、執政官員積極的好勝心和人民

⑨ (法)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中文版，婉玲譯，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五年版)，頁四。

⑩ 同上，頁四。

難成功的。

問題就出在羅馬中央共和政府的小腦袋經常「神經分裂」。無限擴張的征服事業，給羅馬帶來了財富，也帶來了貧富分化；帶來了凱旋，也帶來了榮譽和權慾同時膨脹的將軍。執政官在過去是不拿薪水的義務職位，在今天則是擁有世界的主人。階級分化和軍事首腦介入衝突，使中央政府從不同利益和階層相互制約的權力機關，變成了不同利益相互衝突的機關；本來是協調衝突的權威機構，如今成了衝突的起源和內戰的策源地。共和派和平民派各有自己的軍事領袖，各自向他們控制的行省發布指令，參與內戰。這是自己的左手砍右手，右腳踹左腳。

3. 腦袋改造不了身體

偉大的羅馬人起初並不想建立自己一個民族的專制帝國，他們曾試圖用腦袋來改造身體，具體做法就是擴大羅馬公民權，把共和制度向外擴張。當他們首先把公民權授予全義大利居民時，意想不到的問題出現了。

公民權不出羅馬馬城的時候，公民和士兵是一致的，所有的士兵同時也就是公民。每個執政官都徵集軍隊，每個公民如果不是當前的士兵，就是下任執政官的士兵。士兵與公民利益一致，戰利品在士兵中間平均分配，也就是在公民中間平均分配。

不夠用。崩潰前的羅馬共和國，是個十足的政治恐龍：小小的腦袋，巨大的身軀。沒有什麼是它的敵手，除了它的龐大。一個動物過於龐大，對環境的適應性就很差，自身協調性也很低。龐大的代價，是失去自身的自由。這也可能是某種報應，讓別人失去自由的人，最終自己也沒有了自由。

雖然體制不同，中國漢代也遇到過帝國的頭和屁股不成比例的問題。漢高祖把「西漢帝國股份有限公司」約百分之七十的「股權」（即土地）分給了七個國王，導致了著名政治思想家賈誼的憂懼。他指出當時的政治病就是帝國的腳趾頭比腳踝大，小腿比大腿粗，甚至比腰粗。如果不讓帝國的下半身消腫，戰亂難以避免。

晚期羅馬共和國的疾病比早期漢帝國還要嚴重。漢帝國只是頭輕腳重的問題，羅馬除了這個問題外，它的「頭」和「身體」很不般配：「頭」是城邦共和國的「頭」，「身子」是龐大帝國的「身子」。在羅馬城裡，貴族、平民和軍事集團三大階層互爭統治權，國無寧日；在行省裡，是總督實行絕對的集權統治，總督在任期裡，擁有行省的軍事、民政和司法全權。如果不集權，被征服的行省就會動亂不已。但集權，使被征服行省的財富更多地被總督和他的代理人拿走了，沒有被「汲取」到中央政府手裡，大量的軍隊和退役軍人仍然要靠剝奪農民和土地所有者供養。這種「半截子帝國」體制，也就是說，「戴共和帽，穿專制靴」的體制，或者說，一個共和的中央政府嫁接在集權的地方政府之上的體制，在當時是很

他們治下的別的地市的居民和整個整個的民族引入羅馬，以便操縱選舉，這就加劇了將軍與元老院、羅馬人民之間的衝突，以及都想控制國家的將軍們之間的衝突。當衝突不能用選舉和陰謀詭計解決時，內戰就是唯一的選擇。

對這種混亂和無政府狀態，《世界文明史》的作者有一個小結：

從公元前一四六年布匿戰爭結束到公元前三十年前後時期，是羅馬歷史上極其動盪的一個時期。在這些年間，國家收割了在征服戰爭中播下的暴力種籽所長成的全部莊稼。嚴酷的階級衝突、大屠殺、敵對獨裁者之間的瘋狂鬥爭以及戰爭、起義，此時經常發生，司空見慣。甚至奴隸也參加了這場大動亂^①。

看來，腦袋改造不了身體，只有用身體來改造腦袋了。

4. 共和國死於龐大

最早意識到要用行省的身體來改造羅馬腦袋的，是共和國後期共同執政的「前三頭」克拉蘇斯、龐培和凱撒，以及「後三頭」安東尼、屋大維和列庇都斯。他們都在各自治理的行

① 《世界文明史》，頁二九九。

更重要的是，出任將軍的執政官的利益與士兵一致，也與公民一致：公民選舉執政官，等於士兵擁戴自己的將軍。戰功是當選的主要依據。

等到其他義大利人獲得公民權後，公民權就像一杯濃咖啡被非羅馬人稀釋了。同時被稀釋的還有羅馬人的愛國精神和自豪感。同時，士兵和公民身分之間的聯繫越來越薄弱，一方面，越過阿爾卑斯山和大海的士兵越來越多地留在所征服的地方駐守，慢慢喪失了公民感情，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就漸漸讓位於掌握著他們命運的將軍；另一方面，公民群體的擴大，使士兵利益和公民利益開始分離：士兵的戰利品包括土地，要被外邦公民分享，公民們選擇的執政官，不一定是士兵擁戴的將軍。

這樣帶兵打仗的執政官，就不再是羅馬共和國的執政官，而是士兵的將軍；士兵也就不再是羅馬共和國的公民，而只是蘇拉、龐培、凱撒的士兵。戰利品越來越多地「就地消化」，不運回國內了。因此，蘇拉遠征亞細亞時，第一次取消一切軍紀，放縱軍隊搶劫，就可以理解了。士兵可不想被外邦人剝削。「老子在前方賣命，你在後方享福！」這話不僅今天的士兵會說，古代的士兵同樣會說。

這些和擴大了的共和國離心離德的軍團進駐行省時，行省離心力也加強了。羅馬元老院和人民越來越不知道駐紮在外省的將軍到底是國家的棟梁，還是國家的敵人。這種擔心先是促使元老院和人民選擇沒有軍事獨裁傾向的人做執政官，接下來引起的反應自然是將軍們把

牙人。凱撒肯定減少了人們的自由，但也肯定增加了平等，征服民族與被征服民族的平等，貴族與平民的平等，雖然這是在他的奴役下人人平等。

像秦始皇統一度量衡，凱撒統一了官方日曆，他在希臘天文學家的幫助下完成了這件事，修訂後的日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四年補增一天，與埃及的太陽曆一致起來。

凱撒還改善了國家對資源的動員能力，他在各行省建立了直接由國家徵收直接稅的制度，只有間接稅仍用包稅制。

凱撒做了這麼多，蘇聯主編的《世界通史》的作者還認為「凱撒沒有一貫的政治路線」^⑮。其實，他一慣的政治路線，就是把羅馬由一個「半截子帝國」，變成一個完整的帝國，使國家權威結構適合於變化了的形勢。西塞羅說對了：「凱撒不知道要把我們引向何處，我們是凱撒的奴隸，而凱撒是形勢的奴隸。」這個形勢，就是國家版圖擴大了，要有與之相應的統治權威；權威距離擴大了，要有與之相應的權威本位和權威落差。

羅馬共和國傾覆的根本原因，就是它的突然龐大。深刻的孟德斯鳩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在作家們所寫的作品裡，人們只聽到他們談到把羅馬引向滅亡的糾紛；但是他們卻沒

⑮ [蘇聯]烏特琴科主編，《世界通史》第二卷（中文版，三聯書店，一九六〇年版），頁五四三。

省裡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然後進攻羅馬，給腦袋動手術，把行省的獨裁制度引入中央政府。主刀的是凱撒。凱撒擊敗龐培後，先是集中權力，他是獨裁官，兼終生保民官，兼監察官，這是實際權威；還有名義權威，他擁有「元帥」、「祖國之父」等稱號；還有神聖權威，他是大祭司長，還特許穿衆神之神丘比特式服裝。在集中權力的同時，削弱元老院的權力，他把元老院變成了類似中國政治協商會議那樣的玩藝兒。他在元老院裡安插自己的黨羽，把元老院成員數量增加到九百名，總之要多到讓它無法議事的程度，但與中國三千多名人大代表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他經常自己替元老院作決策，他想到哪個元老，就用哪個元老的名字來簽署決定。西塞羅常常收到東方國王的感謝信，說他建議給他們恢復王位稱號，其實，那事是凱撒替他做的。

接著追求長期權力。他先是爲期十年的獨裁官，兩年後，變成終身獨裁官。後來，他想到繼承和世襲，他在遺囑裡收他的侄孫屋大維爲義子，並立他爲繼承人。

他在帝國一元化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著力消除貴族和平民的差別，打擊貴族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他未完成的事情他的義子屋大維接著做。屋大維用公敵宣告剝奪了無數貴族和大地主的生命和財產，並把這些土地分給士兵和貧民。

凱撒還著力消除羅馬人和非羅馬人在特權上的差別，他和屋大維都積極推行殖民，他一次就向外省輸送八萬退伍軍人和被釋放的奴隸，同時，他還把羅馬公民權授予高盧人和西班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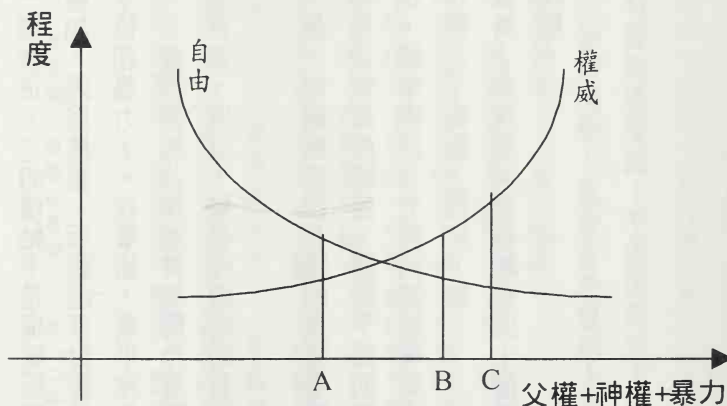
族專制國家的說法。

在羅馬的那個時期，父權本位腐朽了，但還沒有退出歷史舞臺；民權本位是早熟的，卻已經試圖組織大國政權。就當時簡陋的民主工具而論，就像一個孩子要和漂亮的新娘燕爾。不過，父權本位的陰影突然消散，民權本位的孩子悄然離開，因為英雄凱撒大帝披著大神丘比特的戰袍來了，整個世界是他的新娘娘。

神權本位的君主政體誕生了。

5. 震盪與偏離

如果暫時不考慮沒有公民權的奴隸和婦女，擴張時的羅馬共和國的自由比擴張時的秦國要多，而權威要少。所以，無論羅馬共和國的統治在元老院的作用下，如何向「自由—權威曲線」的平衡點右側偏移，秦國都在平衡點更右的地方。見圖五之四。



圖五之四 權威落差曲線的修正

有看到，這些糾紛是必要的，它們一直都存在著，而且應當永遠存在下去。引起災難並且把人民的騷動變成內戰的，完全是由於共和國的龐大。」¹⁶

共和國龐大，除了引起階級衝突，引起公民、戰士和行省的離心傾向以外，還加劇了共和國權威本位之間的緊張關係。羅馬共和國是一個混合政體，元老院的權威以「父權」為本位，人民大會的權威以「民權」為本位，有點類似盧梭的「人民主權」，但肯定不是「人權本位」。它不保障個人自由，常常保障暴民騷動。「後三頭」回到羅馬後，他們的寡頭協定和獨裁權就是秘密通過人民大會批准的。這違反法律程序。人民集合起來違反法律，是暴民專制的特徵，它的權威性來自「民權」而非「人權」。這個案例足以說明，人民大會的立法權不是像伯恩斯和拉爾夫說的是一紙空文。

所以，羅馬共和國是父權本位和民權本位混合使用的政體。在平民起義前，父權占主導地位，元老院控制權力，使共和國具有貴族寡頭專制政治特徵；平民起義後，民權占主導地位，人民大會常常成爲野心家操縱選舉的場所，而人民大會通過的法律可以不需要元老院批准，使共和國具有暴民專制的特徵。我不能同意《世界文明史》的作者關於羅馬共和國是貴

¹⁶ 孟德斯鳩，《羅馬盛衰原因論》，頁五一。

1. 刺蝟聯盟

驕傲的波士頓人說，波士頓是美國的雅典。他們有資格這麼說：不僅因為它市民的文化、文化的超絕，也因為當年獨立戰爭時期，英裔十三個殖民地，就象古希臘的十三個城邦，是在波士頓的表率作用下，奮起抵抗當時的現代波斯帝國——英王國的。

戰爭期間的殖民地聯盟，戰後初期的美利堅合眾國，和當年的希臘聯盟一樣，是一群刺蝟的聯盟，既要聯合對付敵人，又要保持距離，怕走得太近而相互傷害。在《邦聯條例》約束下的美國，既是一個沒有政府的美國（沒有總統，不徵稅），也是一個專制的利用權力巧取豪奪的美國（只有一院國會，權力不受限制，幹好事不足，收賄賂有餘）。

這時的美國，面臨一個選擇上的困境：是要保持革命時期宣布的古希臘式的直接民主，還是要一個強大的國家。獨立戰爭結束了，邦聯制的美國的力量也就結束了。英國敵人退出，自己就相互為敵。州與州之間正在為領土醞釀爭端^①，公民與公民之間在債務糾紛中互相爭鬥，甚至相互殘殺。由於邦聯政府不徵稅，戰爭費用的籌集主要靠對外舉債、對內發行

^① 參見〔美〕漢密爾頓、傑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中文版，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二年版），第七篇，程封如等譯，頁二九—三四。

很明顯，圖五之四是對原「自由—權威曲線」的一個修正，它的橫軸不是權威距離，而是「父權 + 神權 + 暴力」，是兩個權威本位和暴力的疊加。因為擴張、版圖因素對羅馬與秦國權威化的影響是一樣的，剩下的因素主要就是權威本位和暴力了。在秦國，幾乎完全沒有民權本位的作用，父權和暴力的作用比羅馬要強得多。父權在羅馬共和國表現為元老院的貴族共和制，至少是貴族寡頭統治，在秦國，則完全是家長制。所以，擴張完成前的秦國在C點上，而羅馬共和國在A點和B點之間震盪。

使羅馬接近A點的是平民起義後人民大會獲得的民權，使羅馬接近B點的是元老院權力的擴張。在A點，是自由大於權威，國家處於混亂、動蕩或無政府狀態，羅馬平民的無產化和流氓化，加劇了這一傾向；在B點，是權威大於自由，國家處於元老院的寡頭專制之下。羅馬共和國的治理，從來沒有在自由與權威的交叉點也就是平衡點上穩定下來。

直到凱撒把所有的權力集中到自己一個人手中，羅馬才更遠地向右偏離自由—權威平衡點，在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的最大化下進入極限飽和狀態。

四、民主的權威化：美國聯邦黨人的創制

行談判。我們的駐外大使，只是模擬的主權的裝飾品。……私人信用不是工業的朋友和保護人嗎？有關借貸的最有用的那種信用，被縮小在最小的範圍內，這主要是認為貨幣的不可靠甚於貨幣的缺少^⑬。

讀了上面一段，不知道某些為中國設計未來的人們，是否還要堅持把中國大卸七塊或割成八塊，搞什麼「中華邦聯制」，如果他們羨慕類似當年美國「刺猥聯盟」的國家，或當今的獨聯體國家，並認為那是中國未來的最佳選擇，他們可以堅持，只是這種體制可能會把中國引入當年美國人曾經歷過的尷尬處境。

2. 必要的反動：獅虎聯邦

很顯然，聯邦黨人描述的邦聯制美國，是自由多於權威的國家，它和古希臘一樣，在「自由—權威曲線」平衡點的左側，權威落差係數小於1。用圖五之五來表示：

邦聯制的美國在△點上。這個點上的權威落差 $K = AA'' / AA' \wedge 1$ ，權威少於自由。這裡需要解釋的是權威距離。北美十三個英裔殖民地，在獨立戰爭之前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政治

⑬ 同上，頁七二。

沒有金銀保證的紙幣，導致貨幣貶值。一七七九年爲面值四十分之一的貨幣，一七八一年只有面值的百分之一。戰後，債權人要求停發廉價紙幣，並要債務人用硬幣還債；債務人則堅持繼續發行紙幣，並要用紙幣還債，讓債務也貶值。結果引爆了一場外戰英雄謝司領導的內戰。

一個無權徵稅的政府談不上任何權威，更談不上動員資源。無權則無能，對於邦聯政府的無能狀況，《聯邦黨人文集》第十五篇作了如下描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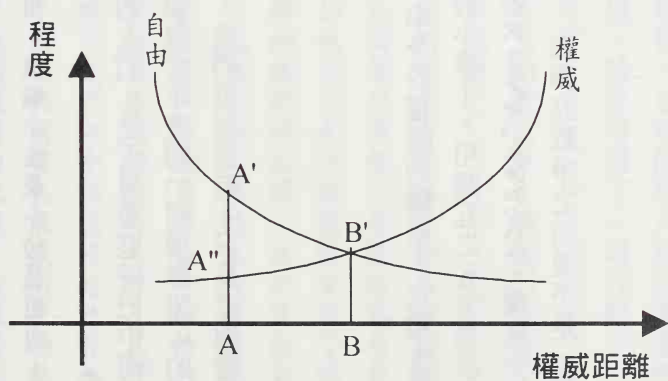
在保持我們的政治存在的危急存亡之際，我們不是向外國人和本國公民借過債嗎？對於償清這些債務依然未作任何適當的或令人滿意的準備。某個國家不是占領著我們寶貴的領土和重要的要塞，而這些按照明確的規定不是早就應該交出了嗎？這些地方依舊被保留，既有損於我們的利益，同樣有損於我們的主權。我們能夠表示憤慨或者打退這種侵略嗎？我們既無軍隊，又無錢財，也無政府。我們能夠莊嚴地提出抗議嗎？首先必須洗刷同一條約使我們的信用蒙受的污損。根據自然條件和條約我們有資格參加密西西比河的自由航行嗎？西班牙把我們排除在這種航行之外。在發生公共危險的時候，公共榮譽不是不可缺少的應變能力嗎？我們似乎認爲它的動因無望和不可挽回而放棄了。商業對國家財富難道不重要嗎？我們的商業已衰敗到了極點。外國列強心目中的威望，不是能夠防備外國的侵略嗎？我們政府的低能，甚至禁止他們同我們進

身，在《聯邦黨人文集》中，以及在約翰·亞當斯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著作中表現得十分清楚。激進派的學說則由民主派的實際政策和政治哲學的核心人物托馬斯·傑佛遜作了最充分的說明。」^①

從上圖可以看出，聯邦黨人主張美國應當從A點右移到B點。從A到B，自由減少，權威增加，如果以自由作為單向度軸線，這是反動，即反方向運動；但從像美國這樣的超大型社會的治理來說，把邦聯變成聯邦，從A點移向B點，從自由多權威少，到自由與權威達到均衡（均衡點B），不是歷史的退步，而是進步，是從刺蝟聯盟變成獅虎聯邦，所以說，聯邦黨人的反動，是必要的反動。有了聯邦黨人，民主才第一次成了超民族大國的「移民」，也才第一次與大國權威結盟。這種民主的權威化，美國當代政治學家喬·薩托利（Sartori）稱為民主的「縱向性」。有權威的民主，在薩托利的詞彙裡，就叫「作為統治制度的民主」。在他看來，「選舉式民主典型地概括了民主的橫向安排，民主的縱向隨動裝置或縱向形變就是代議制民主」。縱向民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多數原則與少數統治究竟是如

①〔美〕梅里亞姆，《美國政治學說史》（中文版，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八年版，朱曾汶譯），頁五一。

體，它們像是英國在北美上空放的十三只政治風箏，線都牽在國王的手裡，國王的手就是各個殖民地的總督。脫離英國，對北美各殖民地來說，權威距離縮短了，所以在各殖民地的基礎上成立的共和國，其自由和民主的程度可與古希臘城邦相比；聯合起來成爲一個國家，對各共和國來說，權威距離擴大了，必然產生權威化動力，要求擴大權威落差，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聯邦黨人代表的就是這種權威化傾向，這傾向，被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梅里亞姆（C. E. Merriam）稱爲「反動傾向」。他評論這段歷史時說：「從英國贏得獨立並獲得正式承認以後，在建立聯邦的過程中出現了兩種明顯的傾向——反動傾向和激進傾向。反動派的學說在憲法本



圖五之五 必要的反動：從刺蝟聯盟到獅虎聯邦

第六章 解凍原理：自由化假說

一、趣文共欣賞

這兩天我很辛苦，跑到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圖書館泡著，找幾篇有趣的文章。功夫不負有心人，還真有點收穫。我有三組文章要請諸位欣賞，每組兩篇，盡量摘要得簡短，不敢浪費看官時間。好在文章都文情並茂，詞彩斐然，讀之讓人壯烈；而且由於對比而產生的幽默效果，是原作者都未必料到的，這要感謝時間這個幽默大師。

第一組，主題是「抗議與譴責」：

抗議無法無天之罪行

何結合在一起的？」^②這也就是說，廣泛的民主和必要的中央權威是如何集合在一起的。

關於聯邦制，我們以後還有更多的討論，這裡要交代的是，聯邦化，在當時的美國，是權威化，是反動；但在今天的中國，則是自由化，是「正動」。道理我不講了，算是本章的思考題。

② (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中文版，東方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二版，馮克利、閻克文譯)

爲撤退華中剿共軍而奮鬥！

爲平毀西北反共封鎖線而奮鬥！

爲停止全國大屠殺慘變而奮鬥！爲挽救中華民族危亡而奮鬥！

我們深信：正義一定戰勝罪惡！光明一定戰勝黑暗！①

與其說這是一篇文章，不如說這是一盆火種，日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有烈焰都是用它點燃的；如其說這是一紙抗議，不如說這是一口袋種籽，日後所有大批判會上高呼口號的臂膀森林，都是從這些種籽破殼而出的。

再看：

嚴厲譴責中共血腥屠殺

對中共以武力血腥鎮壓大陸民主運動發表嚴正聲明

今天凌晨，中共部隊終於以武力攻擊在北平天安門廣場前，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和民衆，造成了慘重的傷亡。中共此一瘋狂的行動，雖然在我們預料之

① 毛澤東，〈抗議無法無天之罪行〉，《毛澤東集》第七集（日本北望社出版，一九七一年版），頁二七九—二八一。原載《解放軍周刊》一二四期，轉載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國革命史參考資料第四集》，一九五七年。

一九四一，二，一

元日朱彭葉項抗議包圍皖南新四軍通電稱：「我江南新四軍軍部及部隊萬人遵令北移，由葉挺等率領行至涇縣以南之茂林地區，突被國軍七萬餘人，重重包圍，自魚至文，血戰七晝夜，死傷慘重，彈盡糧絕。」電訊傳來，聞者心驚，讀者髮指。此等自毀軍令，自壞國法，自相魚肉，自損國力之舉，實可謂無法無天之至！

……

言行不符，損人利己，本是此等人所代表的階級之天性，對根本沒有仁義道德之人，本不應責備他們不仁不義不道德。中國古諺所說的「說的是仁義道德，做的是男盜女娼」，恰可作為此輩人的寫照。此等人之所言所行，正如魯迅所說「有背於中國人爲人的道德！」

但是，此等人今日之所爲，非僅關他們個人的道德信譽問題，而實關整個國家民族命運問題。他們以分裂代團結之陰謀，以內戰代抗戰之罪行，實爲幫助敵僞和危害民國之大不韙！對此輩此等無法無天之罪行，不僅我們共產黨八路軍及新四軍絕不能容忍，即全國愛真理論公道之大多數軍民同胞亦絕不能坐視，我們呼籲全國軍民同胞和全世界公正人士與我們團結一致：

爲懲辦陰謀禍首而奮鬥！

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

(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

……

五曰保護青年。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營之設，將西北、中原各省之進步青年七百余人均繫一處，施以精神與肉體之奴役，形同囚犯，慘不忍聞。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夫青年乃國家之精華，進步青年尤屬抗戰之至寶。信仰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絕非武力所能壓制者。過去十年「文化圍剿」之罪惡，彰明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國，保護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營，嚴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舉。此應請採納實行者五。③

中共應立即停止恐怖迫害行為

對中共大肆逮捕殘殺知識分子及學生行動發表書面談話

對中共最近展開對知識分子及學生的大肆逮捕殘殺行動，表示深切的關懷，希望中共

③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版），頁六八二—六八三。

中，但仍然使我們感到無比的悲憤與震驚。

我們認為，任何政權的存在，都應當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礎上。中共雖然以暴力和謊言竊奪了大陸，但四十年來，從未停止其內部的鬥爭與鎮壓。面對大陸同胞的普遍覺醒，中共所採取的毫無人性的做法，必將受到歷史的裁判，並激起大陸同胞更大的反抗、加速其潰亡。

……

中共的暴政，是所有中國人的耻辱。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必將以最大的決心，結合一切反共愛國力量，為推翻此一暴政，做最大的努力，不達目的，誓不終止。②

兩篇文章都是抗議譴責體，都義憤填膺，但後者較前者更為克制，雖然受前者抗議的人攻擊的是武裝力量，受後者譴責的人屠殺的是和平居民。但兩者代表的都是全體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兩篇文章的寫作時間相距近半個世紀，譴責人的人，受到譴責；受譴責的，開始譴責人。前者是中共黨魁毛澤東，後者是國民黨首領李登輝。

現在看第二組文章，主題是「呼籲與要求」：

② 李登輝，《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第八集（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二年版），頁三一—三一三。

陸「攘外先安內」的看家本領。鎮壓者的黨派姓名改變了，不變的是可憐的學生。

繼續看第三組，這一組的主題是「意見與主張」。

同國民黨談判的十一條意見

(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日)

……

一、在和平、民主、團結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

……

八、在結束黨治的過程中，迅速採取必要辦法，達到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

十一、黨派平等合法的必須辦法：

甲、釋放政治犯。

乙、保證各項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

立即停止此一恐怖的迫害行為。

而對於中共在血腥屠殺後，一方面拒絕國際慈善機構的援助，一方面展開恐怖的逮捕行動，我認為，這都是毫無人性的做法。

同時也對中共最近加強對海外大陸留學生及駐外人員的監控，表示關切。呼籲世界各國，並囑咐我政府有關部門單位，盡最大的努力，對唾棄中共暴政的人士，給予一切可能的協助。^④

第一篇文章的作者還是毛澤東，後面發表書面談話的仍是李登輝，從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八九年，時間間隔還是近半個世紀。這一次，兩個人都成了青年人的監護人和代言人，不同的是，一貫以青年學生導師自居的毛澤東，其後繼者成了學生最恐怖的敵人：通緝他們的領袖，關押他們的頭領，放逐他們的思想家，監控他們的活動；而毛澤東用來指責國民黨的警句「信仰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非武力所能壓制者」，可以原封不動地用來自我譴責，當然，共產黨可以學會許多東西，永遠學不會的就是自我譴責；另一方面，李先生今天用來指責中共的話，比如「展開對知識分子及學生的大肆逮捕殘殺行動」，也正是當年國民黨在大

④ 李登輝，《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第八集（臺北正中書局，一九九二年版），頁三二一。

月，因為它們所要的東西是一樣的：李登輝說，「不要共產主義」，毛澤東說，「仁兄所言，正合潤芝之意，在下要在中國徹底實行三民主義」；李登輝說，「小弟主張，中國要統一，要建設一個民主、自由、均富的新中國」，毛澤東一拍巴掌，「然也！建立獨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正是不才一生之追求」；李登輝暫時忘記自己以前日本皇民身份，興奮起來：「登輝有一不情之求，不對兄弟動武行嗎？」毛澤東哈哈大笑：「吾兄說哪裡話來，潤芝以為，中國要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實現統一。」於是，二人舉杯相慶，相酌甚歡。

遺憾的是，這番談話並不存在，中間隔著血雨腥風五十年，隔著是非非的今天和昨天。從主張上看，今天的國民黨，好像是昨天的共產黨；而昨天的國民黨，儼然是今天的共產黨。

如果看大選失敗後國民黨的表現，則可以說昨天的共產黨從未像今天的國民黨這樣好過；而昨天的國民黨從未像今天的共產黨這樣壞過。國共兩黨的這種逆動和易位，我們如何解讀？

二、小臺、大臺與冰山

容易想得到的一種解讀方式是「謊言欺世論」。持此論者認為中共從來沒有說過真話，

丙、取消特務。⑤

臺灣的主張

我們在此鄭重重申：中國要統一，但必須統一在既照顧全體中國人利益，又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而不應統一在經過實踐證明失敗的共產制度或所謂的「一國兩制」之下。

……

我們進一步主張：

……

第二、中國的再統一應該循序漸進，水到渠成，不設時間表，視大陸地區的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決定「和平統一」的進程⑥……。

「和平」和「民主」是這兩篇文章的主題詞。如果時間老人同情中國人，把這兩篇文章之間相隔的五十多年時間一筆勾銷，則國共兩黨可以卿卿我我、摟摟抱抱、勾肩搭背去度蜜

⑤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頁二〇。

⑥ 李登輝，《臺灣的主張》（臺北遠流出版公司，一九九九年版），頁一五七—一五九。

有保留地贊同這種觀點。唯一的保留是，在毛澤東發表上面三篇文章時，並非在臺下；而跑到臺灣的國民黨也沒有完全在臺下。

毛澤東發表《同國民黨談判的十一條意見》時，他的軍隊至少佔據著陝甘寧邊區、熱河、察哈爾、河北、山東和山西的大部分地區，所以他在這份意見中，要求在這六省區由中共推選人員出任省主席。而被逼到臺灣的國民黨，半個世紀來一直治理著臺灣省。臺灣即使作為一個國家，就人口而論，也不能算太小的國家，但與大陸相比，當然是小國寡民了。

由此看來，導致國共兩黨發生逆變的並非臺上臺下之別，而是「小臺大臺」之別。國民黨的臺灣是「小臺」，共產黨的大陸是「大臺」。小臺大臺的差別，就在於統治的面積，或幅員，也就是我所說的權威距離。小臺的權威距離小，大臺的權威距離大。

共產黨的統治由小臺走到大臺，從小專制走向更大的專制，這種權威化過程，我們在上章「權威化假說」裡研究過了；國民黨從大臺走到小臺，從專制逐步走向民主，這是本章要討論的問題：在既定的權威落差下，權威距離突然縮小，權威落差也有縮小的傾向。這就是「自由化假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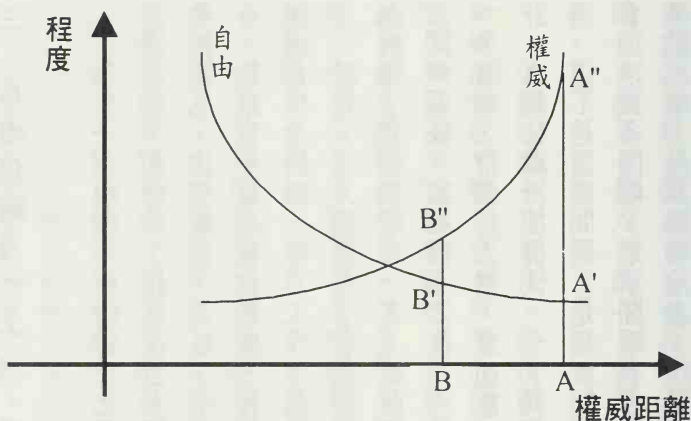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把自由和民主思想的傳播比作陽光，把人民對民主的要求比作春水，把專制統治比作冰山，則權威距離小的小冰山，比權威距離大的大冰山容易融化。道理很簡單，小冰山接觸陽光和春水的相對面積比大冰山大。如果把一座大冰山破碎為幾座小冰山，破碎面就

對國民黨的譴責是捏造的，對自由民主的要求是騙人的。重慶談判是作秀，實行三民主義更是無稽之談。這意思是說，不存在共產黨由「好」變壞的問題，它一直就「壞」；也不存在國民黨由「壞」變「好」的問題，它一直就「好」。國民黨官方輿論接近這種看法，李登輝先生在譴責中共六四屠殺行為時還說：「中共雖然以暴力和謊言竊奪了大陸……」

這種解讀方式有道理，中共確實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暴力集團和謊言大師，但也不能否認國民黨在統治大陸期間實幹過不少它今天譴責別人的事，否則就不能解釋它怎麼丟掉了大陸政權；它允諾人民的憲政也遲遲不搞，一直到帶著「軍政」「訓政」跑到臺灣。這種解讀方式還不能解釋：為什麼共產黨昨天撒謊，今天連「自由民主」的謊言都難得要了。以前是放一次屁，脫一次褲子，現在乾脆連褲子都不穿，赤裸裸地和自由民主對著幹。以前，用批判對付不同政見，毛澤東晚年用工人的棍棒對付聚集天安門廣場抗議的人，鄧小平晚年則用坦克來輾軋他們……

我的看法是，國民黨雖然比較好，但它在大陸時不如後來在臺灣好；共產黨固然壞，但它奪取全國政權前沒有奪取全國政權以後壞。

於是就有了第二種解讀方式：「臺上臺下論」。在臺下想奪權的政黨，總是把好話說盡，一上臺，大權在握的家伙們，總要把壞事做絕，尤其在最高權力不存在制約與和平競爭的地方是這樣。支持這種理論的著名論點是「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我



圖六之一 解凍原理：自由化

凡是想從我的自由化假說和其他理論裡，推導出中國必須分裂才能民主化的結論的人，都要準備失望。中國要民主，也要統一；中國不要極權，也不要分裂。

用「自由—權威曲線」來表示解凍原理，如上圖。

圖六之一說明，當權威距離從A點縮小到B點時，權威落差就有從A''下降到B''的趨勢，自由則有從A'上升到B'的趨勢。而權威B''和自由B'都接近於平衡點O。這就是說，一個權威落差大的專制大國，當它的面積縮小時，其政治體制就有一種向自由—權威平衡點接近的趨勢。接近的速度與程度，要看該國的自由化動力的大小。

是新增加的面積。

不僅接觸面增加，從邊緣到冰山中心的距離也縮短了，溫暖更容易滲透到寒冷的核心地帶。在春水的批評下，在陽光的勸說下，冰山一點不融化是不可能的。小冰山融化所需要的時間，也比大冰山少。一個春季加一個夏天，足可以讓一座小冰山融入大海，融入世界範圍的民主體制。但如果冰山大到一定程度，比如像中國和俄羅斯，春夏兩季融化不掉，那就有麻煩，冬天來了它又重新結冰，靠近它的海水又變成冰坡。我記得中國近代以來，許多次歡呼過解放，至今還在桎梏中；許多次狂喜於解凍，至今還在冰封裡。文學也「朦朧」過了，「傷痕」過了，「解凍」過了，「啓蒙」過了，中國還是一派「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

從俄國身上碎裂出十幾座小冰山之後，它才在一個特別溫暖的春季融化，雖然仍有許多冰塊隨時準備聚集。這個現象啓發了不少人，希望中國趕快自由化的人，甚至希望中國分裂；希望中國分裂的人，巴不得中國趕快自由化。在談論分而治之的人，未必都想禍中國；在渴望中國自由化的人，未必都想福中國。關鍵看他起什麼心。我就看見幾個臺灣人與致勃勃翻譯的一個日本狂人寫的書：《中國大分裂》。他在書中還弄出一張異想天開的地圖，把中國的大好河山塗得一團漆黑，支離破碎。不知道他這樣做時，是否心裡很快意。不過這種快意只是紙上的。

出力」。爲了磨洋工合理化，我的親戚的辦法是讓機器出故障，工人們叫做讓機器「住院」。反正不是人「病」，就是機器「病」。機器一「住院」，就讓它多住幾天，人好歇著。

這種狀況一普遍化，國民經濟就「到了崩潰的邊緣」。毛澤東時代想用資源動員的辦法來解決問題，號召要「抓革命促生產」，革命是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生產就是沒促上去。鄧小平看出了問題的癥結：靠動員解決不了資源產出問題。他認可並發動了從農村開始，向城市蔓延的經濟改革。在農村叫做「包產到戶」，在城市，從「承包」到股份化。經濟管理權下放，各省各地方各企業都有了一定的經濟自主權。這就是在資源壓力下開始的經濟自由化運動。

如果我們把國家在資源動員偏好誘導下開始的權威化運動，尤其是汲取財政的搜刮或剝奪政策，叫做「殺雞取卵」的話，那麼，國家在資源產出壓力下開始的經濟自由化運動，尤其是改革開放政策，就可以叫做「養雞下蛋」。一個國家，特別是一個大國，就在這互相對立的張力作用下往返運動，一直到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達到自由與權威的動態平衡點之前，這種往返運動一般都容易採取極端甚至是暴烈的形式。

秦朝是個殺雞取卵的王朝，而且自己往而不反，只殺雞不養雞，把天下所有的「雞」都殺了之後，自己也被殺了。經過秦楚和楚漢之戰，漢朝初期實行「與民休息」的生養政策，

三、自由化動力（上）：資源產出壓力

我有一個親戚年輕時曾在北京的一個國營棉織廠工作，那時城市改革還沒有開始，工資是固定的，和他的工作狀況沒有關係。你玩命，幹得好，頂多年終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發點獎品，比如臉盆、茶缸、毛巾什麼的。如果發一床床單，那就很稀罕了。據說，有一次有人動議當年獎品發收音機，報告送上去幾個月終於批下來了，但不是收音機，是批判會。說這是獎金掛帥，努力工作不是為革命，是為收音機。

於是，工人們就有了新的發明：讓血壓和體溫快速上升的辦法。目的是開病假條，所謂泡病號。我的親戚有一次上班前猛喝鹽水，我問他怎麼了。他說沒什麼，今天不想幹活，要去開病假條。猛喝鹽水之後，一量血壓，保證超過一八〇。我問還有沒有其他妙著。他說：「多著啦，帶個打火機，量血壓時，突然憋不住尿，上廁所，在廁所裡用打火機一燒溫度計，水銀柱躡得加倍快，一下就頂到四〇度。」

這不是道德問題，是經濟問題，或者說是自由問題。當工人不能追求更多收入時，他就會追求更多閒暇。追求閒暇有多種形式，至少有現場追求和非現場追求兩種。泡病號是逃離勞動現場，是非現場追求；現場追求，用過去的批判術語說是「磨洋工」，或者叫「出動不

如果一個民族既沒有良好的體制，又沒有明智的統治者，還沒有勇敢、成熟的人民，這個民族如果不早早地成了考古對象，比如古埃及；就必定成了活化石，苟延殘喘，為殖民主義者保留地理大發現的興奮，像印加帝國。

資源動員是把個人穀倉裡的糧食收繳國有，要有權威強制實行；資源產出是播種耕耘，要使人們有勞動的熱情和積極性，就要給他們耕種的自由和享有剩餘產品的權力，純粹的強制勞動可能顆粒無收。所以，資源動員偏好是權威化動力，資源產出壓力就是自由化動力。任何一個國家都存在著這兩股推動力。如果一個國家權威不足，民富國窮，資源動員偏好就會把國家推向權威化，政府的作用就會加大；如果一個國家自由不足，資源動員過度，民生凋敝，國庫空虛，國弱民窮，感受到這種資源產出壓力的國家領導人就會主動改革，實行經濟自由化，像中國的鄧、胡、趙；感受不到這種壓力或拒絕自由化的國家領導人就會被命不該絕的人民廢除，或讓其下野，像前蘇聯；或讓其坐牢，像前東德；或讓其暴屍街頭，像羅馬尼亞。

那些領導人頑固，人民又懦弱的國家就悲慘了，人民只好逃亡，或像古巴人那樣，淹死在佛羅里達海裡，現在鬧哄哄的埃連事件，就是一個暴政不放過一個倖存小孩的結果；或像北朝鮮人那樣，九死一生逃到中國，是從虎口逃進狼窩，進了中國人的監獄，然後被遣送回去送死。

開始養鷄下蛋。通過改朝換代的戰爭才解決了資源產出問題。這還是好的。如果一個民族連改朝換代來物極而反都做不到，那等待它的只有滅亡之一途了。比如古埃及民族，不能負擔無窮無盡的金字塔浩大工程，最終當了法老的殉葬品，和它那把死亡看得比生活重要的統治者同歸於盡。

一個體制良好的國家，也就是自由與權威達到動態平衡的民主國家，能自動容納並消解兩方面張力，使對資源的動員和產出達到平衡。沒有這種機制的國家，就要訴諸於統治者的明智了。不明智的毛澤東準備把中國引進精力衰竭而死的滅亡之路，比較明智的鄧小平和胡耀邦、趙紫陽把中國從資源動員體制轉向資源產出體制，引入了自由市場機制。不太明智的江澤民又想恢復資源動員體制，他的抗洪，他的好戰姿態，他對自由經濟的疑慮，他對財政汲取政策的迷戀，他為五十年國慶對國庫的揮霍，都表明他想把鄧、胡、趙時代剛剛養起來的「小鷄崽子」統統宰掉，以滿足他大國領袖的慾望。

如果一個民族既沒有良好的體制，又沒有明智的統治者，要在「養鷄」和「殺鷄」之間保持平衡，就只有靠人民的英勇和成熟了。中國人民是英勇的，所以不斷地改朝換代，幹掉揮霍腐敗的王朝，讓新王朝和自己休養生息，讓自己和文明存續了下來；英國人民是成熟的，通過制度創新，使自由經濟和資源產出有了制度保障，用自由民主制度阻止王室的刀無限制地伸向人民的「鷄窩」，遏制了統治者對稅收的無限饑渴。

種主權相對論，主要是指它自己以外的別的國家的主權，並非是指它自己的主權，在前蘇聯尤其如此。東德、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保加利亞和蒙古的主權，對蘇聯人來說，都是相對的。

相對到什麼程度？相對到一個政治笑話說的，捷克斯洛伐克宣傳部長早上上班，走過陽光燦爛的布拉格廣場，奇怪的是他打著一把傘，有人問他：「又不下雨，打傘幹嘛？」他驚訝地說：「你居然沒有聽廣播？今天上午莫斯科有中到大雨呵！」相對到蘇聯人可以處死捷克國家領導人，可以推翻匈牙利國家政權；相對到蘇聯坦克可以開進這些國家的首都，讓這些國家的人民在他們的坦克射程之內跳舞。

這還不算太尷尬。更尷尬的是中國當局，國力不強，又經常在自己國內不幹好事，指揮不了別人，又怕別人指揮，於是堅決主張絕對主權論。這是怕被別人打的壞孩子的退縮心理反應，也是顧頭不顧屁股的駝鳥理論。等於有一個沒有長大的家長，心理年齡不到十二歲，不幸的是他居然當了爸爸。孩子要糖吃，他沒有，家裡的那點錢都被他喝酒、賭博折騰掉了。孩子於是哭，在門前廣場上。他居然抄起一把刀砍斷了孩子的胳膊，鄰居一片譴責之聲。他毫無愧色，說這是干涉他家的「內政」。他是主張家庭有絕對主權的。

如果中國像德國或波蘭那樣，民族統一性高，其他民族所占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十，而且散居各處，還好說。困難的是，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有些民族在局部地區還是多數民

四、自由化動力（下）：被奴役極小化

1. 分裂動因：絕對主權論

我們上面討論的是自由化的國家動力，這一節我們來看看自由化的個人動力和民族動力是什麼。我們在上一章提供了一個「政治人假設」：政治人追求的是權威極大化，被奴役極小化。作為分享或獨攬權威的「政治人」，他追求的是權威極大化，這是權威化的個人動力；作為專制或極權統治下的個人，他追求的是被奴役極小化，這是自由化的個人動力。

同樣，作為一個統治別人的民族，比如當年的羅馬人，後來的滿州人，今天的漢人，他們追求的是權威極大化，這是權威化的民族動力；作為一個被統治的民族，比如當年（羅馬教廷統治時期）的英國人，元、清兩代的漢人，今天的西藏人，追求的是被奴役極小化，這是自由化的民族動力。

兩種政治人都有理論，理論的核心，無非是主權論和人權論。凡超級大國，比如當年的蘇聯，和從戰後到今天的美國，一般都主張主權相對論，或有限主權論。它們已經強大到沒有任何國家可以覬覦它們的主權，只有它們去壓縮別人的主權。所以，就國際關係而言，這

分裂，關鍵是看統治者是否願意開放主權。

2. 政治參與

要說中共從來沒有開放過主權，我還真有些猶疑。

一九八九年二月，接待我們中國青年幹部訪日團的，是一位田中先生，他說祖上是江蘇人，他本人六〇年代多次來北京，是日本的紅衛兵。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讓中國人，尤其是讓年輕人狂熱，為之狂熱的還有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許多反主流文化的青年。

就政治參與來說，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治讓人民參與到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樣的程度。老實說，文革並沒有給我留下多少痛苦的記憶，因為我生活在社會底層，沒有天上人間的感覺。十年文革是絕大多數中國人輪流來過的狂歡節，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蹂躪。這就是為什麼對文革難以徹底否定的原因，也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是民間的神，但卻是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心頭的痛的原因。

文革是千古以來罕見的當權者號召人民造反的政治和宗教狂歡運動。在文革中，迫害者是老百姓，犧牲品是「三有」的人：即有權力的人，有文化的人，政治上有污點的人，也就是過去有文化有權力有財富的人。沒有一種是中國老百姓喜歡的人，因為他們一沒有權力，

族，比如西藏，可能還有新疆。一方面主張民族獨立，各民族一律平等；另一方面又像王八咬手指一樣，死死咬住絕對主權論不放，這就是在天天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你主張絕對主權論，你的各民族平等的理論就沒有了著落；你就是在主張只有漢民族才有權享有絕對主權，其他少數民族不能享有一丁點主權，儘管你搞了民族自治，儘管你用傷害少數民族居住區漢族人權的辦法來拉攏少數民族，他們仍然感到屈辱，感到被剝奪，因為你不讓他們感到他們在分享這個國家的主權。

主張主權絕對論，就是拒絕其他民族分享國家主權，逼著他們在要麼享有百分之百的主權，前提是從中國分裂出去，獨立起來；要麼讓自己的主權等於零，就是留在這個國家裡面。中國當局整天在指責別人搞分裂，其實分裂的動因來自它自己的理論：是主權絕對論在逼著少數民族造反，逼著他們渴望分裂、仇恨統一。

作為一個國家裡的被統治民族，被奴役極小化的自由化動力推動它面臨兩種選擇：一種是積極的選擇，叫分享主權，這是一種以民族為規模的政治參與，是手的選擇。另一種是消極選擇，你不讓我和你平等地分享主權，我就走人，從這個國家分裂出去，從零主權到百分之百的主權，這是一種以民族為規模的逃亡，是在原地的出埃及記。這是腳的選擇。達賴喇嘛選擇的是真正的出埃及，他帶著他的政府離家出走，版圖帶不走，他帶走了流亡的主權。

所以，對一個多民族大國來說，自由化動力可能推動多民族的政治參與，也可能導致它

著什麼。

「文革」其實宣布了人民主權論的破產，也宣布了主權高於人權論的破產，只是中共當局不想從文革災難中吸取真正的教訓。毛澤東可能是人民主權論的真正信仰者，人民要行使主權，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就必須搞群眾運動，就必須象文革那樣，人民作爲一個整體起來造反。如同西方每四年左右舉行一次大選，毛澤東主張每過七到八年，就搞一次類似文革的運動，也就是讓人民行使一次主權。

反對文革，就必須反對人民主權高於人權。劉少奇先生遭迫害時，向毛澤東要求做一個普通公民的權利，他其實是在要求人權。無論按照中國還是中共的傳統觀點，他這個要求都是一種奢望。記得楚王讓使者榴賚重金聘莊子做楚相，莊子對使者說，官不可謂不大，禮不可謂不重，但我還是不能從命。你看見過披紅掛綠走向祭壇的豬嗎，雖然高貴，那時想做一隻普通的豬也不得了呵！你劉先生已經披紅掛綠走向祭壇了，怎麼還可能再去做一頭普通的豬呢？按照中共理論，你所提倡的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一貫不要人權，你的人權有誰來保障呢？個人和民族一樣，追求被奴役極小化，也有「手」和「腳」的兩種選擇。手的選擇就是政治參與，要求平等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並且通過政黨政治參與競爭；腳的選擇就是政治疏離。疏離有距離上的和態度上的。態度上的疏離表現爲政治冷漠。凡是堵塞了政治參與之門的地方，政治疏離就會發生。

二沒有文化，三沒有財富。敬愛的毛主席說，「造反有理」，「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也就是說，你們要參與政治。政治在文革中，是讓全國人民發狂的精神鴉片。老百姓真正體會到了自己是國家主人翁的快感，只要你願意，你明天就可以參加造反派組織，去砸爛你痛恨的政權機關，去奪你想要的權。

但要說這就是政治參與，我也有些猶疑。與其說這是政治參與，不如說它是罪行參與，罪魁禍首就是毛澤東。犯罪是快樂的，如果不受制裁則更快樂。文革中，全國人民都是罪犯，權力成了被人民哄搶的財富，唯一不能搶的是毛澤東屁股下的寶座。如果說中國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以有權者和文化人爲猶太人的納粹運動，可能有某種恰當之處。

但這也是對政治人追求的一種解決方式，它似乎一次實現了政治人的兩種追求：權威極大化和被奴役極小化。所有人（除了那些被踏在腳底下的）都在分享革命的最高權威，似乎沒有人在奴役他們。至於偉大領袖毛澤東，那是他們的解放者，不是壓迫者。

但這只是某種錯覺。在文革中，個人受奴役的程度之深，是罕見的。那是一種什麼奴役？那是群體對個人的奴役。你只有參與集體犯罪的義務，沒有退出犯罪的權力。大家都去迎接「最新最高指示」，你不去？大家都去參加批鬥會，你不參加？大家都在跳「忠字舞」，你不跳？大家都在齊聲背誦毛主席語錄，你不背？只有經過文革的人才知道那將意味

相對於希臘，愛奧尼亞是苗圃，希臘是林場。自由的種子被移栽到希臘之後，有了更大的成長空間，但並沒有長成參天大樹，相對於自由制度所需要的更大空間來說，希臘也只是個苗圃，需要第二次移栽，遺憾的是沒有找到合適的林場，自由夭折一〇〇〇多年。

薪盡火傳。小內海愛琴海邊的自由火種，到了公元一〇〇〇多年後，被歷史的巨風吹到了更大的內海地中海沿岸的義大利城邦：熱那亞、米蘭、威尼斯、弗羅倫斯等等。這些城邦也是移民社會，其居民，大多是從義大利內地為逃避戰火和暴政而遷徙來的。個人所有權和自由制度再一次萌芽，這一次自由比較幸運，它找到了尼德蘭、葡萄牙、西班牙和英格蘭等更大的「林場」。自由的種子像蒲公英的小傘一樣，黏在往返於義大利沿海城邦和尼德蘭、英格蘭之間的羊毛商人的馬背上，被帶進了這些國家，長成大樹，接著移栽到整個歐洲。

第三次更大的移栽是橫跨大西洋的旅行。最早的北美洲英國移民主要是在國內受迫害的清教徒，被奴役極小化追求，使他們無限擴大與英國權威的自由距離，遠涉重洋來到新大陸。遙遠的權威和廣闊的空間使自由制度茁壯成長，最後終於脫離母體，美國成了自由制度最穩固的地方。去年和朋友在舊金山紅杉樹公園遊覽，那些巨大的紅杉樹讓我驚嘆。我知道，在這片土地上，和它們一樣高聳入雲、難以合抱的巨樹還有那看不見的自由之樹。

屢次移栽自由制度失敗的亞洲，在二戰以後迎來了機緣。美國對日本的占領、對臺灣和韓國的保護，英國對香港的租借，使自由越過大洋在太平洋東岸找到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三批

3. 自由距離：天高皇帝遠

這一小節我們著重討論空間距離上的政治疏離，你將會發現，這個討論十分有趣。

主權權威到達國境線的平均距離，我們稱爲權威距離；與此相反，個人到達主權權威的距離，我們稱爲「自由距離」。主權者的權威與權威距離成正比，個人的自由與自由距離也成正比。對這個自由定律最直觀的解釋，就是一句老話：「天高皇帝遠」。離皇帝越遠，天越高，自由度越大。

於是就有移民。移民的動機無非是兩個：一是尋找新的資源，二是遠離權威中心。我在一九八九年初步研究過個人所有權成長的歷史，發現移民社會對人類的貢獻極大。在「萌芽與移栽：個人所有權成長的歷史道路」⑦一文裡，我有一種見解，認爲個人所有權和自由制度的種子是在小型移民社會萌芽，然後移栽到比較大一點的社會裡去的。西方最早最著名的移民社會是愛奧尼亞，它是希臘移民建立的海外小城邦。當雅典還在王政時期時，愛奧尼亞就發展起了工商業，有個人所有權的概念，並開始和母邦進行商業活動。

⑦ 原載《走向未來》叢刊，第四卷。

五、自由空間：危險的三部曲

我們看到，自由的種子需要苗圃，自由的幼苗需要移栽。

沒有小的苗圃，自由的種子不能發芽，因為大型專制帝國必須木桶一個，任何讓自由發芽的裂縫都足以讓其瓦解；沒有大的「林場」供移栽，自由的幼苗就會因相互擁擠、爭奪不到足夠的陽光和空氣窒息而死。

這就是說，自由的成長，需要足夠的空間。一個人或一個民族，自由活動的空間越大，他或它的自由就越充分。所以，自由與自由空間成正比。讀者可要小心了，這是一條危險的定理。我發現了它，但無法取消它。

自由的發展，一般要經過三個階段，我稱之為危險的三部曲：

第一階段，是疏離階段，它表現為民族分裂或集體移民。當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越來越嚴酷的虐待時，上帝給了他們一個摩西，讓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爲了讓法老放行，上帝顯示聖蹟。但法老不聽。上帝於是降災，降水變血之災，降蛙災，降虱災，降蠅災，降畜疫之災，降瘡災，降雹災，降蝗災，降黑暗之災，直到上帝向埃及人降長子死亡之災，法老才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但法老變心，率兵追擊以色列人。上帝讓紅海分開，讓以色列人過

城邦，自由在這片權威毒素最深的土地上存活了，並且創造了亞洲經濟奇蹟和政治奇蹟，韓國和臺灣都成功地實現了民主。

它們相對於東方大國中國大陸來說，又只是苗圃，自由需要第四次移栽。恰在此時，苦難深重的中國人用他們最新的一次大苦難，換來了當代極權僭主政體的鬆動，沿海建立了十個開發區，最重要的是深圳，於是開始了國內遠離權威的移民運動。人們潮水般地湧向深圳，創造了世界上不多見的城市成長速度：二十年內，一個數萬人口的邊陲小鎮，變成了一個擁有四百萬人口的現代化大都市。這是一個國內的移民社會，是從香港移栽自由經濟制度的國內苗圃，現在，幼苗已經移栽到了上海，一個更大的老移民城市。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自由制度是移民創造、培育和移栽的。這不奇怪，所有的移民，都是母國或母體社區裡自由偏好最強的人。而且移民社會相對的小型，也便於自由制度成長，便於個人政治參與，按照解凍原理。

最後要提到的是，體制上的政治疏離。遠離權力體制，也是一種自由距離。從體制內向體制外運動，是對自由的追求。這一次江澤民的「三講」，就沒有「講」到體制外的私人企業裡去。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出現的下海狂潮，是體制內的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的一次集體逃亡，擴大體制上的自由距離。

瓜分。

自由發展的第三階段是「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喜幾家愁」階段，是開放主權和市場階段，也就是市場全球化，政治地緣化階段。二十世紀對所謂「生存空間」的追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劇。德國被肢解，日本被約束，義大利被民主化，殖民時代和共產主義革命時代的世界格局被固定下來，既得利益者是英國、美國和蘇聯。地理空間被限定的德、日、意發奮圖強，經濟上迅速崛起，把領土擴張變成了市場擴張。美國更是大發戰爭利事，在得到領土失去自由的蘇俄江河日下之時，迅速成爲世界經濟霸主。

世界經濟舞臺變成了一場拳擊賽，蘇聯解體後，美國沒有了重量級對手。爲了彌補這個真空，也爲了平衡日本的競爭，西歐不得不走向聯合，彼此開始開放主權，把征服變成主權的部分轉讓，一個強大的歐洲聯邦共和國在分娩之中。

世界貿易組織要求破除所有市場壁壘，加速經濟全球化；而競爭壓力迫使退居二流經濟強國地位的相鄰國家聯合起來，對付超級經濟強國的競爭。當今的世界，小國的生存更加困難；開放市場的落後國家面臨經濟強國的競爭優勢和「市場暴力」，在技術上處於受奴役的地位。我曾經在第三章介紹過一位「裁縫德先生」，說他在整的地方「裁」，在零的地方「縫」。「裁」，就是自由的第一階段，「縫」，就是自由的第三階段。在過去，他裁了不列顛，縫了美利堅；在當今，他裁了東歐，縫了西歐，但被裁了的東歐和俄國會有可怕的第

去，用海水埋葬了法老和他的軍隊。

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開始放肆，開始敗壞，縱慾，狂歡，拜偶像。上帝震怒，頒下十誡，並讓他們自相殘殺。瀆神者被殺之後，才最終把他們引到流著奶與蜜的迦南之地。

這既是一個美麗的寓言故事，也是一個警世的預言故事。它告訴我們，自由的產兒是血腥的。他伴隨著災難、戰亂和死亡，伴隨著分裂和反分裂，伴隨著自由後的放縱和狂亂。如果沒有戒律，自由就等於自取滅亡。

自由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更危險的擴張階段。自由化動力在推動人們疏離奴役者之後，還會推動他們擴大自由空間，其手段，往往也是血腥的。這個階段，就是霍布斯所描繪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當內部個人對個人的戰爭通過所謂的契約簽定「停戰協定」後，他們往往會聯合起來向外進行擴大自由空間的活動。這個活動在歷史上稱之為「殖民主義」或別的什麼主義。這個階段一般是半自由化階段，有比較充分的經濟自由，但基本沒有政治自由。沒有政治自由，主權封閉，自由動力不能把他們導向政治參與，只能引導他們走向擴張自由空間；有了經濟自由，市場動力迫使自由資本家擴張產品市場，並開拓新的原材料產地，開發更加廉價的勞動力。

正是這個永不枯竭的動力，開始了從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的地理大發現，開始了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的瓜分世界的殖民主義，開始了二十世紀東西方後起強國要求對世界的重新

期夭折，命運只給他們留下了一個多病的女兒瑪麗。沒有兒子繼承王位讓亨利很不開心。但是，比幸運還要幸運的是，王宮裡有一位美麗的黑眼睛宮女安妮，讓國王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她後來和國王所生的女兒伊麗莎白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英國女王。

於是，亨利決定休妻，要立黑眼睛安妮為王后。他於一五二七年向教皇克萊門特七世請求，要求宣布他和凱瑟琳的婚姻無效。天主教的法律不允許離婚，但如果能提供證據，證明舉行婚禮時的情況是非法的，教會的法律可以宣告婚姻無效。又極幸運的是，凱瑟琳曾經和亨利的長兄結過婚，婚後幾個月她的丈夫就去世了。亨利的律師們援引這件事，從聖經《利未記》中找到一段話，說明凡是男人和他死去的哥哥的妻子結婚，他就要受到詛咒，不能有後嗣。

教皇頗為為難。如果拒絕，英國可能放棄天主教信仰；如果宣告婚姻無效，他就會激怒凱瑟琳的侄子查理五世皇帝，查理正在入侵義大利，威脅著教皇的世俗權力。他大發神功，施展「拖」字訣，說要在英格蘭解決此事，於是派特使到英國調查。一查查了兩三年，而教皇特使又回到羅馬。亨利忍無可忍，於一五三一年召集各教區教士會議，要他們承認他是英國教會領袖。然後他又說服國會通過法律，終止向教皇交納一切歲貢，宣布英國國教是一個獨立的民族單位，只聽從國王的權威。當然，凱瑟琳成了棄婦，安妮成了王后。

無論怎樣評價這一事件對英國成長的重要性都不會過高。

二個自由發展階段嗎？反正我現在已經聽到俄國當選總統普亭在咬牙切齒地要強大俄羅斯，但願他是指俄國的經濟，而不是指「生存空間」。

六、一個案例分析：英國教會獨立

偉大的德語作家茨威格寫過一本有趣的書，書名好像是《群星璀璨的時刻》。這本書寫了人類歷史上許多偉大人物和偉大事件的決定性時刻，這個時刻可能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可能是偉人的美麗曇花怒放的那一剎那。

其中有一篇叫《決定世界命運的三十分鐘》，寫的是滑鐵轆之戰。在黎明時刻，英軍增援部隊出現了，可是作為後備隊的拿破崙的一個元帥沒有率部提前投入戰鬥，因為拿破崙在戰前部署他於天亮時參戰。如果他的智慧稍微多一點，多一點機變；或者拿破崙委派另一位更英明的元帥擔當此項任務，戰役可能就有另一種結局，世界歷史也會改寫。

我們也可以假設，假如英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多鐸王朝的亨利八世（一五〇九—一五四七年）國王的妻子是一個美麗溫柔的女人，或者她給他生出一大群王子，英國的歷史也會改寫，英國的子孫也許就不會像今天這樣占據著世界上每一個美麗的地方。

幸運的是，王后凱瑟琳的芳容使國王喪失性慾，更幸運的是他們所生的兒子都在嬰孩時

歐洲的年歷翻到公元一五一七年，西歐出現了對羅馬教皇的離心傾向和疏離運動。有些國家脫離了羅馬教會，比如日耳曼的某些地區，丹麥、挪威、瑞典和瑞士，當然還有英國；有些國家沒有，比如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在拒絕承認羅馬教皇權威的民族中，只有英國教會是在國王領導下實現獨立的，其它民族，特別是日耳曼民族，是在不斷的民間起義的激烈革命中推進脫離運動的。

這一點至關重要。沒有脫離天主教的國家，仍然在一個龐大的宗教權威體系支配之下，國民的自由精神難以發育，因為羅馬教廷的宗教權威距離大，對宗教權威落差有強烈的渴求，宗教控制總是不願放鬆。作出反彈的民族，就有更劇烈的反應，比如法國大革命，其實是有點補宗教革命的課的意思。托克維爾就說，法國大革命「是一場以宗教革命形式展開的政治革命」^⑧。

而被摠住了的民族，比如西班牙、葡萄牙，自由精神就很萎縮。同樣是殖民地，英裔的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在一七八七年就建成了聯邦制的民主國家，而西班牙裔的拉丁美洲各國，還有葡萄牙的巴西，一直到二十世紀還在軍事獨裁政權的泥潭裡掙扎。至於母國，葡萄

⑧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二年版），中文版，頁五〇。

對英國歷史進行不同方式的解讀，似乎是一個永恆的誘惑。

我有時真奇怪，一個在中世紀後期黑死病之後只剩下不到三百萬人口的島國，其後裔怎麼可能布滿這個世界各大洲所有最富庶的地方，其語言幾乎成了世界各民族的通用語言，以它的語言為母語的人所擁有的財富和土地面積，至少占有全人類的四分之一以上。光是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和南非，就可以看出它後代子孫的興旺。

這一切是怎麼來的？

是不是來自英國最早發育的資本主義精神？這是對的。馬克斯·韋伯首先發現了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聯繫，但是，嚴格地講，英國並不是一個純粹的新教國家，英國的國教介於天主教和新教之間。

是不是來自英國最早在政治上體現出來的自由價值？這也是對的。但為什麼是在英國不是在別的地方最早產生這種價值？

是不是來自英國在別人還弱小的時候就強大起來，有條件向全世界釋放它的擴張能量？這還是對的。但是什麼樣的因素使它占盡了發展的先機呢？

歷史是一根繩子，很難說是哪一根纖維對它的粗壯起了最關鍵的作用。如果一定要說出一根來，我最願意說的是英國國教精神。如同韋伯把資本主義精神追溯到新教倫理，我將英國的自由精神和強大的源頭追溯到英國國教。

神準備；

第二，自由增加了，權威並沒有喪失，恰恰相反，國王一身兼有世俗權威和宗教權威，權威反而增強了，沒有發生社會失範現象；

第三，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國民和教民並沒有發生嚴重分裂，英國國教寬容地容納不同的教派，如英國國教的「高派教會」，他們和羅馬教友的唯一不同是他們拒絕承認教皇的至高權力，還有英國國教的「低派教會」，他們的新教和路德派同樣激進；

第四，脫離羅馬教會，使國王失去了君權神授的基礎，不得不向民授尋找合法性，加速了權威本位的轉換，從神權轉向人權。《世界文明史》的兩個美國作者注意到，英國教會獨立時的兩個統治者亨利八世（一五〇九—一五四七年）和伊麗莎白一世（一五五八—一六〇三年）的權力是通過巧妙地維持一種類似的民治政府取得的。

英國之所以在宗教改革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要歸功於它的地理位置，它與羅馬之間的自由距離比其他的國家大，脫離更容易；它孤懸海上，與天主教國家西班牙和法國隔著大海和海峽，要不是這個有利條件，英國宗教改革不僅會夭折，國家還可能被法國或西班牙瓜分。亨利八世宣布教會獨立後，教皇就開始了顛覆英國國王的計劃。亨利逝世後，他多病的女兒瑪麗繼位，短暫地恢復了天主教，好在她在位時間不長。她的同父異母妹妹伊麗莎白一世繼位，又改宗國教。教皇和天主教國家就想用蘇格蘭女王瑪利亞來代替她的英王王位。一

牙到一九七四年靠軍人政變才蹣跚地步上民主之路，而西班牙的佛郎哥獨裁政權，更是二十世紀的一大禍害。

雖然沒有解釋原因，塞繆爾·杭廷頓也注意到了這個現象。他在《第三波》一書中說：「一項研究表明，在九十九個國家中，『新教徒的人口比例越大，民主的程度也就越高。』」相比之下，天主教卻與缺少民主或有限和後發的民主聯繫在一起。李普塞已經注意到，「天主教似乎在大戰前的歐洲和拉丁美洲是反民主的。」^⑨

現在回過頭來說新教。新教革命成功的國家，由於採取了教士造反和人民起義的激烈方式，在有些地方造成了嚴酷的政教合一的獨裁政治，比如日內瓦；在另外一些地方造成了無窮的宗教紛爭，使民族遲遲難以統一，喪失了強大起來的機遇，比如日耳曼。

唯有在英國，在國王的領導下完成宗教改革，使英國民族作爲一個整體脫離羅馬教廷，讓英國國教成爲一個獨立的民族單位。這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性：

第一，就宗教權威而言，權威距離縮短了，落差也下降，國王成爲獨立國教的「最高統治者」，但他無權宣揚神語和舉行聖禮，公民的宗教自由增加了，從而也爲政治自由作了精

⑨

〔美〕杭廷頓，《第三波——二〇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中文版，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一九九八年版），頁八五—八六。

第七章 穀倉結構：侵略傾向假說

一、新加坡之夜

新加坡是個童話。尤其是在六月的夜晚，雨後，坐在遠離海岸的游船上，身邊環繞舊日同窗，聽異國歌手唱南洋小調，看舷窗外明月輕移月暈……這時，男人們都以為自己成了青蛙王子，女人們不想知道自己不是白雪公主。

那一趟旅行成了一個夢，但時時回到我記憶中的，是一個穀倉，非真實的，抽象的。在一個被花香重重包圍的深夜，我和同學張煒傾談，他當時在劍橋大學做經濟學博士論文。在接近天亮的時候，我們談到了我這本書的主要內容。他對我的理論框架有嘉許之意。他說，

五五九年，瑪利亞和她的丈夫從教皇那裡接受了英格蘭國王封號。

這蘇格蘭女王何許人也？她被英國人視為蕩婦，是法國介斯家族的女兒，是西班牙人的情人。蘇格蘭在十六世紀處於分裂狀態，成為英國、法國和西班牙併吞的對象。英國靠地利先占領了蘇格蘭。瑪利亞繼位後，勾結法國人於一五五一年把英軍趕出了蘇格蘭。

一五六〇年，伊麗莎白一世收回蘇格蘭，在和約上載明瑪利亞必須放棄英格蘭王位，但在法國的瑪利亞拒絕和約。一五六七年，在伊麗莎白的支持下，蘇格蘭加爾文教派起義，抓住了瑪利亞，她被迫讓位給她年幼的兒子詹姆斯六世。一五七〇年，教皇庇護五世下令，解除伊麗莎白政權，把她作為異教徒革除教會，免除其臣民對她宣誓效忠的義務，並禁止服從她。

一五八六年九月，瑪利亞下獄；一五八七年，因在獄中與謀起義，被處死。教皇號召天主教徒向英國宣戰。天主教國家西班牙裝備了有史以來最強大的「無敵艦隊」進攻英國。一五八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英西兩軍開戰，這場決定兩國命運的決戰，以英軍的勝利而告終。

自由保衛住了。從此英國就開始了自由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向全世界擴張。

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①這就是說，要保住他權力穀倉的高度，就必須不斷擴張穀倉的底部。

穀倉結構概念的產生地新加坡，就是一座小穀倉。我一直擔心的是我的權威落差理論解釋不了它。自由化假說認為，根據冰山原理，一個從大國體系上掉下來的小國，會加快自由化進程，因為權威距離縮小了，權威落差也會跟著縮小。但新加坡似乎是個例外。它從馬來西亞分裂出來之後，其政治自由化程度好像不比它脫離的那個國家強。在馬來西亞，至少還有許多不同的政黨。據報導，華人黨派還經常是被穆斯林大黨拉攏的對象。可是在新加坡，就只有執政黨了。作為一個以華人為主體的社會，它比臺灣小得多，但臺灣政治自由的發展反而比它快。

新加坡可以說是一個保姆國家。這並不是說，它以輸出保姆為產業，而是說它的政府像保姆一樣照顧它的人民，人民則像嬰孩一樣依賴他們的政府。人民不聽話，就用鞭子抽他。據說，摸女孩子的胸部，要抽一鞭子；摸更敏感的地方，要抽三鞭子，甚至更多。這種打孩子似的懲罰，頗有中國古風，在當代世界，算是司法上的珍品。

① (美)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中文版，王保存等人譯，求實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版)，頁一六三。

如果能找到「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之間的均衡點就更好了（我後來找到的是權威與自由之間的均衡點）。第二天，財政學專家林雙林同學來找我（他是美國某大學教授，當時在新加坡大學授課），說張煒囑咐他在建立理論模型上給我提供幫助。

我開始談，談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之間的正比關係，談山高水長，談瀑布模型。雙林聽著，沉思著，突然說，瀑布模型不如穀倉模型好，穀倉可能更貼近你的理論的感覺。權威落差是穀倉的高度，權威距離是它底部的廣度。底部越大，就能達到更高的權威落差；反過來，達到很高權威落差後，就要求擴大底部的廣度，也就是權威距離，不然穀堆就會倒塌。我當時有瀑布情結，覺得穀倉下里巴人。而瀑布更有氣勢，更有美感，更有詩意。在我寫第三章的時候，一直為找不到一個貼近的解釋結構而幾近失眠。最後妻子給了我一只「木桶」，才算渡過了危機。但所有的比喻結構都是跛足的，它不可能穿越一個複雜思想庭院的所有房間。比如穀倉結構，就難以解釋權威化現象。穀倉底部擴大，並不見得非要提高它的高度；但穀倉如果增加了高度，它的底部就非要擴大不可，否則穀倉就不穩定，高度就維持不住。所以，用它來形象化侵略傾向假說，是合適的：權威落差擴大了，權威距離就有擴大的傾向。對穀倉結構最好的注腳來自拿破崙皇帝的自詡與自供：

「我的權力仰賴於我的榮耀，而我取得的勝利則給我帶來了榮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榮耀和新的勝利來滋養我的權力，我的權力就會喪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

我們在自由——權威曲線上標出的均衡點，是一個靜態的均衡點，它是一種權威等於自由的理想境界。現實中的國家政治體制可以不斷接近它，但很難固定在這一點上，它們都處在權威和自由的動態平衡中。

什麼叫權威與自由的動態平衡？就是權威化動力等於自由化動力。就新加坡而言，它雖然在自由——權威曲線的右側，權威大於自由，但它在這個點上達到了平衡，因為自由化的動力在這個點上與權威化動力相等，相互抵消。這表明，新加坡的自由化動力不足，儘管它權威距離小，政治參與程度還是不高。

但這只是動態的平衡。隨著自由化動力的加大，動態平衡點必然會向左移動，不接近自由——權威均衡點，它是不會停下來。臺灣總統直選的成功，好像是給新加坡自由化動力加了油，保姆政府敏銳地感到了這種傾向，主動給言論自由開了個口子，開關了個像倫敦海德公園自由角那樣的地方，只要登記一下，就可以在那兒自由講演。這真是一個未雨綢繆的好政府，它總是知道孩子們在什麼時候需要什麼。

新加坡這個穀倉的高度與它的底部相比，雖然高了些，但你不必擔心它會用擴大底部，也就是擴張領土的辦法來釋放能量。它太小了，擴張動力不足，它只能走上降低權威落差的自由民主道路，這正是小國的好處。如果是一個像法國、德國和日本那樣的大國，國內的權威落差一旦急遽提高，你就要小心了。

所以，新加坡就成了一個童話。幾乎所有兒童不宜的東西，在新加坡都不容易見到。我逛街，逛書店（順便提一句，書店很少），基本見不到黃色書刊，也基本見不到政治性讀物。但花草樹木繁茂，天空和海水湛藍，你走在花叢中，總覺得會有一隻鴨子突然竄出來，沖著你嚷嚷：「我不是醜小鴨！」特別是美麗的聖陶沙，簡直就是個兒童樂園，連車站的站牌都像是兒童畫。你上了車，會想，可能它的終點是豌豆公主的宮殿。

就是這個袖珍國家，極受設在歐洲的世界競爭力委員會的專家推重，連續幾年被排在最有競爭力國家名單的前幾名。排在它後面的是一連串東西方的民主國家，比如日本、瑞士、德國、英國等等。這不等於說，民主是沒有競爭力的？

其實，這個排名很值得玩味。它從經濟上論證了一個政治哲學問題：民主不一定是最好的，不民主可能是最好的，也可能是最壞的。新加坡其實不能算是一個國家，它就是太平洋上的一個希臘城邦。如果說古往今來有什麼國家最接近偉大的柏拉圖哲學家國王的理想境界，那就是新加坡了。

顯然，新加坡的政治體制並不在自由與權威的均衡點上，它是權威多於自由。這就出現了一個矛盾：既然它不在自由權威平衡點上，那它就應當處在不穩定的政治狀態，怎麼還是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國家？而且，新加坡的政治動盪，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少的，也是最少的國家之一。如何解釋？

的強大破壞性力量引向另一個魔鬼史達林的布爾什維克，以毒攻毒，西方可以坐收漁利。張伯倫沒有想到的是，魔鬼之間更容易締結條約，因為它們從來不打算信守。於是，史達林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和希特勒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秘密協定，前者是想把災難引向西方，後者是和希特勒合夥打劫，共同瓜分波蘭。這是一場犧牲別人利益，求得自身平安的危險競賽，給希特勒留下了縱橫捭闔的空間。

那些很快就成為希特勒案板上的肉的其他小一點的民族，表現也不更好些。捷克將被瓜分時，波蘭和匈牙利沒有唇亡齒寒之悲，倒重演了中國式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故事。波蘭對捷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其割讓特申邊區。它不知道，這時候，希特勒和史達林正在商量切割它的方案。

在希特勒不斷表示和平願望，到處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時候，英、法、俄等大國，都有一種僥倖心理，認為總有辦法避免戰爭爆發，至少避免戰爭在本國領土上爆發。這就是當時全面綏靖思想的一個根源。

2. 脫韁野馬

要是張伯倫和史達林知道在權威極大化、自由空間極大化和報仇雪耻的民族情感這三重動力推動下的德國，其侵略衝動是多麼強大，他們就不會苟且偷安了。

二、要是張伯倫知道有個侵略傾向假說

1. 全面「綏靖」

溫斯頓·丘吉爾在他的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風雲緊急》的扉頁上題詞：「本卷的主題：英語民族如何由於他們的不明智、麻痺大意和好心腸而聽任惡人重新武裝。」^②

這是他客氣。其實，當時「聽任惡人重新武裝」的可不只是英語民族，法語民族和俄語民族也同樣沒有盡力制止希特勒的德國軍國主義化，甚至都想把禍水引向別的民族，有的還企圖讓別人被希特勒「烹」了，自己最好還能分一杯羹。

比如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英國首相張伯倫和希特勒簽定了《慕尼黑協定》，用犧牲捷克的代價換來希特勒表示和平意願的一紙空文。但其意圖不言自明，是要把希特勒魔鬼般

② [英]溫斯頓·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風雲緊急》（中文電子版，紅旗出版社，《家庭藏書集錦之九：法律、經濟與軍事》）。

度，所有的自由化動力都銷聲匿跡了。魏瑪共和國似乎已經成爲不體面的往事，民主思想本來就沒有深入人心。工業界上層人士感謝元首結束了經濟蕭條，工人感謝他保證了穩定的就業，軍方感謝他給了他們一支強大的軍隊。不感謝他的那些共產黨人、社會黨人、工會領袖，有時還有基督教民主黨人，都被投入布痕瓦爾德或達豪集中營；而教士們軟弱無力地反對過毒氣殺人之後，又爲祖國和元首祈禱。所有人的權利都被踐踏，有些人，比如猶太人還從肉體上加以消滅。權利約束失去作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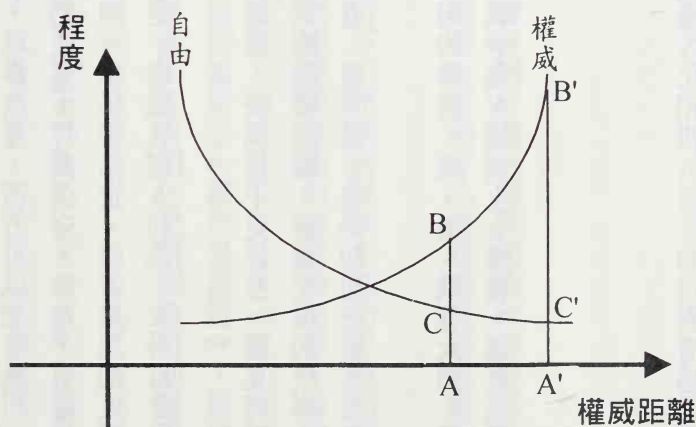
資源約束怎麼樣？資源約束只存在於民主國家，把經濟資源轉變爲戰爭資源在法國就困難重重。《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的作者，法國的亨利·米歇爾描述過當時的情況，爲了備戰，

在軍費開支方面，其數額誠然在不斷增加，而且法國議會也一直予以批准。但事實仍然是，在有關國家安全的某些關鍵時刻，財政上的一些考慮（法郎的穩定或貶值）的確阻礙了法國的重整軍備。預算送議會批准前，在部一級的討論中，財政部常常削減國防部要求的數額。國防部制定生產計劃和建立能夠實現這些計劃的組織機構費時太多。它在訂貨方面猶豫不決，各組織機構之間互抱敵意，以及在某些財政制度上缺乏靈活性。上述這些事實足以說明：國防部儘管抱怨缺乏資金，它卻經常發現花不完已經撥給它的款項，以至一九三五年年度撥款中的百分之六十不得不轉入一九三六年

先說權威極大化。我們已經知道，權威極大化既包括擴大權威落差，也包括擴大權威距離。對權威極大化有兩種約束條件，一是資源約束，二是權利約束。只要一個國家的權威落差極大地擴大了，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擺脫擴大權威距離的資源約束和國內人民的權利約束，侵略傾向就會失去控制。這就是我的侵略傾向假說：當一個國家權威落差擴大時，它的權威距離就有擴大的傾向。用「自由—權威曲線」表示如圖七之一：

圖七之一表明，當權威從B點上升到B'點時，自由就從C點下降到C'點，權威落差就從BC擴大到B'C'，這時，權威距離就有從A點向A'點推進的傾向。

之所以會有這種推進，主要是權威化動力與對它的約束失去平衡。抵消權威化動力的是自由化動力，權威落差一旦擴大到希特勒納粹當局那種程



圖七之一 侵略傾向假說

題，它能夠利用匈牙利的麥田、南斯拉夫的銅、羅馬尼亞的原油和土耳其的錳，蘇聯還可以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⑤。

權利約束失去效力，資源動員不受限制，而民主國家又綏靖主義氾濫，希特勒的侵略衝動便如脫韁野馬，狂奔起來了。

3. 納粹的「血統」

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希特勒一個人發動的戰爭，是他一個人的野心大發作，是他自己追求權威極大化的結果，那是不公平的，大部分德國人民都積極支持甚至狂熱參與了這場戰爭；如果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責任都應當由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統治者和人民承擔，那也是不公平的，所有此前參與瓜分世界的西方強國，都有責任，都應當反省。

溫斯頓·丘吉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裡說，「法西斯主義發源於共產主義，而納粹主義則從法西斯主義發展而來」，「這是本屬同一血統的運動」^⑥。這個血統論我是贊成的，但是，沒有追根溯源。我以為，所有這些主義，還包括拿破崙主義，都來自同

⑤ 同上，頁一六。

⑥ 〔美〕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頁七四。

度。這就難以鼓勵財政部部長對它更慷慨一些了^③。

米歇爾還提到了軍事工業上的困難，如資金到位、訂單發出，但在火砲、坦克和飛機的生產方面過分拖延；人民陣線決定把軍事工業國有化，引起辯論，拖延了這些工業的現代化過程；更重要的是，這種自由化的經濟很不適應採取工業動員所需要的計畫性、權威決定和價格控制^④。

德國的情況如何呢？德國的資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動員。納粹黨已經強制推行它的嚴酷統治，全體人民已被征調，公共輿論受到嚴格控制，行政機構被納粹黨人取而代之，所有人都被迫強制服從它的領袖。爲了動員資金，希特勒讓人民過艱苦生活，還沒收了龐大的猶太人資產。所有德國境內的經濟資源都被用於準備戰爭。德國從一九三六年開始，在四年內就建立起了自給自足的戰爭經濟，在冶金、化學和電氣工業方面，德國無疑在技術上是最先進的，而且在科學研究、理論和應用上也同樣先進。雖然在人造絲和人造橡膠的生產方面，從煤裡提煉石油方面，德國的進展不快，但第三帝國通過政治和外交努力，已經解決了這個問

③ (法)亨利·米歇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文電子版，中國國家圖書館網上圖書館，文學哲學圖書分館)，頁一七一—一八，(原出版者：商務印書館，一九八〇年版)。

④ 同上，頁一八。

的則越來越瘋狂。西班牙和荷蘭比葡萄牙瘋狂，英國人又比西班牙和荷蘭人瘋狂。這些海上帝國在爭奪海外殖民地的時候，陸上強國如法國、哈布斯堡帝國、普魯士和俄國，則在歐洲你爭我奪。除了俄國在歐洲以外的亞洲獲得了廣袤的領土以外，歐洲各大國奉行的平衡戰略使每個大國重描國境線的雄心都受到挫折。

等到法國醒悟過來把目光投向海外時，才發現，未被瓜分的海外地盤所剩無幾，只有非洲的部分地區和北美加拿大還剩一杯羹。等到義大利和德國強盛起來，世界領土幾乎已被瓜分完畢，你可以想見這兩個國家的統治者和人民的忿恨之心。而迅速武裝起來的海上強國日本，則看中了西方列強還未完全搞定的東亞和東南亞。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德國首先發難，其意圖很明顯，它要按照它的實力對世界勢力重新進行瓜分。歐洲的既得利益者合作起來，把德國這頭犖牛的頭強行按了下去。按下去就算了，勝利者們還做了旨在使德國民族受辱的「蠢事」（丘吉爾語）：割地賠款，限制軍力，企圖使德國永遠不要強大起來。

受辱愈深，反彈愈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三個法西斯國家，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都曾經受盡了其它歐美強國的蹂躪。日本是被美國軍艦逼著打開國門的；義大利被奧匈帝國、西班牙帝國和法蘭西帝國當作擦軍靴的布片已有好幾個世紀；德國統一前受小辱，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受奇耻大辱。

一個血統：「殖民主義」。這個血統的父親是政治專制，母親是經濟自由。政治專制的父親，有權威極大化的侵略傾向；經濟自由的母親，有擴大自由空間的擴張衝動。這兩個衝動疊加，就是狂熱的民族主義，是統治者和人民合作共同實現瓜分世界或重新瓜分世界的心。

所有偉大的民族，最敏感也最富有進攻性的就是這個時期。在英國是多鐸王朝時期，在法國是波旁王朝，特別是拿破崙時期，在德國則是統一後的第二帝國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時期，在俄國是沙皇尼古拉一世時期和史達林時期，在義大利是墨索里尼時期，在日本，則是明治維新後天皇權威和國家現代化同時推進的時期。

誠然，在所有這些時期之前，世界和歐洲爭霸戰不斷，但在那些戰爭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擴張版圖的帝王雄心，是權威極大化的結果，人民是被動參與的。但從地理大發現後的殖民主義開始，人民往往成爲主角推動著他們的帝王或領袖，實現其瓜分世界市場、原材料和奴隸產地的野心。在最早的殖民主義國家，帝王扮演的往往是贊助者的角色，比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國王；而在後起的經濟大國，是人民的領袖扮演煽動者角色，比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由於歐洲國家統一和強盛的時間不同，越是後起的大國，其領導人和人民越是焦躁不安，因爲未被瓜分的世界殖民地越來越少了。最早的殖民主義者還有幾分探險的樂趣，後來

締結。延續至今的意識形態鬥爭，都起源於這時的宗教鬥爭。

更燦爛的霞光來自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她的英國艦隊戰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後，英國的新教徒民族主義情緒高漲，這是對天主教敵人的勝利，於是與西班牙在全世界展開了爭奪殖民帝國地位的鬥爭，而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則從背後縱容。

早些時候，她用一個英國海盜掠奪來的西班牙商船上的巨大鑽石裝飾自己的王冠。一五八三年，聖約翰港和與它毗連的紐芬蘭島上的領土被宣布為伊麗莎白的領地；女王的寵臣探查了北美洲東海岸的一部分，命名為維吉尼亞，在那兒建立了英國的第一個殖民地。一五九六年，英國艦隊粉碎了在加地斯港的西班牙艦隊，從此英國艦隊失去對手。伊麗莎白在位末年，東印度公司到了印度。再後來，我們知道，到了中國。

所有這一切擴張，不難理解，主要是來自人類的慾望：女王擴大權威距離的慾望，教徒到海外開闢市場、尋求財富的慾望，但都被解釋成來自上帝的啓示。教徒們似乎並非是去收羅殖民地財富，宣布女王的領地，而是去傳播宗教福音。用宗教等意識形態把人類的擴張野心 and 慾望合法化，並爭取全民族參與，甚至變成狂熱的運動，是近代以來的一大發明。

法國大革命在這方面更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托克維爾對這場革命有極其深刻的分析，他說：

法國革命彷彿致力於人類的新生，而不僅僅是法國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熱情，在

這就是說，德國的第三帝國不僅受希特勒權威極大化驅動，也受德國資本家重新瓜分世界市場的自由空間極大化驅動，更受德國人民報仇雪恨的民族情感驅動。在這三重驅動之下，豈是張伯倫和史達林送的一份小小的禮物（捷克和波蘭）能夠了得的？

冤有頭，債有主。法國、俄國和英國，納命來吧！我想，這是希特勒當時最想狂喊的。一直到二戰以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浪潮使殖民帝國土崩瓦解，才略略平衡了一點戰敗國的心態，使德國、日本和義大利走上另一條擴張之路：經濟擴張。它們的成就世界有目共睹，老牌殖民帝國反而衰落了。

最壯觀的日落是英帝國的日落。

三、作為擴張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及其變種

1. 變種之一：宗教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拿破崙主義

我們還記得英國日出時的景象。

第一道曙光是英王亨利八世宣布英國教會脫離羅馬教廷，成爲一個獨立的民族單位。英國宗教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開始高漲，近代民族主義、擴張主義和意識形態的不解之緣開始

「聖戰」，「將它的士兵、使徒、受難者充斥整個世界」。可以把法國大革命及其後果理解為從殖民主義向法西斯主義過渡的中間形態。對內恐怖鎮壓，對外侵略擴張，這兩件在後來的德國由希特勒一個人幹的事情，在當時的法國是由兩個人幹的：羅伯斯比在前，拿破崙在後。法西斯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羅伯斯比主義 + 拿破崙主義。差別是「教義」上的，一個好聽一點：「自由平等博愛」；一個難聽些：「日耳曼種族優越」。當然，不同的教義，殘酷性不一樣：前者頂多搞王權滅絕，後者卻要搞種族滅絕。

這表明，越是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或者說現代化國家，其民族主義的宗教色彩越淡，意識形態色彩越濃，也越可怕，越恐怖，擴張性越強。在英國，雖然是一個沒有教皇的宗教，但畢竟還是宗教，有上帝，有禮拜，有懺悔，有拯救，有來世生活。因此在國內變革和殖民地擴張過程中，殘酷性還是有限的。法國大革命的宗教則是宗教的代用品了，有宗教的狂熱，沒有宗教的限制。雅各賓黨人的斷頭臺，在英國是不曾有過的。

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英國的日出，得益於自己民族意識的覺醒；英國的日落，則起因於殖民地民族意識的覺醒，其中還包括它自己的「屯墾後裔民族主義」的興起。美國的獨立，就是這種民族主義不認同母體「王民族主義」的結果。

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產生這樣的热情。大革命激發了傳播信仰的熱望，掀起一場宣傳運動。由此，它終於帶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時人爲之震恐；或者不如說，大革命本身已成爲一種宗教，雖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爲既無上帝，又無禮拜，更無來世生活，但它卻像伊斯蘭教一樣，將它的士兵、使徒、受難者充斥整個世界^⑦。

這是大革命的宗教性質。大革命還有它的民族性質，法國歷史學家米涅談到大革命時說：

革命以法律代替了專橫跋扈，以平等代替了特權；革命使人們擺脫了階級的區分，使國土消除了省份之間的壁壘，使工業不再受行會和行會監督的限制，使農業擺脫了封建領屬關係，免除了什一稅的重壓，財產不再容許任意指定預備繼承人，革命把一切歸於一個階級，一個法律，一個民族^⑧。

於是，這個民族就以宗教般的狂熱，在新任「教主」拿破崙的率領下，開始了對世界的

⑦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文版，商務印書館，北京，一九九二年版），頁五二。

⑧ [法]米涅，《法國革命史》（中文版，商務印書館，北京，一九八一年版）。

使通向法西斯政體的大門次第打開^⑨。

這是他對歷史的一種解讀，從他獲得的廣泛贊同的情況看，他的解讀是出色的。我覺得美中不足的是，作品出版的年代不可避免給這部偉大著作染上了意識形態色彩，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對他的影響也略顯過大。

就我的目的來說，我以為，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在現代化道路上的差別沒有摩爾先生說的那樣大，最重要的差別是在強盛國力、分享主權與瓜分世界的先後問題上統治者與被統治的意見一致程度不一樣。最一致的是英國。英王的權威極大化和新興資產階級自由空間極大化完全合拍，所以，強盛國力與瓜分殖民地同時進行。

這個過程告一段落後，英王的過度權威才和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動力發生衝突，從而開始了國內自由化和民主化進程。人們應當注意到，對於相對落後的國家來說，政治消費和別的好東西的消費一樣，都有一個超前問題。由於這個問題，由於英國臣民對英王的限制，波旁王朝和它的臣民發生分歧。資產階級在擴大國際自由空間方面和波旁王朝合作到中途，突然提出主權分享問題，遭到拒絕後爆發革命。革命後，繼續在波旁王朝時期未完成的與英國爭

⑨（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中文版，華夏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七年版），

2. 變種之二：財閥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

巴林頓·摩爾在其名著《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裡探討了通向現代社會的三條道路。一是通向現代社會的民主道路，二是來自上層的革命與法西斯道路，三是農民與革命，也就是共產主義道路。

在這本書裡，他著重研究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起源。雖然他的目的，是要闡明現代化道路問題，但他的研究對理解民族主義的另一個變種，即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主義的起源有啓發性。在摩爾看來，日本和德國的現代化動力不是像英法那樣來自民間，而是來自上層，結果導致地主階級的保守和專制。依他之見，土地貴族是法西斯主義的主謀，新興工商階級中的精英分子是共謀。他說：

在現代化歷史接下去的一幕中，一種新的要素湧現出來，地主階級和新興工商階級中的精英分子締結同盟，組成十九世紀的政治架構，這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如果建立這樣一個聯盟的努力失敗了，通向共產主義的農民革命就將橫插進來，像在俄國和中國那樣。……這類聯盟在哪裡成功，哪裡便有漫長的保守主義乃至專制主義的政府統治歲月。

等到民主的嘗試「難以應付嚴峻的時代挑戰，它不能也不願對社會基本結構加以改革，終於

所有工業的統治權。四個最大的財閥集團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使其總資產超過了三億日元，相比之下，在一九三〇年只有八百七十五萬日元。」^⑩

根據有利原則，我們就可以看出，法西斯主義的真正主謀是誰了。

3. 變種之三：工農民族主義——共產主義

俄國和中國又和德、日不一樣，德國和日本是強大起來後，先幹什麼，是擴張還是先分權的問題；中國和俄國，特別是中國，是如何才能強大起來的問題。

在現代化過程問題上，最順利的依然是英國。它一著占先，著著占先。在現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權威和自由同時增加，而不能一個增加，一個減少。如果自由增加，權威減少，社會混亂和動蕩就會增加，從而發生社會失範現象；如果權威增加，自由減少，政治專制就會加劇，社會反而會進一步退化。

這個觀點，我在一九八九年就提出來了，遺憾的是，當時人們爭論問題，嘴皮用得少，腦袋用得少，幾乎沒有人注意我這個觀點。確實，我當時提出這個觀點，看起來自相矛盾：

^⑩ 同上，頁二四一。

奪世界帝國的任務，這是拿破崙幹的事情。

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情況與英、法不同。既不像當年英國，人民高度一致地和國王一致；也不像當年的法國，人民高度一致地和國王不一致。在德、日，一部分人民要求先推翻有錢人的統治，這主要是下層貧苦百姓，工人和農民，但不強大；另一部分階層則要求先分享權力、再談重新瓜分世界問題，這部分人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另一部分人則主張先爭奪世界，再來分配權力，他們擔心民主導致內鬥，消耗本民族的力量，喪失世界爭霸的時機，這些人主要是大地主、大官僚和財閥豪門資產階級，還包括一部分以戰爭為業的職業軍人。在德國和義大利，民主派已經獲得勝利，但實踐證明他們不能滿足本國人民洗雪前恥和爭霸世界的願望；在日本，前兩種人威脅天皇的權威，只有第三種人才與他的權威渴望一致。法西斯主義分子上臺執政，表明全民族或人民的多數最終同意先要重新瓜分世界，並清除先強大起來的其他強國強加給他們的不平等條約，並清洗舊侮新辱。

戰爭中，幾乎所有人的利益都暫時受損，唯有財閥豪門的利益得到擴張。摩爾先生正確地指出：「軍事爭霸和法西斯主義始終對商業有利。」根據摩爾的統計，日本的「工業產量從一九三〇年的六億日元上升到一九四一年的三十億日元。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關係顛倒了過來。在一九三〇年，重工業僅占全部工業產量的百分之三十八；到一九四二年，卻已占了百分之七十三，雖然財閥在名義上屈從於政府的控制，實際上他們能夠完全有效地掌握對

同樣有自由與權威同時增加的過程，現代化過程也還算順利。

中國和俄國開始現代化時，都是中央集權制的君主專制政體，社會權力都在社會頂部。現代化動力只能來自社會上層，要搞現代化，必須下放權力。這就是說，要想增加自由，發展商品經濟，必須犧牲一部分權威。這容易導致社會失範。另外，靠上層官僚來推動現代化，這是與虎謀皮，必然遇到極大的反抗。戊戌變法的失敗，胡耀邦、趙紫陽的下臺，都是維護舊權威的保守派反抗的結果。

實在反抗不了，他們就會尋求補償，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占社會財富，使貪污和腐敗社會化。表面上看，社會好象發展了，經濟也增長了，但都沒有給普通工人和農民帶來實際利益，有的還處於赤貧狀態。使國家強大，始終是個夢想。一批愛國知識分子於是起來尋求新的強國之路。昨天，他們找到了共產主義；今天，他們找到了新左派思潮。共產主義者以工人農民為依靠力量，希望通過一場革命，先奪取本國政權，然後通過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奪取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權。這是想讓強國與擴張一步到位，畢其功於一役。雖然叫做共產主義，骨子裡還是民族主義。誰爭取做上了共產國際的老大，誰就可以指揮別的民族。

毛澤東的擴張野心被蘇聯老大哥制約住了，這是他老人家最終和蘇聯搞掰了的原因之一。蘇聯人則利用共產國際做了本民族的擴張工具，把各國共產黨作為顛覆各國政權的別動隊。當然，蘇聯發的最大一筆財，還是戰爭財。二戰結束後，它吞併了波羅的海諸國，撕碎

正如自由——權威曲線表示的，自由與權威之間是替代關係，此消彼長，怎麼可能同時增加呢？

如果是馬克思，就可能得意地說，「這就是羅陀斯島，就在這兒跳吧！」我沒有這份得意。問題的關鍵在權威本位的轉換。多鐸王朝在與舊貴族的鬥爭中，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基本摧毀了以父權本位為基礎的貴族政體，而代之以神權為本位的君主政體。按照自由距離理論，君主統治下的農民，比領主統治下的農奴享有的自由要多，因為農民離君主的自由距離，比農奴離領主的自由距離大。同時，君主的權威也比領主的權威大，因為它的權威距離也更大了。

事情並未到此為止。幸運的多鐸王朝和羅馬教廷決裂後，國內的宗教自由增加了，同時，國王的權威也增加了，因為世俗的王權又扮演了宗教首領的角色。正是這種兩重意義上的權威與自由的同時增加，使英國在多鐸時代迅速邁向現代化，國內經濟增長和國外勢力擴張同時實現，挫折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少。

還有一點也很重要。英國由於是最早的殖民國家之一，在市場經濟發育的初期，就獲得了大量貴金屬，加快了它的原始積累，還有大量廉價的海外原材料、廉價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商品市場，這些是任何後進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無法享有的。

日本和德國在現代化前，也是貴族政體，雖然起步晚，但貴族政體被君主政體取代時，

至今還在爲民主在國內被監視的鮑彤先生，在網上貼文章說：「民主可以救中國」；另一些人，則歷數民主的弊端，嫌大陸當局專制得還不夠。比如有個化名馬悲鳴的先生，有點像五柳先生，五柳先生是好讀書不求甚解，他是好寫文章不顧邏輯，他說，「中共萬惡，唯善六四。」在天安門廣場和平請願的學生，是「非法割據」，應當鎮壓。還有個叫「中國人民大眾」的無名英雄粗魯地說：「毛老頭在時雖然國家不及現在富裕，但中國人揚眉吐氣，在世界上沒人敢小視我中國！可現在，他媽的！讓那些鳥頭頭們自己說說看！一個清朝還能持續數百年，可惜毛爺爺開創的一個本來朝氣蓬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剛走過五十年就到了又一個滿清晚期了！」

終於讓某些有識之士按捺不住。激昂如海外化名蘆笛的先生，痛斥那些狂熱推銷戰爭的青年人正在變成法西斯黨徒；穩重如國內學者雷頤先生，則以史爲鑒，提醒人們要「警惕法西斯」。雷先生的文章可謂是遠水解了我的近渴。孤懸海外，遠離中文環境，又讀不了英文，使我患了資料饑渴症。他文章中的某些資料，恰好可以部分彌補我這一節文章在資料上的某些缺憾。一個理論的解釋性價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在預測上的價值。侵略傾向假說如果有什麼貢獻的話，那就是它在世界事務中對一個國家侵略性的評估，以及對這個國家發動侵略的可能性進行預測。根據這個假說，一個國家如果本來就是一個專制國家，但如其專制程度加深，其侵略性就隨之增大；一個國家雖然不是民主國家，但口頭上還承諾要

了波蘭，還把東歐諸國變成自己的附庸國；在亞洲還有越南、北朝鮮聽他指揮。雖然有中國、南斯拉夫和阿爾巴尼亞先後鬧分家，但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裡，蘇聯是一個紅色世界帝國，這使俄羅斯民族的自豪感達到了頂點。只可惜工人農民打仗、做工、種地還行，治國和搞經濟建設並不內行。加上莫名其妙的意識形態作祟，清除了本民族的全部精英，使他們的好夢不長。

工農民族主義的擴張，是人類有史以來最低級的擴張。它對本民族的貽害，比法西斯主義要嚴重許多倍。法西斯主義戕害別的民族，共產主義專門戕害本民族。看看法西斯統治之後的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強盛，再看看共產主義統治之後的俄國和東歐，還有處於這種統治末期的中國之慘狀，你就明白我所言不虛。

四、侵略的預警信號：對民主反動

1. 侵略性評估

最近互聯網上的海外中文論壇有意思起來了。

一些人在呼籲臺海和平，另一些人在叫囂對臺戰爭。一些人，比如為中國的民主坐牢、

希特勒自豪地宣布：「我是民主的死敵」！他還宣判了民主制度的死刑：「共和制度和歷屆政府毀滅了德國的一切，這種制度最終被消滅的時刻到了。」

戈培爾也有狼一樣的真誠：「我們進入國會，是爲了在民主武器庫中用它所具有的武裝爲我們自己服務。我們將要成爲國會議員，以使用魏瑪民主的支柱去瓦解魏瑪民主。如果民主那麼愚蠢，竟爲了這種給人幫倒忙的差使給我們發免費車票和津貼，那是它自己的事，……我們是作爲敵人而來的！如狼衝入了羊群，我們就是這樣來到了。」^①

狼的誠懇，來自它的強大和羊群的軟弱。希特勒和戈培爾言行一致，說幹就幹，爲民主送了葬。當然，爲民主培養的是千百萬人的生命，包括德國士兵的生命。

義大利人的哲學思維能力要差些，所以反民主思想也不如德國人堅定。一定要爲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找一個哲學起點，只能想到馬基維利了。他的《君主論》鼓勵君主（不管是合法的還是不合法的）爲了保護並擴大自己的權力，爲了征服和國家統一，使用各種手段，包括

① [英]弗·卡斯頓，《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中文版，周穎如等譯，商務印書館，北京，一九八九年版），頁二一一、二七五。轉引自雷頤網上電子文章：《警惕法西斯》，萬維論壇（www.credera.org），二〇〇〇年五月九日；多維新聞（www.duowennews.com），二〇〇〇年五月十日。

逐步實現民主，如果突然或逐步放棄這個承諾，並視民主如仇敵，禁止人們談論它，這個國家的侵略性也隨之提高；侵略性上升最快的，要算一個民主國家，突然蛻變為一個獨裁或極權國家，它發動侵略的可能性最大。

所有這三種情況，都是對民主的反動，即向民主的對立面運動。用我的術語說，就是背離自由與權威的均衡點，向權威方向運動，導致權威落差擴大，增強擴大權威距離的傾向。反動一般從思想上開始，接著是行為，最後在政治體制上完成。思想反動，只是一個信號；行為反動是一個更危險的信號；只有在制度上幹掉了民主，實現了獨裁，才具有現實上的侵略性。但反侵略，必須從思想上反專制開始。

2. 德國和義大利

德國對民主的反動，是從哲學上開始的。兩個人貢獻最大，一個是尼采，貢獻了「超人哲學」的民族心理；一個是斯賓格勒，貢獻了「強權政治」的歷史意識。這兩個東西，是納粹意識形態的兩根主要支柱。

從「超人」哲學和強權政治出發，納粹對自由精神和民主政治進行了露骨批判，認為民主制是一種照顧遷就庸眾的軟弱制度，只有領袖獨裁制度才是真正強者的制度。因此在掌權之前，納粹就公開聲明要破壞民主制度。

3. 日本

日本人比義大利人還要不擅長哲學思維，但擅長學習。明治維新時期，有個叫大國隆正的，讀了荷蘭國際法學家格老秀斯的書，學到了「萬國公法」概念，就發揮說，在日本與萬國之關係中，日本是「本」，而萬國是「末」。「本」之國的日本天皇，是「地球上之真主、總帝」，是「世界之總王」。天皇守護皇位之日本是「萬國之總帝國」。這樣的日本與萬國相聯系的國際關係，無非是把作為「世界之總王」的天皇推向萬國的「通路」。他說：

「天照大神之神意，見諸《延喜式》第八卷，乃欲召集萬邦，使之從屬我天皇也。今日聖意亦與此同，一切通路應無阻滯。」^①有了這個「通路」，只管「進入」就是了，像「進入」中國那樣。說實在的，這是把格老秀斯的理論學歪了。中國人有時候也不知道天高地厚，把世界分為中華和夷狄兩類，但還沒有可笑到要做萬國之主。從被《日本政治史》的作者稱為「在國學中，就國家建設問題提出主張並在歷史上留下輝煌業績的」三個人物之一的大國隆正的言論看，日本人由於國小心大，已經有點心理變態了。在這樣的國民心態下，要

①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中文版，周啓乾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頁一九一—一九二。

被人視為惡行的手段。

我不認為墨索里尼有興趣學習這本著作，雖然他是法西斯主義的鼻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他就表現出了傑出的反民主鬥士的巨大才華。他當時是個「極左派」社會黨人，激烈反對議會政治，尤其反對黨內「溫和派」參與議會政治。他支持政府侵略利比亞的主張，並因此於一九一一年被判刑五年。

他的偶像是古羅馬英雄，圖騰是古羅馬王權權杖，一個搗不熱的舊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積極主張參戰，反對義大利社會黨的中立政策，表示「要提高嗓門，用洪亮的聲音高呼這個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詞：戰爭！」^⑫這當然是噪音。結果，他被社會黨開除。他求之不得，成立了法西斯組織。最後進軍羅馬，兒戲般地登上權力頂峰。從此，戰爭，對於他就不再是一個「可怕而又令人神往的詞」了，而是可怕而又讓人激動的行動。不過，他的下場，是可憐而又讓人同情的，當他無助地站在一個游擊隊員槍口前的時候。

⑫〔美〕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頁四七。

於起事部隊的面前。」¹⁴

於是，在一九三七年，三件事同時展開：一是軍部建立起軍事獨裁政權，內閣變成了天皇直接任命；二是文部省開始進一步神化天皇，發行《國體之本義》，把天皇皇位推到了「無上尊嚴之高位，乃永不動搖之國家的根本原則」，至於帝國議會，不過是「為翼贊天皇之親政而設置者」¹⁵；三是製造蘆溝橋事件，侵犯中國華北。德國和義大利是先完成國內對民主的反動，建立獨裁統治，然後發動戰爭；日本則是侵略與獨裁化同步進行，交替推進，有時是侵略向前進，獨裁長一寸；有時是獨裁大步走，擴張爭上游。之所以有這個差別，主要原因之一，我想是德、意在歐洲列強的眼皮底下，在軍備完成之前，不得不偽裝其侵略意圖；而日本遠處亞洲，無人看管，所以更加肆無忌憚。

4. 兩伊戰爭和海灣戰爭

兩伊戰爭和海灣戰爭爆發前，也並不是沒有預警信號。

伊朗的信號人人都看清楚了，那就是領導了伊斯蘭革命的阿亞圖拉·何梅尼，登上了權

¹⁴ 同上，第四卷，頁三二五—三二七。

¹⁵ 同上，第四卷，頁三五七—三五八。

對天皇的權力進行限制，搞什麼憲政，豈非異想天開？而且會「阻滯」天皇做「世界之總王」的「通路」。

這就難怪於一八八九年通過的憲法成爲虛飾性的議會民主的一個幌子，隨著日本自由黨被解散，吵吵鬧鬧的立憲運動和自由民權運動歸於失敗，日本就開始了擴張之路，進行了「兼六合而掩八竝」和「伸張國權」的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把國權「伸張」到了朝鮮和臺灣。日本政府於一九二八年春在普選之後對共產黨進行的大逮捕，對勞動農民黨、日本工會評議會和全日本無產階級青年同盟的禁止令，是一個更加危險的信號。而日本陸軍因刺殺張作霖和天皇一起逼迫田中義一首相辭職，是日本邁向軍國主義化的實際步子。緊接著就「進入」了中國東北。

日本的法西斯化與德國、義大利不同，不是來自一個領袖人物的鼓動，而是一大批軍隊裡的青年法西斯黨徒用宣傳、暗殺和屢敗屢搞的政變推動的。當然，天皇陛下有一隻若隱若現的手在操縱。等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又一次青年軍官發動政變時，天皇本人終於按捺不住，「撕下立憲君主的外衣」，先是鼓勵政變部隊說，「承認諸子之真意系基於顯現國體之至情」，後又不斷敦促軍方對起事軍人進行鎮壓，甚至呼喊：「朕親率近衛師團，將其鎮壓。」連《日本政治史》的作者都說，這時的天皇，「作爲擔任大元帥的絕對君主而出現

其實，更危險也更隱蔽的信號來自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海珊。海珊是一個偽善而又用心險刻的統治者，一直在做著古代哈里發的美夢。他的夢想是做阿拉伯世界的主宰。他在兩伊戰爭爆發前夕，毫不掩飾地說：「讀一讀伊拉克歷史，你就會發現，它不是指路明燈，就是受侵略軍鐵騎踐踏。」

在伊朗革命後不久的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伊拉克革命指揮委員會總書記兼總統貝克爾宣布退休，由他的副手海珊接替他的職務，貝克爾結束的其實是他的空名，並不是實際職務，實權早就到了海珊手中。

幾乎就在當天，海珊開始了對黨和國家高級機關大清洗，以謀叛罪清除了二十二名革命指揮委員會委員中的五名委員，總共判處二十二人死刑，另有三十三人被判一—十五年徒刑。爲了產生震懾效果，海珊想出了連史達林都沒有想出來的絕招，讓地方黨組織代表親手槍斃他們以前的領導人。⑰

在這前後，海珊還做了幾件意味深長的事，一是謀求和敘利亞兩國合併，採取聯邦或邦聯的形式，組建「聯合阿拉伯國」。敘利亞主張兩國政府官員和議員對等委派，海珊不同

⑰ 「黎巴嫩」福阿德·馬塔爾，《海珊傳》（中文電子版，中國國家圖書館，在線圖書館，傳記圖書分館），頁三三（原出版者，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

力頂峰。雖然巴勒維國王的政權也不是什麼民主政權，甚至不是君主立憲政體，但它的集權程度，肯定趕不上一個政教合一的革命性極端政權。而何梅尼政權的革命性，教義的極端性，和它的侵略性是成正比的。

一個奧地利的何梅尼傳記作者說，何梅尼革命成功後，「在伊拉克的什葉派教徒很快便活躍起來，拿著何梅尼（也是他們的最高宗教權威）的一封信，要求政治自治。流亡納賈夫期間的阿亞圖拉，有整整十年曾經是伊拉克當權者用以對敵對的君主制鄰國進行地下鬥爭的一個備受歡迎的政治工具。但隨著何梅尼的勝利，巴格達多年來在何梅尼身上所要的把戲，突然變成一個政治爆破筒了。」^①

只要何梅尼還活著，鄰國伊拉克就有理由感到不安。作為世俗國家的伊拉克，是伊朗革命政權輸出伊蘭革命的首選國家，況且伊拉克國內有大批什葉派穆斯林。何梅尼如果要這麼做，還有一個理由，他和伊拉克當權者有仇。他雖然在伊拉克待了十年，但就在伊朗革命爆發之前幾個月，伊拉克政府將他驅逐出境。

①〔奧地利〕海因茨·努斯鮑默，《何梅尼——以真主名義造反的革命者》（中文電子版，中國國家圖書館，在線圖書館，傳記圖書分館），頁一三五（原出版者：世界知識出版社，北京，一九八〇年七月第一版）。

世界。他要通過戰爭耀武揚威，讓阿拉伯國家承認他的霸主地位。海珊的傳記作者非常敏銳地指出：「戰爭促使阿拉伯和伊斯蘭國家接受伊拉克爲一個強國，如果它們能夠接受一個更強大的伊拉克，戰爭會更快得到調停。」¹⁸

但這場戰爭得到調停了，另一場戰爭就可能開始。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在兩伊戰爭中堅定支持伊拉克的科威特，它首先成爲犧牲品；感受到亡唇之寒的沙烏地阿拉伯，也是第一個熱情擁護海珊〈民族憲章〉的。

海灣戰爭的故事，正好演義了義大利智者馬基維利的格言：誰在使別人強大，誰就是在自取滅亡。

五、俄羅斯：專制與擴張的循環推進及終止

幾乎所有的權威化過程，都可以被認爲是對自由的反動，但未必都是對民主的反動。民主政體應當在自由與權威的均衡點附近。但如果一個政體像古希臘雅典政體那樣，向左偏離

¹⁸ 同上，頁十。

意，大概是想自己多派。海珊要求兩國的復興社會黨和兩國政權同時合併，敘利亞不同意。因為兩國的社會復興黨的共同締造者阿弗拉克曾被敘利亞判處過死刑，後在伊拉克。兩黨合併，就要承認他的領導地位，也就是承認海珊的領導地位。獨裁黨的厲害人們是知道的，兩黨到了海珊手裡，敘利亞還能分享主權嗎？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對合併取消極態度就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件事是把不結盟運動會議拉到巴格達開，以阿拉伯世界的發言人自居，甚至想代替南斯拉夫和古巴成爲不結盟運動的領袖。第三件事是利用埃及和以色列、美國簽定大衛營和平協議的時機，把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拉到巴格達開，導演了一場派專機給埃及總統沙達特送勸告信的鬧劇，被埃及方面拒絕後，又煽動阿拉伯國家中止埃及作爲阿拉伯國家聯盟成員的資格，其實海珊就是要代替沙達特做阿拉伯世界的領袖。

更能暴露他的野心的，是他於一九八〇年二月七日突然拋出來的《民族憲章》，提出了處理阿拉伯各國關係的基本框架，實際上是爲阿拉伯世界立法。居然獲得了阿拉伯世界的一致讚譽。這也可能是試驗一下阿拉伯世界對他的支持率，因爲他馬上就要發動入侵伊朗的戰爭。

因爲這時，他對伊朗的戰爭準備已經就緒，只需要策劃幾個陰謀挑起事端就可以了。他對伊朗的侵略戰爭處心積慮地準備了五年之久，但海珊的醉翁之意並不在伊朗，而在阿拉伯

的德國人，都攻進了莫斯科或莫斯科城下。但俄羅斯人的偉大之處，表現在他不可思議的後發制人能力上。俄羅斯彷彿是個太極高手，你打他，受傷的是你自己。以至於美國《時代周刊》有一年評選「歷史之最」，把進攻莫斯科，不論是誰進攻莫斯科評為「有史以來最大的錯誤」。

蒙古人打了俄羅斯，結果，蒙古人征服的許多地區都併入了俄羅斯版圖，其中還包括也被蒙古人統治過的中國的大片土地，更有甚者，後來蒙古還被俄國肢解了，一個叫外蒙，成了俄國附屬國，一個叫內蒙。瑞典人打了俄羅斯，結果，全軍覆沒，國王查理逃到土耳其流亡，波羅的海沿岸的大部分省份和芬蘭的一部分，落入俄國手中。法國人打了俄羅斯之後，亞歷山大沙皇挺進巴黎，拿破崙皇帝的臣民居然高呼「亞歷山大皇帝萬歲！」而法國皇后約瑟芬，據說，在宮中用法國美酒，也許還用別的更美的東西款待俄國皇帝。德國人打俄羅斯的後果更嚴重，東德成了牛郎，西德成了織女，銀河是柏林牆，一個民族，強行分居。日本人怎麼樣呢？後果好不了多少。日本曾經偷偷摸摸地獲得過一兩次對俄國海軍和旅順口俄軍的勝利，它後來付出的代價是幾十萬關東軍的生命和北方四島的主權。

只有聰明的英國人和它的後裔美國人很少碰俄國人，除了小規模的克里米亞戰爭之外，英美和俄國合作多於火拼。英國和俄國合作對付過拿破崙，英美還和它合作打敗過希特勒。世界各大民族幾乎都讓俄羅斯占過便宜，沒有讓俄國人占到便宜的就是英國和美國。在熱戰

自由——權威平衡點，它如果向右移動，是權威化，但不是偏離民主，而是從一種不穩定的民主移向一種穩定的民主，也就是從古典民主，移向現代民主。

所以，並非所有的權威化都一定是侵略的信號。至少在三種情況下，在權威化之後不會有大的侵略性擴張。一是從自由——權威平衡點的左側向平衡點移動的權威化，比如當年美國從邦聯向聯邦制過渡；二是極小型的國家，爲了保持穩定而加強其權威，比如獨立後的新加坡；三是超大型國家在大征服之後，它的權威化是爲了保持穩定、同化異族，比如秦帝國和古羅馬帝國。因爲這樣的大國已經達到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的極限狀態，再擴張領土，對它已經無利可圖。這種極限狀態，用經濟學的語言來描述，就是擴張版圖的邊際效益等於零。

最危險的是國力上升時期的世界準一流國家，或者叫做從二流向一流過渡的國家，尤其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或者民主制度剛剛建立，但還立足未穩的時期。當年的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都屬於這種情況。

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俄羅斯。其它國家在專制與擴張的一兩個循環之後，就達到了極限狀態，從而停止擴張。只有俄羅斯，似乎它的極限狀態的彈性極大。換句話說，它的胃口特別大，不容易吃飽。

從蒙古人開始，世界上許多強大起來的民族，都要到俄羅斯去碰碰運氣，試試自己的鋒芒。成吉思汗驅策的蒙古人、查理十二世率領的瑞典人、拿破崙統帥的法國人和希特勒指揮

加酒裡尋找安慰，出現了瘋狂的酗酒現象。俄國的死亡率是當時歐洲最高的。所有這些導致的不滿情緒，又為民粹分子、布爾什維克分子、工團主義者和各種激進派分子提供了理想的溫床。

被征服地區的民族問題也很嚴重。波蘭人、芬蘭人、喬治亞人、拉脫維亞人、愛沙尼亞人、亞美尼亞人，都在反抗當局的「俄羅斯化」政策，並經常出現叛亂。

種種問題疊加，社會動亂加劇。一九〇一年一月，就出動軍隊一萬三千五百次，全年達十一萬四千次。到一九一三年，因「攻擊國家政權」而被捕的達十萬人。

俄羅斯面臨困難的選擇：繼續改革，權威進一步喪失，社會可能更加動亂；取消改革，強化專制，可以獲得暫時的社會安定，但會進一步減少資源產出，使政府更加尷尬，要軍隊就不能要民生，要民生便不能要軍隊；剩下的選擇就是繼續擴張了，好處很明顯，掠奪的物資可以緩解資源短缺，一致對外，可以緩解國內衝突，但不可以失敗，任何一次軍事上的失敗，都會導致激進分子的革命和少數民族的叛亂。

俄國自信自己是戰無不勝的，於是為了擴張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遺憾的是戰爭拖得太長，軍費太龐大，傷亡也太慘重了。結果，俄國沒有等到勝利到來：協約國最後贏了，俄國卻提前輸了。俄國在這次戰爭中丟掉了波蘭、芬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克倫斯基政府無法阻止帝國的崩潰趨勢，布爾什維克革命成功，建立起了更加專制的極權政體。按照馬克思

中差不多總是勝利的俄羅斯，最終在英美導演的冷戰中衰敗了，敗得很慘，由一個超級大國，變成了一個在世界新聞的頭條中很難找到的國家。

俄國人是後發制人，英美人是無爲而制，更加高明。讓俄羅斯自己在專制與擴張的循環裡走向自我毀滅。俄羅斯每征服一個地方，國內的專制就加深一步。征服瑞典後，彼得自稱皇帝，從一個小公國變成一個帝國。而加深專制之後，又進一步進行侵略，領土越來越大，包袱也越背越重，對專制的渴求越來越深。所以，我們對繼承了亞歷山大一世的尼古拉一世（一八二五——一八五五）的極端專制就不感到奇怪了。

專制的結果當然是經濟衰退、政府普遍無能和軍隊戰鬥力下降。結果，俄國軍隊在一八五四——一八五五年克里米亞的擴張戰爭中與英、法軍隊相遇，遭受巨大損失。對一個大國來說，戰敗未必是壞事，它暫時中止了擴張與專制的循環，在資源產出壓力下，自由化動力啓動。就俄國的情況看，俄國開始了一系列激進改革，最重要的是農奴制的廢除。

但是，過大的權威距離和無藥可治的擴張衝動，一方面使俄羅斯沒有容納更多自由的空間，另一方面又要拼命「汲取」財政用於龐大的軍費。這樣，俄羅斯對資源的動員總是大於資源產出。這種竭澤而漁和殺雞取卵的政策，必然把下層人民置於悲慘境地。一九一三年，俄國政府把九點七億盧布撥給武裝部隊，而花在衛生教育上的經費只有一點五四億盧布。工人的住房沒有排水系統，各種公害嚴重，而且稅率極高。爲逃避殘酷現實，人們只能在伏特

歐撤軍，還搭上了雄才大略的歷代沙皇征服來的中亞諸國，甚至包括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喬治亞。以這種代價獲得的民主，俄國人民是珍惜還是怨恨，還有待觀察。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和東歐，對俄羅斯人來說，彷彿是個魔咒。失去它，又想獲得它；獲得它，消化不良，又吐出它。出出進進，給俄羅斯並沒有帶來多少好運。

現在，俄國的國力和威望，低到了和這個民族的偉大和歷史不相稱的地步。民主制度在俄羅斯勝利的最後時刻未必已經到來。俄羅斯目前的政治體制，還不能說已經能有效地防止總統的沙皇傾向。葉爾欽把總理、議會甚至選民玩於股掌之上，臨下臺還給民主制度一擊：把好端端的總統任期制，搞成接班人制。他嘩眾取寵的提前辭職，因此獲得的超出法律允許的特權，都給俄羅斯民主制度投下了陰影。

俄羅斯民主的脆弱，它從超級大國地位的滑落，俄羅斯民族的偉大和愛國，國內民族矛盾和宗教衝突的此起彼伏，都表明，它還沒有完全走出專制和擴張循環推進的危險期。

主義的理論，國家應當逐步消亡，而蘇聯帝國對國家機器的強化，超過世界上任何時期的帝國。這是一個偉大民族擴張衝動受挫後的自然反應，無限權威化，不僅是爲了阻止帝國的繼續崩潰，更是爲了進行新的擴張。權威化有兩種，一種是保守的權威化，一般發生在大擴張之後，目的在穩定和同化，如古羅馬的帝國化；一種是進取的權威化，一般在大擴張前，比如這時的蘇聯，和後來的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目的在擴張。

毛澤東可能沒有完全弄懂蘇聯體制的意義，也模仿蘇聯搞極權體制，而自己又既沒有擴張的可能，有蘇聯老大哥在；也沒有擴張的慾望，打下中印邊界的一些地方又主動讓給人家，羊肉沒吃著，還惹了一身騷。他的極權是白搞了，只是讓中國人民受了苦。

蘇聯體制的擴張野心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它真的想要搞世界革命，做全世界人民的主宰。它的努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終於有了回報，不僅把在一戰結束時丟掉的波羅的海沿岸國家拿回來了，還分割了波蘭，讓東歐國家都成了它的附屬國。唯一的遺憾是沒有搞顛芬蘭。

對一個帝國來說，蘇聯的擴張和專制都已達到極點，達到了極限狀態，再擴大，就不是人所能承受的了。在這種體制下，沒有容納任何一點自由的空間，資源產出動力很快衰竭，於是偉大的俄羅斯民族走上了慢性自殺之路。

終於，物極必反。吃得太多導致消化不良，蘇聯解體，吐出了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從東

第八章 雪崩反應：崩潰趨勢假說

一、世界一片斷裂聲

被塞繆爾·杭廷頓歡呼為民主「第三波」的浪潮沖刷下的世界，並非都是帆影點點，海鷗陣陣；透過被陽光照徹的浪霧，不只是顯現美麗的彩虹，也隱約可見海岸上帝國的廢墟；甚至浪濤的轟鳴，也掩蓋不住國家棟梁斷裂的咔嚓聲。

我感到好奇的是，杭廷頓注意到了這波民主化過程的不少特徵，唯獨沒有指出民主化對一個多民族國家解體的影響。對於被他視為民主化第三波的領袖國家葡萄牙，他也只注意民主化在其國內造成的混亂，政變與反政變，遊行，政黨紛爭，從極左的共產黨到極右的法西

國所屬的企業所占的比重雖然有所上升，也不過只占總產值的百分之六。在全蘇聯生產率排在前兩位的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其工業企業的百分之九十一（愛沙尼亞）和百分之八十（拉脫維亞）直屬於蘇聯中央管轄。

至於「各民族の平權」更是一句空話。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對許多民族的強迫大遷徙，可以用慘無人道來形容。而所謂「民族自治共和國」，其實就是史達林廚房裡的鷄蛋，想什麼時候捏碎你，就什麼時候捏碎你。一九四四年，克里米亞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的全體居民被強行遷移，同時，巴爾卡爾人被從卡巴爾達—巴爾卡爾自治共和國遷走。此外，全部或大部被遷徙的還有庫爾德人、亞美尼亞人、日爾曼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土耳其人和芬蘭人，相應的自治共和國、自治州的建制都被撤消或降格。在這之前被遷徙的還有卡拉恰伊人、卡爾梅克人、車臣人和印古什人，他們的自治共和國也被撤消^①。

把憲法當戲文的後果，就是假戲真唱。在你有力量的時候，人們可以和你一起在臺後哭，在臺前笑；等你的力量消解了之後，你假惺惺允諾的一切都要你徹底兌現，這就是從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的真相。這是一次人類政治的大雪崩，是發生在二十世紀的

① 參閱郝時遠、阮西湖等主編的《蘇聯民族危機與聯盟解體》（四川民族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斯黨，一年內六屆政府更迭，在保守的北方和激進的南方之間差一點爆發內戰等等。他就不提葡萄牙民主化導致了葡萄牙帝國最後的崩潰，它在非洲的五個殖民地喪失，變成了五個主權國家。葡萄牙在一九二六年發生軍事政變，建立了漫長的薩拉查獨裁政權，其主要目的也許正是要提高權威落差，維持它最老牌的殖民帝國統治。這一次，殖民帝國和獨裁統治一起被埋葬了。

比葡萄牙動靜不知道大多少倍的帝國坍塌，發生在前蘇聯。前蘇聯一直搞的是假聯邦制。表面上，各加盟共和國享有的主權，比美國各州還要多，比如一九二四年的蘇聯憲法規定，聯盟是「各平權民族的自由聯合，每一個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一九三六年的憲法也說：「每一加盟共和國均有自由退出聯盟之權」；一九七七年憲法措辭雖然開始謹慎，但退出權還是有的：「每一加盟共和國都保留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查美國《合眾國憲法》，就沒有各州可以自由退出聯邦之條款。

可實際上呢？實際上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所享有的自主權不僅比中央集權的法國各省少，甚至比前沙皇俄國時期的各省還要少。前沙皇政府雖然橫征暴斂，但沒有把所有的企業收歸國有，而在前蘇聯，幾乎所有的企業都是國有企業，而且大部分都是聯盟中央企業。比如一九五八年蘇聯工業總產值中，聯盟所屬企業產值占百分之六十九，聯盟和共和國所屬企業占百分之二十八，各共和國所屬企業僅占百分之三。到一九八六年，工業總產值中各共和

十，人口只有那時的百分之四十四，經濟實力大約也只留下百分之四十左右。英雄瓦爾特保衛的薩拉熱窩，成了別人的首都。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精神。

而更讓塞爾維亞人不能容忍的是，居然有人要把科索伏切割出去，那是他們心臟的一部分。一三八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塞爾維亞人聯合其他斯拉夫人與入侵的土耳其人在科索伏平原進行決戰，結果大敗土耳其。塞爾維亞人把科索伏戰役視為保家衛國的聖戰，六月二十八日遂定為「聖·維多斯節」，改變國家體制，成立「南斯拉夫王國」的憲法也是在這個紀念日通過的，被稱為《維多夫坦憲法》。在塞爾維亞歷史上有上百首詩歌歌頌科索伏戰役中塞爾維亞人的英雄行為^②。對塞爾維亞人來說，對科索伏的爭奪，也就是對本民族光榮與夢想的爭奪。但南斯拉夫的解體卻怪不了別人，是又一個假聯邦真集權和大塞爾維亞主義帶來的災難。

還有一個假聯邦的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也抵擋不住民主「德先生」的剪刀，將其剪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主權國家。

當民主訪問印尼時，同樣帶來喧嘩與騷動：華裔被迫害，東帝汶在騷亂，亞齊在動蕩。

② 參閱嚴家祺文章：〈大塞爾維亞主義的抬頭〉和〈南斯拉夫主義的沒落〉，載《明報》1990年四月二十一日。

出埃及記。於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中的十四個加盟共和國，按照憲法賦予它們的權利退出蘇聯，只留下俄羅斯一個孤家寡人，龐大的前蘇聯帝國變成了十五個獨立國家。其中，三個波羅的海沿岸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大概是永遠不會回頭了。剩下的三個斯拉夫國家俄羅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有可能將來會走向聯邦。高加索一帶的四個國家亞美尼亞、摩爾多瓦、喬治亞和阿塞拜疆，還有突厥民族的五個國家塔吉克、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其走向有待觀察。至少，它們分別與伊朗和土耳其有不可分割的歷史、民族和宗教聯繫。

俄羅斯這次損失慘重。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土，可能比例更大的資源，比如著名的巴庫油田，分裂出去了。忽報人間又裂土，歷代雄主沙皇的在天之靈大概會「淚水頓作傾盆雨」了。他們的悲慟是可以理解的，烏克蘭和中亞的大部分領土被併入俄羅斯版圖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他們為此流過多少血，灑過多少淚，搞過多少陰謀詭計，幹過多少傷天害理的事，費了多少移山心力，只有他們自己知道。而普希金的本國讀者，要想感受一下曾經感動過偉大詩人的黑海濤聲，就要出國旅行了。

難兄俄羅斯與它的難弟南斯拉夫比起來，還算是幸運的。在民主化浪潮的衝擊下，南斯拉夫的船破得更厲害，損失更慘重。南斯拉夫如今只剩下一個名不符實的國名了。在馬其頓、克羅埃西亞、斯洛伐尼亞、波黑獨立出去之後，其國土面積只有狄托時期的百分之四

難受呢？自由和性交一樣，沒有嚐過它的滋味，可能不知道它的美妙，嚮往之心還可以克制。一旦嘗到它的美味，要他放棄，就不那麼容易了。要麼怎麼說「不自由毋寧死」呢！

以臺灣獨立為政綱的臺灣民進黨在大選中獲勝後，臺海局勢驟然緊張。形勢將如何發展，就成了對兩岸中國人智慧、勇氣和善意的考驗了。

二、木桶散架與「改革彈性」

托克維爾說：「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我們也可以說，現實告訴我們，對於一個獨裁政權統治的國家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民主化的時刻，政權越專制，國家越大，民族越多，就越危險。

的確，蘇聯東歐民主波並沒有衝垮所有被波及的國家。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國都沒有發生分裂，東德和西德還進行了合併，從民主化中獲益最多的是德意志民族。在民主化浪潮的衝刷下，有的大分裂，比如前蘇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有的基本維持現狀，如波、匈、保、羅、阿；有的還完成了民族統一，比如德國。

爲何有此差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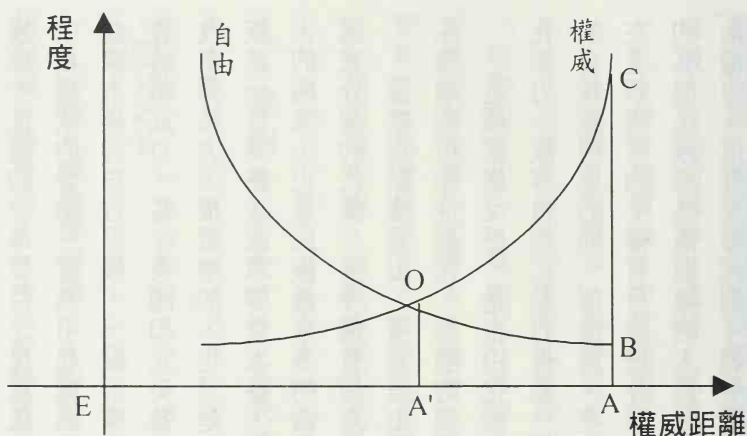
一九九九年七月，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柏克萊大學召開「中國政黨政治研討

儘管印尼軍方玩弄各種詭計，化裝成平民對分裂派施以暴行，也沒有能阻止東帝汶獨立加入國際主權國家俱樂部。亞齊的衝突將帶來什麼後果，要看事態發展。

民主化並非只在同一個國家中的不同民族之間造成分裂或衝突，即使是同一個民族如中華民族，當臺灣進入真正的民主程序後，臺灣人對大陸人的民族認同感馬上下降。以前的認同感，來自當權的國民黨中的大陸人，他們還有大中國的「皇民思想」。他們在臺灣是少數派，但，是當權者。當他們能決定臺灣命運時，他們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先是一個中華民國的立場，看看太不可能了，才改爲「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臺灣民主化後，決定臺灣命運的是臺灣選民。臺灣人大多是清朝以前大陸移民的後裔，對大陸連模糊的概念都沒有。就切身感受來說，他們對大陸的認同還不如對日本的認同。不錯，日本是侵略者，但最初的痛楚之後，是先進的日本管理所帶來的好感。大陸人怎麼樣呢？由於大陸愚蠢地採取了孤立臺灣、逼其無路可走，強使他們被迫接受統一方案的策略，使幾代臺灣人心理上受了傷害，對大陸恨還來不及呢，何來認同？大陸的「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大皇民族主義」，逼得臺灣興起了「移民後裔民族主義」。

臺灣人與大陸人的民族認同感下降，還有一個政治價值上的原因。好不容易爭得的自由，誰會親手葬送？大陸的獨裁政權面目可憎，和他結婚？除非殺了她。有人問達賴喇嘛，沒有性生活是不是很難受？達賴喇嘛說，不性交不知道性的滋味，不知道它的滋味，怎麼會



圖八之一 崩潰趨勢假說

圖八之一表明，當權威從○點減低到○點時，自由就有可能從B點上升到○點，權威落差就從 $AC/AB > 1$ ，減小到 $AO'/A'O = 1$ 。當然，權威距離也就有從EA縮短到EA'的趨勢。這種趨勢變成現實，處於民主化中的國家就會分裂。

趨勢並非就是現實，如果權威從○點降低到○點，自由從B點上升到○點，而權威距離並沒有縮小，沒有從A點移向A'點，這時，整個自由—權威曲線就會向右平移，從A'移向A點。同樣，如果一個國家權威落差擴大了，而並沒有擴張，那整個自由—權威曲線一定是向左發生了平移。

曲線發生平移，表明這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國家幅員或民族狀況具有彈性，有調節空間。我們把這種彈性，稱之為「改革彈性」。小國改革彈性比大國大，民主體制的改革彈性比非民主體制大，民

會」，晚餐時，兩個波蘭專家恰好和我同桌。我向他們請教，波蘭人占全國人口的比例是少。他們說，約占百分之九十三。我想在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諸國裡，民族的同一性也會是很高的。按照我在第三章提出的木桶理論，當一只木桶的箍力下降時，大木桶比小木桶散架的可能性大，桶板在木質、板寬和板厚上統一性低的比統一性高的容易散架，因為大木桶和桶板統一性低的木桶離心力比較大。波蘭國家比前蘇聯小，民族統一性比前蘇聯高，這就是為什麼前者完好，後者分裂的原因。至於德國，不僅民族統一性高，向心力大；而且木桶不太大，也就是說權威距離有限；在民主化過程中又有西德接管東德，西德的民主權威及時替代了東德崩潰了的極權威，沒有發生權威真空，就像賽車換輪子一樣，只要稍停一下就可以繼續奔馳。如果權威距離過大，像當年英國和北美殖民地那樣，中間隔著大西洋，即使民族統一性甚高，只要一開始自由化和民主化，北美還是會從母體上分裂出去。

這就是我的「崩潰趨勢假說」：當一個國家的權威落差下降的時候，其權威距離有縮小的趨勢。一個極權國家或獨裁國家開始民主化，它的權威落差自然下降，它對邊遠地區的權威供應也會減少，過去被強力捆在一起的民族會趁機獨立，權威距離和國家版圖有可能縮小。用「自由—權威曲線」表示如圖八之一：

壓迫民族，或被壓迫地區的人民，這就是逼著他們用「腳」選擇了。一旦突然減壓，會帶來爆破，有如前蘇聯。這時，你請他們與你分享主權，他們也不會幹。他們要獨立享受一下自己的主權來補償過去所受的屈辱。

在蘇聯瓦解前夕，蘇聯總統戈巴契夫在國家主權問題上一再讓步，先是提出「地方自治」；接著又提出「主權國家聯盟」；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雪崩爆發前，又公布了「新聯盟條約」，條約充分確認各共和國在自己領土上擁有全部國家權力的主權性質，這已經是邦聯性質的國體了，但是，沒有哪個共和國願意簽署。崩潰趨勢已經形成，人家已經不想和你一起過日子了，分家已不可避免。

用俚語來說，這就叫屎到了肛門邊，才去找廁所，結果自然是狼狽不堪。

三、案例分析之一：大英帝國的慢性解體

1. 因父之名

一個北愛爾蘭浪蕩子，不務正業，成了街頭混混，從貝爾法斯特一直混到倫敦城裡，泡妞行竊，快樂無比。不料樂極生悲，由於無法提供不在現場的證明，他被牽扯進一起發生在

族統一性高的改革彈性比民族統一性低的大。改革彈性小表現在自由——權威曲線上，就是自由和權威的變動，容易引起權威距離變動。改革彈性大則是說，自由與權威的變動，會引起曲線本身的左右平移，一般不導致權威距離變動；即使發生變動，也是和平的和自願的，不會訴諸武力。當年英國和北美殖民地之間改革彈性小，所以有獨立戰爭；十三個殖民地之間改革彈性大，權威增加，也只是有一個略有改變嫌疑的制憲會議。今天，波蘭國家小些，民族統一性高些，改革彈性大些，所以比較平穩地過渡到了民主政治；而俄國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也是民族最衆多的國家（前蘇聯有一百多個民族），改革彈性很小，因此付出了國家分裂的代價，至今還有個車臣問題，讓俄國政府撓頭。

這就有點像雪山，積雪與山體的統一性很低，山越大越高，當山的高度突然降低時，發生雪崩的可能性越大，雪崩的規模和氣勢也越驚人。

這種雪崩反應，是自由化動力作用的結果。我們已經討論過個人自由化動力和族群自由化動力。族群自由化動力推動一個國家中按區域居住的民族，甚至在不同區域居住但有獨特的自我認同感的同一個民族，在主權問題上不是作出「手」的選擇就是作出「腳」的選擇。在這個國家的主權有可能被分享時，他們傾向於採取「手」的選擇，也就是和組成這個國家的其他民族或其他區域的人民一起，各轉讓一部分主權給中央政府，自己保持著相當大的自治權力，這就是聯邦制。如果這個國家的主權是封閉的，拿假聯邦制像唬弄小孩似的唬弄被

這就是著名的好萊塢名片《因父之名》的簡單情節，我花這麼大篇幅敘述它，不僅因為這個故事動人，還因為它是一個象徵：英帝國大廈的裂縫已經無可阻擋地從海外深入英國本土，對它的修補已經和罪孽聯繫在一起，喪失了道義上的合法性。

愛爾蘭是英帝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殖民地，是殖民帝國大廈的第一塊基石。英國人在公元十二世紀就開始了對它的侵占，但到十六世紀，愛爾蘭的大部分還沒有歸順英格蘭。一五四一年，英王亨利八世給自己加上了愛爾蘭國王稱號，並大規模沒收愛爾蘭貴族和教會土地，再恩賜給英格蘭移民，條件是在愛爾蘭定居。

這項措施從都鐸王朝一直延續到司徒加特王朝，終於把愛爾蘭完全併入英國。結果，使大批喪失土地的愛爾蘭人，有的當小佃農，有的沒有了生活來源。貧窮的愛爾蘭孩子失學嚴重，成為當時愛爾蘭的嚴重社會問題。在愛爾蘭任職的英國偉大作家斯威夫特出於愛國熱情，為英國當局獻計獻策，寫了篇著名的《育嬰芻議》，建議開闢一項新產業：把愛爾蘭婦女變成「土地」，專門生產一種美味食品——嬰兒，長到一歲多就上市銷售，肉質鮮嫩，又可以免除任何教育費用。他還推薦了若干嬰兒烹調法，或煮或炸或烹或沙拉，風味各異，各擅勝場。遺憾的是英國當局缺乏虛心納諫的胸懷，致使斯兄的建議沒有給社會帶來效益，只給他本人帶來文名。

了解了愛爾蘭人的歷史創痛，就不難理解愛爾蘭共和軍的凶殘。在人類事務中存在著某

倫敦的爆炸案裡，這起爆炸案是愛爾蘭共和軍策劃並實施的。他和他在倫敦的親戚都被關進英國監獄，他的父親前來探視，也被判有罪，說是爲他兒子提供後勤支援。

儘管英國警方後來抓到的一個愛爾蘭共和軍骨幹分子承認這起案子是他幹的，但他的供詞進了秘密檔案，不讓任何人查閱，以便維持對那父子倆的誤判。警方這樣做的緣由無法查明，也許，世界上所有人都有潛在的壞孩子心理，幹錯了事拒絕認錯，只要有可能；也許，英國人對愛爾蘭共和軍的行爲深惡痛絕，因而遷怒於所有的北愛爾蘭人，並且認爲，你今天沒幹，保不準明天會幹，還是關著你保險。不管原因爲何，父子倆做穩了囚徒，而且成了一個牢房的囚友。

這父子倆感情極好，父親對兒子有難以掩飾的慈愛。爲了洗清罪名，堅毅的父親開始無休止地申訴，兒子卻不肯協助，他的頹廢情緒，使他對警方絕望。十幾年後，父親不堪監獄和疾病的雙重煎熬，亡於獄中。這對兒子打擊極大，對父親的愛和愧疚，促使他要爲父親脫罪。他開始請求律師支援。那位女律師查到了秘密檔案，終於在法庭上讓警方敗訴，與此案有關的在獄人員全部被釋放，唯獨父親的在天之靈得不到安慰：法庭維持對他的有罪判決。從英國當局的角度看，可以理解，宣布他無罪，當局就有罪，因爲它奪去了一個無罪之人的生命。至於奪去了那麼多無辜者的青春，不知有否給予補償。

兒子於是以父親的名義發起浩大的申訴運動，許多人上街支持他。

用，二是英格蘭民族特有的務實、節制、妥協和中庸的性格。不列顛民族是世界上最善於在自由與權威之間保持平衡的民族，最近澳大利亞全民投票對政體的選擇結果也足以說明這一點：在立憲君主制和民主共和制之間，公民選擇了前者。其實，澳大利亞已經是立憲民主政體，維持英王的君主地位，只是一個權威的象徵，分享整個英聯邦的共同體權威價值，讓自己的自由和更大的權威保持平衡。第十章我們要專門討論「共同體權威價值」問題。

從英帝國的統治方式，可以推論，它很好地總結了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統治經驗和教訓。羅馬共和國在征服了廣大區域之後，從共和走向專制；英國君主國在征服了廣闊的外殖民地之後，反而從專制走向共和。羅馬共和國想維持一個中央共和地方集權的「半截子帝國」，沒有維持住；英帝國卻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半截子帝國」體制：中央君主立憲，地方總督集權或立憲，英格蘭本土集權。這是一種有趣的「民主—集中制」。毛澤東一直聲稱要在中國搞民主集中制，但他沒搞成，因為他不捨得在中央真的搞民主。

羅馬沒搞成半截子帝國，英國搞成了，依我之見，差別主要在公民權安排上。羅馬共和國把自己的公民權授予義大利、高盧和西班牙等被征服地區，這一方面稀釋了原羅馬公民權的政治價值，縮小了它所代表的權威比例，因為分母擴大了；另一方面，由於沒有發明代議制民主，遙遠區域的公民也無法行使其公民權，使公民權進一步成爲某種榮譽，而不是按程序選擇國家首腦、參與國家決策的權力。公民權在什麼地方消亡，專制帝國就在什麼地方興

種循環與平衡機制：寬容帶來寬容，暴力引起暴力，壓迫導致反抗，掠奪連著清算。中國人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善惡都報。」就是這個意思。時辰到了，愛爾蘭共和軍來了。

應當感謝民主和人權，北愛爾蘭人的這次反抗，沒有帶來一六〇三年英國當局對愛爾蘭北方起義的那種嚴厲鎮壓。暴力的循環中斷了，因為英國的權威落差下降：專制君權已成為往事，現在實行的是議會民主。雖然還有司法上的問題，比如《因父之名》裡的故事，但國家暴力已經軟化。經過漫長的較量，和平艱難來臨。進入二〇〇〇年，英國工黨政府終於同意在國內民主化上再向前走一步，讓北愛爾蘭設立自己的議會，實行自治。而愛爾蘭共和軍也宣布要放下武器，結束漫長的恐怖主義反抗。

這是整個英帝國日落過程的一個寫照：權威落差逐步下降，權威距離逐步縮短；民主化多走一步，英帝國大廈多裂一條縫。

2. 公民權隔離和螃蟹策略

應當承認，在所有帝國的日落中，英帝國的日落過程是最長也是最壯觀的。司馬遷評論秦帝國時說：「其興也突，其亡也忽。」這種暴興暴亡的公式似乎不太適合英帝國。英帝國的興起很快，但衰落很慢。這主要歸功於兩個方面：一種是新型型的統治形式——民主的運

由和民主的空間；如果實行統一的民主化改革，帝國權威距離太遠，馬上會分崩離析。

實行公民權隔離，分而治之，就是本土先搞「民主特區」，通過立憲，限制國王的權力，使各殖民地擁有相對獨立的主權，為以後的主權開放留下餘地。這就等於把權威落差分級化了，從英王到香港的市民，權威落差可能是相當大的，但香港的自由緩衝了這種壓力，使市民不感到難以承受。就像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待在瀑布之下的石頭都會被沖裂；如果讓瀑布每落十米就修一個臺階，這樣就把壓力平均分解了，即使你待在最低一層，三千尺之下，和待在上面承受的壓力是一樣的。

但這項制度安排也潛伏著一個危機：既然殖民地公民權和英國本土的公民權是隔離的，殖民地對英國本土的認同感就會下降。自由化動力成熟早而且大的地區，就可能分離和獨立傾向，原居民越多的地方，獨立傾向越強。北美獨立前的口號是「不代議，不納稅」，就可說明這個問題。最早是北美獨立，第二世界大戰後獨立的更多。這時，英國當局就實行螃蟹政策，為了保全自己的本土利益，哪條腿被捉住了，就主動放棄哪條腿。遺憾的是，英帝國的「腿」沒有螃蟹腿的再生能力，斷掉一條少一條。還有一些沒有斷掉的腿，比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由於民主化和自決權，英國對它們的權威，也只有象徵意義。

英帝國就這樣緩慢解體了。

起，這就是羅馬的命運。

英國不同。英國多鐸王朝時期的資產階級和國王合作爭取了宗教自由，通過殖民化擴大了海外自由空間後，英王的權威落差陡然增大。在海外殖民地享受自由空間的移民可能沒有感到壓迫，在英格蘭本土的市民由於自由距離短而難以忍受國王不受限制的權威。一六四九年革命過激了一點，廢黜了國王，宣布英國為共和國。但為了英帝國不至於崩潰，克倫威爾走上了軍事獨裁道路，這種權威還不如王權。一六六〇年，王朝不僅復辟，而且復仇，導致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一六八九年通過《權利法案》，一七〇一年頒布《王位繼承法》，完成了君主立憲改造，英國走上了議會民主。英國公民通過選舉產生議會，議會選舉產生內閣。

但英國的公民權從來沒有像羅馬共和國那樣，授給過英國本土以外的殖民地人民。各殖民地的英國後裔和原居民是否享有本地公民權，要看當地居民的自由化動力。動力大了，才逐步讓他們享有當地公民權。這種公民權安排，我稱之為「公民權隔離」，它比種族隔離要好些，比同質公民權要壞些。

但公民權隔離是英國的一項明智選擇，其目的是要在權威化動力和自由化動力之間保持平衡。這項安排的實質是「分而治之」。不列顛殖民帝國那麼大，權威距離那麼遠，對權威落差的要求特別巨大。如果實行統一的權威化治理和單一制的政治制度，就不會留下任何自

有關蘇格蘭的內部事務全部由蘇格蘭議會自治。

這樣，英國就完成了本土聯邦化改造。這項改造，除奠定了長治久安的基礎外，還完成了一項政治制度創造：英聯邦是這樣一種政治聯合體，在它的本土是聯邦制，在海外是邦聯制。聯邦其內，邦聯其外，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國家呢？其實，國家的概念在這裡淡化了，這是一種不同於盧梭時代設想的那種單一政治共同體國家，這是複合政治共同體。英王是英聯邦復合共同體的首腦，但不列顛王國又是歐洲聯盟的成員。英聯邦和歐洲聯盟有重疊的部分，也有不重疊的部分，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就是不重疊的部分。此外，不列顛王國還是北約成員。共同體複合程度越來越高，是政治現代化的最新發展。

陳舊的主權概念已經被取代了。

四、案例分析之二：大清帝國突然崩潰之後

1. 中國的鏡子碎了

最近上網，看到不少精彩帖子，其中筆名蘆笛的先生的十二篇系列文章（丑陋的大陸人），尤為出色。這些文章從「黨文化」一直反思到傳統文化，讀之暢快無比，像大汗淋漓

3. 本土聯邦化

爲了適應龐大帝國對權威落差的要求，英國在本土雖然實行了議會民主，但在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上搞的卻是有限中央集權。北愛爾蘭、蘇格蘭和威爾斯的治理，一直由英國相關的大臣或中央政府委派的總督負責。雖然這些地方擁有相當的司法自主權，但沒有任何立法權，因爲這些地方都沒有自己的議會。這種體制，可以稱之爲立法權中央集權制。我國著名政治學家嚴家祺先生稱之爲「身合國」，他以蘇格蘭和英格蘭的關係爲例，說這兩個國家合併後，是一個國王兩種制度，「一君兩制」^③。當然，這個兩制，只是司法上的。

海外殖民地丟失得差不多之後，本土的中央集權的必要性下降了。而頑固的保守黨「心中還有夢」，自然是舊日的帝國夢，一直拒絕向北愛爾蘭和蘇格蘭開放立法權，也就是不許搞議會自治。結果就是北愛爾蘭人民的不斷反抗。開明的布萊爾工黨政府順應了時代潮流，不僅把立法權還給了北愛爾蘭，還未雨綢繆，於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一日讓蘇格蘭公民是否贊成設立自治議會投票表決，結果，百分之七十四的選民投了贊成票，除外交、國防之外，

^③ 嚴家祺，〈身合國〉和〈身分國〉，香港《九十年代》雜誌，一九九七年十月號。

權威不夠，不足以阻擋分裂趨勢；也許，他近距離觀賞過當一個皇帝的榮耀，想親自品嘗一下滋味，反正他經受不住勸誘，終於稱帝。稱帝本來並非大逆不道，人家拿破崙也稱了帝，法國人民還是非常愛戴他。至今，澳大利亞人民還選擇了君主立憲制。但在當時的中國，他是犯了大忌：第一，中國人反帝制的極端情緒被煽動起來了；第二，各地軍閥開始做起了土皇帝夢；第三，還有個孫中山等著榮登大寶呢，當然他以革命的名義。

從中國後來的歷史看，當時如果接受袁世凱稱帝，進行君主立憲，可能是較好的選擇，也許，中國的版圖不會被修改，達賴喇嘛也不在印度，也可能沒有中國共產黨把中國導入又一個清朝末年。從國外來看，當時最不願意袁世凱稱帝的是日本。中國不分裂，它怎麼「進入」呢？中國不起火，它怎麼打劫呢？中國的水不混，它怎麼摸魚呢？當然還有俄國。

清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一下被你袁世凱關進了後花園，豈能容你？於是各種野心家、革命家、軍閥和民衆紛紛討伐，有的用槍，有的用筆，有的用吐沫。並且，各省紛紛通電獨立，軍閥割據，袁世凱是被急死了，但是，中國的鏡子也碎了。

2. 「聯省自治」

於是有些人想讓中國破鏡重圓。

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曾經出現過類似當年美國聯邦化的局面，若干省搞了「省憲

之時，狂喝了一瓶冰鎮啤酒。雖有些激憤之詞的泡沫，但在深層流動的是清醒的理性。

與我本節有關的是他寫的〈臉譜文化〉，在他看來，四書五經裡只有兩種人：君子和小人；二十四史裡也沒有第三個人，除了忠臣和奸佞。這是兒童式的思維，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壞人，小白兔或者大灰狼。黨文化繼承了這個傳統，搞出了階級鬥爭。在這種文化支配下，政治上的妥協是不可能的，不走極端是辦不到的，因為沒有中間路線。在這種文化的參與下，我們在歷史上喪失了許多機遇，一步步走到今天這個險境。

能看懂辛亥革命後中國之危局的，恐怕是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但在中國革命「臉譜博物館」裡，前者是白臉，後者是紅臉；前者十惡不赦，後者無量功德。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其實，只有像袁世凱那樣行伍出身並當過柱國大臣的人，才能感受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大國，傳統皇權權威突然崩潰所帶來的震撼，才能在夜深人靜之時聽見帝國大廈棟梁斷裂的咔嚓聲。

一桶江山的大清帝國，桶箍被辛亥革命的利劍斬斷了，二十多塊「桶板」裂開來，被分別抱進了各地軍閥的懷裡。如果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權威，鎮住各省軍閥，中國的前途只能是分裂和戰亂，然後群雄並起，逐鹿中原，打出一個最強者，用武力統一，再進入新一輪一桶江山時期。

袁世凱是想避免這種情況的。也許，他覺得做立憲總統，對當時分崩離析的中國來說，

聯邦的人，而中國的「非常大總統」孫中山則堅決反對陳炯明積極推行的「聯省自治」和平統一路線，主張北伐，武力統一中國。

中國從戊戌變法開始的怪事是，越是激進的主張越是占上風，越是暴力的路線越是被歡迎。大家都知道，在孫中山和陳炯明的衝突中，以陳炯明的失敗而告終。既然國父已經被臉譜化為偶像，陳炯明只能當「叛徒」了。人們不問一問的是，他背叛的是什麼東西，如果背叛的是新皇帝夢，那他就不應該承擔那樣多的指責④。

3. 破鏡難圓

北伐之後，中國開始了新「三國演義」：國民黨、共產黨和日本侵略軍展開爭霸戰。在國際反法西斯同盟的幫助下，日本先出局，「三國演義」變成國共兩黨的「秦漢之爭」。共產黨最終在大陸獲得勝利，把國民黨趕到臺灣。

中國破鏡重圓了吧？非也。

④ 本小節的資料請參閱嚴家祺先生的文章，〈二十年代「聯省自治」的啓示〉，香港《明報》，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九日，還可以參閱陳炯明先生的公子陳定炎和美國康州大學教授高宗魯合著、在香港出版的《一宗現代史實大翻案——陳炯明與孫中山、蔣介石的恩怨真相》。

自治」，一些「聯省自治」黨人積極推動聯邦化運動。在中國的「聯邦黨人」裡，當時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胡適，最著名的軍事領導人是廣東省粵軍總司令陳炯明。

胡適先生在北京發行的《努力周刊》第十九期上發表文章說，「中國太大了，不適合單一制的政治組織」，「用集權形式的政治組織勉強施行於這最不合於集權政治的中國，是今日中國軍閥割據的一大原因。」因此，他主張中國建立「省自治的聯邦制」。難怪有人認為胡適先生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他從美國還真學到了東西。不像今天到美國留學的某些人，不知何故，只學會了對集權的留戀和辯護，所謂「新左派」是也。到了西天，取不到真經，讓人惋惜。

那時的軍閥也比今天的軍事領導人有出息得多。一九二〇年夏，「湘軍總司令」譚延闓在全國首先宣布湖南「省憲自治」。接著，浙江、四川等省也成立了「省憲起草委員會」，起草了省憲草案。廣東省的「省憲自治」是「粵軍總司令」陳炯明推動的。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廣東省議會正式通過「廣東省憲法草案」。於是，十二個實行「省憲自治」的省份開始組織「聯省政府」。有趣的是，當年美國是十三個州首先聯邦的。

中國之所以沒有美國的結果，關鍵是土壤不一樣。但另一個原因也並非不重要：美國幸運的是有一個偉大的國父華盛頓，中國不幸的是有一個貌似偉大的國父孫中山。華盛頓是真愛人民不愛權，對孫先生我就不敢這樣說了。反正，當年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是積極推進

坦主權國家。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疆的裂痕比西藏的還要難以彌合。西藏有比較溫和的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其宗教勢力主要限於本土，國外的支持主要限於對人權價值的認同。新疆則不同，明裡暗裡支持它獨立的有兩大國外勢力：一是突厥民族，從中亞到土耳其，可以為它提供援助；二是國際伊斯蘭力量，它比佛教密宗可要狂暴得多，從俄羅斯的恐怖性爆炸和車臣之戰就可以看出，它比達賴喇嘛的布道更具有血腥味。

最後，還有兩塊鏡面拼不到一起，那就是大鏡面大陸和小鏡面臺灣。這兩塊鏡子在裂開的半個世紀中，發生了變性。臺灣的那一塊，變得越來越明亮，像朱老夫子說的那塊「半畝方田」，自由的「天光」和民主的「雲影」徘徊其中，還有池塘春草，綠柳黃鸝。大陸的這一塊呢？變成了魔鏡：

……

這是一塊被施了魔法的玻璃

吃進人肉，不吐人皮

被它照見的一切，都失去

和真實的聯繫

那是生活的反面，墓碑的內壁

首先，鏡面缺了一塊。一九一一年，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的慫恿下，在清王朝被革命砍掉腦袋時，就藉機宣布外蒙獨立。一九二一年，外蒙在蘇俄的扶持下，成立人民革命政府；一九二四年，進而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五年，蔣介石與蘇聯達成協議，允諾外蒙獨立，而外蒙也給了蘇俄可觀的回扣：把原屬於中國的一塊七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送了過去。俄國人是從來不做沒有便宜的買賣的。

其次，鏡面裂痕無法彌補。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造成了西藏、新疆地區出現國家主權真空。西藏領袖十三世達賴喇嘛也於一九一一年宣布獨立，還和外蒙簽訂了一個《蒙藏條約》，相約一道從中國分裂出去，永不回頭。不過，西藏的態度不如外蒙堅決，背後是自顧不暇的印度，撐不了腰，西藏自己沒有人資助還過不了日子，十三世達賴喇嘛又急於轉世，所以還勉強留在中國的鏡子上，但裂痕很深。一九五九年，十四世達賴喇嘛出逃印度，裂痕就更加難以彌合了。新疆維吾爾人趁國民黨和共產黨相掐，趁兩黨和日本人搏鬥，無暇內顧之機，和境外的突厥人合作，於一九三三年和一九四三年分別宣布成立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在史達林的壓力下，維吾爾人和中共談判，據說簽訂了《十七條協議》，允諾新疆建立一個類似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形式的國家。不巧，東土耳其斯坦的領導人返回時，飛機失事（據說，是中共造成的），乘客全部遇難，但已經被勾起來的民族獨立夢想沒有遇難。至今還有許多新疆維吾爾人在土耳其建立大本營，要策劃成立東土耳其斯

第九章 護照的價值：國際權威及其衡量

一、大國之短與小國之長

1. 大國專制、停滯、腐敗，小國自由、創新、清明

如果把「權威化假說」和「崩潰趨勢假說」聯繫起來考察，我們很容易發現，一個多民

眼睛戴在臀部，褲子都是

上衣。尿蹩了請上教堂

心痛了，去看牙醫

偶爾也有跑步比賽，拿冠軍的

是跑得最慢的人

五十年後，都倒在起跑線上

所有的骷髏並列第一

……⑤

這樣一塊魔鏡，誰敢和它沾上關係？現在臺海火藥味很濃，這樣下去，破鏡不僅難圓，說不準還會繼續碎裂。

清王朝權威崩潰，打碎了中國的鏡子，一百年沒有完璧。中國還經得起另一次破碎嗎？

⑤ 引自吳稼祥：長詩《魔鏡》，載未出版的獄中詩集：《光明與黑暗的豎琴》。

容易被一個人獨攬。不過，在出現這種情況時，老百姓也不難聯合起來，通力合作，把暴君和暴政同時推翻。因此，小國歷來是政治自由的搖籃。大部分小國有時隨著自身強大起來而丟失這種自由。這個事實清楚地說明，政治自由來因於國家的弱小，而非來因於國家本身。

世界歷史沒有提供過一個大國長期實行共和制度的例證。這個事實說明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熱愛共和制度的一切激情，隨著領土的擴大而增強；而支持這種激情的德行，則不會同步增長。

個人的野心隨著國家力量的增強而增大，政黨的力量隨著其所定目的的重要性的增大而增強；但能抵制這種破壞性激情或力量的愛國心，在大共和國就不如小共和國強烈。也同樣不難證明：在大共和國，愛國心不容易發揚，而且其作用亦小。貧富的懸殊，城市的巨大化，風氣的敗壞，個人的自私自利，利害的衝突，幾乎都是因國家的巨大化而產生的惡果。其中，大多數對君主國的生存全無害處，而少數的幾個甚至能延長其壽命。另外，在君主國家，政府有一種特有的力量：政府可以利用人民，但不依賴人民；人口越多，君主的力量就越強。……再也沒有比大帝國更反對人民的幸

族的中央集權大國^①的命運是不幸的。這種不幸是，它很難有制度創新空間，總是陷入「專制統一——分裂——再專制統一」的循環。用中國婦孺皆知的《三國演義》裡的名言說，「話說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則戰亂，合則虐政。

而按照「自由化假說」，一個小國容易解凍，即使有專制統治，也容易結束。小國的暴政，像熱帶地區的暴雨，長不了的。比如柬埔寨，波爾布特的恐怖政治確實比毛澤東的還要過分些，現在怎麼樣？魔王死有餘辜，而在中國這樣的大國，毛澤東還是個神。有些思想家在批判他，但不敢大聲。柬埔寨已經在國際監督下舉行大選，而中國呢，美國對中國的一個人權譴責案，像英國和加拿大那樣了不起的國家都不敢簽名。害怕中國的「訂單外交」，你簽名，我不給你訂單。儘管柬埔寨內部和中國一樣，自由化動力不足，缺乏陽光，但國際的春水很容易就把小國柬埔寨的暴政污泥滌盡。

關於大國與小國在政治上的長短，托克維爾有一段法國式的精彩描述，不可不讀：

自由畢竟是小國固有的長處。小國政府對公民中的野心家提供的誘餌太少（比如沒有老要做大國領袖的誘惑——引者注），而公民個人的才智又極其有限，所以國家大權

① 除特別中明的外，本章的「大國」是指聯邦化民主化前的專制大國。

遷徙；民主是用手清掃腐敗，誰腐敗誰滾蛋。要尋找一個沒有腐敗的專制大國政府，就像在窰子裡尋找貞女一樣難。雖則如此，腐敗的程度還是有差別。中國傳統君主制時期，對官僚的約束比較嚴；有科舉制度選擇人才，有迴避制度對付裙帶關係，有回京述職制度讓官員檢點自己行爲，有欽差大臣巡查制度糾察地方劣政，有擊鼓喊冤制度讓百姓申訴，有告老還鄉制度防止成立黨派「保險公司」。毛澤東反封建，反掉了這六大官制；反資本主義，反掉了自由民主。但他創造了群眾運動，幾年清洗一次官場，效果也還可以。這使他至今還被中國老百姓懷念。今天的中國，既沒有嚴格的官制，又不要民主自由，還拒絕對官場清洗，腐敗自然有烈火燎原之勢。

小國在政治轉型時期，腐敗也難免。錢權交易，黑金泛濫，就是臺灣的一個頑症。但只要自由充分，這些東西必然會像陽光下的積雪，不愁它化不掉。民進黨政府已經拿起手術刀，要挖這塊膿瘡。

2. 大國多起義，小國多起訴

以起訴中國共產黨聞名海內外的郭羅基先生，前不久在香港出了一本書：《共產黨違法案紀實》。起訴共產黨，這是一個壯舉。他爲這一壯舉付出的代價是晚年被流放海外。郭先生是哲學家，他的行爲有哲學動機。什麼動機？在中國用「起訴」來代替「起義」。他說：

福和自由的了②。

如果了解托克維爾所說的大國，其實是他的祖國法國的話，那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大帝國，就更是只利用人民不依賴人民，更是反對人民的幸福和自由了。不過，托氏的論述，才情多於分析。大國之所以是自由的敵人，主要是「權威化假說」決定它的治理必然是權威大於自由，自由與權威不能趨向均衡。尤其像一桶江山的極權中國，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達到極限狀態，個人自由被降低到生存權地步，和動物的權利比較接近。

國家越大，制度創新越難。新制度還沒來得及試驗，就可能因為連鎖反應，導致舊制度崩潰。在中國，從古以來有一條定律：改革派都沒有好下場，原因就在這裡。在一個超大型國家，新制度的好處還沒有顯現，對統治的壞處就足以讓它被扼殺於搖籃。新制度，特別是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制度，一般都要經過小國的搖籃把它搖大，才能在大國推廣。從美國新自由經濟學派的觀點也能解釋得通：大國的制度創新費用比小國高昂。缺乏創新機制，停滯就是專制大國的常態，而小國則生機勃勃。

歷史已經證明，自由和民主是治理政治腐敗的特效藥。自由是用腳拒絕腐敗，你腐敗我

②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紅旗出版社電子版「家庭藏書集錦」之八，哲學盤，北京，中文版），頁二〇四—二〇五。

因為郭先生的文章寫得精彩，忍不住多引了一些。其實，郭先生的觀點並不寂寞，這種「反革命」主張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在持不同政見的中國高級知識精英層裡相當流行。著名文學家劉再復和哲學家李澤厚出過一本談話錄，書名乾脆就叫《告別革命》。無論是反對起義，還是告別革命，其觀點都有其深刻性，出發點是好的，維護的是人道和人權，寬容和理性，呼籲的是保守精神；反對的是中國近代以來總是占上風的極端主義思潮，這些思潮一次次把中國引入災難。

但是，社會進步的槓桿到底在哪裡？起訴嗎？這裡有三個基本問題需要澄清。第一，起訴能否解決一個國家的民主化問題；第二，起義都是暴力的嗎？第三，就算是暴力起義，總是導致暴政嗎？恕我孤陋，我還真沒有看見哪個國家的民主是從訴訟程序中獲得的。即使是最溫和的英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靠的仍然是起義，只是沒有流血罷了。更不用說法國大革命，蘇聯東歐的巨變了。印度尼西亞的民主化也是人民起義的結果。國家越大，起訴等個別人行爲，越不起作用。大國裡的小動作，就象滄海裡的一滴水，起不了波瀾。

如果所有人，或多數人都做同樣的小動作，比如起訴，那就已經不是起訴，而是起義了。這裡有一個集體行動的困境。沒有足夠的信息傳播，任何集體行動都是不可能的，而沒有集體行動，任何專制統治者都會各個擊破，讓你的脖子還沒有伸長之前就把你割斷，你如何報曉？國家越大，集體行動越困難。越沒有集體的和平運動，統治者就越肆無忌憚。其結

中國的問題是革命太多了。一批人看著臺上的人不好，就把他們推翻了，然後自己坐上去。人是經濟動物，每個行為都有經濟目的。費了那麼大勁，死了那麼多自己人才登上了當權的寶座，當然還得是和自己和自己的利益當先。否則，何不在臺下忍受利益損失？於是上得臺的人還是不幹好事。臺下的人就又把他們推翻。新上臺的也是人，也是經濟動物，自然是優先照顧自己人的利益……這種惡性循環了無盡期，直到如今。

什麼時候中國人，包括上了臺的人，若是不幹好事，可以通過「起訴」，而不是「起義」來解決問題？起義即使成功，也不過是起義的發動者或領導集團獲得強權，以便進行自己的強權統治。起訴若成功，所獲得的則是公民普遍的保護自己的利益的權利。少數人靠「起義」獲得強權，搞各種新舊版本的「權威主義」，不外還是欺負老百姓。這與每個老百姓不再忍受各種權威主義的欺壓，自我保護個人權益的起訴，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他的結論是：「廢棄以暴易暴，開創以法易法。」^③

③ 轉引自馬悲鳴，〈有趣的「起訴」與無聊的「起義」〉，載美國中文網站多維新聞網，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多維觀點」，網址是 www.duoweinews.com。

大陸爲了統一，不承諾對臺灣不使用武力；中國爲了民主，也不能承諾不革命或不起義。當然，通過政變、談判和妥協如果能完成民主化，那是最好不過了。像臺灣，一個偉大人物的魄力破除了黨禁和報禁，打開了民主化的閘門。

3. 大國出庸君，小國有明主

當老態龍鐘的大陸第三代領導人在西方領導人和攝影機面前梳頭，在土耳其搶勳章戴，在大陸封殺一個唱了一支中華民國國歌的歌女時，臺灣的新領導人在對氣勢洶洶的大陸黷武主義者說：「你硬來，我軟去。」這形成一個有趣的對比，大國出小丑，小島倒出了政治家。同樣有趣的是，當年中國大陸的華國鋒在傻乎乎地堅持「兩個凡是」的時候，彈丸小國的李光耀總理正在「龍化」新加坡。大國不是沒有人才，在專制條件下，似乎只有革命和政變才能出人才。毛澤東是革命的產物，鄧小平是革命和政變的雙料產品。就專制大國的常態來說，其領導人像近親繁殖的貓，不斷退化。

我們在第二章研究過，這種國家領導人一蟹不如一蟹現象，是當代僭主政體的必然後果。第一把手必須與第二把手保持個人權威落差，才能睡著覺。僭主健旺時挑選第二把手，標準是威望遠遠低於自己，有點才能還行。所以，衰老前的僭主可能還有能幹的副手。僭主老邁時挑選接班人，標準就降到這個人永遠不能有超過自己的才能了，如果有，他的「教

果，就會把國家引向一場更大的革命和暴亂。大國多起義，這是大國的短處，不是中國人民反抗精神過剩的結果。實際上，中國人至今還在忍受暴政，是中國人反抗精神不足的證據，而不是相反。

在大國，在宣布告別革命的同時，最好同時呼籲統治者告別頑固。否則，只要你宣布告別革命，他們就會讓你永遠遇不上自由和民主。

起義是以暴易暴的觀點也不全面。郭先生提到的一九八九年中國天安門事件，如果也是起義，就不是暴力，而是和平請願，使用暴力的是官方。不譴責鎮壓者，反過來批評甚至攻擊請願者，似乎成了海外反思「六四」事件的一股強勁的思潮，讓人費解。世界上最著名也最成功的和平起義，是印度領袖聖雄甘地領導的，也沒有聽說印度的知識分子在譴責他，甚至被起義的英國人對他也是極尊重的。

說起義總是導致暴政，也不是事實。周王朝滅殷紂，就是仁政代替暴政。美國獨立戰爭也沒有搞出一個暴君。與郭先生的主張相反，幾乎所有大國的民主化都開始於起義或政變。被亨廷頓先生作為第三波民主始作俑者的葡萄牙，也是一伙軍人率先政變啓動其民主進程的。作為哲學家，郭先生應當區分改朝換代的戰爭和制度變革的起義。不錯，法國大革命造就了拿破崙，但如果法國人民從此告別革命，都去起訴，拿破崙三世能垮臺嗎？我想，中國不是起義太多，而是太少。

民族統一性高的，分裂了還可以再統一，比如中國，經過戰國、秦漢、魏蜀吳、南北朝、五代十國，最後還是統一成一個國家。如果民族統一性低，分裂了，就很難再還原成原來的帝國。看看世界歷史，能完好保存下來的世界大帝國，幾乎沒有，從波斯帝國，到馬其頓帝國，到羅馬帝國，再到神聖羅馬帝國，從蒙古帝國，到奧斯曼帝國，再到拿破崙帝國，都成了往昔的回憶。俄羅斯帝國民族統一性高的地區保持下來，其他地區分裂出去。唯一的例外是美國，它爲什麼例外，正是本章的主題。

小民族和小國能在歷史的戰火中存活下來，都是因爲它善於結盟，誰強大，就和誰同盟。容易被滅絕的是那些想做大民族主宰的小民族。中國東北地區曾經先後繁榮過兩個優秀的小民族，一個是宋代的契丹人，一個是明代的滿州人，若論他們的強悍和才智，絕不亞於越南人和朝鮮人。但是，契丹人已經找不到踪跡了，滿州人也在慢慢消失。而越南和南北朝，還是亞洲的重要國家，尤其是韓國，甚至是世界經濟大國和體育大國。原因就是越南、朝鮮善於結盟，一直是強大的中央帝國的盟國，從沒有試圖征服這個巨人；而契丹人和滿州人則國小雄心大，先後把宋帝國和明帝國當作他們的獵物，都獲得過巨大成功，但終因後勁不足，導致自己的毀滅。

大國和小國都是相對的概念。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都曾經是十五、十六世紀的大國；英國、法國更是十七、十八、十九世紀的大國，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其國力可以

主」地位就不能維持。誰能相信給華國鋒五十年時間，他能有超過毛澤東思維的能力？給江澤民三十年，他也說不出一句鄧小平南巡時的語言。如果沒有民主，中國要想有與大國地位相稱的領導人，只能寄希望於政變了。

小國容易實現民主，可以在有限人才的範圍內挑選比較好的。再者，人才在小國容易顯露，顯露了好被人挑選。在茶靡開花的大國，即使是人才，你還要會裝孫子，不然你早早就會被精英淘汰機制所淘汰。赫魯雪夫孫子裝得好，戈巴契夫孫子裝得也不錯，成了接班人。前者被毛澤東視為睡在僭主身邊定時炸彈式的人物，史達林要早知道赫魯曉夫是這種人才，早就讓他去見馬克思了。

4. 大國容易分裂，小國易於結盟

大國爲什麼容易分裂？大國因爲專制缺乏活力，停滯衰退，人民生活不下去要造反，一造反，一統江山就散了架，這說的是傳統君主制大國；如果是多民族國家，分享不到權力的少數民族就要爭取獨立，比如歐洲的哈布斯堡王朝，苦撐到十九世紀中葉，還是被迫讓義大利獨立，與匈牙利分享皇權，最終還是分崩離析，塞爾維亞、捷克、克羅埃西亞等等，紛紛獨立。如果是現代向民主化過渡的僭主制大國，民主化降低了它的權威落差，權威的河流流不到遙遠的邊疆，雪崩反應便會開始。

小國則不然，自由化動力比較容易啓動，從經濟自由向政治民主過渡的時間也不會太長，比如韓國和臺灣。即使是新加坡，自由與權威的平衡點，也在逐步向自由等於權威的均衡點移動。我們下面將說明，小國最容易發生的問題和大國相反，不是權威過剩，而是自由大於權威，導致政體不穩定。比如臺灣，幾年內，憲法改了五次，幾乎成爲兒戲；再比如古代民主時期的雅典，幾乎沒有有權威的執政官。「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小國就象立在嫩荷上的蜻蜓，輕盈而富有彈性。可以隨風蕩漾，不會滑落水中，況且還有四片透明的薄翅保持平衡。但是，不能起大風，下暴雨，否則，荷莖被颳斷，將無憑依處。

二、大國的國際權威

1. 護照的價值

既然大國問題如此之多，讓大國分裂成小國好了，何必捆在一起受罪？我在大陸和一些朋友或熟人談起我本書中的理論，說中國既要民主，也要統一；但大國民主化有一個分裂陷阱，就是雪崩反應，這是一個難題。我想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朋友問我：「分裂有什麼不好？分裂成新加坡那樣的小國不是挺好嘛。」而另一方面，一些狂熱的民族主義分子，爲了

和美國相提並論。如今，與美國和日本經濟實力相比，各歐洲國家都有力不從心之感。還有完成了民主化的大國俄羅斯和正在經濟改革中的中國緊隨其後，讓西歐政治家有未雨綢繆的緊迫感。西歐各國小國化，促使它們採取了明智的結盟戰略，甚至有聯邦化趨勢，以此來尋求集體優勢，這是在美國主宰的單級世界裡的求存之道。

5. 大國是平衡木上的大象，小國是小荷尖上的蜻蜓

說來說去，一個專制大國的根本短處是權威大於自由，自由化的動力總是屈服於權威化動力，所謂穩定壓倒一切。它似乎只可以達到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的極限狀態，也就是自由化動力與權威化動力相互抵消的靜態平衡中。這種平衡既是僵死的，又是脆弱的。所謂僵死，是指在所有自由化動力的幼苗上都要壓上石頭，如果不能讓它完全不能成長，也要讓它扭曲變形，比如，不讓商業經濟繁榮和市民社會發育，但把社會精英的能量都釋放到官場上，建立官本位社會。所謂脆弱，是指它的改革彈性很低，在很高的權威落差下，沒有容納自由的空間，自由化動力一啓動，社會就面臨崩潰。在這樣的大國，自由與權威不能趨於均衡，也就是說，建不成民主社會，不是專制，就是分裂。

所以，這種大國社會，就像站在平衡木上的大象，只能保持靜態的身體平衡，只要一動盪，就會從平衡木上掉下來，更不要說做高難動作，在動態中保持平衡了。

現在世界上價值最高的護照，當然是美國護照。美國人不出國，不知道作爲一個美國人多麼牛氣；中國人不出國，不知道作爲一個中國人多麼受氣。中國人出國最受氣的時期，是「六四」剛剛結束那陣子，中國的新聞媒體報導過一個中國代表團在法國巴黎機場被扣押被侮辱的詳細經過。那時，是中國的普世價值最低的時期之一。與美國護照相比，中國護照所代表的總體國力、人均財富和普世價值，都等而下之，所以不能讓它的持有者揚眉吐氣。

對護照價值感受深切而細微的人要算是前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了，他寫過一首〈蘇聯護照〉的詩：

我真想像狼一般地吃掉

官僚主義。

證明文件我瞧不起。

任何公文紙片子都給我滾，

滾他媽的去。

但是，這本——

沿著船艙和艙間的長廊

走動著一個彬彬有禮的官吏。

統一臺灣，不惜進行「超限戰」，不惜擁戴獨裁統治。後者不知道大國之短和小國之長，前者不知道大國之長和小國之短。

要想知道大國之長與小國之短，帶一本護照出國就知道了。一本新加坡的護照，和一本美國護照，在國際上的價值不可能是一樣的。儘管有好幾年，在世界競爭力排行榜上，美國還排在新加坡的後面。持美國護照的公民的生命在國外受到威脅，前來營救的可能有航空母艦，新加坡公民呢，可能只有外交抗議了。一個美國公民分享的財富，雖然比一個新加坡公民分享的財富多不了多少，某些行業裡，新加坡人的工資甚至比美國人還高，但是，幫助一個在國外公民的是整個國家的力量。小國的力量小，大國的力量大。

如果讓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護照之間選擇，我當然選擇後者。不選擇一本大國護照，而選擇其一部分的小區的護照，是不是有悖於我上面提到的「護照價值國力論」？是，也不是。護照的價值，不僅要看它代表的國力，還要看它代表的普世價值。中國大陸是個專制社會，普世價值低；香港社會是個自由社會，還是英聯邦的以前成員，雖然還不是民主社會，普世價值比大陸高。另外，香港護照所代表的人均財富比大陸也高。大陸護照包含的大國價值，香港護照也同樣分享。這就是說，大陸護照有的，香港護照都有；大陸護照沒有的，香港護照也有。因此，香港護照的價值要高於大陸護照。香港護照可以在幾十個國家免簽，大陸的就不行。

伸長脖頸，睜大了雙眼：

這是哪兒來的？

這又是什麼地理上的新發現？

對其他各式各樣的護照，

眼皮一眨不眨：

什麼？丹麥人，

瑞典人。

卷心白菜似的腦袋一動也不動，

臉上毫無表情。

突然這位老爺爺歪起了

嘴巴，好像挨了火燒。

這是官兒老爺爺在看

我的那本紅皮護照。

他拿著它——

好像抱著一顆炸彈，

他拿著它——

人們都交出護照，

我也交出我那

鮮紅顏色的小本子。

看到某一類護照——

嘴邊馬上露出微笑。

看到另一類護照——

卻是一副鄙夷的神情。

例如，接過印有雙獅的

英國護照，就畢恭畢敬。

接過美國護照，

好像收到小費，

不停地點頭哈腰，

兩眼貪婪地盯著善心的大叔。

……

對著波蘭護照——

蠢笨的警察

任何公文紙片子都給我滾，
滾他媽的去。

但是，這本——

我由寬大的褲袋中掏出它，

好像掏出一件珍品。

看吧，羨慕吧，

我是

蘇聯的公民。④

原詩是著名的馬雅可夫斯基式的樓梯詩，爲了節約空間，我將其恢復爲平常的排列形式。這首詩表明，落後國家或不受歡迎的國家之國民的反應機制都差不多：受到歧視甚至蔑視，反而激起愛國熱情。某些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有些不愉快經歷，突然愛起國來，還把這種失落學術化，就像馬詩兄將其詩化一樣。在詩裡，我們看到，對護照檢查官來說，最尊重的是英國和美國的護照，那是因爲它們代表的國家，國力大，普世價值高；對丹麥和瑞典

④〔蘇聯〕馬雅可夫斯基，〈蘇聯護照〉，載《馬雅可夫斯基詩選》（中文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頁三〇六—三一〇。

好像捧著一個刺猬，

好像握著一個雙刃刀，

他拿著它——

好像托著一條兩米長的

吐著二十根毒舌的響尾蛇。

碼頭工人意味深長地眨了眨眼：

要是給您搬運東西，不必付錢。

密探懷疑地望著憲兵，

憲兵望著密探。

若是因為我手裡拿著一本

印有鐵錘和鐮刀的蘇聯護照，

就把我毒打和釘上十字架，

那幫憲兵才真會叫好。

我真想像狼一般地吃掉官僚主義。

證明文件我瞧不起。

標，即感召力指標。即使如此，鄧小平先生還數次當選美國《時代周刊》的世界風雲人物。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的第三項國威指標大幅度下降，國際威望一落千丈。但由於前兩項指標勉強好於同時期的俄羅斯，在國際上的發言權還是有的。

中俄兩國在科索伏戰爭期間的不同表現，反映出了兩國國威價值的變化。按理說，中國在科索伏的戰略利益，遠遠小於俄羅斯。科索伏靠近俄羅斯，西方修理這個地區，不能不說含有限制俄羅斯沙皇主義復活的意思；被打擊的塞爾維亞人還是俄羅斯人的兄弟；而在俄羅斯國內還存在著類似科索伏的車臣問題。但由於俄羅斯國力和國威素質都有所下降，在解決國內問題上還有求於西方，同時，科索伏戰爭高舉的是人權之戰的旗幟，符合俄羅斯的普世價值取向，所以，對科索伏戰爭表現消極，姿態較低。而中國，自以為國力和國威素質都有大幅度上升，要在國際上扮演一下大國姿態，還要表現一下反普世價值也就是反人權護主權的國際感召力，所以強硬地站到南斯拉夫一邊。結果，掌聲寥寥，還被美國揍了一耳光，被俄羅斯總統葉爾欽耍了一下子，讓中國去做替死鬼得罪西方，他剛和江澤民對唱完「情歌」，轉身就到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和別人擁抱去了，目的是要貸款。這是中國所謂「第三代」領導人想借國威壯自己威風的典型「狐假虎威」策略，當然騙倒了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愛國賊」們。在三項國威指標裡，最重要的是第一項指標。第二項和第三項指標，都可以通過制度變革加以改善。當全世界都採用了人權普世價值後，這項指標的感召力就消失了。

護照，既不尊重，也不蔑視，這兩個國家是自由國家，但國力較弱；最瞧不起的是波蘭護照，似乎不認識的樣子，這也符合實際情況，國家小，還是極權國家，普世價值低，甚至還是別人的附庸國。對蘇聯護照，表現出「火燒」一般的感覺，那感覺，可以說是恐怖加仇視。蘇聯國家之大，不能不讓人看重，但它的暴力統治和對世界自由價值的威脅，又不能不讓人恐懼甚至厭惡。

這就是大國的長處，即使幹壞事，都讓人重視。小國雖然享有自由和活力，但安全、穩定和力量，以及在國際上的發言權，都是小國沒有的。

2. 國威的衡量

從以上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護照是一個國家國際權威的憑證，我將之稱為「國威貨幣」。它包含著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權威價值，簡稱「國威價值」。對國威價值有三項衡量標準，一是總體國力，一般用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二是個量國力，可以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三是普世價值，主要是人權被重視和保障的程度。第一項指標衡量的是國威的力量，第二項指標衡量的是國威的素質，第三項指標衡量的是國威的感召力。

俄羅斯巨變後，國威價值下跌，主要是前兩項指標下滑，但第三項指標上升。中國改革後，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八年，三項指標都有程度不同的上升，上升最慢的是第三項指

金融方面的義務，更是不值一提，預算沒有赤字的國家還少嗎？爲什麼別人沒有提出要和美
國相提並論，只有俄羅斯提出來了呢？關鍵還是它的潛在國力大。它的經濟一旦啓動，就是
其他小國無法望其項背的。

這三項指標的變動，顯現出大國的興衰。法國在大革命後，國力並沒有突然增強，但猛
然間，法國人在拿破崙的統率下，在一段時間裡似乎戰無不勝，成爲歐洲霸主，主要是第三
項指標即感召力上升了。自由平等博愛，使君主政體的國家在短時間裡失去了戰鬥力。也正
因爲它的國力沒有實質性增強，精神因素沒有長期效果，最終還是被歐洲列強制服。

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國力比中國小，國威的素質也不比中國高。中國北洋水師的艦隻
訪問日本時，它的先進和龐大會引起日本朝野驚恐。明治維新後，日本經濟迅速現代化，人
均工業化水平一九一三年就趕上了俄國，一九二八年遠遠超過了它。如果以一九〇〇年的英
國人均工業化水平爲百分之百，一九一三年日本和俄國均爲百分之二十，一九二八年日本是
百分之三十，俄國爲百分之二十^⑥。當然更是超過中國了。儘管俄國和中國在人口和土地面
積方面超過日本許多倍，但日本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擊敗了中國強大的北洋水師，

⑥〔美〕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中文版，王保存等譯，求實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八
月第一版），頁二四二。

唯有第一項指標，與國家的大小和人口資源多少有關，不是想改變就能輕易改變的。蘇聯東歐改制後，其他國家都小心翼翼地在申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只有俄國突然來了底氣，宣布要和美國平起平坐。

據美國中文多維新聞社駐巴黎記者帕特里克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報導，俄羅斯新任總統普亭的新任經濟顧問伊拉留諾夫聲稱，從下屆西方工業八國首腦會議（G 8 峰會）開始，普亭決定以大國總統的身份與美國分庭抗禮。下屆 G 8 峰會將於二〇〇〇年六月四日在莫斯科召開。俄國《消息報》二十七日報導說，總統心腹顧問伊拉留諾夫對記者說，莫斯科決定在下屆 G 8 峰會上正式提出俄美「兩國關係新概念」，俄羅斯今後無論在什麼場合都要與美國「對等談判」。

這是在說大話嗎？可能不是的。伊拉留諾夫認為新概念的提出，是基於俄羅斯經濟已步入正軌，並健康發展，今年以來俄羅斯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增加了五十億美元，國家在金融方面「履行了全部義務」，而且今年將首次實現預算無赤字，甚至還有盈餘^⑤。

「經濟已步入正軌」的東歐國家有的是，臺灣的外匯盈餘可能比俄羅斯還多，至於履行

⑤ 載多維新聞社，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八日新聞，網址：www.duowei-news.com。

和經濟戰場上，長期看，都占不了上風，因為美國國力太強大，國土太遼闊，資源太豐富。據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個被俘的日本海軍軍官被帶到美國本土，到達機場上空，看見機場上停著一望無際的戰機時，感慨地說，日本不可能贏得這場戰爭。日本很知道這一點，每次大戰都進行偷襲。除了前面說的對俄國和中國海軍的偷襲，二戰時還偷襲美國的珍珠港，中國的滿州和華北。偷襲的戰略是對的，但對象錯了。美中都是國土廣袤和人民英勇的國家，不可能一次偷襲就把這兩個巨人徹底擊潰。只要一陷入持久戰，日本離勝利就會越來越遠。

3. 國威的「匯率」或指數

美國量子基金會主席索羅斯先生的英名全球都是知道的，英國人尤其知道。他一生有許多傳奇故事，最傳奇的還是他一九九五年的那一場英鎊之戰。他在外匯炒作中，賭英鎊對德國馬克匯價下跌，結果成功了，據說此役他掙了十五億多美金。

如果說索羅斯先生賭的僅僅是貨幣匯率，我覺得可能低估了他，他賭的是英國國威對德國國威的「匯率」下跌。貨幣匯率，不過是國威匯率的一個貨幣形式。索羅斯先生原本是個哲學家，是著名大哲學家波普爾的學生，敵視封閉社會。他看到東德從封閉走向開放，並與西德統一之後，國力會大為增強。國力增強或衰落，往往會表現在這個國家的「幣力」上。

於一九〇四在對馬海峽摧毀了俄國艦隊，接著又在中國領土大連進行的日俄戰爭中再次戰勝俄國，雖然每一次日本都是習慣性的偷襲，不宣而戰，使其勝利減去不少光彩，但以小小島國，先後戰勝中俄兩大東方帝國，還是顯示了國威素質提高所帶來的威力。在同等國力條件下，國威素質高的大國將強盛；同等國威素質條件下，國力強、資源多的大國將強盛。一八五〇年，俄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歐洲占第一位，為一百二十七億美元（以一九六〇年美元和物價的市場價格為標準），排第二位的英國是一百二十五億美元。但按國民生產總值的人均產值算，俄國在歐洲六大強國（英、法、意、德、哈布斯堡和俄）裡，是墊背的，一八五〇年是一百七十五美元，不到排第一位的英國的一半（四百五十八美元，以一九六〇年美元和價格為標準）。到了一八九〇年，英國的人均產值已經是俄國的四倍（英國七百八十五美元，俄國一百八十二美元）^⑦，這就決定了俄國大國地位的衰落，在一八五四—一八五五年克里米亞戰爭、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的俄日戰爭和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相繼失利，並最終墮入共產主義泥潭。

日本和俄國不同，它的國威素質高，但在和素質同樣高的美國較量時，無論在軍事戰場

⑦ 同上，頁二〇八—二〇九。

兩個國家對比，甲國有九個人，乙國有三個人，它們的總產值和人均產值之比如下表：

表七之一：甲乙兩國產值之比

人均產值	9	甲國
總產值	18	乙國
人均產值	2	
總產值	12	

通約之後，比例如下：

表七之二：甲乙兩國用產值來計算的國威指數

人口	3	甲國
人均產值	1	乙國
總產值	3	
總產值	2	
總產值	4	

從表七之二可以看出，人均產值乙國高於甲國，為二比一；總產值乙國低於甲國，為二比三，二者相乘，國威指數 Ω 仍然是乙國大於甲國，是 1.33。

中國第三次國內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的金元券膨脹得像只汽球，就是因為當時戰爭耗盡了經濟潛力，國力下降導致幣力萎縮。蘇聯解體後，經濟狀況一落千丈，盧布對美元的匯價狂瀉，也是俄國國力大幅度下滑造成的。索羅斯認定英鎊硬不過馬克，其信念，我以為，是來自對英德兩國國力和國威相對變化的判斷。

貨幣匯率是指一個國家的貨幣和另一個國家貨幣的兌換比例，「國威匯率」是指一個國家的「單位國威」可以換算成幾個別國的「單位國威」。這裡難以確定的是「單位國威」，「單位」的「國威」是多少？我建議用三種方式來計算，它們是貨幣法、產值法和市值法。

貨幣法是用匯率乘流通中的總貨幣量來計算。比如，我們要知道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國威匯率是多少，只需要知道中國流通中的貨幣總量 $G1$ 和美國流通中的貨幣總量 $G2$ 和匯率 L 就行了，用 $C1$ 來表示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國威匯率或指數，我們有下式：

$$C1 = LG2/G1$$

現在，人民幣與美元的官方匯率為 $8.3:1$ ，這就是說，即使美國貨幣總量 $G2$ 等於中國貨幣總量 $G1$ ，美國的單位國威是中國單位國威的 8.3 倍，國威匯率是 $8.3 \cdot 1$ ，即 $C1 = 8.3$ 。如果 $G2$ 是 $G1$ 的 3 倍，則 $C1 = 24.9$ 。

產值法是兩個比較國的總產值之比乘上人均產值之比，等於國威指數 $C2$ 。假設甲、乙

○，這樣就既考慮到了一個國家價值形態的國力（○₁，貨幣指數），也考慮到了它的實物國力和生產率（○₂，產值指數），還考慮到了一個國家證券化的國力，從中可以看出經濟景氣（○₃，市值指數）。由於這本書寫作時間和資料都有限，未能就實際統計資料做一個案例分析，留待以後修訂時再作彌補。

4. 國際拳臺上的重量級選手

不用多說，在相同或相近的生產率條件下，一個大國的國威匯率或指數，肯定要比小國高。國威指數越高，在國際上的發言權就越大，國際地位也越高，抵禦經濟風險的能力就越強。一個國威指數低的小國和一個國威指數高的大國競爭國際地位，很難占到上風。

二十世紀七〇年代，美國總統尼克森在其顧問季辛吉的國際平衡論的指導下，終於超越意識形態考慮，和臺灣中華民國斷交，和極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要說，從法統上看，中華民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合法，前者也是美國政府多年打交道的伙伴；從感召力上看，當時的臺灣雖然也是政治威權社會，但在價值觀念上，屬於西方自由世界，但美國還是放棄了和臺灣的舊愛，另尋中國大陸這個新歡。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是大陸作為重量級拳手的作，它可以在美蘇戰略對抗中，制約和平衡蘇聯勢力在亞洲的擴張，從而間接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

雖然甲國比乙國的人口多，但國威指數比乙國低，影響甲國國威的是過低的人均產值。如果一個國家無論人均產值和總產值都高於另一個國家，比如美國和中國，其國威指數就會更高。

現在簡單說說市值法。市值法就是比較兩個國家上市公司的總市值，可以看出國威指數的變化趨勢。二〇〇〇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國有七支高科技股票在香港掛牌交易，包括微軟和英特爾，其總市值為十一億港元，是在香港交易所掛牌的其它股票總市值的二倍，可以看出，美國國威指數之高。這七支股還都是美國第二股票交易所NASDAQ上的「股霸」，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老牌股，比如可口可樂、通用電氣等股王還不在其內。最近，倫敦股票交易所和法蘭克福股票交易所醞釀合併，大概是歐盟的一個戰略性舉措，想提高歐盟股市的總市值，要與紐約爭奪世界金融證券市場的霸主地位。而美股「入侵」香港，也是意味深長，是對英國傳統金融勢力地盤的一個挑戰。

假設甲國上市公司總市值為D，乙國上市公司總市值為E，D與E之比，就是市值上的國威指數C3，如下式：

$$C3 = D/E$$

要想綜合評價兩個國家之間的國威指數，最好是將C1、C2、C3相乘，得出一個總指數

予很高評價：「如果說世界上存在某種戰爭，其旨在倫理之目的，或基於倫理之理由，那麼我們可以聲稱，上述戰爭即屬此例。科索伏沒有石油以吸引某國之興趣利益，聯盟部隊在那裡也沒有任何領土要求。聯盟部隊之戰鬥旨在其他人應有之人類之權益^⑧。」這就是說，科索伏戰爭是人權之戰。但必須看到，這種人權之戰，也只能發生在南斯拉夫這樣的小國土地上，假如在俄國車臣發生同樣的種族清洗，我相信，國際社會的眼睛這時可能正好患眼疾，看東西有點模糊，把車臣看漏也未可知。這裡還是存在著雙重標準，一是人權標準，另一個是實力標準，也就是國際權威標準。按照第一個標準，所有國家都不能幹踐踏人權的事；按照第二個標準，如果你力量足夠強大，或者你可以給別人帶來經濟上的利益，你可以在人權問題上多幹些壞事，要不，怎麼英國、加拿大不願署名譴責中國呢？

在和平時期尚且如此，在戰時，小國更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一個最輕量級的拳手，能夠上臺和重量級的劉易士進行比賽嗎？希特勒7天就滅了捷克，如果不是英美俄等大國沒有被納粹德國滅亡，現在的世界還能設想嗎？如果中國不是有四億人口，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能抵抗日本侵略軍八年嗎？

⑧ 「捷克」哈維爾，〈論有限主權〉（中文版，載二〇〇〇年五月號《北京之春》，美國紐約出版）。

在臺灣與大陸爭奪國際社會地位的過程中，臺灣一步一步被逼進到了牆根，喪失聯合國席位，斷了和美國的外交關係，這是最致命的兩個打擊。從此之後，承認臺灣的國家越來越少。不是臺灣的外交家不如大陸，是臺灣的國威指數大大低於大陸，沒有那麼多的錢和市場可以挽留更多國家的外交關係。即使民主來到了臺灣，但它對國威指數的影響甚微，也未能幫助臺灣爭取到更多的國際承認，以至於臺灣前總統李登輝抱怨國際社會沒有給臺灣的經驗以足夠的重視。其實，他最想抱怨的可能還是他幾近「軟禁」的生活。他自從一九九五年進行過一次據說讓美國總統柯林頓後悔的母校康乃爾大學之旅後，至今五年了，還沒有離開過臺灣。最近，卸任後的李登輝先生又想以母校之旅打動日本當局，以校友身份訪問日本，但沒有被接受。軟禁他的不是別人，正是大陸當局。

不要說臺灣了，就連英國和加拿大這麼重要的國家，因為與中國相比國威指數有下降趨勢，在中國「訂單外交（誰反對我就不給誰大額訂單）」的攻勢下，連老朋友美國都不想支持了。二〇〇〇年五月美國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譴責中國人權狀況的提案，邀請英國和加拿大聯合簽名，被拒絕。拒絕的理由是，他們將尋找與中國的建設性對話來改善中國的人權。美國發言人說，如果對話能解決問題，美國還有必要提交譴責案嗎？很委婉，但有點無奈。

以良知著稱於國際社會的捷克總統哈維爾先生，對國際聯盟部隊在科索伏的作戰行動給

第十章 分級落差：大型共同體的內外均衡

一、大國和小國的不穩定狀態

1. 手壓葫蘆：大國的內部不穩定

在第三章，通過「木桶模型」，我們已經了解像中國這樣的超大型社會，處於一種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的極限狀態，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則是權威落差和權威距離的超限狀態。所謂極限，是指國家的疆域和國家的權威落差都達到了最大限度，到達了一個邊際，超過這個邊際，擴大國土無法統治，或無利可圖；政府對個人的奴役也達到了最大限度，超過這個

總結本章的敘述，我們的結論是：小國的長處是享有自由，大國的長處是享有力量；大國的短處是容易專制容易分裂，難以實現民主，小國的短處是不夠安全不夠穩定，難有國際威望。

達到均衡的情況下，就會七葫蘆八瓢地亂漂，發生我們在第八章裡指出的「雪崩反應」，掉進第三章末尾所說的「民主——分裂陷阱」。

大國不穩定是因為內部缺乏自由，但似乎又承受不了自由。自由化動力把多民族的超大型國家從「自由——權威曲線」的右側向中間推，在推的過程中，隨著權威落差的下降，權威距離也隨之縮小，其含義是國家分裂。如果分裂的國家能忍受這種分裂，各國都可能走向民主化，像獨聯體國家那樣。但被犧牲的是作爲一個超級大國的力量。如果不能忍受這種犧牲，重新統一的權威化動力過於強大，它又會通過武力把各國捏合起來，將重新統一的國家又向「自由——權威曲線」右側推，權威距離是擴大了，權威落差又隨之提高，進入新一輪極限狀態，新一輪手壓葫蘆。這真有點像西西弗斯推石頭上山，那石頭是個大國，推上去，或者說推到「自由——權威曲線」右側，石頭停不住，老要向下或向「自由——權威曲線」左側滾，滾下來，碎裂成幾塊石頭，他又把它們黏在一起，再推。如此反復，這就是「中國的歷史，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這是毛澤東先生的習慣用語。

極權或專制大國不穩定，但又有力量。因此它的力量是不穩定的力量。強大時，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雄視宇內；羸弱時，如宋季明末晚清民初，人皆可夫。

只要一個超大型社會不能放棄中央集權，不能在「自由——權威曲線」的均衡點附近穩定下來，這種周期性的活塞運動就不會停止。現在，中共當局讓中國遠離這個均衡點，按葫蘆

限度，人們無法謀生，無法像人那樣生活。所謂超限，是指極權統治超出了人所忍受的最大限度，結果是人口的大批死亡，和人類的牲畜化或野獸化。

我們知道，這種極限或超限狀態，是在「自由—權威曲線」的最右邊，遠離自由—權威均衡點。這是一種脆弱的平衡，這種平衡建立在對社會自由化動力徹底扼殺的基礎之上，它犧牲的是人的幸福、創造力、資源產出效率等等。這種脆弱平衡極不穩定。它的不穩定，就像是一個人用兩隻手把兩只葫蘆按到水底下，不讓它們漂起來。這是可以做到的，在短時間內甚至可以做得很好。但是，這個人必須精力無窮，永遠不累，也不需要吃飯、上廁所、睡覺，連盹也不能打，一打盹，手一鬆，葫蘆就漂起來了。現在的中國大陸當局要按的還不止兩只葫蘆，又是經濟自由，又是政治自由，還有宗教自由，要按住法輪功，要按住民主黨，要按住失業工人，要按住受害於苛捐雜稅的農民，還要按住總是好動的大學生……而且，用劉曉波先生的一句戲言說，每年六月，中共當局都要來一次「例假」。「六四」前後十天，神經過敏，自我折騰，又是「衛生棉」，又是發脾氣，弄不好，葫蘆就從手底下滑走了。

葫蘆的浮力是政府的手難以對抗的。它的力量來自韌性，政府會累，它不會累。葫蘆的浮力是什麼？就是自由化動力，是人民對自由的渴望，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只要葫蘆被壓在水底，它向上的浮力就一直存在，不浮到水面，總是處於不穩定狀態。

浮到水面會怎麼樣呢？在沒有現代政治制度的安排下，在沒有必要的機制讓權威和自由

比一個國家既不能自衛又不能自給的境遇更可憐的了。」^①

讀著這段話，我心裡想著的是新加坡。新加坡是有「富裕而又自由的形象」（不是民主），世界競爭力它排第一，亞洲法制環境它也排第一，但它的海軍和陸軍都養在別國的土地上，不知道突發戰爭時，他們趕回來時國家是否還存在。

新加坡作爲一個小國，是隨時準備與大國結盟的；作爲一個以華人爲主體的社會，它又不願與非華人大國結盟。而華人社會，有自由的沒有力量，如臺灣；有力量的沒有自由，也不講道理，比如大陸。這是新加坡的痛苦。與前者結盟，不能獲得預期的國威；與後者結盟，是與虎謀皮，首先掐斷自己脖子的可能就是這隻老虎伙伴。

所以，它的臺灣政策和大陸政策就有點搖擺不定。從長遠打算，它是要和大陸結盟的，從它施行和大陸接軌的簡化漢字和橫排版圖書就可以明白；從暫時看，又不願和臺灣關係搞僵，畢竟是自由社會，又都是華人。大陸和臺灣關係緩和時，新加坡好做人，關係一惡化，就尷尬了。從力量上講，不願得罪大陸；從價值上講，更是難以言說，既不喜歡臺灣的民主，也不喜歡大陸的蠻橫，新加坡既不民主，也不蠻橫，只好兩邊勸架，都不得罪。

①（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中文電子版，北京，紅旗出版社《家庭藏書集錦之五：哲學》），頁二〇六。

的那兩隻手已經痠麻異常，還要強調穩定，受罪的是它自己。再按下去，葫蘆還會變成地雷，只要一鬆手……

2. 牆頭草：小國的外部不穩定

由於解凍原理和「自由化假說」的作用，一個小國容易接近「自由—權威曲線」的均衡點，也就是說，比較容易民主化。只有一個民主國家才有可能長期穩定的，因為它有改革彈性，在權威不足時，增加權威；在自由不足時增加自由。但是，小國的國際權威不足，缺乏力量，難以抵禦外來的國際壓力，容易被大國所左右，甚至被大國所宰割。如果被侵略，會迅速滅亡，不靠大國幫忙，難以復國，最著名的例子是古代的以色列。

所以，小國國威不足，具有外部的不穩定。

托克維爾說：「在世界上，大國的存在為國家繁榮提供了一個新的因素：即力量。如果一個國家天天被人掠奪或侵略，那麼空有富裕和自由的形象又有什麼用處？如果外國控制了大海並規定各項貿易條例，那麼本國的工商業又有什麼用處？大國之所以繁榮，決不是因為它大，而是因為它強。因此，力量一向是國家幸福和生存的主要條件之一。於是，除非環境特殊，小國總是要自願聯合起來，或被人聯合起來而成為大國的一員。我不知道有什麼境遇

換取名義上的獨立。雖然英勇的芬蘭人曾經重創俄國侵略軍，但誠如孫子所指出的：「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小國再英勇，也不可能避免被大國征服的命運。比芬蘭人更英勇的波蘭人，在二戰期間用馬隊向德國的坦克衝鋒，也只讓自己國家的旗幟多飄揚了幾天。二戰後的芬蘭，和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區別不大，但表面上還有自己的國旗國歌和外交，但在政策上完全以蘇聯的馬首是瞻。國際上把這種現象稱為「芬蘭化」。

在大國夾縫裡求生存的小國，是很難傲然挺立的。

二、聯邦制：兼得小國自由與大國力量

1. 分級加壓的灌溉系統

大國要民主，但又要力量，不能分裂；小國要力量，但又要自由，不能臣服於別人。要兼得這兩者，除了聯邦制或邦聯制，別無他途。聯邦制為什麼可以使一個大國擺脫權威化壓力，跳過「民主——分裂陷阱」，避免發生雪崩反應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看看灌溉系統。

傳統政治技術和現代政治技術之間的差別，與傳統灌溉系統和現代灌溉系統之間的差別

小國的這種兩難境地，來自它的無力。就像牆頭上的草，東風大向西倒，西風大向東倒，這不是它的本意，只是沒有力量支撐自己的身體。大國就不同了，它是根深葉茂的大樹，狂風襲來，即使折斷幾根樹枝，來年春天還會重新長出新枝。大樹的自癒能力強。歷史上極其強大的匈奴部落和突厥部族，都沒有征服大漢帝國和大唐帝國，雖然他們到了歐洲後，給歐洲人惹了不少麻煩。蒙古人和滿州人征服了南宋和明王朝，但漢人並沒有像以色列人那樣，出埃及，勝利逃亡，而是用刀和槍把征服者送到他們原來發祥的地方。能這樣做，就因為它大，因為它強。

歷史上的某些處於國際風口浪尖上的小國，爲了求生存，不得不臣服於某個大國，獲得了保護，但要損失部分尊嚴和自由，比如獨立以前的朝鮮和冷戰時期的芬蘭。由於地緣上的關係，朝鮮一直臣服於它的龐大鄰國，這如其說是爲了獲取保護，不如說是爲了用臣服來避免直接被統治。等到日本強大起來，豐臣秀吉想「進入」朝鮮的企圖受挫後，中國對於朝鮮就有了實際上的保護價值。朝鮮和保護國中國的關係，有點類似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君主聯邦」，甚至還要鬆散，是個「邦聯」，朝鮮的立法權並沒有喪失，行政管理權也是獨立的。但到了二十世紀初，衰落的清帝國自顧不暇，無力承擔對朝鮮的保護義務，日本「進入」朝鮮後，其獨立和自由就基本被剝奪了。

芬蘭也由於地緣關係，離可怕的蘇聯太近，離強大的西方太遠，只好用實際上的臣服來

2. 水向高處流：公民代理人管理政府

代議制完全可以說就是政治權威的抽水機。如果說以神權為本位的權威資源是「黃河之水天上來」，以人權為本位的權威資源就是北溟之海水裡存。神權本位的權威資源來自神授，人權本位的權威資源來自民授。所以，神權權威是瀑布，以高就下，灌溉整個國土；人權權威是海水，被代議制的抽水機一級一級向上抽，以使政府成為有源之水，供給那些需要「水」的地方。在這個比喻的語境裡，政府不是別的，是「水資源」的批發轉運站，傳統的權威灌溉系統變成了權威供水系統。

英國十九世紀的著名思想家約翰·斯圖加特·密爾對代議制進行了專門研究，他的《代議制政府》一書是理性和激情合璧的佳作。但這本書不是討論代議制民主和領土範圍關係的著作，他討論的可能是他那個時代那個地區感興趣的問題。在他生活的時代，對代議制政府的優越性和可行性可能還有疑問，所以他著墨的重點是論證「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議制政府」，同時，還討論了實行代議制的條件。在密爾看來，並非所有民族都可以實行代議制。什麼樣的民族不適合搞代議制呢？簡單地說，不夠理想的民族，比如那些做慣了奴僕沒有自主精神的民族和不會服從的野蠻民族不可以搞，因為代議制是最理想的政府形式。

至於代議制對擴大民主統治區域上的好處，他只簡單提到：「經過上述各種考慮，顯然

極其類似。決定傳統灌溉系統灌溉面積的是三個因素，一是可用於灌溉的水量，二是水源的高度，即水位，三是灌溉的渠道是否暢通。水量越充足，水位越高，渠道越暢通，可灌溉的面積就越大，水送達的距離就越遠。

這裡的水量，相當於政治上的權威資源，水位相當於權威落差，渠道相當於信息通道。在既定的水量和渠道條件下，要想灌溉更大的面積、和更遠的距離，就必須提高水位。這就是說，在既定的權威本位、權威資源和信息通道條件下，要想治理一個更大面積的國家，就必須提高權威落差，也就是提高集權和專制程度。所以，想灌溉大面積良田的水庫要建在高山上，想治理大國的政權都高高在上，爲了增加相對高度，還要人民跪下，像毛澤東所做過的那樣。

發明了蒸汽機後，灌溉系統就現代化了，水源高度不再影響灌溉面積。灌溉機械把輸送水資源的水位落差，變成了機械壓差，不僅可以輸送沒有落差的水，還可以輸送負落差的水。它可以把地底下的水抽上來灌溉，還可以把低處的水送到高處。即使要把水送到一千公里之外，也不需要建一個高聳入雲的水塔，只需要在適當的距離內建若干變壓裝置就行了，壓力不足時加壓，壓力過大時減壓，猶如輸電線路。

在政治制度上類似蒸汽機的發明是代議制和聯邦制。

的那樣巨大的版圖上順利實施。唯一能掌管如此巨大的國家的事務的政體，只能是專制政體。爲了支持這個論調，曾引用著名權威孟德斯鳩的下述論點：『一個共和國的特性是只能在狹小的領域，非此無法存在。』由於惟恐失去地方自由的各州許多公民把成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看作是對他們建立暴政，他們認爲，同意像費城制憲會議提議的那樣一個政府，乾脆就是把奴隸的鎖鏈套在自己身上。歷史的先例是反對擬議的政府的，因爲過去的大民主國家的領域都極其有限。所謂希臘、羅馬、義大利共和國，幅員都是很小的。因此，憲法擁護者們必須提出一種解釋，爲新的形勢辯護。③

美國聯邦主義者進行了多方面的辯護，與我們的論題有關的，主要是對民主政體和共和政體的區分。在《聯邦黨人文集》第十四篇中，執筆人麥迪遜寫道：「在民主政體下，人民會合在一起，親自管理政府；在共和政府下，他們通過代表和代理人組織和管理政府。所以，民主政體將限於一個小小的地區，共和政體能擴展到一個大的地區。」④

③ [美]梅里亞姆，《美國政治學說史》（中文版，商務印書館，北京，一九八八年版），頁五五。

④ [美]漢密爾頓、傑伊、麥迪遜，《聯邦黨人文集》（中文版，商務印書館，北京，一九八二年版），頁六六。

能夠充分滿足社會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體人民參加的政府；任何參加，即使是參加最小的公共職務也是有益的；這種參加的範圍大小應到處和社會一般進步程度所允許的範圍一樣，只有容許所有的人在國家主權中都有一份才是終究可以想望的。但是既然在面積和人口超過一個小市鎮的社會裡除公共事務的某些極次要的部分外所有的人親自參加公共事務是不可能的，從而就可得出結論說，一個完善政府的理想類型一定是代議制政府了。」②

代議制政府之所以好，密爾說了兩個理由，一是民主，「全體人民參加政府」；二是擴大政治參與的範圍，參與範圍一擴大，直接參與是不可能的，只有派代表參加。這就是代議制。代議制可以防止民主政治在擴大的版圖上變質，或者用本書的術語說，在權威距離擴大情況下，代議制可以防止權威落差提高這一論題，美國聯邦主義者給予了比較充分的論證。當年，聯邦主義者受到的最大攻擊之一，就是按照聯邦主義者的方法去做，美國就會失去民主，因為美國太大了。美國政治學說史專家梅里亞姆對這場爭論是這樣敘述的：

首先要討論的是一個國家的疆域與民主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憲法擁護者們不得不應付的一個最經常、確實也是最令人頭痛的反對意見是：共和政體不能在像美國所擁有

②〔英〕密爾，《代議制政府》（中文電子版，北京，紅旗出版社《家庭藏書集錦之五：哲學》），頁五五。

要理解公民直接管理的政府和代議制下的公民委派代表管理的政府爲什麼適用不同的國家範圍，可以用企業制度來進行類比。最早的私人企業是獨資企業，由於資金積累慢，發展速度上不去。如果廣泛集資，距離遠的投資人就有個參與管理和資金安全問題。於是發明了股份公司制度，股東選舉董事會，董事會任命執行官。這樣，股東即使遠在千里之外，也可通過他委託的董事會成員來管理和監督企業經營，還可以通過股票買賣來規避投資風險。這就是委託代理制的現代企業制度。

公民直接管理的政府相當於傳統的獨資企業，代議制政府相當於現代股份制公司，股東是公民，他們通過投票把自己的公民權利在一定時期內轉讓給自己的代理人，讓他們代理自己去管理國家。在時期終了時，再把公民權撤回，重新委託。這樣似乎可以防止個人對政治權力的專斷。

但是，美國聯邦黨人沒有完全搞清楚的是，防止美國政體由民主政體蛻變爲專制政體的，主要不是代議制，而是聯邦制。代議制是在大國範圍內實行民主的技術，但不是保障公民權利不被篡奪的最有效的武器。

3. 聯邦制是防止大國民主政體僭主化的更重要武器

在權威落差的三大問題中，代議制只解決了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公民和政府的關係問

姑且不論這個區分在政治學上是否會取得公認，但他實際區分的是古典式的直接民主政體和現代代議制的間接民主政體。直接民主政體施用的地域不能太大，它的「自然範圍是從中心點到達這樣的距離：它正好使最遠的公民能因公務需要而經常集合，包括的人數不超過能參加那些公務活動的人數」。⑤按照現代交通的觀點看來，這如其說是個距離問題，不如說是個會場問題。有了飛機，世界任何地方一天內都可以到達，只是國家大了，沒有那麼大的會場可以容納那麼多公民；即使能容納，也不能議事。不過，在麥迪遜時代，馬車還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距離還是非常重要的。在麥迪遜看來，代議制的共和政體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共和政體的自然範圍，就是從中心點到達剛好使代表能因管理公務需要而集合的距離。」他反問道：「能夠說合眾國的範圍超過了這個距離嗎？大西洋沿岸是美國最長的一邊，十三年來，各州代表幾乎不斷集合，距離最遠的各州議員並沒有由於比國會附近各州的議員中斷出席會議的時間更長而有什麼過失」。⑥接著，他還饒有興趣地計算了美國的緯度和距離，並和歐洲國家進行比較，認為美國的領域並不比德國、法國、西班牙和被肢解前的波蘭大多少。

⑤ 同上，頁六七。

⑥ 同上，同頁。

僭主最恐懼的永遠是他一次盜竊的合法性權威資源水庫在慢慢乾涸。

聯邦制和基層自治（因為和本書主題無關，我這裡不討論三權分立對防止獨裁的作
用），是防止獨裁者對人民授權進行盜竊的一種防護措施。人民不是一次把所有權利授予中
央代理機構，而是分層委托給許多權力機構，所有權力機構被委托的權力都是有限的。人民
把一部分立法權授予邦一級的政府，把另一部分立法權授予聯邦政府，這樣，無論是邦政府
和聯邦政府，都不可能壟斷立法權。

行政權的地方自治也是保護公民權利的一把又一把鎖。美國雪弗蘭汽車有一則著名廣告
詞是「像一塊石頭」，指的是它的安全和牢固。它的廣告設計我印象也很深，你看見一扇又
一扇帶各種鎖的鐵門次第關上，最後一扇是雪弗蘭的車門。每一級的基層自治都是保護公民
權的防盜門，有了這種設計的公民權，我們才可以說：「像一塊石頭。」

4. 主權約束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本節開頭的問題了。我們闡述過，大國權威化動力有兩個來源，一是
資源動員偏好，因為大國管理的事務多，費用高；二是一元化的向心力，爲了保持政令統
一，要強制全國執行相同的政策和法律，不能政出多門。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在中央集權
的大國，立法者必須使各項法律具有一致性，而不能帶有地方和習俗的差異。立法者決不處

題，當然是根本問題，即權威本位問題。但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國家最高首腦與其他統治精英的關係問題，代議制是解決不了的。只有代議的政體，可以仍然是中央集權的政體，也可以是議會獨裁政體，就像美國聯邦化前的一院制國會那樣。

中央集權和議會獨裁很快就會把代議制政體轉變為假民主的僭主政體，只留下民主的名義，閹割掉民主的實質。這種閹割手術在一個有長期專制傳統的大國，比製造一個大監都要簡單，只需要把公民的一次授權或委托，變成永久性授權和委托就可以了。以後的所謂選舉和授權，都搞成儀式性的表演，像當今中國大陸每四年一次的選舉表演那樣。

這種閹割手術，也可以被稱為囤積權威資源的「水庫工程」：把抽自人民的權威之水，囤積在「水庫」裡，說這是人民的授權，把源源不斷的權威活水，變成死水，讓作為「水源」的人民感到權利饑渴。那「水庫」就成了他們的權威來源，這就是我在第四章談到的「高峽平湖模型」。

世界上可以表演的東西很多，但忠誠和信任是表演不了的。人民可以按照你編的劇本表演「授權」，但並沒有授予忠誠和信賴，相反，還會產生疏離甚至仇恨，因為他們的意志遭到了每四年一次的姦污和強暴。這種只有表面合法性的政權，自然患了權威資源饑渴症。越饑渴，越要進一步強姦民意，幹什麼都要打著人民的名義。為什麼這種假民主的僭主都具體反對人權抽象贊成民主？因為人權狀況如何是可以檢驗的，而民主授權是可以表演的。

主制大國政府照樣可以侵犯地方利益，實行多數的專政。聯邦制的民主國家，在資源約束和人權約束之外，又增加了更強有力的主權約束，就是邦主權對聯邦主權的約束。

各邦的主權用來抵禦內部侵犯，抵禦中央政府對地方的侵犯，抵禦潛在的獨裁者對人權的侵犯；聯邦主權用來抵禦外部侵犯，抵禦其他強國對本聯邦的領土野心。密爾就是從這意義上談到聯邦代議制政府的：「不適合或不願意在同一國內政府下生活的幾部分人，在對外關係上組成聯邦往往是有好處的，既防止他們自己之間的戰爭，也為了更有效地防衛強國的侵略。」^⑨這個「他們自己之間的戰爭」，我理解，既是指各邦之間可能發生的戰爭，也是指霍布斯意義上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邦的範圍比較小，容易民主化。所以，邦的主權保障內部自由與權威的均衡，聯邦的主權保障國際權威的均衡，提高國際權威指數。邦的主權解決作為中央集權大國一部分的內部自由不足的問題，聯邦主權解決一個小邦外部權威不足的問題。在聯邦制大國，自由化動力和權威化動力不會導致國家的分裂或專制，只會引起改革和調整。

聯邦制結束了統治疆域對國內自由與權威均衡點的影響，也就是權威距離對權威落差的

⑨ [英]密爾《代議制政府》，頁二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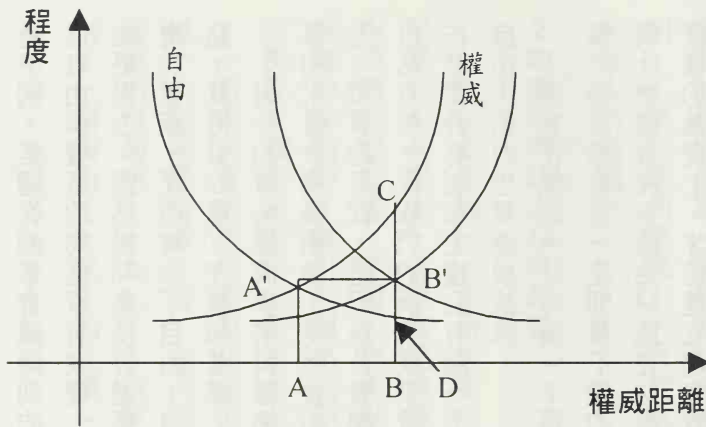
理特殊事件，只能按正常情況立法。這樣，人民就必須服從立法的需要，因為立法不能服從人民的需要和習俗。這正是國家動亂和多難的一大原因。」^⑦這也正是大國必須專制的原由，從而也是大國權威化動力強大和必須保持高度權威落差的原因。

聯邦制對大國的最重大貢獻是維護了自由化動力，但削弱了權威化動力，減少了中央政府對權威的無限渴求。托克維爾說「在聯邦制國家，就不存在上述弊端，因為國會只制定全國性的主要法令，而法令的細目則留給地方立法機構去規定。」^⑧公共事務分兩級主權政府處理，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務減少了，對資源的動員渴望會下降；邦政府根據自己的情況立自己的法，一元化讓位給多樣化，一元化動力也下降了。

聯邦制不僅減弱了權威化動力，還加強了對政治人權威極大化的約束力。我們指出過，對權威極大化衝動有兩個約束條件：一是資源約束，二是權利約束。公有制社會比私有制社會更容易極權，就是因為完全失去了對獨裁者的資源約束；無人權保障比有人權保障的社會，或者說以人權為本位的社會比非人權為本位的社會更容易極權，就是因為缺乏對獨裁者的權利約束。對一個大國來說，僅僅有資源約束和人權約束還是不夠的，一個中央集權的民

⑦〔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頁二〇七。

⑧同上。



圖十之一 聯邦制國家權威距離擴大權威落差不變

三、張力條件下的動態平衡

1. 政治均衡與三大約束條件

上文提到，聯邦制結束了統治疆域對國內自由權威均衡點的影響，也就是結束了權威距離的變動對權威落差的影響。就「自由—權威曲線」來說，權威距離或對國際權威的追求，不會使均衡點向右移動，只會使整個曲線向右平移，如圖十之一：

圖十之一表明，當一個受資源、人權和主權約束的聯邦制國家的統治疆域從 A 點擴大到 B 點時，它並沒有像中央集權大國那樣，權威將上升到 C 點，自由將下降到 D 點，而是整個曲線從 A' 點平移到 B' 點，用文字來表述就是：國家疆域擴大了，自由與權威的均衡沒有變。最能說明這個狀況的還

影響。在聯邦制被發明以後，它影響的只是外部的國際權威了。在同等條件下，權威距離與外部穩定和國際權威指數成正比。一個外部不穩定的小國要尋求與大國結盟，根據就在這裡。在結束這一節前，我們再來聽聽自稱沒有比他更熱愛聯邦制的托克維爾對美國聯邦制所唱的美妙讚歌，他的歌聲總是那麼動聽：

從領土的面積來說，聯邦是一個大共和國；但從它管理事務之少來說，它又無異於一個小共和國。它做的事情都很重要，但為數不多。由於聯邦的主權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所以這個主權的行使對自由沒有危險……

但是，在美利堅合眾國，也像在一個單一制國家一樣，工作和思想均屬自由，沒有任何東西抑制進取精神。它的政府尊重天才和知識。在整個聯邦境內，就像在由同一個帝國統治的國家內部一樣，到處是一片昇平氣象。在國外，它與地球上的各大強國並駕齊驅。它有八百多里約（約二千多英里）海岸對外商開放。由於它掌握了走向新大陸的鑰匙，所以它的國旗在遙遠的海邊也受到尊敬。

聯邦既像一個小國那樣自由和幸福，又像一個大國那樣光榮和強大。⑩

⑩〔法〕托克維爾，《美國的民主（上）》，頁二〇八—二〇九。

權約束。也只有財產和主權的個人所有制下（所謂主權的個人所有制就是人權），對國家權力的縱向分割（聯邦制）和橫向分割（三權分立）才有可能，才能對所有權力都進行限制。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自由與權威的均衡，或者說政治均衡的基礎，是財產和主權的個人所有制。

2. 均衡點與政治發展趨勢

現在必須指出，政治均衡只是一個理論抽象，一個理想狀態，沒有一個現實中的國家總是處於均衡點上。這就有點像經濟學上的供給與需求曲線，某種商品的供給與需求在現實中也很難恰好相等。不過，均衡點的存在是不容質疑的，供給與需要的均衡點決定市場趨勢，偏離均衡點時，會引起價格波動，價格波動反過來會調節商品供給和需求的數量，使之接近均衡點：價格上升時，需求會減少，供給會增加；價格下跌時，需求會增加，供給會減少。

自由與權威的均衡點決定的是一個國家長期的政治發展趨勢。當一個國家的自由大於權威（包括國際權威）時，在內部就會出現政府治理能力下降，在外部會出現不安全不穩定，甚至出現衝突。一九七三年西歐、日本和北美成立三邊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於一九七五年提供了一項報告：《民主的危機》。報告由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杭廷頓、法國社會學家克羅齊和

是美國。美國從制憲會議時期的十三個州，擴大到今天的五十個州，統治疆域擴大了數倍，但自由與權威的均衡沒有改變，今天的美國仍然和當年的美國一樣自由一樣民主，甚至更自由更民主。因為聯邦憲法經過修正，糾正了當年某些過分的權威化偏向。疆域擴大不僅沒有增加權威，反而增加了自由，沒有使美國政治體制偏離自由權威均衡點，反而更接近均衡點，就得益於建立在聯邦基礎上的三重約束，即資源約束、人權約束和各邦的主權約束。

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納曾經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短缺現象做過經典研究，他認為軟預算約束導致擴張衝動，是短缺的根本原因。他其實是想說，社會主義公有制才是短缺的原因。預算約束軟，是因為公有制下，產權界限不清，沒有人對財產負責。最硬的預算約束來自私有制。從我們的研究成果看來，公有制不僅是經濟短缺的原因，也是極權暴政的原因。在財產公有制和主權公有制（不能分割的「人民主權」）下，對國家權力的約束全部軟化，自由化動力也被連根拔掉。

洛克在他的《政府論》下篇裡，用大量篇幅闡述財產私有權，足見他的遠見卓識。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是一座開發不盡的富礦，每一代人都能從中發掘他們那個時代所需要的資源。為什麼議會民主政治只能在財產私有制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來？我們已經知道答案：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資源和人權約束。為什麼多民族大國的民主政治只能建立在聯邦制的基礎上？這個答案我們也知道了：只有在聯邦制的基礎上，才能建立起有效的主

將減少，自由的供給將增加；社會混亂，權威的供給將增加，自由的供給將減少。這就是政治的長期發展趨勢。

3. 「自由—權威曲線」下沉：政治上的「滯脹現象」

但自由與權威之間並非總是存在替代關係，也就是說並非一個缺乏，另一個一定過剩，一個上升，另一個必定下降。在社會改革時期，最容易出現自由與權威同時增加，或權威減少了，自由並沒有相同幅度的增加的情況。

一個權力結構中間大兩頭小的「棗核型」的貴族社會，一旦開始改革，最容易出現權威與自由同時增加。這有點像毛澤東在一首詞中描述的現象：「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爲三截，一截贈歐，一截遺美，一截還東國。」在這種社會中抽寶劍的在英國是國王，在日本是天皇，把貴族的權力裁爲兩截，而不是三截，一截給農奴，一截給自己。給農奴的變成了自由，給自己的變成了權威。這樣的社會很容易達到自由權威均衡點，現代化也容易成功。

在俄國和中國這樣的專制大國，是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權力不下放不能開始改革。如果權力不能立即放到平民手裡，而被中層官僚截留下來，這時就會發生權威大幅度減少，而個人自由並沒有同幅度增加的情況。這是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權力三民主治」現象：政治權力、經濟權力和社會權力沒有分離，但切成小塊下放給了各級官僚，這是一頓「免費晚

日本社會學家綿貫讓治執筆，這個報告提出了民主國家的「統治能力問題」^①，這也就是權威的問題。提出這個問題，表明西方社會的權威下降了，將出現一個權威化趨勢，以加強統治能力，或提高國際權威指數。歐洲聯盟的誕生，也是這個權威化運動的一部分。

當一個國家權威大於自由時，在內部會出現衰退，經濟增長率下降，這時候，自由化動力將會啟動。如果這是一個自由與權威接近均衡但偏向權威的民主國家，自由化動力會和平地按程序地啟動，這就是改革或政策調整；如果這是一個遠離自由的專制國家，像今天的中國，自由化動力的啟動將十分艱難，因為它缺乏改革彈性。遇到壓制的自由化動力有可能以破壞的形式發生。但是，只要這個國家不解決自由不足問題，它的長期發展趨勢就是自由化，無論什麼力量也不能阻止。它就是山上的石頭，一定要向下滾；它就是峽上的瀑布，一定要向下瀉。大家都知道水的頑固和柔軟，你擋住左邊，它走右邊；你擋住上邊，它走下邊；東南西北都擋住，它變成水氣蒸發到空中，成爲雨雲雪霧。這就是自由。自由若水也，它的均衡點在大海。

價格波動是市場不均衡的表現，社會波動是政治不均衡的表現。社會衰退，權威的供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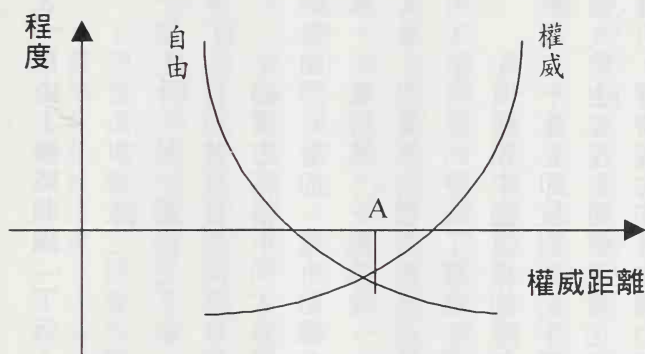
① [法]克羅齊等，《民主的危機》（中文版，求實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四月版），頁二。

4. 多黨三權：必要的張力

政黨是生產政治產品的企業，主要產品是政策，但集裝箱是自由與權威。在一個有改革彈性的民主國家，當社會出現衰退或混亂的波動時，就說明自由與權威出現了動態失衡，要增加自由的供給或權威的供給。

日常的調節在政府與國會之間進行，當兩者出現難以調和的衝突時，最高法院會起調節作用。這是三權分立的功能。一般說來，政府供給的是權威，國會供給的是自由。一個有趣的案例是美國兩大對中國廣播的中文電臺，一個是自由亞洲電臺，一個是美國之音，前者是國會提供的資金，後者是政府提供的資金；所以，前者是國會電臺，後者是政府電臺。中國當局對兩個電臺都不喜歡，但最不喜歡的是自由亞洲電臺，因為它給予最大關注的是中國的人權和自由，而美國之音，則不能不考慮美國政府的立場，要緩和中美之間的矛盾，要保護美國資本在中國的份額，為的是美國國家利益。

另一個有趣的對照是在是否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的問題上，美國政府成了中國的說客，而中國的民運人士反而成了中國國家利益的敵人，這反應的是自由與權威之間的衝突。美國國會代表著制約政府的三大約束條件，眾議院代表人權，參議院代表各州主權，美國政府則要考慮美國聯邦的利益。在美國政府看來，給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符合美國國家利



圖十之二 自由—權威曲線下沉

餐」，權力的盛宴。這不是個人的自由，而是權力的自由。一個皇帝變成了無數土皇帝，皇帝就在身邊。中國的新聞界就是這種情況，媒體數量增加了許多，記者的新聞自由並沒有相同幅度的增加。

這時，社會的權威和自由都會缺乏，就像經濟上的停滯膨脹一樣。社會停滯和社會混亂同時出現，此外還有伴隨權力自由必然帶來的腐敗現象。這可以稱之為自由與權威曲線的「下沉」，見圖十之二：

從圖上可以看到，在曲線上方，自由與權威沒有交叉點，這就是說，自由權威無法達到均衡，A點無論向哪邊移動，雖然權威和自由可以單方面增加，但都不能接近均衡點。這就是今天中國改革的困境。

個政黨更偏好自由，另外有個政黨更偏好平等，偏好平等的政黨對權威價值總有較高的評價，因為平等是要政府權力來實現的。在英國，保守黨是偏好自由的，工黨偏好平等；在美國，共和黨偏好自由，民主黨偏好平等。偏好自由的黨被稱為保守的和右傾的，偏好平等和權威的政黨被稱為激進的和左傾的。

一個左傾或右傾的政黨持續執政是危險的，這就如同一個持續右轉彎或左轉彎的人肯定走不遠甚至會走進死胡同一樣。持續右傾，自由可能過量供給，社會將不穩定；持續左傾，權威和平等會過量供給，社會將失去發展動力而陷入衰退。所以，民主國家每過幾年就要通過大選來選擇新的執政黨，目的之一，是防止權威或自由的過量供給，或及時滿足社會對自由或權威的需求。如果一個執政黨成功地使社會最大限度地接近自由與權威的均衡點，它可能繼續執政，否則，它將讓位給與它處於競爭狀態的在野黨。

冷戰結束後，西方出現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這是左傾政黨自我革新運動，也是自我平衡運動，想在自己一黨綱領裡實現自由與權威的平衡，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延長執政時間。在英國，被稱為「新工黨」路線；在美國，被稱為「新民主黨」路線。「新工黨」路線在英國造就了布萊爾政府，「新民主黨」路線在美國造就了柯林頓政府。據說，一九九八年二月，英國首相布萊爾在華盛頓與美國領導人舉行了一次政策性討論，討論之後，布萊爾表述了為廿一世紀的國際社會而達成一種中間偏左的共識的雄心壯志。這種新的努力將發展成

益；但美國國會首先要考慮的是美國在國際上的自由價值和美國各州的利益。給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就少了一個制約中國改善人權的手段，使國會失去了向全世界供給自由的一個工具。一個美國以外的大國和美國採取同樣的價值觀，符合美國和世界更長遠的利益。但代表各州利益的議員，也不能不在人權和本州主權之間保持平衡。柯林頓政府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用給予相關州以政策優惠的辦法，換取了某些議員對政府政策的認同，使這一議案在參議院獲得通過。

比國會更關心自由與人權價值的可能是選民。每個美國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時一般都要拿中國開涮，因為中國似乎是當今世界踐踏人權和自由的邪惡勢力的總代表，譴責中國可以博得選民歡心。但總統一上臺，就不得不和中國政府打交道，不得不捏著鼻子到中國去，不得不去握某些骯髒的手。目的是爲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利益，爲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和國威指數的上升。

美國是這樣，其他國家也是這樣。陳水扁和民進黨在競選過程中，對大陸的不認同達到偏執的程度，把臺灣的獨立和自由放在競選綱領的首要地位，目的是吸引選民。當選後，調子馬上緩和下來，民進黨甚至表示，如果必要，他們可以把臺灣獨立的綱領從黨綱裡刪除。這就是政府權威所要求一個執政黨必須擔負的責任，這和要求民主時的角色是不同的。

對自由與權威進行周期性調節的是政黨政治。粗略地說，在健全的政黨政治國家，總有

1. 安全——穩定假說

翻檢我從秦城監獄偷帶出來的手稿，有一張發黃的小紙片是我最珍視的。它是這本書思想的種子，上面寫著：「從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公式推論出的原理」。一共有四條：1. 規模原理，它被我後來分解為權威化假說和侵略傾向假說；2. 安全原理；3. 穩定原理；4. 自由化原理，就是我在本書中討論過的自由化假說。

關於安全原理，那張紙片是這樣表述的：「由於國家安全與權威落差成正比，受到外部威脅的社會或社會群，有向心的權威化傾向，威脅緩解或解除，有離心的自由化傾向。」這個表述自然不是很清晰，要把它討論清楚同樣需要一章的篇幅。

穩定原理也有點含糊：「由於社會穩定與權威落差成正比，不穩定的社會有擴大或者穩定權威落差的傾向；不穩定或過小的權威落差有使社會失去穩定的傾向。」

本書沒有承擔討論所有這些原理的任務，但本節的主題與穩定和安全原理有邏輯上的交叉。我們的思想歷程已經進入聯邦制，自由和權威已經在內部達到或接近均衡，也就是說，我們假定一個國家對穩定和安全的關心不會對權威落差產生長期影響，儘管這種影響在短期是存在的，甚至是強有力的，比如戰時的美國也會有總統集權和新聞鉗制，但戰爭結束，就會返回原來的軌道。做了這樣的限定，我們可以把所謂安全原理和穩定原理修改為如下的

一種回應全球秩序變遷的政策框架。他說：「老左派抵制這一變遷，新右派則任其發展。而我們應該駕馭這一變遷，使其導致社會團結與繁榮。」^⑫作為這個雄心壯志的一個例證，布萊爾政府在國內確實做了一件連保守黨一直以來都不敢做的事：給蘇格蘭和北愛爾蘭以地方議會自治。如果說給北愛自治是為了解決困難的北愛和平問題，那麼，給蘇格蘭地方自治，則是布萊爾政府未雨綢繆的遠見卓識。此舉最後埋葬了英國本土的立法權中央集權制度，「新工黨」確實讓人耳目一新。

正是這種在政府和國會之間，在左右政黨之間存在的張力，保障了民主國家的改革彈性，保障了自由和權威的及時供給，才使國家的自由與權威總是處於張力條件下的動態均衡中。

四、國威指數變動引起國家重組

^⑫ 參閱〔英〕安東尼·紀登斯，《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北京大學出版社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一月出版），正文頁一。

很多，但如果不遏制這個下降趨勢，日本朝野會越來越不安。讀完第三小節，你將會認識到，日本的不安比西歐要深，因為它的強大鄰國不僅和它有仇，還沒有完成國內自由與權威的均衡。日本爲了挽回經濟增長停滯的頹勢，加強了國內改革，在日本國鐵私有化後，又要私有化日本電訊，還推動企業內部的制度改革，把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制度等「三大法寶」漸漸收藏起來，開始採用西方式的企業激勵制度。

2. 國威指數相對下降推動西歐聯盟

三十多年來，美國傑出的政治學家杭廷頓寫過三本有世界影響的書：第一本是《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以下簡稱《秩序》），出版於一九六八年；第二本是《第三波——二十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以下簡稱《第三波》），寫於一九九一年；第三本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簡稱《文明》），出版於一九九六年。評論他的著作，我不夠資格，這裡也沒有篇幅，我只是想就他的三本書簡單談幾點理解，這些理解和我此處的主題有關。

杭廷頓的三本書都是從維護美國的價值和利益的立場出發，試圖以世界眼光對當時世界局勢作出有利於美國外交政策的理論概括，根據有利原則，他有時強調美國實際利益的一面，有時強調美國價值觀念的一面。在《秩序》裡，他強調的不是自由與民主的美國價值，

「安全—穩定假說」：

「在自由與權威的均衡政治體制下，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安全和穩定與它的權威距離成正比，當它受到利益上不一致的外部強國或強大聯盟的威脅或挑戰時，它有擴大權威距離的傾向。」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擴大權威距離」的含義。它可以是擴大聯邦或參加一個大的聯盟，也可以是征服別國領土。如果一個民主國家遇到一個或多個強權國家的挑戰，它在戰爭中也可能占領這個國家的領土，以便削弱這個國家的後續進攻能力，也就是減少對本國的威脅。比如第四次中東戰爭時，以色列占領了大片埃及和敘利亞領土。

我們還可以引入國威指數進一步修改「安全—穩定假說」：「在自由與權威的均衡政治體制下，一個國家或國家聯合體的國威指數下降，則表明它的安全—穩定係數下降，它就有擴大權威距離或進一步改革制度提高國威指數的傾向。」這個假說也可以稱之為「複合共同體化假說」，簡稱「複共體假說」。這個假說表明，一個國家或國家聯合體，如果其國威指數與其對照的強大國家或國家聯合體相比有下降趨勢，它就會產生不安全感。在可能的條件下，它要尋求新的聯盟，比如歐洲聯盟，以提高聯合體權威指數，歐洲聯盟是一個典型的政治複合共同體：聯邦和邦聯相互重疊。

不能擴大聯盟，就要革新國內制度，進一步擴大自由化動力，提高國威素質。如日本，在中國開始改革後，它和中國之間的國威指數比率一直在下降，雖然它的指數仍然比中國高

更有趣的是，二十三年後，同一個杭廷頓，忽然歡呼起民主的勝利來，但是他沒有同時歡呼他的「民主獨裁弱差別論」的破產。這沒有關係，反正他關心的是美國利益，不是他學術邏輯的一貫性。他在《第三波》裡熱情洋溢地寫道：

二十年前，世界上約有不足百分之三十的國家是民主國家，現在，百分之六十多的國家是通過某種形式的公開、公平和競爭性的選舉來建立政府的。

約在二十五年以前，威權政府（軍人政變集團、個人獨裁政權等）似乎蔚然成風，今天，千百萬以前曾在獨裁專制統治者下受苦受難的人生生活在自由之中。此外，由於歷史上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不發生戰爭，和平地帶也得到了大大地擴展，國家間衝突的可能性也大大地降低。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急速成長，毫無疑問，是人類歷史上最壯觀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變遷^⑭。

如果說二十五年以來威權政府蔚然成風，千百萬人在獨裁專制統治者下受苦受難，也有杭廷頓的一點貢獻，也許不能說是恭維他。按照他的理論，非民主國家追求「政府水平」一定遠甚於追求民主價值，只要有助於提高政府水平，可以民主也可以獨裁，誰還費心去搞民

⑭（美）杭廷頓，《第三波——二十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中文版，劉軍寧譯，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版），頁二—三。

而是為緩和冷戰的美國外交政策提供依據。在這本書裡，他把權威的價值放在優先於自由與民主的地位。這本書開宗明義第一章第一節就直截了當地寫道：「國家之間政治上最重要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形式，而在於政府的水平。有些國家政治上體現了一致性、共同性、合法性、組織、效率和穩定，而有些國家卻缺乏這些特性。它們之間的差別有甚於民主制與獨裁制的差別。一般講，共產主義的極權國家和西方自由主義的國家都屬於高效率而非虛弱無能的政治體系範疇。美國、英國和蘇聯的政府形式儘管不同，然而這三種制度的政府都在統治。每一個國家都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民衆中對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著壓倒優勢的一致意見。」^⑬

他的觀點對錯姑且置而不論，有趣的是民主或獨裁在這裡成了「政府形式」問題，而不是價值問題。既然「政府水平」上的差別有甚於民主制與獨裁制的差別，蘇美之間共同之處就可能多於美國與不穩定的第三世界國家之間共同之處，因此，為價值而冷戰，其必要性就降低了。可以說，杭廷頓的「民主獨裁弱差別論」和季辛吉的「國際平衡論」一起，為中美建交奠定了理論基礎，為緩和當時的世界緊張局勢作出了貢獻。

⑬ (美)塞繆爾·P·杭廷頓，《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中文版，張岱雲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頁一。

的定價就可以知道，它上市時，剛好比美元的幣值高一點點。這就是較勁。這次和中國進入世貿談判，歐盟作爲一個主體進入談判桌，也是想作爲一個重量級選手向中國要價，它不想落後於美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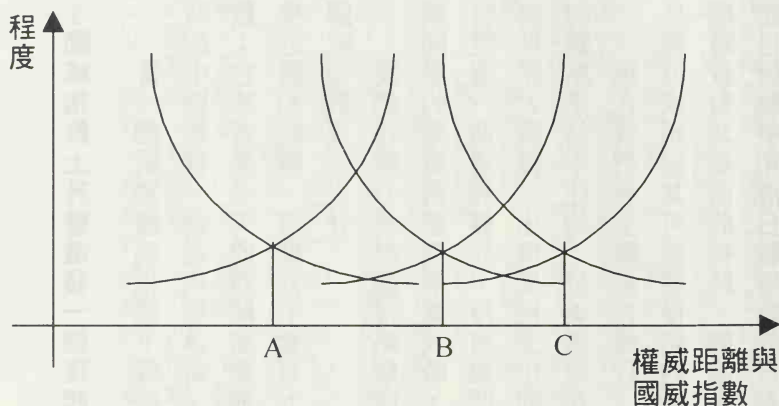
作爲美國最敏感的政治神經的杭廷頓，當然感受到了歐洲對美國的離心傾向，甚至是對抗情緒。彌合這一裂痕，可能是他寫作《文明》一書的主要動因之一。在這本書裡，他掩飾不住對冷戰時代美國教主地位的懷念，於是想用宗教衝突來代替過去的意識形態衝突，變美蘇之間的冷戰，爲美國與中國以及穆斯林國家之間的宗教戰，把世界文明的衝突，說成主要是西方基督教文明與儒教文明、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由於穆斯林世界沒有一個核心國家，那麼這種衝突，就主要變成了以美國爲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國家與中國之間的衝突。

這個看法到底有多大真實性姑且不論，但它對美國的策略價值是很大的。如果西歐接受了這個論點，則美國就從威脅源又變成了教主，這回不是「民主教」，而是基督教。杭廷頓似乎認爲，沒有美國的領導，西方文明便會衰落。要「延緩西方的衰落」「保持西方的團結」，辦法就是守住北大西洋公約，以之爲「西方文明的保障機構」。他坦率地指出：「在蘇聯威脅已不復存在的情況下，人們對西方未來的統一，特別是它對於美國對歐洲承擔的義務意味著什麼，感到憂慮。」「西方能否在政治經濟上走到一起，主要取決於美國是否再次

主？而他也沒有說明，在二十多年前被他認為和英美民主政體一樣，擁有「民衆中對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著壓倒優勢的一致意見」的蘇聯政體，何以也在民主化第三波浪潮的衝刷下，被摧枯拉朽。這些都不構成對杭廷頓的詰難，他考慮的是當時的國際關係，是對國際形勢作出怎樣的概括更符合美國的價值和利益。這一次他對民主化浪潮的歡呼，其實是對美國價值「一統江湖」的歡呼，是對全世界民主朝聖者對美國民主聖地進行朝拜的一種召喚。如果說，民主也是宗教的話，教主是美國，美國領導世界民主潮流。

遺憾的是，歐洲，特別是西歐國家不怎麼認這個教主。他們曾經認過，那是在冷戰時期。按照我前面表述過的安全原理：「由於國家安全與權威落差成正比，受到外部威脅的社會或社會群，有向心的權威化傾向，威脅緩解或解除，有離心的自由化傾向」，冷戰時，威脅西歐各國安全的是蘇聯東歐集團，所以有向心的權威化運動，要奉強大的美國為教主，與蘇聯抗衡。

蘇聯東歐解體後，對西歐各國的威脅解除了，但西歐並沒有高枕無憂。威脅還在，只不過威脅的性質和威脅源改變了。以前是來自蘇聯東歐的政治軍事威脅，現在是來自日本美國的經濟威脅。所以，西歐在冷戰後，並沒有開始離心的自由化運動，而是開始了以美國為主，要經濟對手的新權威化運動，這就是歐洲聯盟的誕生。它沒有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性質，而是邁向統一的政治經濟組織。要想知道歐洲聯盟的假想對手是誰，從歐元



圖十之三 小國通過聯邦化提高國威指數

圖十之三描繪的是三個自由與權威均衡的小國通過聯邦，擴大了權威距離，也提高了國威指數（從A點擴大到C點），但權威落差並沒有相應擴大，這就是聯邦化帶來的好處。

從羅馬帝國衰亡後，歐洲就沒有統一過。每一次統一的企圖，都帶來戰爭，規模最大的是兩次世界大戰。這次，沒費一兵一卒，只費千邑香檳；沒放導彈槍炮，只放焰火鞭炮，就實現了歐洲的聯盟。是何緣故？根本原因是西歐各國民主制度臻於成熟，自由與權威處於經常性均衡狀態。兩個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打仗，似乎成爲當代國際政治的一條公理，這個公理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的：從積極的方面說，在民主國家之間，任何問題都可以通過協商解決；從消極的方面說，民主國家的資源約束、人權約束和主權約束很硬，資源和人力不會被野心家動員爲戰爭資源。

確認自己的西方認同，並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確定為西方文明的領袖。」¹⁵

杭廷頓知道，西方自由世界的內聚力，是要靠一個共同的敵人來維持的。在古希臘，是波斯人；在冷戰時期，是蘇聯人；現在，他挑選了中國人和穆斯林。只要敵人有了，西方世界就要求美國來當領袖了，問題是美國是否願意當。《文明》這本書，如其說是寫給東方人看，不如說是專門寫給西歐人看的。北大西洋組織在南聯盟土地上實踐了一下杭廷頓理論，頭腦簡單的中國當局果然愚蠢地扮演了杭廷頓希望它扮演的角色：以整個西方為敵。

但是，中國的威脅至少在當前是虛構的，美國對西歐的經濟競爭力的威脅，遠遠大於中國和穆斯林對西方文明的威脅。各國經濟利益之間的衝突，比所謂文明的衝突要真實得多。就國際競爭力來說，中國對於西歐與其說是敵人，不如說是市場；在競爭亞洲市場時，歐洲真正的對手是美國和日本。促使西歐各國走向聯盟的，是單獨一個國家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威望指數的相對下降。爲了在國際經濟拳臺上，能與美國和日本這樣的重量級選手較量，西歐開始了聯邦化過程。

比較小的國家通過聯邦，可以擴大權威距離和國威指數，如圖十之三：

⑮

〔美〕杭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頁三五五—三五六。（亦見台北聯經版，一九九七年，黃裕美譯。）

比如兩越統一後的越共對印度支那的擴張。前者是內部革新，提高生產能力帶來的；後者是上二次征服或國家合併帶來的。

國威指數上升，對民主反動，這還不是侵略的充分必要條件，還有兩個條件值得重視：其一是，國威指數越接近世界先進水平，越進入世界前幾位，其侵略的可能性越大；其二，越是後來居上，在歷史上受其他世界強國凌辱越深的大國，其侵略的可能性也越大。它要侵略，一是要雪耻，二是要重新瓜分世界，按新的實力對比。

二戰前的德國，符合所有上述四個條件：第一，在二十世紀二十一—三十年代，德國生產能力的發展居世界之冠，國威指數急遽上升。第二，到一九三八年，德國在若干經濟指標上，已經接近或超過英國和法國，居於世界前幾位，比如，在一九三八年，人均工業化水平，德國是一四四（以一九〇〇年的大不列顛為一〇〇，下同），法國是七三，大不列顛是一五七，美國是一六七，居世界第三位；鋼鐵產量，德國是二二二〇萬噸，法國是六一〇萬噸，英國是一〇五〇萬噸，美國是二八八〇萬噸，居世界第二位；能源消耗，德國是二·二八億噸煤，法國是〇·八四億噸，英國是一·九六億噸，美國是六·九七億噸，也居世界第二位；此外，在相對的總的工業潛力和在世界製造業產量所佔的相對份額方面，德國也都僅

3. 國威指數上升會激發一個後起專制大國的擴張野心

當一個國家國威指數下降時，它將缺乏安全感。它要麼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和改革開放時的中國那樣，通過內部革新，從內涵上提高國威素質，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提升國威指數；它或者像今天的西歐國家那樣，由於內涵的國威素質潛力已基本挖盡，勞動生產率已經接近飽和狀態，短期內不會有太大提高，只好通過聯盟或聯邦，從外延上提高國威總量，使國威指數成倍上升。

我們在第七章討論侵略傾向假說時提到，當一個國家出現對民主反動時，或者說，當一個國家的權威落差突然擴大時，其侵略的可能性就會加大，並在實際上進行擴張。但我們沒有設置一個邊界條件，沒有說明是否所有國家在民主上出現反動時一定會侵略。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反民主化的國家遠遠多於侵略擴張的國家，就足以說明一反民主就侵略的觀點是站不住的：拉美國家在六〇—七〇年代普遍專制化，但沒有普遍侵略。

現在我們有了限制性條件：只有當一個國家的國威指數相對於其鄰國有大幅度上升，並且接近或超過其可能要侵略的國家的國威指數時，這個國家的專制加深或對民主反動才有可能導致對其鄰國的侵略。國威指數的大幅度上升，可能是從內涵上提高國威素質的結果，比如日俄戰爭和清日戰爭時的日本，二戰時的德國；也可能是從外延上提高國威總量的結果，

際政治的發展。聯邦制條件下的主權相對化，意味著國家共同體化了，而共同體的主權是開放的。它的開放有兩方面涵義：其一，經過一定程序，可以接納其他申請加入聯邦的政治共同體；其二，加入聯邦的各州有退出聯邦的權利。美國聯邦憲法通過後，在二百年的時間內，從原來創制的十三個州，增加到五十個州，就體現了這種開放性。

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語居民有獨立傾向，也沒有訴諸戰爭，而是訴諸全民公投。用胡平評論臺灣選舉的話說，用數人頭代替砍人頭，這是歷史性的進步。這也是主權開放的結果。

主權開放程度最高的要算歐洲。特別是英國，它是英聯邦的首腦國，自己本土也聯邦化了，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都開始實行或在準備實行地方議會自治，而英國又參加了歐洲聯盟。這種政治共同體的相互重疊和複合，是世界邁向後國家時代的一個跡象。

經濟開放必然帶來主權開放，經濟全球化也必然促進國家觀念的更新。有趣的是，馬克思所預言的許多事情，被他的信徒國家所拒絕，倒在他憤怒批判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得以逐步實現，比如消滅貧困，比如減少不平等現象，比如提高工人的福利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消亡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西方國家的主權不斷開放，國家觀念正在弱化；而宣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國當局，卻在強化國家意識，固守絕對主權論，不要說向世界開放主權了，對自己的同胞，對自己國內的少數民族也拒絕開放主權，把國家主權變成了黨官僚集團的壟斷財產，這不僅是對馬克思的背叛，也是逆世界潮流而動。

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①⑥}。

第三，德國是一個後來居上的大國，在一戰後被迫接受割地賠款的耻辱條約，而在歷次瓜分世界的浪潮中，它的獵物最少；第四，希特勒上臺，對民主進行徹底的反動。越接近上述四個條件的國家，發動的侵略戰爭規模就越大。在當今世界，完全符合這些條件的國家是少之又少，但千萬不要以為一個都沒有。

4. 主權開放：後國家時代來臨

本章內容極其重要又相當龐雜，現在我試著作一個小結。聯邦制作為一種現代政治技術，它的發明，就國內政治來說，使民主制度第一次有可能在一個超大型國家內實行。它的主要功用，是讓一落千丈的權威落差，分級下落，讓每一級的壓力相等，這意味著聯邦制基礎上的逐級自治。這樣，權威距離與權威落差之間的正比關係就告終結。

這個終結在國際政治上具有極大的意義，它不僅終結了超大型國家內部的專制統治，也終結了領土爭端中的戰爭行為。主權絕對論，相當於經濟上的個人所有權絕對論，限制了國

^{①⑥} 參見〔美〕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中文版，王保存等譯，求實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出版），頁二四二—二四五。

參考書籍中英文對照表

- A·安德魯斯 (A·Andrewes) 《希臘僭主》The Greek Tyrants
-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政治學》The politics
- 愛德華·麥克諾爾·伯恩斯 (Edward McNall Burns) 菲利普·李·拉爾夫 (P·L·Ralph) 《世界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 溫斯頓·丘吉爾 (Winston Sir Churchill) 《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Memoi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話對中共並不陌生，希望它不僅被用來指責別人，也用來自我反省。它是預言，也是勸告，還是警示，我寄希望於中國人的自省能力和中共當局裡的有識之士。

- 《第三波——二十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 【法】克羅齊 / 【日】綿貫讓治 / 【美】塞繆爾·杭廷頓 (M. Crozier, Joji Watanuki, S. P. Huntington)
- 《民主的危機》The Crisis of Democracy
- 保羅·甘迺迪 (Paul Kennedy)
- 《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梅里亞姆 (Charles Edward Merriam)
- 《美國政治學說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ies
- 密爾 (J. S. Mill)
- 《代議制政府》Utilitarianism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 《論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Laws
- 《羅馬盛衰原因論》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ecadence
- 巴林頓·摩爾 (Barrington Moore)
- 《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邦雅曼·貢斯當 (Benjamin Constant)

《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 Writings on Political Thoughts Classic

Definitions of Modern Liberal Doctrine

愛德華·吉朋 (Edward Gibbon)

《羅馬帝國衰亡史》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安東尼·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漢密爾頓、傑伊、麥迪遜 (Alexander Hamilton, John Jay, James Madison)

《聯邦黨人文集》 The Federalist A Commentary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霍布斯 (T · Hobbes)

《利維坦》 Leviathan

塞繆爾·杭亭頓 (Samuel P · Huntington)

《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變動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

《里爾克詩選》The Selected Poetry of Rainer Maria Rilke

盧梭 (J. J. Rousseau)

《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西方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權威和個人》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

喬治·H·薩拜因 (G. H. Sabine)

《什麼叫政治理論》What is the Political Theory

喬·薩托利 (G. Sartori)

《民主新論》Democratic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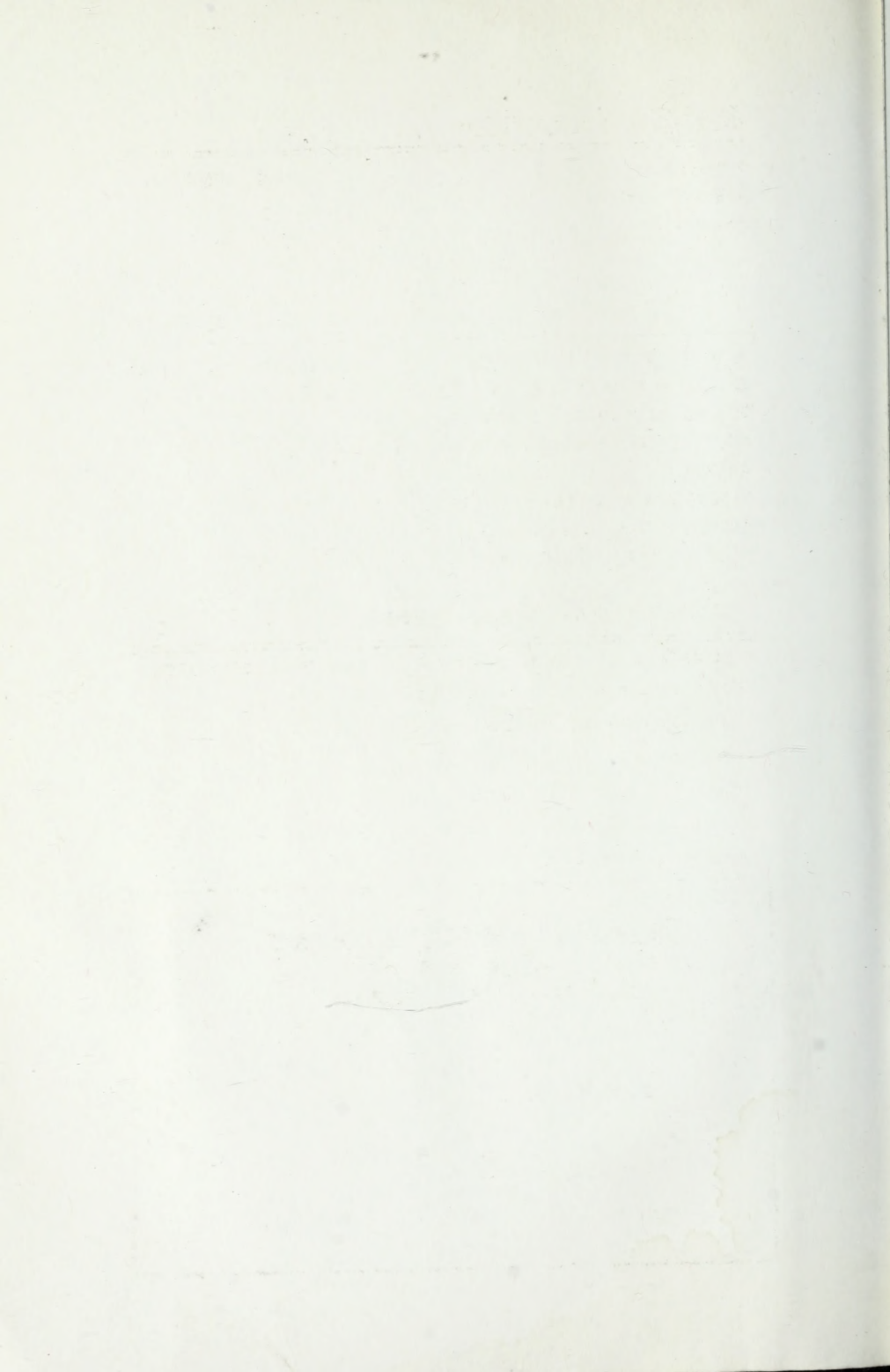
斯塔夫里阿諾斯 (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全球通史——1500年以後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 A Global History

R·特里爾 (Ross Terrill)

《毛澤東傳》Mao: A Biography

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文化叢刊

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

2001年7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吳稼祥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23620308・2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2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莊惠薰
封面設計 王振宇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257-0 (平裝)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 / 吳稼祥著。

--初版。--臺北市：聯經，2001年

408面；14.8×21公分。(文化叢刊)

ISBN 957-08-2257-0(平裝)

1. 政治制度-中國大陸

574.1

90009818



BOSTON PUBLIC LIBRARY



3 9999 04227 406 6

WITHDRAWN

No longer the property of the
Boston Public Library.
Sale of this material benefited the Library.



DEMCO

「他」進秦城監獄時似乎還是一個新權威主義者，出來的時候已變成一個聯邦論者了。他為什麼會有這一轉變？轉變的過程有些什麼曲折？這些問題都是十分複雜而有趣的，讀者必須細讀本書才能獲得答案，……我認為本書最大的貢獻是作者對於中國現狀的深入觀察。他所運用的一些感性描述詞，如「荼靡現象」、「一桶江山」、「穀倉結構」等確是既形象生動，又入木三分。這自然和他的不尋常經歷是分不開的。他不但出入過紅牆（中南海）和黑牆（秦城），而且出獄後為了謀生，還一度開過小茶館。沒有這一「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生活背景，他不可能把中國社會的上上下下都看得一清二楚。」

余英時

ISBN 957-06-2257-0



9 789570 822571

00280

